苏联大清洗内幕

陈启能

目录

历史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代序）

陈启能

一

1988 年 6 月，正当苏联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紧张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这学期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了。从 6 岁至 16 岁的学生都可以从这项决定中获益。他们不仅可以因此少开几次夜车，而且更重要的，可以少受一些欺骗。

这真是一项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苏联官方对迄今在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沿用至今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一整套说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当然不止是历史教科书，掩盖了苏联历史的真相，讲给人们听的是许多谎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消息报》热情赞扬这次取消历史课考试的决定，并尖锐地指责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不能再让谎言毒害广大中小学生了，这就是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原因。

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这是苏联当前进行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弄清楚历史和现实，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改革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苏联今天存在的、已成为改革对象的高度集权、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形成于 30 年代斯大林时期，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中间有过赫鲁晓夫等的改革尝试，但并未根本触动，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后期）反而得到加强和巩固。由此可见，苏联的这套旧的体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被舆论宣传为完美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从理论上（从哲学上、经济学上等等）千方百计得到论证。更有甚者，这个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了起来。人们知道的只是专为这个体制唱赞歌的，由斯大林审定、于 1938 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了调的不真实的历史。

今天要改革斯大林的模式，就必须要正本清源，必须要弄清现行体制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恢复历史真相，清除多年来制造的种种"历史神话"，总结 70 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真正弄清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吸取教训，因而当前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苏联的改革正式开展以来，有关苏联历史的种种问题很快就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揭露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恢复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公开性"，就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公众，敢于揭露存在的问题，如果做错了就公开承认错误。这同样适用于历史。如果对历史真相遮遮掩掩，不敢揭露，对历史上的错误不敢承认和纠正，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现实中贯彻"公开性"原则了。因为历史和现实是分不开的。

1987 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此后，在苏联舆论界就掀起了“填补空白点”的热潮。在史学界也开始了“史学改革”。

这次史学改革的先锋、莫斯科国立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尖锐地指出，党史直到现在还是按《简明教程》的公式阐述的，只有它的作者（指斯大林）一人头上罩着一贯正确的光圈，而其论敌全都被抹了黑。今天谁都明白，《简明教程》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里面照出的人，一些是被不成比例地过分夸大了，另一些却被漫画式地缩小了。里面只有巨人和矮子，其实巨人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侏儒、各种错误倾向分子和人民公敌。苏联作协会员、哲学博士 F•沃尔科夫认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在许许多多著作中被糟踏成了这种样子，以致于满篇不是空白，就是黑焦油，已经到了无法再下笔修改的地步了，因而可行的办法不是修订这部历史，而是彻底矫正这面哈哈镜。”

打碎这样的历史哈哈镜，换上一面真正的历史之镜，首先是为了现实的需要。用沃尔科夫教授的话说：“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产生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而恰恰是对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来说，‘真理’一经提出就变成了永不变化的公式，变成了铁打铅铸的模式。”一位叫 E•萨夫佐夫的副教授也认为：“需要了解事件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是为过去一些诚实的名字恢复名誉，而首先是为了今天。这里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怎样进行当今的改革。绝不能指望能把当今最先进的思想长期地同《简明教程》中那种简单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我们走向何方——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对 1929 年、1937—1938 年、1948—1949 年这些事件的根源和真正含义能否搞清楚。”

我们看到，从 1987 年起，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历史热”，至今方兴未艾。许多报刊杂志，其中《莫斯科新闻》周报、《星火》杂志等尤其引人注目，纷纷发表各种历史题材的文章、专访、回忆、资料，揭露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或者对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发表新的材料。看报成了许多苏联人每天要做的一件大事。许多报亭前，人们排起长龙抢购有新鲜内容的报刊。科学家们也开始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历史学家为填补历史上的“空白点”，在努力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 1988 年 6 月 20 日的电视讲话，仅仅这个研究院的学者在填补“空白点”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搞清楚了 100 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许多新的历史专着正在编纂中。譬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将于 1988 年秋季完稿的斯大林政治传记《胜利与悲剧》，尚未出书，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注目。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及作者的文章《斯大林现象》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此外，关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书，关于 20 年代权力斗争的书等都在撰写中。新的苏共党史也正在编撰。一些过去被禁的著作纷纷开禁解冻，得以问世。如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三部分，现在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其中一些章节已在报刊上发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反对农业合作社给斯大林的信也首次得以发表，等等。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可以说，这个问题成了苏联当前对待改革不同态度的两种力量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以至戈尔巴乔夫多次出面公开表示支持对历史真相的揭露。1987 年 12 月 2 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对苏共和苏联历史作“真实的分析，必然会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简言之，解决改革的紧迫问题”。在 1987 年 6 月 28 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严厉驳斥了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摒弃教条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理”，是“给社会主义历史抹黑”。他指出，绝不能允许改

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并强调“这是与国家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

二

在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中，在需要揭露的历史问题中，30 年代和 40 年代末、SO 年代初的大清洗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应该被恢复和填补，这不是偶然的。试想，为什么会有“被遗忘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空白点”？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枪决了，被赶出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空白点”。简言之，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主要是由“大清洗”造成的。

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万百万。究竟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确切的数字恐怕还要历史学家去考订。但据苏联一些人士估计，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譬如，苏联一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 1987 年 12 月 22 日在电视节目里说，他估计斯大林时期的被害人至少有 1500 万。如果加上进劳改营、流放、剥夺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数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据一位接近官方档案的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的数字，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 120O 万人被关在劳改营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处罚，则有约 7400 万人。这些数字是否完全确凿，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仅被处死的就不计其数。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遭到清洗处死的是无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 年举行）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83 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 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 个元帅中 3 个被杀，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 3 个被杀，10 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 个军长中 50 个被杀，186 个师长中 154 个被杀，16 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 个军政委中 25 个被杀，64 个师政委中 58 个被杀，456 个上校中 401 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大清洗规模之大和性质之严重，所以就造成苏联历史上出现许多“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如果考虑到这许多“被遗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有功勋的人（当然他们也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末就不难想象，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的话，一部苏联历史如何能够完整、真实？因此，如果要填补“空白点”，恢复“被遗忘的人物”的应有地位，恢复历史真相，就绝不能回避大清洗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首先需要“正名”。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历史。我们总习惯说苏联 30 年代的“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是如此。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例，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讲 30 年代和以后的清洗。赫鲁晓夫说的是“镇压运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等等。这同“肃反运动”的提法是根

本不同的。“肃反运动”，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不能全盘否定。而苏联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上面这句话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同时指出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滥用权力”。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深入研究，苏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以后还会更多地发表。这里不去说它。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和罪行是作了区别的，而这样区别是有道理的。譬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高度集权的宫僚行政体制，乃至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的判断和指挥错误以及外交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误，哪怕十分严重的，恐伯还应归人“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来完全错了，也造成很坏的后果（譬如 1929 至 1931 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还是多少可用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首次建设社会主义来解释。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方法、判断、措施，乃至理论都错了。唯独“镇压运动”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简单的犯了错误，而是罪行。因此，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运动”是不恰当的，这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是犯了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在事后判断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时，称之为“镇压运动”的。这是就其实质而言的。可是在当时呢？在当时难道不是作为“肃反运动”开展的？

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是同党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 年代三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 1923—1926 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1927 年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 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或称“反右倾斗争”，同 30 年代后期的“镇压运动”直接有关。“大清洗”是从 1934 年 12 月基洛夫遇害以后开始的，实际进行主要是在 1936—1938 年。

且不说基洛夫被刺案本身疑窦重重，有许多迹象表明同斯大林有关。就从后来事件发生的实际进程来说，基洛夫被刺案很快被用来作为镇压斯大林在 20 年代党内斗争中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借口。基洛夫被刺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干的。从这里开始，许多骇人听闻、难以想象的罪名被加到过去的反对派头上。大家知道，在 30 年代大清洗时期，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这可以说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标记。第一次是在 1936 年 8 月，被审的是所谓“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 16 人被枪决。第二次在 1937 年 1 月，被审的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 17 人被处死。第三次在 1938 年 3 月，被审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 21 人被枪决。1937 年 6 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 8 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都同过去的反对派有关，特别是同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因为 1929 年被驱逐出苏联，因而只能缺席审判，无法把他枪毙，但他后来在 1940 年也在墨西哥被暗杀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外国间谍，这是为了加重罪行。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在大清洗疯狂进行、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什么坏事不能发生？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的告密、诽谤，有野心的人的挟嫌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害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上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然而，总的说来，这次大清洗的主调还是要消灭党内的反对派和潜在的对手，还是同党内斗争有关，主要是同党的领导层的斗争有关。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一大，1922 年召开）选出的 26 名中央委员中，有 17 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 1919 年到 1935 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 31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2O 人死于党内斗争。

这难道是"肃反运动"？有谁能相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到 30 年代统统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大清洗发生在 1936 年以后，那时 20 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首领都已经公开承认错误，苏联也已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獗？这是说不通的。

因此，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30 年代的大清洗也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肃反运动"，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需要发动一场运动去肃清他们，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当然，关于 30 年代的大清洗，在苏联也是刚刚开始揭开内幕，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即无论是基洛夫的被暗杀，还是以后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是有明确的预定目标的，那就是要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和反对派。大清洗中的无数冤假错案，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知道，对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对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工作者和军人、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政治控制和镇压措施，是精心策划的伪造的结果。"

至于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的清洗，当时虽然已经没有 2O—3O 年代的党内反对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肃反运动"。这时期主要是两大案件，一是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被害的是当时身居要职并有上升趋势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见的干部。这样的干部要被剪除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另一起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则是一件典型的诬陷案。

只有这样理解"大清洗"的实质，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这里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学者们去认真地研究。但首要的是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敢于抛弃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概念、旧的习惯看法。要根据客观实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论结论和经验教训。这里一不要掩盖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抛弃旧的观念，建立符合实际的新观念。在苏联，当前"公开性"的执行往往和"新思维"的推行分不开，就不是偶然的了。

围绕着"大清洗"的问题，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进行分析。虽然也只是刚刚开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学的布坚科教授在 1988 年第 9 期《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过去只把这种

问题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人。可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苏联尖锐的党内斗争，难道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苏联的大清洗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似乎很难说得通。布坚科教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个问题还刚提出，很多方面还需要讨论研究。不见得这个说法就能解释许多问题。然而，重要的是，敢于打破旧的框框，真正面向实际，大胆探索，并努力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思维。

三

1937 年 2 月，布哈林在被捕前悲愤欲绝地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绝命信，请求他的妻子把这封信熟背记住。布哈林相信他的不白之冤在将来一定会被洗清。他在信中高呼："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怕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毁着党。"

布哈林是有远见的，他的坚定的信念使他相信，这团乱麻将来一定会被解开。但不知他是否预想到，这团乱麻的解开是多么的不容易。

1956 年 2 月，离布哈林的绝命信整整 19 年之后，在斯大林逝世后三年，作为"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为解开这四乱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把这四乱麻完全解开。

赫鲁晓夫严厉地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残杀无辜、大搞恐怖活动的罪行。在当时的确起了震聋发聘的作用。这个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做得不彻底，他的揭露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他对大清洗本身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三次莫斯科审判没有触及，20 年代反对派的问题没有动，这样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都依然是反革命恐怖分子、间谍特务，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这样一来，大清洗中的主要案子没有推倒，尽管也平反了许多冤案，毕竟还是留下了个大口子。这样就不可能把问题彻底弄清。因为，给人的印象必然是：斯大林的清洗还是肃清了不少真正的反革命，其错误在于"肃反扩大化"。同时，不给 20 年代反对派首领们彻底平反，不仅大清洗的实质会被歪曲，而且也势必影响对 20—30 年代整个历史真相的恢复，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意识形态争论、党内斗争等）的正确评估。

第二，赫鲁晓夫把大清洗的原因归咎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把个人迷信的产生又主要归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毫无疑问，大清洗同个人迷信是分不开的。但是，不管是大清洗，还是个人迷信，都不能单从斯大林的个性上找原因。这里面还有深刻得多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不触及体制，只从斯大林个性上找原因，这样的揭露和批判是很肤浅的，因而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第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对大清洗的揭露，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舆论的广泛发动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是秘密报告，事先既无很好的酝酿，事后又缺乏广泛的宣传讨论。直到今天这个秘密报告还没有在苏联公

开发表（有消息说苏联塘公布这个报告），而西方宣传工具却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很快就全文公布了它的内容。这样反而造成了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彻底解开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团由各种罪行组成的可怕的乱麻，但他毕竟打开了缺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曲折的，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难题很轻易地就得到解决。老实说，从赫鲁晓夫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如果不算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后曾经极短期（一共 9 天）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外，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斯大林之后的第一任新的党的领导人。布哈林寄于希望的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任，就能以对当时来说相当大胆的作法为解开这团乱麻做出了努力，这是相当不简单的。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在世时，他的统治虽然看似稳固，但由他的许多违反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做法所造成和积累起来的矛盾实际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并没有彻底解开这团乱麻。就拿布哈林来说，虽然 1962 年 12 月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佩洛夫（据说他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宣布布哈林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但 1938 年苏联最高法院对布哈林判处死刑的判决并没有撤除。至于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人，连这点松动都没有。乱麻，可能松开了一些，但依旧还是一团乱麻。

接着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长达 20 年，根本谈不上解开乱麻问题。

转机来自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1988 年，布哈林被枪决之后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在绝命书中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发出的呼吁才真正被听取，他的愿望（把他头上的污秽冲掉，宣告他无罪）才完全实现。2 月 4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撤销 1938 年对布哈林、季可夫等十人的判决。在这之前，对同一案件中被牵涉的克列斯京斯基等另十人的判决也被撤销。这样，在这个案件被判刑的 21 人中，只有雅哥达一人未被平反。雅哥达何许人也？他 1934—1936 年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贝利亚的前任，直接参与镇压的刽子手，后来被抛出作为替罪羊。如今，大清洗的受害者被平反昭雪，大清洗的直接参与者依旧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遗臭万年。真所谓，善善恶恶，自有天报。

接着，据 3 月 26 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正式撤销了 1937 年 6 月 11 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罪名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八人的判决。在此之前，1950 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也被彻底平反。这次案件没有象莫斯科审判案那样举行公开审判，被害者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也没被正式开除出党，只是收回了他们的党证。考虑到这个情况，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于 2 月 26 日作出决定，重新确认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三人的苏共党员资格。

又一个重大行动是在 6 月 13 日作出的。这一天，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定，为当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案中受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 33 名老布尔什维克恢复名誉，宣布他们无罪。

最后剩下一个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因 1929 年被驱逐出苏联，因

此在 30 年代的大清洗中没有被正式判刑，也未遭枪决。他 1927 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加上许多罪名。因此，对托洛茨基自然也有一个平反的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对他的许多活动的评价问题，当然对别的已被平反的政治家也有一个评价问题，但对托洛茨基要更为复杂，因为他 1929 年出国以后还进行了许多活动。但不管怎么说，公开性的原则、恢复历史真相的做法，对托洛茨基也应该是适用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否彻底贯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托洛茨基，要为他平反。1988 年 6 月 17 日，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著名改革派人物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政府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就属于这些人之列。"他接着指出，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阿法纳西耶夫说："至于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将有所突破，但是，这要取决于对我们的历史以及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

十天之后，6 月 27 日，苏联《共产党人》副主编奥托·拉齐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国家应该撤销对托洛茨基的间谍指控，苏联历史书中应当重新写上他的名字。但是拉齐斯不主张为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他说："我们应当停止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书中勾掉的做法，给他在革命和（革命后的）内战中应有的地位以及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地位。我们应当还他以本来面目，既不美化也不丑化。"

今天，大清洗中的主要冤案已经平反，20 年代反对派首领的不白之冤已被推翻，根据这种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真相的原则，原先的苏联历史必然要重写。在对苏联历史没有作根本的改动之前，决定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课考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围绕着"公开性"政策，围绕着恢复历史真相的做法，斗争十分激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作者声称，当前报刊上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理报》于 4 月 5 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上述文章进行迎头反击，尖锐地指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目前，这场争论虽然已经过去，但斗争并未停止。

尼娜·安德烈耶娃断言，对大清洗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揭露，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种思想恐怕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如果真正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论是苏联人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还是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就象不承认问题的存在、甚至千方百计加以掩盖并不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一样，客观存在的成就也是无法否认、抹煞的。如果要否认、抹煞成就，也象要掩盖、否认问题一样，只会延缓历史的发展，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并不能因为要实行公开性，要恢复历史真相，就一定会否定和抹煞成就。现在的问题往往是，人们在成就的掩盖下。不敢去揭露问题；或者怕否定成绩，就去讳言、掩饰问题。

一个社会也如同一个人一样。一个社会出现问题犹如一个人生了疾病。如果讳疾忌医，人的毛病就无法治愈。社会也一样，社会的弊端和毛病，如果不揭露出来，就无法找到治愈的方法。给人治病，并不是要把人治死。给社会治病也是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挖掉病灶，使

身体健康起来。如果说，社会和人在这方面还有区别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人患了病，真正要想隐瞒病情不请医生的，恐怕还在少数。而一个社会有了弊端，要下决心去揭露它、医治它，恐怕要困难得多。这里面的原因是明显的，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利害关系。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不管多么困难，有了病总得去治，早治比迟治好。

拿苏联来说，今天揭露历史上的问题，正是为了克服社会中的弊端，为了今天的改革，为了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揭露大清洗的内幕，不仅是为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历史上无辜受害的无数正直的人平反昭雪（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更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弄清出现大清洗悲剧的原因，挖掉根源，健全法制，发扬民主，保证这类罪行以后不再发生。这件事情做好了，所得到的收益是无法比拟的。

在这一点上，社会也和人一样。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任何社会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发展。过去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自然而然都是好的，怎么可能出现弊端和问题，甚至象大清洗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问题，这原本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原则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单独地出现的。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说就是苏联），旧社会的痕迹自然更要比马克思设想的多得多。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初创的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失误等种种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出现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是并不奇怪的。重要的是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头脑和比较现实的看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大工程，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总是估计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总结。目前，搞改革也是这样。但有一点十分重要。社会主义已经有了 70 多年的历史。这是一笔财富。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隐瞒，不夸大，必然会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苏联学者认为，在了解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了解为此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如果回避历史上这些痛苦的问题，那就无助于今天所要解决的民主化、公开性、遵守法纪、官僚主义等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如果以“成就”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那就是为今天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斯大林所创造的“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为他所创立的党和国家的结构、社会生活准则，最主要的是为专横武断的权力辩护。

我们看到，在苏联当前的改革巾，十分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注意革除旧政治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 6 月 28 日开幕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的长篇报告中强调，在当前面临的许多复杂；司题中，“改革政治体制是最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参政和管理国家。为此，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建立完整的法制体系、加强人民代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党政职能分开、对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进行监督等等。这个改革纲领还只刚刚提出，在实施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对公开性政策的坚决执行，这是苏联当前改革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同苏联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上的黑幕的揭露，恐怕是分不开的。

苏联著名作家阿纳托里 •雷巴科夫于 1987 年公开出版了他酝酿了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大清洗——阿尔巴托街的儿女们》。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很快被抢购一空。雷巴

科夫在谈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经济损失，但最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损失。当人的生命贬值的时候，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丧失了，道德标准消逝了，心理气氛改变了……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应当唾弃什么，我们必须摆脱什么样的桎梏。"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幕前夕，苏联 30 个城市大约 3 万人签署了一份致这次会议的呼吁书，呼吁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时期遭受镇压的牺牲者的纪念碑，以及有关这些牺牲者的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内的信息研究和教育中心。"纪念碑"倡议小组的代表、地质学家尤里·萨莫杜罗夫 1988 年 6 月 2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法律自我意识和培养我国公民具有不与罪恶与暴力相妥协的精神"。7 月 4 日，苏共领导作出决定，在莫斯科建立这样的纪念碑。

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论是功勋还是罪恶，都已经永远逝去。但历史和今天又是不可分的。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也可以成为包袱。关键就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但如何前进，速度如何，曲折多大……都同人们如何对待过去有关。

我们看到，今天，在苏联，历史又迈出了一步，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四

下面，再简单地谈一谈本书的情况。

1987 年以来，苏联报刊十分活跃，发表了许多历史反思的文章、揭露历史问题的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恐怕主要还不是历史学家，记者、哲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党政工作者、作家、各行各业的干部……纷纷投书报刊。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披露自己知道的事实，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专访，回忆自己切身的经历，公布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对不同观点进行热烈交锋……这是全民族的历史反思，是为了当前的改革回首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这里面不仅有对过去黑幕的揭露，有新鲜的历史事实的披露，更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目前许多问题还没有定论，还在争论，还在探索。但重要的正是思想、启示、求索，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对已有 70 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这个变化，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关心世界发展的人，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关心我国改革的人，都应该注视它，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此，我们决心编译《苏联历史启示录》，选择苏联报刊上最新发表的文章资料，尽快地奉献给我国读者。《苏联大清洗内幕》就是其中的第一本。

收入《苏联大清洗内幕》的文章，从内容上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在大清洗中受害人的案件情况的。这一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因为大清洗中的案件太多，涉及党政军团科学文化各个领域，我们尽可能地各个主要领域都照顾到，这样多少可以从中看到当年大清洗牵涉面之广。大清洗中的主要案件，如"布哈林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克里

姆林宫医生案件”等等，也都有收入。

第二类是关于揭露当时直接从事镇压活动的刽子手，主要是贝利亚的面目的。除了贝利亚之外，象叶若夫，以及过去揭露较少的维辛斯基等也有所涉及。

第三类是分析大清洗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结合具体事例进行分析的，文笔比较生动，并不是干巴巴的说理文章。

总的来说，可读性是所有这三类文章的共同特点。因为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报刊上的文章。文章的形式和文字都比较生动活泼。很多是对当事人或家属的采访，加上对第一手资料的摘录。这样除了可读性之外，还增加了这些文章内容的可信性。

但是文章牵涉到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可能会给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增加困难。为此，我们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以帮助读者阅读。另外，有些文章的标题我们作了更动，有的加了副标题。

由于时间匆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在翻译、编排和注释方面肯定会有不少纰缪，敬请读者们给予指正。

最后，应该指出，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苏涵、营特金、陈京宪等同志的许多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拉斯科尔尼科大案件

瓦西里·波利卡尔波夫（历史学博士）

“我很高兴收到从乌德摩尔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戈利雅内村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命名的少先队中队的来信。从他们的来信中，我得知，年轻的列宁主义者们正在大量收集革命英雄的资料，并请求至今健在的革命和内战的参加者给他们寄去关于那个英雄时代的回忆录……”

1912 年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老革命家 y·N·马诺欣的这些话，使我们回想起那个悲惨的命运，其中我们生活的不同时代离奇地交织在一起。

正象 J·特里福诺夫心爱的主人公们常说的，人是一条穿过时间的长线，是历史的最纤细的神经，可以把它劈开，可以把它分离，——也可以根据它确定许多东西。

死里逃生

白卫军把 y·N·马诺欣同萨拉普尔城的其他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一

起塞进了“水上监狱”。驳船从萨拉普尔城溯卡马河往上游开去，到艾利雅内村附近在河中心抛锚停住。底舱里的人们已许多天没有东西吃了。司务长时不时地在舱口出现，呼喊着：“谁想活，就交出政委、共产党员和水兵！”底舱里没有人叛变。囚徒们被一批批地带上甲板，枪决后尸体被扔入卡马河。

然而，正在这时，B •M •阿津指挥的师从白军手里收复了萨拉普尔。红军舰队指挥 O •O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同斯塔尔克海军上将指挥的敌军舰队激战后，率领三艘驱击舰（“灵巧号”、“坚固号”、“勤奋号”）也到达这里。1918 年 10 月 17 日，他出发去援救关在“死亡驳船”里的人。拉斯科尔尼科夫下令驱击舰降下红旗，以便伪装成自卫军的舰艇。他接近了戈利雅内。当“灵巧号”同驳船平行时，值班班长按照司令员的命令对着喇叭筒喊道：

——斯塔尔克海军上将阁下命令你们准备好。现在，我们要用拖船牵曳驳船连同俘虏去乌法。

——那红军怎么办？——押送队中有人问，——要知道，他们在萨拉普尔。

——萨拉普尔于今天早晨已被我们英勇的部队占领。红军逃到阿格雷兹去了。

停泊在码头的带轮拖船也被告知：

——根据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上将的命令，你们要牵曳驳船连同俘虏去乌法。我们将护卫你们……

在萨拉普尔码头，水兵们逮捕了白卫军的狱卒，把他们带上了岸。

囚徒们听到了脚步声和武器的碰撞声。舱门打开了。“在蓝天的背景衬托下，——马诺欣叙述道，——我们看到了身穿呢衣、头戴饰有飘带的无檐帽的红海军水兵。他注视着底舱里墓穴般的黑暗，喊道：

——同志们，还活着？

给我们放下了一部涕子。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弄得惘然若失，开始登上甲板、我们相互拥抱，吻着自己的解放者……”

下面最好还是让看到当时情景的拉里莎 • 赖斯纳来说：“……432 个步履维艰、遭受劫难、脸色苍由的人。穿过水兵的人墙走下岸来。一长串蒲席、尖顶帽、用干草捻成的帽，给这个来自彼世的人的队伍以一种稀奇古怪的形态……还在走近岸边时，他们就用因久卧腐烂的麦穗而坏了的嗓子开始唱起《马赛曲》。歌声一直到广场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囚徒们的代表向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司令员和苏维埃政权致敬。拉斯科尔尼科夫被抬在手上拥进食堂，那里已备有热食和茶。”

“然后，分给他们新的衣服。（这已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说了。——作者注）他们又急又高兴地从身上脱掉肮脏破烂的蒲席，并穿上了人的服装。很多人一扒下蒲席，立即就穿上红军眼装，并马上出发到前线去了。1918 年 11 月 7 日，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红军在激烈

的冲击后占领了伊热夫斯基工厂。参加这次冲击的，有许多被我们解放的‘驳船上的人’。其中一些人，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幸福，为了共产党，献出了自己忠于革命的生命。”

当马诺欣 1966 年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水兵们的功绩没有被遗忘，同样，那个 1918 年 10 月在萨拉普尔被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抬在手上的人也没有被遗忘。这就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建立功勋的当地戈利雅内，少先队中队要以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骄傲的名字命名。

经历三次革命

在戈利雅内建立功勋时，拉斯科尔尼科夫是 26 岁（1892 年 1 月，他出生于彼得堡一个神职人员的家庭），而在他的背后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要经历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生命往往是不够的。

“还在 1905—1906 年就读于实科中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两次参加了罢课，而且有一次还被选人学生代表团，并去找学校校长，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为此差一点被开除出校。1905 年革命第一次唤起了我的政治兴趣和对革命运动的同情，但因为我当时只有 13 岁，因此我完全搞不清楚各个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就根据情绪一般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1905 年革命期间的政治感受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强烈意识，自发地把我引向社会主义。我们家里十分艰苦的物质生活更使我强烈赞赏这些情绪。”

从 1908 年起，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十分人迷。1909 年，这位 19 岁的青年就加人了社会民主党。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的《明星报》撰稿，而当《真理报》刚开始出版时，他就成为该报编辑部的秘书。

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主义的党联系在一起，他走上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他的是严峻的考验。还在 1912—1913 年时，他就尝到了沙皇监狱和流放的滋味。

1917 年 3 月中，党派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去喀琅施塔得编辑《真理呼声报》。在进入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后，他在水兵、士兵和工人中间博得了巨大的威望。他被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

4 月 3 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参加了欢迎从国外流亡回来的列宁的人群，并一路陪他去彼得格勒。同列宁的相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兴奋地、突出地谈到这一天。同革命领袖的会见并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生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后来他有机会不只一次地去完成列宁交付的十分重要的使命。

在彼得格勒的七月和平游行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着一支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成千上万的水兵队伍。当时，临时政府正准备破坏克舍辛斯卡娅的私邸，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就设在这座楼里。中央委员会军事部委任拉斯科尔尼科夫负责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任命他为这座楼的管理主任。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曾同他商量，为了保卫革命首都免遭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军队的攻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战舰。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参加了普尔科沃战役，后来又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前去援助莫斯科起义的无产阶级。回到彼得格勒后，他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部政委。1917 年 11 月，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军宫宫衔。但接着举行的全俄海军代表大会为表彰拉斯科尔尼科夫对革命的功绩，通过决议把他从海军准时提升为中尉。

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列宁建立工农红海军。他被任命为副海军人民委员，是著名的水上远征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远征是为了把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从雷维尔和赫尔辛基转移到喀琅施塔得（以免它们落入已开始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军队之手）。

列宁委派拉斯科尔尼科夫去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去执行政府关于把黑海舰队的舰艇在 1918 年 6 月在诺沃罗西斯克港台沉的决定。当时反革命的军官想把舰艇开往塞瓦斯托波尔，那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落人德国占领者之手。6 月 28 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这次任务时说："……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由于他所进行的鼓动工作和党的工作对他是十分了解的。"

他很快就回到了莫斯科，并被党中央以特命全权代表身份派往出现危急状态的伏尔加河流域。中央发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委任状可以证明，他所享有的中央的信任是如何之大。委任状写道："俄共中央任命他为党的侦查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调查所有党员同前线的军事行动有关的行为而成立的），他有全权可以停止任何党员的任何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可以把任何党员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党员的活动与党的任务和形势要求不相符合。"

1918 年 7 月，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当时的主要战线（东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 月又去指挥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

9 月 2 日，拉斯科尔尼科夫进入刚成立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胜利地结束伏尔加河的战役以后，他于 1918 年 11 月回到莫斯科，回到海军人民委员部，但 12 月又率领一支特遣队伍被派往雷维尔进行海上侦察。拉斯科尔尼科夫乘坐的驱击舰"斯巴达克号"在雷维尔附近失事，并被英国巡洋舰包围。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全体船员被俘。他被送往伦敦，并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呆了约五个月。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坚决措施，1919 年 5 月，他被释放，用以交换早先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被俘的 19 名英国军官。

从英国回来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阿斯特拉罕一里海区舰队，后为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的司令员。在他的指挥下，这支区舰队在 1919—1920 年间进行了不少次光荣的战斗：帮助陆军在察里津取得胜利，帮助陆军保卫阿斯特拉罕，帮助陆军攻占亚历山大堡，在那里俘虏了乌克兰哥萨克自卫军残余，最后以著名的恩泽利战役结束自己的征程。

1920 年 6 月，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他曾一度赞同反对派的观点。在克服这些观点后，他在以后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地为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

1921—1923 年，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俄罗斯联邦驻阿富汗的全权代表。他以杰出的外交才能，为建立苏维埃国家与阿富汗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他是苏维埃外交家中获得

外国勋章的第一人。从 1924 年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青年近卫军》杂志、《红色处女地》杂志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的主编、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主席、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和艺术总局局长；193O—1938 年，是苏联驻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的全权代表。

拉斯科尔尼科夫以天对的文学家而闻名，写有多种政论作品、书和剧本。在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波得格勒》一书中，他以卓越的艺术形式叙述了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在准备和武装保卫十月革命中的革命功绩。

他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

4O 年代时，人民委员会前办公厅主任 B・H・邦契一勃鲁耶维奇写过一部回忆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海军》，但没有出版。20 年后，《军事历史杂志》于 1964 年发表了它的摘录。请看邦契一勃鲁耶维奇是怎样叙述他亲自知道的革命和内战年代的某些事件的：

“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一名海军军宫去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以组织彼得格勒的防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位他本人认识的、当时在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准尉叫来，详细地指示他，在诺沃罗西斯克要做些什么，要求他坚强不屈，一切以政府的名义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他一封特别授权书．要他读给指挥宫和水兵听。”

“这位被派遣的军官出色地完成了政府和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本人托付给他的使命。1918年 6 月 18 日，黑海舰队在诺沃罗西斯克被凿沉……”

在写了前面这许多以后，已没有必要再特别说明，邦契一勃鲁耶维奇所说的“一名海军军官”指的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回忆录的作者没有直呼其名，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从1938 年起在出版物上提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确切些说，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回事？为什么对这个英雄的名字这样害怕（他的遗骸已安葬在尼斯）？1963 年第12 期《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回答了这个问题。受高级党组织委派参加审查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 B・C・扎伊采夫写道：

“十七大以后，他在国外以惊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发展。由于专横枉法，不合斯大林心意的、许多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列宁主义干部、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在国内战争中认识的杰出的军事长官以及外交工作人员被莫明其妙地处死。这一切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戒备起来。他在保加利亚工作时，开始发现由叶若夫（后由贝利亚）秘密派遣的密探是怎样监视他的。

1939 年 7 月，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法国时获知，他在国内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不再受法律保护。

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开始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7 月22 日，他发表公开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坚决地为自己和其他无辜蒙难的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进行辩护。”

在 1936—1937 年期间，外交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要把他从索非亚召回莫斯科，说是要商量新的任命，一会儿说是去墨西哥，一会儿去捷克斯洛伐克，一会儿去希腊，一会儿又说去土耳其。拉斯科尔尼科夫感觉到，这些借口是“极不严肃的”（怎么可能产生另一种感觉，如果知道，譬如苏联和墨西哥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他拒绝了这些建议，声明他“对留在保加利亚很满意”。最后，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他立即返回莫斯科，答应给他某个“责任重大得多的”职位。

“1938 年 4 月 1 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在公开声明中写道，——我离开索非亚去莫斯科，并在当天把自己的行期打电话通知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住在保加利亚的所有苏联人都到火车站来送我。”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没有到达莫斯科。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关于这事，他在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说的：“1938 年 4 月 5 日，当我还没有到达苏联边境时，莫斯科已等不及了，在我还在旅途上的时候，就解除了我的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的职务。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消息我是在外国报纸上读到的。而且连最起码的礼节也没有遵守：我甚至没有被称呼为同志。我是懂得政治的，我明白，一个人被火速地解职并把这事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这意味着什么。

发生这事以后，我就清楚了，只要我一过国境线就会立即被逮捕。

我明白了，我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成了无罪的罪人。所有关于从墨西哥到安卡拉的负责岗位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圈套，是引诱我去莫斯科的手段。”

用这种可耻的、有损于国家的手段，已经引诱过许多全权代表。J・M・卡拉汉，被坚决要求接受驻华盛顿大使的职务，而当他回到莫斯科后，却被逮捕和枪决了。

B・A・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被从西班牙召回，用的借口是：他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为了使这项任命具有更大的可信性，有关的决定甚至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公布了。在报纸的读者中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公布这个决定是专门为了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一个人的。

1938 年 4 月 5 日的决定把我作为罪犯解除了职务，而我的罪行又被定死，不容引起疑惑。在这之后再到莫斯科去，简直是疯了，无异是去自杀。

在巴黎圣母院的正门上方，在其他塑像中间，矗立着圣丹尼斯的雕像。他恭顺地拿着自己的头颅。然而，我宁愿在自由中依靠面包和水生活，而不愿无辜地在监狱中煎熬而死，既然我没有可能为强加的吓人的罪责进行辩白。

拉斯科尔尼科夫留在了国外。“尽管被以前所未闻的粗暴方式解职”，他仍表现出自制力和对苏联政府的忠顺。1938 年 10 月 12 日，他被召到苏联驻法国的全权代表处。R・3・苏里茨大使告诉他，苏联政府对他“除了擅自留在国外这一条外，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建议他回莫斯科去，并向他保证，回国以后他“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拉斯科尔尼科夫清楚地知道，只要“擅自留在国外”这一条，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当时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10 月 18 日，他给斯大林寄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不承认当时这个唯一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暂时在国外的逗留“并不是擅自的，而是被迫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我任何时候也不拒绝回到苏联去。”

至于后来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从前面引证过的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中得知：

“从那以后，没有再向我提出任何新的回国要求。

我向驻巴黎全权代表处提出的延长护照的请求也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这个声明写于 1939 年 7 月 22 日——作者注）我从报纸上获悉 7 月 17 日举行的缺席审判的滑稽剧。强迫我离开索非亚，却宣布我是“逃兵”；专横地解除我的职务，却宣布我拒绝回苏联，不顾我向斯大林作的严正声明：我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不拒绝回到苏联去。

我的忠顺被宣布为‘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

这个决议再一次使人看清斯大林的司法制度，看清臭名昭著的诉讼程序的假戏真做。它清楚地表明，无数的‘人民敌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对最高法院来说，为了判处极刑，怎么样的根据就足够了。”

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意识到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一列宁主义者和苏维埃国家公民的尊严。他以这种意识结束了这个声明：

“宣布我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出于对一个不愿任人宰割而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荣誉的人的盲目仇恨。

我抗议对公正裁判的这种嘲弄，我要求公开审理案件，并要给我辩护的机会。”

他没有获得在法庭上辩护的机会。

1939 年 8 月底，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尼斯（法国南部）得了肺炎，病情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很快病人又得了脑膜炎，他没有抵住病魔的袭击，9 月 12 日与世长辞。他的遗骸被葬于尼斯城一个法国家庭的祖传墓地。

整整 25 年，在这位革命家、外交家、文学家、接受过列宁教育的政治活动家的光荣的名字上，蒙受着诽谤和咒骂。如果没有拉斯科尔尼科夫亲手写的证明（指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和给斯大林的最后公开信），这些诽谤是很难澄清的。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这封信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忘我地相信自己人民的精神力量，希望斯大林培植的专横枉法的制度被揭露和正义获胜的时刻不要很久就会到来(为了争取正义过去有几代革命者曾经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就标志着这样的时刻。1963 年 7 月 10 日，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废除了 1939 年关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决议，“因为在他的活动中没有犯罪的内容”。他被恢复了党籍，在他自觉

的一生中有 30 年是为党服务的。

最后的功绩

在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进行 25 年的隐讳和辱骂以后，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怀好意的捏造。《苏共历史问题》白纸黑字地断言，这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英雄的荣誉是白壁无暇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直到生命结束“始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苏联公民。在放逐期间，他没有做任何损害自己名誉的事。”也在当时，即 1963 年 12 月，我们还知道了拉斯科尔尼科夫 1939 年 8 月 17 日写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年代，党内也存在着健康的力量，它们不能容忍专横和对列宁主义社会生活准则的背弃，尽管这类专横和背弃行为被拔高到政府政策的高度。对经验丰富的陆海军指挥人员的残害特别引起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安。他警告说，这会削弱苏联武装力量，一旦同法西斯主义发生战争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认为同希特勒德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声疾呼地向斯大林声言：

“您用肮脏的伪造行为导演的法院诉讼，其判决的荒谬超过了您从教课书上读到的中世纪对异端的诉讼。

您强迫您的同行人以痛苦难堪的心情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们的血洼前进。在您领导下写成的骗人的党史中，您向死人、被您杀死和羞辱的人行窃，把他们的丰功伟绩据为己有。”

我们只是在现在，在探索社会生活改革进程的时候，才发现人文科学中和艺术中的停滞和教条主义。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可以帮助人们追溯这些现象的演变，揭示它们的根源，引起人们对使这些现象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的注意。不弄清楚这些因素就不可能把它们根除。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特点是，无情地揭露正在形成中的罪恶，不藉口“客观”原因而打折扣，这些“客观”原因常被蓄意用来为罪恶开脱——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这个特点正是列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为我们留下的教训。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国家精英’，——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却剥夺了作家、学者、画家劳动的最起码的内部自由。您钳制压挤艺术，使之窒息死绝。被您吓破了胆的书刊检查机关的狂暴行为和编辑们可以理解的胆怯（他们对一切都要以自己的脑袋担保）导致了苏联文学的僵化和瘫痪。作家不能出版，戏剧家不能上演剧本，评论家不能发表未经官方许可的个人意见。您扼杀苏联艺术，要它扮演宫庭谄媚者的角色，但它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赞美诗’。您培植假艺术，这种艺术令人厌烦地千篇一律，只会颂扬您的臭名远扬、令人作呕的‘天才’。平庸的写作狂肉麻地吹嘘您是生干月日的半神，而您犹如东方的专制君主陶醉于粗笨的阿谀奉承的香烟缭统之中。您无情地歼灭不合您意的天才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现在哪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现在哪里？A•阿罗谢夫现在哪里？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现在哪里？加林娜•谢列布里亚科娃现在哪里？她的罪行就在于她是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是您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只是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出版物才作为“新闻”披露了 C•J•科罗廖夫、J•C•利哈乔夫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斯大林统治的阴雨岁月由于虚妄的罪名被拘禁服刑的事。正因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发生这一切的当时所作的揭露给人的印象有多么强烈。

“您剥夺了苏联学者（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提出者（即指斯大林——译者注）写道，——起码的科学思想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创造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的人，用阴谋倾轧、闹无谓纠纷、中伤陷害等手段，使学者无法在大学里、研究所里和实验室里工作。您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闻名的杰出俄国学者伊帕季耶夫院士和奇奇巴宾是‘投敌叛国分子’，天真地想糟蹋他们的名声，实际却只使自己蒙受耻辱，因为您向全国和全世界的社会舆论承认了您的制度的可耻事实：优秀的学者逃离了您的‘天堂’，把您的‘恩赐，（住宅、汽车、人民委员会食堂用餐卡）留给了您。您残害天才的俄国学者。优秀的苏联飞机设计家图波列夫现在哪里？您甚至对他也不宽容。是您逮捕了图波列夫，斯大林！没有一个领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剧院副经理、卓越的导演、杰出的艺术活动家 BC・梅耶尔霍利德并不从事政治，但您也逮捕了梅耶尔霍利德，斯大林！”

让我们回忆一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给斯大林的公开信写于 1939 年 8 月 17 日，就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之前两个星期（这次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这时，斯大林正沉醉于有可能防止同德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幻想之中，无论在 1939 年，或者在 194O 和 1941 年，他都没有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

拉斯科尔尼科夫敲响了警钟。还在当时他就认定形势已是“临近军事危险的关头，法西斯主义的矛头指向了苏联”。他把德国和日本在西欧和中国进行的军事行动看作“只是为将来侵略干涉苏联准备进攻基地”，并认为“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在日益增长的危险面前，拉斯科尔尼科夫特别敏锐地感受到斯大林通过消灭最为可贵的干部的办法对国家国防能力的破坏。

“您知道在我们缺乏干部的情况下每一个有经验、有修养的外交家的格外可贵，——拉斯科尔尼科夫给斯大林写道，——您却把几乎所有的苏联驻外全权代表诱骗到莫斯科，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杀掉。您把外交人民委员部整个机构通通破坏了。”

陆海军的状况也没有少引起他的痛苦：

“在战争前夕，您大肆毁坏红军，毁坏祖国的爱和骄傲、她的强大的保障。您使红军和红海军失去首领。您杀死了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中培养出来的许多天才统帅，他们用最新的技术改造了红军，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在战火迫在眉睫的关头，您继续杀害军队领导人、中层指挥人员和下层指挥员。布柳赫尔元帅现在哪里？叶戈罗夫元帅现在哪里？是您逮捕了他们，斯大林。为了安抚焦急不安的社会舆论，您欺骗全国说，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为强大了。您知道军事科学的法则要求在军队里从总司令到排长实行一长指挥制，您却恢复了政治委员制。这种体制产生于红军初创期，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官，而对旧军队的军事专家需要进行政治监督。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官，在军队中实行两重政权，破坏了军事纪律。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伪善地恢复了对俄国历史上的英雄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和库图佐夫）的崇拜，指望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会比那些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对您的帮助更大。盖世太保和日本侦察机关的真正奸细利用您对谁都不信任的心理成功地在被您搅混的水中摸鱼，向您大量投送诬陷最优秀、最天才和最诚实的人们的伪造文件。在您创造的极不健全的气氛中，这里充满怀疑、互不信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面侦查和为所欲为（您把红军和全国都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折磨），在这种气

氛中，任何被‘截获’的文件，都被信为（或装作信为）不可辩驳的证据……”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这封信的前面，摘引了《聪明误》中的两行字作为题词；“我要说的关于你的真话，要比任何谎话都坏。”这里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了履行这个允诺，他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那末请看 A•H•托多尔斯基提供的统计数字：斯大林的镇压造成 5 个元帅中 3 个被杀（A•N•叶戈罗夫、M•H•图哈切夫斯基、B•K•布柳赫尔），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 3 个被杀，10 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 个军长中 SO 个被杀，186 个师长中 154 个被杀，16 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 个军政委中 25 个被杀，64 个师政委中 58 个被杀，456 个上校中 401 个被杀。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结束这封信时写道：

“您的疯狂的残暴行为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行的清单是列不完的。被您残害的牺牲者的名单也是列不完的，不可能把他们都列举出来。苏联人民迟早会把您作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叛者、主要的暗害分子、人民的真正敌人、饥荒和假案的制造者送到被告席上去。”

这位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列宁主义者革命家的愿望已经实现。党谴责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把他滥用权力的事实公诸于众。剩下来要做的事是，深刻研究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条件，研究反对个人迷信斗争的历史经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件是进行这种研究的珍贵史料。它们表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在列宁的领导下，成长了一批不可压服的战士。他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旗帜，并善于在非常情况下捍卫党的荣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这些信件向我们传达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声音。

要拉斯科尔尼科夫作出决定去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是很困难的，这点他在 1939 年 8 月 17 日的信中是承认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精神力量去克服痛苦和危险，并说出了真话，这样的真话是很少有人敢于讲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公民勇气去打破沉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党已经谴责了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后也是这样。有些学界人士对斯大林的温情的评述，已成为一种新的僵硬的公式：尽管个人迷信“在社会生活的个别领域”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损失，但是不论是个人迷信本身，还是它的后果“都丝毫也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造成的，它们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从这里引伸出的教训是，“绝不能认为下述现象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是正确的：在我们的某些科学的或艺术的出版物中，只从个人迷信现象的角度来描写生活，结果就掩盖了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C•J•特拉佩兹尼科夫在 1965 年 10 月坚持这样说。1966 年 1 月，他的转风使舵的“科学”思想又讨好地发展了前面的想法：说是太可借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影响了党和人民对“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格格不人的现象”（此处指个人迷信——译者注）的揭露，“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个人迷信时期’得到了传播”。

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这种确实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现象的分析，是同这类“思想”观点根本不同的。这类观点的灌输，对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的现象的批判的阻止，正是今天社会科学停滞的原因。不用说，科学界和宣传界的官僚主义“精英人物”依据的是党的正式文件。但是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代条件下，能不能认为苏共中央《关于消

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是充分的和十全十美的？我们难道不觉得，它似乎并没有把这种现象的全部实质揭示出来？而我们宣称个人迷信已被消除是不是太匆忙了些？”

恢复名誉后记

所有因共同的革命工作、党的工作和国务工作认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人，或者根据历史文献和著作了解他的人，无不满意地接受高级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关于恢复他苏联公民和共产党员名誉的决定。军事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在战斗的岗位上》收了他的回忆录《1917 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和《伊里奇的海军准尉的故事》。戈利雅内的少先队中队被同意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命名。应邀访苏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遗孀 M·B·拉斯科尔尼科娃和女儿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海军军事委员会、《军事历史杂志》编辑部、《星火》杂志编辑部和波罗的海水兵的亲切接待。还决定把英雄的骨灰运回祖国，并重新安葬在喀琅施塔得。在巴黎大学本部毕业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女儿，也被莫斯科大学作为进修生接受。

这种普遍崇敬已经回到十月革命英雄行列的 O．O．拉斯科尔尼科夫光辉形象的气氛，突然被 C．J．特拉佩兹尼科夫的发言毒化了。1965 年 9 月 5 日，他在莫斯科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在谈到评价个别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改造过程中“时而站到对立的立场上”）中的“主观主义情调”时，谈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

“在思想方面，他始终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驻外全权代表，他拒绝回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背叛。他为拒绝回到苏联进行辩解的信，是寄给自卫军分子的一家最肮脏的机关刊物——在巴黎出版的《新俄罗斯》杂志的。这份杂志在战前是由你们并不陌生的克伦斯基和与他合作的米留科夫编辑出版的。在战争前夕这封信在那里被广泛用来进行反苏宣传。这个背叛者与白卫军分子、法西斯败类沆瀣一气，对苏联人用血汗取得的一切和确立的一切横加污辱，抹黑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而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加赞扬。只有毫无责任心的人才会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临阵脱逃、他从苏联的逃跑看作是功绩。”

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第二次迫害，这次已经在他死后，应该成为所有尚寄希望于二十大后的改革思想的人的具体教训，也成为使那些被二十大“吓得要死”的人积极起来的信号。用 A·J·布坚科教授在《莫斯科真理报》上的说法，“阻止肃清社会上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的进程”是符合这些人的利益的。

特拉佩兹尼科夫的“揭露”的价值究竟如何呢？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它们指靠的是听众的不了解情况。这些指责首先是不符合事实的。特拉佩兹尼科夫声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似乎是刊载在。新俄罗斯。杂志上的。然而，他说的这封信，并非刊于《新俄罗斯》，而是载于《最后新闻报》。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并非在同一个出版物工作，而是在两个：克伦斯基出版的是《新俄罗斯》，而米留科夫出版的是《最后新闻报》。这当然是小事一桩。但对象特拉佩兹尼科夫这样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吹鼓手”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斗士来说，是应该知道这些“小事”的。往下还可看出，他把发表在不同出版物上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声明和信混为一谈了，也不清楚它们发表时的情况。

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没有把他的信寄给任何一家报纸，而是依照法国通用的做法把信交给“哈瓦斯”通讯社。通讯社根据一般原则通报所有报纸，因而信发表在《新俄罗斯》和《最后新闻报》不取决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选择。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这一切都不清楚，只从信件

发表在这些报纸这个事实出发，捏造出拉斯科尔尼科夫同白卫军分子有直接联系，而显然为了更加耸人听闻，又说他同“法西斯败类”勾勾搭搭。特拉佩兹尼科夫热衷于自己的这种荒诞的指责，认为可以给这位老共产党员、列宁的战友戴上一顶“背叛者”的可耻帽子。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是“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象特拉佩兹尼科夫肯定地说的那样？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在 1939 年 8 月 17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正象您知道的那样，我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在出版物上和大规模的集会上同一切反对派进行过思想上的斗争。即使在现在，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策略。”

或许，拉斯科尔尼科夫写的不是事实，对他的这个声明绝不能相信？那末请看由斯大林签名的证据——即由斯大林编辑（还有基洛夫、日丹诺夫等人）、于 1935 和 1936 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第 1 卷里的说明：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生于 1892 年）——布尔什维克，1910 年入党。在战时是海军军官。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里海舰队的领导人，肃清了白卫军和英国人在里海的势力。现在是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

这里只字未提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论什么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虽然在同一个人名索引中，给别人写的说明必定会提到他们参加反对派的事。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斯大林编辑的这一卷书的编纂者之一。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回避，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拉斯科尔尼科夫作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曾赞同过反对派的观点，但很快就放弃了。然而，这个事实丝毫也不能成为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截然相反的评价进行辩护的理由，因为列宁教导党不要因已经纠正了的错误去抨击共产党员。列宁写道：“就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刚发生之后，俄国好些卓越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去回想这些错误。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如无特殊的需要，去回想已经完全纠正的错误是不正确的。”看来，这就同完全没有必要去回想捷尔任斯基和伏龙芝在列宁争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犯的错误一样。最后，特拉佩兹尼科夫倒有更多的理由把“托洛茨基主义”扣在斯大林的头上，因为斯大林在 1918 年 11 月 6 日承认托洛茨基承担了“（十月）起义的全部组织工作”，断言：“在卫戍部队很快倒向苏维埃和巧妙地安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面，党首先应该而且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特拉佩兹尼科夫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另一指责——说他“临阵脱逃”、“从苏联逃跑”，比起前一个指责来，并没有更多的理由：这些指责在 1939 年就向他提出来了，但已被我们高级的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在重新审理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并为他恢复名誉时推翻了。

至于说到敌人利用拉斯科夫尼科夫的信，那末敌人总是要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揭露我们痛处的文件耍花招的。他们同样把揭露个人迷信的党代表大会文件、许多出版资料散布开去。令人反感的程度并不亚于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的报纸的出版物，不断刊登这些文件资料，并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注释。但今天谁也不会想到要从这些资料被翻印的事实得出如下的结论：这些资料的作者同白卫军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

列宁对这类情况持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只一次地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的态度……我们丝毫也不是看不到，这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歪曲，白卫军的爪牙会十分注意我们的坦白，——但我们说：让它去！我们从直率的和公开的真话中得到的好处将会多得多，因为我们相信，即使这是痛苦的真话，只要清楚地说出来，任何一个自觉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部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

从 1965 年以来的 20 年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再一次遭到诽谤。他的名字被从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删除。怎样才能衡量所有这一切给用革命传统教育苏联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

我们离开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光荣节日越近，就越是精神振奋地领会到我党中央下述号召的意义："苏联人民将永远怀念列宁主义者——革命家、伊里奇的战友。他们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英勇传统，并历经艰险考验，毫不动摇地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些共产主义的功臣中间，革命英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永放异彩。

（原文题为《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26 期。陈启能译）

加里宁主席的妻子

列夫·拉兹贡

原编者按】作家列夫·拉兹贡今天所讲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真实一词的通用词意是："实实在在地 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发生过。"这篇故事的作者是儿童 文学作家和批评家。这篇故事节录自他尚未发表的作品。并非想象》，这部作品写的是他在监狱和集中营 17 年（1938—1955 年）里的所见所闻。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政策牵涉到苏联整个社会、一切社会阶层——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从克里姆林宫到最偏远的原始森林中的乡村。《加里宁主席的妻子》中的悲惨故事讲的正是这样的事件之一。

星期六，夏日的黄昏早已降临，我该上路了。每逢短暂的"周末"我都到沃扎叶利去。对从第一劳改营到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 30 公里徒步行走已经习以为常。一昼夜以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冬天，我这段路程可以走得很快。冬天的道路被踩得象柏油路一样坚实，空气令人神爽，所以这几乎是马拉松一样的路程我走起来倒也轻松，甚至没有什么疲劳感。一到夏天，路面经过卡车轮子的千碾万轧变成细小的流沙，走起路来就吃力多啦。所以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搭乘顺路的汽车。

在值班岗楼前停着一辆对旅行者颇具诱惑力的汽车。这是一部仿制美国"吉普"样式的"小山羊牌"轻型越野汽车。坐上这玩艺儿只消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沃扎叶利。几小时前这辆车载来了一位大医官：我们医务室主任带来了一位上校——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我干嘛不试一试和他们一起走呢？反正我好象还有点自由，因此也还是他们的同志！……

首长们从岗楼里出来走到自己的汽车边，我走到劳改营医务室主任跟前对他说：

“少校同志！如果您的车子里有空位置的话，请带我到沃扎叶利去吧。”

医务室少校总的说来待人还不错，甚至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务行政首长。我指望的正是这点，结果没有失望。高个子上校戴着绿色肩章，上边有蛇形的医务标记。他对我彬彬有礼。我与他在车子后排并排坐下，我们的“小山羊”就沿着沙丘奔驰起来。少校和上校继续着在上车前显然已经开始了的谈话。少校大学毕业后在劳改营工作，上校则不同，他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不久。他毕业于军事医学院，一直在部队服役。当然，我从这两位上级军宫的对话中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上校会出现在古拉格。

上校说得多。他谈到自己在前线的工作，谈到同许多人的有趣的会见。他感到特别幸运的是所遇到的他的一个部下：当他在某军医处当领导时，处里的主治外科医生是加里宁的女婿。这不仅给这个军的军医处带来明显的好处，而且使和我这次同行的同伴有可能结识米哈尔•伊万诺维奇本人。他曾同加里宁的女婿一起出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被邀请到加里宁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著名的我国国家元首不拘礼节地吃饭聊天。

上校谈到加里宁的魅力、谦逊精神、原则性和在国内享有极大尊敬时，激动得声音颤抖。然后又去夸赞加里宁的女婿，遗憾地说，现在他们分开生活了，并对少校讲，他过去的这位部下目前在某地当军队的外科医生。

……这时我真是被鬼迷住了心窍！……我对上校说，加里宁的女婿现在是某条战线的主治外科医生，就在另一个城市……上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我，异常和蔼地问道：

——请原谅，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这样说，我的人格对这种态度不能忍受。于是我非常平静地回答：

——这是他的妻子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对我说的。

上校沉默了好一阵子，反复惦量着从一个过去历史清楚的人那里听到的这个意外的信息。他终于忍不住了：

——请再一次原谅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什么时候对您说的？……

……我几乎无处可退了。

——两星期以前。

这次上校沉默的时间更长。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正在进行思考。显然，这种思考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他受不了这些问题的折磨，找不出合乎逻辑的回答，于是他再一次问我：

——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纠缠不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哪儿对您说

的？

……天啊！我为什么掺和进来？！而且我们的少校也在场！鬼才知道，这场愚蠢的谈话以后会惹出什么事端？可我现在该怎么办？……

——她在沃扎叶利对我说的。

这一回上校反映迅捷：

——不，我几乎什么也不懂！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在这儿能干什么，在沃扎叶利？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又为什么要到沃扎叶利来？

……我象死人一样地保持沉默。我能回答什么？也许，这位上校不该知道这里人所众知的事情？……

——少校，您能否回答我这个问题？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在沃扎叶利干什么？

少校完全平静地回答：

——她是来探监的。

——什么，来探监的？！她来看谁？您是说来探监？

——看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关在我们这里的科梅丹茨克劳改营。

我在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中还很少看见过上校做出的这种休克性的反应。他双手抓头，说些含混不清的话，把头埋入两膝之间。然后象癫疯病突然发作，身子左右摇摆，嘴里吐出一连串不联贯的象一股湍急的河流似的歇斯底里的话：

——天啊！天啊！……不，不，这不可理解！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加里宁的妻子！全国元首的妻子！不管她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要把加里宁的妻子关进监狱，关进普通的监狱、普通的劳改营啊！！！上帝啊！多么耻辱！多么不幸！！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又是为什么？能这样吗？！那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又干什么了？！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

上校抬起头，几乎在车子里站起来。

——少校！我要认识她！您应当把我介绍给她……

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谈话在生自己的气。无论是上校歇斯底里发作的缘由，还是歇斯底里本身都没有使我特别发笑。但是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白痴般的话却差点儿没把我逗笑了。我一下子想象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怎样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怎样在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浴室里，以她独有的精细在为刚刚洗过的灰色囚衣用一块小玻璃片去清除虱卵，而在这时，上校走进来恭敬地向她做自我介绍……

要是替上校辩解，应该说，他的强烈的反应一般说来是自然的，有人情味的。国家首脑、极其令人尊敬的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妻子在一所平常的劳改营里过着一般的囚徒生活，对此，就连那些对一切都能适应的人也难以安之若素… •即使是比这位不久前才开始在劳改营工作的军医要更有知识的人，对这个消息也会感到震惊的。

类似的情况甚至也发生在莉卡的身上。正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叶卡捷琳娜 •伊万诺芙娜在我们的劳改营里。

有一天，莉卡到我这儿第一劳改营作客，她说她和一个老年的女囚犯很要好。这位老妇人是从另一个劳改营转来的，她的覆历表上写着：她只能在看管下干活。但是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医生把她分到弱体力劳动一级，因而她得以在浴室中工作，清除内衣上的虱卵并发给洗澡的人。叶卡捷琳娜 • 伊万诺芙娜住在被服间，多年的繁重劳动以后她终于有喘息的机会了。莉卡在办事处工作下班后每天都去她那里：给她捎点儿不是犯人吃的食物，和这位聪明的招人喜爱的老太太坐一会儿，说说话儿。她不是俄罗斯人，是波罗的海沿岸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很早就俄罗斯化了，不象是个女工，虽然她有一次曾说，她很久以前在工厂里作过工……对了，她的姓也完全是俄罗斯的。

——她姓什么？

——加里宁娜。

——她是米哈伊尔 • 伊万诺维奇 • 加里宁的妻子呀。

……莉卡没有象上校那样歇斯底里发作，可也绝对不相信我的话是真的……首先，不可能！其次，凭她俩的关系，她不可能瞒着她。这样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事！……

但我敢肯定不会错。虽然我并不认识叶卡捷琳娜 • 伊万诺芙娜，但她和我岳父母关系很好。1937 年夏天我们家没人再来了，无数朋友和熟人远离开我们，电话铃声不响了，这时候，叶卡捷琳娜 • 伊万诺芙娜是为数不多的继续探问我妻子奥克萨娜健康的人之一。她从克里姆林宫药房给我妻子弄来了普通凡人极不易搞到的药品。1937 年底，这个援助的来源断了：我们听到，叶卡捷琳娜 • 伊万诺芙娜被捕了。

说实在的，无论是军医上校，还是莉卡，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关在监狱里而感到极度的困惑不解。归根结底，如果连政治局委员本人也可以随便地被逮捕和枪杀，那么他们的妻子为什么就会得到豁免呢？……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斯大林怎样迷恋先进技术，但他总也摆脱不了旧的恶习：他的战友当中，很多人定该有亲人被捕。看来，最接近斯大林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的亲人（或近或远的亲人）是没有被捕过的。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一个被枪杀，一个被迫自杀；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的丈夫斯塔赫 • 加涅茨基被捕后被枪决；伏罗希洛夫的亲家（儿子的岳父母）被捕，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 • 达维多芙娜也差点被捕；众所周知，莫洛托夫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领导人）也被逮捕……这个名单还可以写下去……因此加里宁妻子的被捕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加里宁早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当我还自由的时候，他的最老最亲近的朋友、还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时的同志——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就被捕了。绍特曼一家和我很接近，我和他的儿子是朋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详情，不过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绍特曼不仅是加里宁的朋友、老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奥布霍夫厂自卫战”的领导人和接近列宁的人……他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在形式上他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无论如何他的被捕应当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形式上的同意……

事实上却是：一天夜里一些人来到绍特曼家，头一件事是问：“有武器和列宁的文件吗？”就象过去常向老布尔什维克问的那样，然后就把老人抓走了。绍特曼的妻子苦熬到天亮后，立即给加里宁挂了一个电话。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对自己的老朋友打来电话甚为高兴，在电话里快乐地说：

“喂，你终于来电话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无论是你，还是舒罗契卡都没打电话来，这多不好呀，叫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喂，舒拉契卡的神经根炎好些了吗？孩子们怎么样……”

绍特曼的妻子打断了老朋友快乐平静的话语，说：

——米沙！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今天夜里舒拉给抓走了吗？……

这样的电话加里宁不知要接到多少？

莉卡不听我的任何解释。于是我建议她下次见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时，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并以我的名义问她：知不知道绍特曼和他妻子的情况……第二天我接到从科梅丹茨克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莉卡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

——你是对的！一切都跟你说的一样！……

后来，莉卡向我讲述了她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见面时的戏剧性场面……她来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浴室，结结巴巴地转达了我的那些话……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尽管具有爱沙尼亚人的耐性，但脸色还是变得惨白……莉卡于是失声痛哭起来，问她：

——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你？……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下子搂住莉卡的脖子。两个人抱头大哭，就象世界上所有女人常做的那样。即使她们具有我们主席的妻子那样的耐性和经验，她们也会这样的。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带走”的情节很平淡，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有人从她定制衣服的服装店给她往克里姆林宫打了一个电话，叫她去试衣服。服装店里已经有人在等她了……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具有爱沙尼亚人的沉默寡言的特性，一位老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妻子的地下工作经验。她不愿意谈接到服装店打来的电话之后发生的一切。但我们知道，她被关押时的情况很糟。她的履历表几乎就是半部刑法典，其中包括

最可怕的第 58－8 条——搞恐怖活动。她的履历表被打上一个叉，这意味着，她永远要受看管，只能在看押下进行重体力劳动。在被关押的十年中，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女劳改营中可、能有的最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她是一位很健壮的妇女，从孩提时起就习惯了劳动，所以这一切都经受住了。只是当她从一个战时解散的劳改营转到这里来以后，才得以干上一份“黑”活。

在战争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生活开始出现好的变化。显然，这是加里宁为其妻不停地请求的结果。这一点也是加里宁不同于斯大林的其他“最亲密战友”的地方。莫洛托夫从不提及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女儿在人党的时候，当问及父母的情况的时候，她回答说，她的父亲是莫洛托夫，没有母亲……总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女儿尤娅和莉季娅经常去探望她。她们到来时，在居住区给她们拨出了一间房子，配置了漂亮的家俱，甚至还有地毯，她们毕竟是加里宁的女儿呀！被监禁的主席妻子也被允许在自己女儿的房间不受看管地过三天生活……

莉达第一次来的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通过莉卡邀我去“做客”。这样我就和莉达认识了。我坐着，喝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优质葡萄酒（它的味道我早已忘了），吃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美食，听着刚从莫斯科来的人讲见闻。

当听说，加里宁曾不断请求斯大林宽容他的生活伴侣，请求释放她，哪伯给他机会在临终前见上她一面……听到这些，甚至对于我来说，也感到有点可怕。有一天，苏联已经在战场上胜利挺进的时候，被老头子的眼泪弄得不耐烦的斯大林发了善心，答应说：好吧，算了吧，战争一结束就放了老太婆……加里宁一家比起其他苏联人带着更大的，也许是忐忑不安的焦躁心情盼着战争结束。就在这时，在一次这样的会见中，我知道了加里宁的女婿在什么地方，而正是这个消息引起了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心理上的危象。

三天的会见之后，被监禁的加里宁娜又被送回了劳改营。她又得重新拿起自己的劳动工具，用小玻璃片清除虱子卵。

当未来的为伟大人物歌功颂德的小说家，要描写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的感情时，请他不要忘记在斯大林的善行中写上一笔：他没有忘记这样一件小事，即他给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许诺。

差不多在战争结束后的正好一个月的时候，发来了释放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电报。可是电文中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释放她的，劳改营行政当局可以发给她一张给一般释放犯的等外身份证：不仅剥夺她回莫斯科的权利，而且还不能在其他 170 座城市居留……在匆忙向莫斯科询问之后，劳改营的头头笑容满面，殷勤地建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暂时住在他家里……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些天宁愿住在莉卡那儿。几天以后，头头们坐着一辆汽车来到莉卡栖身的破烂茅舍，他们把过去受自己管制的犯人的手提箱搬上车。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莉卡的陪伴下启程去火车站。

1945 年秋天，我去莫斯科休假时，去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几次。去她那里使我很为难，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她住在自己的女儿那里，而她女儿的房子正是我妻子奥克萨娜渡过自己短暂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我也曾在那里住过……莉季娅・加里宁娜正好住在我们过去住过的住宅的低层。每当穿过这所院子，过去的老习惯已成自然，

往往要抬眼观看我们房间的窗户，而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我的造访很高兴。她不愿意到克里姆林宫她丈夫那儿去，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明白，她不需要这样做。显然，他自己在此时也已抛弃了某种幻想。当莉卡到莫斯科休假时，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来往很多，经常一起去剧院。当莉卡回到沃扎叶里后，不断收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封封亲切的信件。

不难理解，为什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愿意住在克里姆林宫。因为她怕什么时候会偶然遇到斯大林（虽然这种机会极少）。但她终究没有能避免这种机会。

当加里宁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重病在身了。一年以后，在 1946 年夏天，他就病故了。当时我们还在乌斯季维姆拉格。我们怀着异样的心情在广播中听到和在报纸上看到，整段关于党、人民和斯大林如何爱戴这位死者的报道。在报上读到英国女王给一年前还在劳改营清除虱子卵的人发来的表示同情的电文时，心里更不是滋味……而在报刊上看到给加里宁送葬的照片时，已经使人完全感到可怕了。在灵柩后边走的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走在她旁边的是斯大林及其一班人马……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相见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叫人无法忍受的闹剧场面终于没有避免，这种场面甚至连莎士比亚在自己的记事作品中也是意想不出来的……不管询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关于她在这次会面中的心情有多么不通人情，我还是要问一问，只要有机会能再见到她。可是我和莉卡自由的时间很短，而当 50 年代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不在人间了。

＊＊＊

有一次在《儿童文学》出版社历史编辑部我遇见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她要为孩子们出一本关于自己父亲的书。和她互致问候以后，我问她：

——咱们从前见过面，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

——是的，是的，我说看着您怎么面熟呢。咱们是在疗养院见面的。不记得是在“巴尔维赫”还是在“索斯纳赫”了？

——不，那不是疗养院，那个地方叫“沃扎叶里”……

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眼里流露出悲伤和惊骇的目光，在沃扎叶里我就曾见到过这种目光。

（原载苏联《星火》周刊 1988 年第 13 期。沙增明译，陈启能校）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尤里·费奥法诺夫

由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审理一项异议引起的思考和感受。

1939 年 5 月，五位姑娘都是 18 至 20 岁。叶琳娜在有色冶金学院学习；塔玛拉在音乐学院学习；娜塔莎在医学院学习；尼娜和塔季娅娜在外语学院学习。

从时间上讲，这一法律行为只占二、三分钟……。苏联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季霍米尔诺夫简要地通报了情况。大家似乎安静了下来，但马上便举起了手：苏联总检察长提出的异议，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致通过。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同意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因为，最高法院每一位成员面的都有一份文件，说实在的，已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调查准备工作进行到这种程度：通常的法律辩论题目已经没有了；为了闲谈而讲话，在高级司法机关是不允许的……。

这项异议是关于叶琳娜·鲁希莫维奇、塔玛拉·梅德韦杰娃、尼娜·奥波科娃一洛莫娃、塔季娅娜·斯未尔加一波卢扬、娜塔莉娅·克列斯京斯卡娅的案件的。1939 年 11 月 17 日，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58 条，她们五人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决有罪。因为犯反革命活动罪。因为犯建立苏苏集团罪。她们的父亲——党和国家的高级工作人员，以及她们的母亲——不论担任什么职务的，即使是家庭妇女，也都被（按当时的说法）“带走”了。突如其来地“带走”了。

把这些姑娘连在一起的，是她们父母的命运，以及她们过去都在莫斯科第 32 中学同一个班学习过。看来只要这些，就足以对她们的案件提出第一份称为《决定》的文件了：“1939 年 6 日 10 日，我，侦缉员助手、国家安全机关的中士马克耶夫，经过侦查……认定：1. 塔·梅德韦杰娃敌视和反对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镇压的犯人的孩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加者。”

塔玛拉本人的洪词被作为证据。第一次审讯笔录上记着：她在“反革命聚会”上说：“我们的事情虽不重要，但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要组织起来。我们一起干会容易些。我们终究要互相帮助。”其实，“集团的参加者”之一已为中士提供了一个有份量的借口，用来判定反革命阴谋罪。她对女友们说：“我相信，所有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满意的。抛开我们的个人问题（父母的事）不说，那又怎么样呢？列宁所做的一切不都被颠倒了吗？”

阿尔巴特街的这些女孩子已经不是那么幼稚了。她们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开始对她们审讯时，她们就更清楚了。

我正在翻阅一些年代已久的文件。怀着一种感情……是好奇？同情？激动？害怕？我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想象到一些清景：在坚强的革命者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们面对着中士和中尉。

——我们没有反对苏维埃的言论。尼娜·洛莫娃说她的母亲没有罪过。她走到正在为自己父亲担忧的丹娘·斯米尔加身旁。

——你们还在哪里集会过？

——在丹娘那里。

——我提醒你们，侦缉的结果说明，你们参加了反苏维埃集会。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反苏维埃的言论。

新的决定："监禁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科布洛夫。"

我又翻开一叠写得整整齐齐的卷宗。审讯是从 21 点开始，23 点 30 分结束的。审讯开始——审讯结束……。

侦查员雅库申上尉的决定："梅德韦杰娃被指控为青年反革命集团的参加者……。对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洛莫娃予以拘捕。"

"为了补充侦查"，又请求上级准许延长拘押期限。下面就是补充侦查的结果：

"我承认，参加过被内务人民委员都镇压的子女的集会，明明也知道有反苏情绪，我说过攻击领袖的反苏笑话。塔·梅德韦杰娃"。

塔季娅娜·斯米尔加一波卢扬的口供记录写着：

——是的，母亲被捕后，有一次，我从学校出来，列娜说不相信母亲真的有罪。还说让我们集中起来读读列宁的书。

她们两三天后的供词：

——我承认，说过有反苏情绪的话。我现在明白，这些话足以证明我是反对苏维埃的人。

——我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因是受父母的直接影响。

就这样，这些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在父辈榜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们被击毁了。她们被击毁了。但是她们没有被击垮，同一个塔季娅娜·斯米尔加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侦缉员说（也被记在记录里）：

——难道这不有失尊严吗？你清楚地知道，根本没有任何罪，你也是同样的公民，斯大林说过："儿子不能替父亲负责"，但我还是被生活抛弃了。

是的，五人中有四人"认罪"了。娜塔莎·克列斯克斯卡娅始终否认有罪。不过，这对连续审讯方式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现在知道，她，还有其他四人，在"补充侦查"期间遭受了些什么，而为了"补充侦查"，按照法律程序定期提出呈请，并得到了处长去监狱拘押的许可。

她们都很勇敢，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这从那时"出产的"官僚主义机构作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起诉书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曾招募奥波科娃一洛莫娃来说明青年团伙的活

动，但她拒绝效力，并从事秘密活动”。这些话下面画上了红线。“应招人斯米尔加一波卢扬拒绝效力。”那些招募者干得不错——他们搜罗一些“伪造品”向上司交差。“提供情报的人”公开拒绝充当可耻的角色，以至从事“秘密活动”！不，姑娘们的心灵并没有被摧垮和败坏。

接着——是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已事先附上了卫生所的证明。实质上，在判决书下来以前，这些证明已预先决定了姑娘们的命运——证明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

无论是司法会议的记录，还是特别会议的判决书，我在“案卷”中都没有找到。有的只是在一些公文纸上简短地写着的对每个人的处置：将叶琳娜•鲁希莫维奇流放到遥远的哈萨克斯坦边疆区为期五年，将塔玛拉•梅德韦杰娃和娜塔莉娅•克列斯京斯卡娅流放到同一地点为期三年，将尼娜•奥波科娃一洛莫娃和塔季娜娜•斯米尔加一波卢扬送感化营劳教三年。九年后，即在 1948 年，叶琳娜•鲁希莫维奇和塔玛拉•梅德韦杰娃再次遭到惩罚，被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为她们恢复名誉？不，早在 1955 年曾为她们恢复了名誉。但是，当时宣告判决无罪的提法是：“由于犯罪证据不足”。这种说法意味着一个人没有犯罪，完全可以为他恢复名誉。然而，道德上有个细微差别——“无法证明”。

1987 年 12 月 24 日，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改变了措词——

“由于不存在犯罪内容”。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还审理了一起“特别案件”。格里戈里•茨维特科夫、玛丽娅•多尔弗曼一茨维特科娃、阿勃拉姆•多尔弗曼。前面两位是经济学家，第三位是列宁格勒工厂的会计，这些人职务不高，名声不大。他们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耶夫恐怖集团成员，指控他们企图在盖世太保的爪牙的帮助下谋杀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1936 年 10 月 11 日他们被判处死刑，在当天就执行了枪决。

然而，这已经是另一个历史案件了。许多冤案中的又一件……。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经常为一些人恢复名誉，为含冤而死的人平反昭雪，还给他们亲友们唯一可以归还的东西——美好的记忆。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88
年第五期，1988 年 1 月 3 日。崔丽芝译，曹特金校）

人民委员的女儿

——布勒诺夫及其女儿的案件

安·马卡罗夫

……她记起了不知在哪里阅读过的一些故事，也可能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比方说是从少先队队会上作报告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听来的。故事讲到，一些被监禁在沙皇要塞和三角堡中的革命者凭着击敲墙壁的特别暗号，相互通报消息，还讲到如何通过从外面递东西，把便条放进烤馅饼里传进来，或者用类似的方法递送锯铁窗的小指甲锉。多么幼稚、陈旧的幻想！真有意思，谁还敢这样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深层地下室里逃跑，可婶婶凭着那张扶养卡，又能给她收拾些什么东西送来呢？不过两个葱头和半块黑面包而已。能照监狱的暗号敲墙吗？她该是多么高兴啊，要是能把有关自己的一点消息递给同她一块被捕的什么人，首先是她的丈夫和十数个同龄的朋友、同班同学，那些来自斯特拉斯路、特维尔林荫路、普希金大街和高尔基大街的邻居们，或是那怕从他们谁那儿得到一句问候的话，她也会感到幸福的。可是，要是大白天在看管员死盯不放的目光下连走近铺位也绝不可能，你又怎么能用你也不明白的符号试着敲墙呢！在夜间，在这隐秘的、唯一属于你的时间里，盒子似的牢房的墙壁不断开合着，人们不时被从床上喊起来，带去进行例行的审问。

侦察员是一个姓罗多斯的人，个子不高，有一副健旺的体魄睛——她毕生都不会忘记他那火红的头发和深蓝色的眼睛——他与其说是审问，勿宁说是要她明白这一情况：1944 年 4 月他们被逮捕的这伙年轻伙伴，曾计划实施一个恐怖行动——谋杀斯大林同志。侦察员的这种逻辑——真是空前绝后的发明：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每一个平日司空见惯的细节，任何一件生活琐事，他都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它什 1 变成意味深长的引人怀疑的细节。这些细节再被上挂下连，就造成一幅臆想出来的好象真实的、似乎不可推翻的恶毒阴谋的图画。同班同学嘛？这是明明白白的，意味着他们早就暗中串通好了。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采用他们圈子中通用的名字和绰号：布巴、奥古列茨、雷布卡。很明显，这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他们秘密的地下代号。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急救车”上的担架员，——由此可以无误地推断，在城里侦察时，他的职责是监视斯大林同志的汽车。她的丈夫沃洛佳是在战地医院躺了一年的残废军人，在战争中几乎失去了双脚，他被指控为在策划的谋杀案中从前线运回了机枪。侦查员让他们相信，他们打算从一个姑娘家里的窗口进行射击，这位姑娘就住在阿尔巴特区。可是，这姑娘家的窗户面向一个偏僻的院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汽车任何时候也未必会到这里来。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侦察员难为情。这一类把一般事情都想得十分凶险的纯属捏造的揣猜，根本不顾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她被指定的罪行是何等可怕，但又是这样单纯，原来她只是打听了国家机密——斯大林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路经阿尔巴特街的行车路线。不过，她的罪行的根据是更为充足的，是无需调查的，正象人们所说，她的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因为 22 岁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布勃诺娃，是被枪决的“人民敌人”、前教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和苏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的女儿。

我们坐在俄罗斯联邦美术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会员、艺术理论家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布勃诺娃坐落在莫斯科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听她回忆着她在莫斯科监袱的单人牢房里所煞过的七年多的日日夜夜。在卢比扬卡、布特尔基、莱福尔托夫这些监袱里她都呆过。最可怕的是被隔离起来，在一个折磨人的小圈子里，充满着老是一个样子的纠缠不清的思想情绪，在生活中再也永远看不到亲近的什么人。应该说，就连在成熟的年纪这也是难以忍受的，但在那个年龄起码你已度过了不能勾销的大半生，可是在最无法自卫的青春的年华，当人还是

向整个世界坦开胸怀的时候，这会如何呢？突然间，这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四壁秃墙。然而，甚至就连在这封闭的空间，你也不可能支配你自己，因为一个无形的监视者的声音仿佛是一种最高的神秘的力量，在命令着你——坐下或者站立，走动或者停步。

住宅的窗外还是那个莫斯科：过去是石榴胡同的休谢夫大街，先前曾是斯皮里多诺夫卡的阿·托尔斯泰大街，再稍往前去，猜得出是这样一些纵横交错的胡同：科津欣胡同、三池塘胡同、帕拉舍夫斯基胡同、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现在为纪念建筑学院士改名为若尔托夫斯基大街）。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监狱的高墙也阻挡不住的思想，把她从牢房中带到了这些大街小巷。

这是一所初级小学，这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女学生就是教育人民委员安·谢·布勃诺夫的女儿。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想检查一下“十月儿童”的政治常识，就问他们：你们说说，在我国谁是管理所有工厂的最主要的负责人？谁是管铁路和轮船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回答管理所有学校的最主要的负责人是谁时，她自豪地回答：“是我爸爸。”班上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这位女老师在奶奶面前责备了她，说这个小姑娘想法多么古怪。奶奶有些不好意恩，不过承认小姑娘说的是实话。

在第 175 中，所有的人自然都知道她是人民委员的女儿。她家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所在当时是很宽敞的，课后同班同学都爱在这里聚会。

这是著名建筑师费·舍赫捷利建造的一所别致的独居住宅。当布勃诺夫一家从十月二十五日大街迁到这里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妈妈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她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有教养的、慷慨好客的家庭，从事艺术史研究，交往了一些艺术家朋友——很高兴有这所新住所，因为现在家里能够接待客人了。在那个年代，教育人民委员部不仅掌管高校和普通学校，所有文化事业都处在它的领导之下：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在父母的这所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什么人没有见过呢！老派的文质彬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易于激动的弗谢沃洛德·埃米尔耶维奇·梅耶霍尔德，阿列克塞·雅科夫列维奇·泰罗夫及其谜一般美丽的夫人阿利萨·科宁，总带着烟斗的阿历克谢·托尔斯泰，穿着海军坎肩的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以及文雅而可笑的米哈依尔·科利卓夫；还有约·奥尔别利院士、给列夫·托尔斯泰本人演奏过的小提琴家亚·戈登魏译尔和敏锐的艺术里手、画家伊·格拉巴里……

来得更经常的客人还有人民委员的亲近朋友，和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的令人吃惊的个人命运，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党报记者、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成了他个人的历史。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法布里齐乌斯、普里马科夫——这些被编成歌曲称颂的“红色元帅”、国内战争英雄，这些集团军长、师长、旅长，他们的名字为全国的所有孩子所狂热倾倒；可是对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说，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几乎是亲人。当然，他们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他曾同他们一起战斗在烈火熊熊的乌克兰草原，也曾同他们一起冒着疾风般的炮火在喀琅施塔得的冰面上行进。

大概，在苏联历史上没有一次事件，它的参加者不曾在布勃诺夫家里以亲身的可靠经历提到过第一次俄国革命使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在家乡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同米哈伊

尔·伏龙芝结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发动伊万诺夫和舒雅的织布工人投人罢工斗争，建立并训练了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直到这位传奇式的无产阶级统帅逝世以前，他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家庭问一直相互来往（有关这位统帅的过早的、奇怪而神秘的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早在小姑娘时就有所耳闻人）。

1917 年 10 月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为领导即将来临的起义选举出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该委员会。

彼得格勒铁路枢纽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具体地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17 年 10 月 25 日早晨，关于工兵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电文就是由安·布勃诺夫签署后，由铁路电报局发出的。这个电报定是发给“所有一切人”，换句话说，是发给全俄罗斯和全世界的。

顺便提一下，安·布勃诺夫是接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本人而就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说起来可笑！可以料想，这种情况是把什么样的责任放到了这位文化部门新的领导人肩上！要求他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水平！需要他有何等实事求是的品质！然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没有白白用安·布勃诺夫的名字命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曾同布勃诺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一块工作不只一年。她有这样一段证言留了下来：

“……党把这样一个人放到了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上，他先前的全部工作、他先前的整个斗争经验，保证他能有党的视野，能有对工作不是图求形式而是注重实质的习惯，能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注重所有细节并检查执行情况的能力。”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可以说从其家庭生活的经验证实了这一评价的正确。父亲很喜欢她，但任何宽纵她的事也没有做过。

当然，她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但这幸福不是事事都能满足，不了解下层人的操劳这一古典的意义，而是意味着能有丰富的感受，能见到那时代卓越的人物，也意味着笼罩着全家的那种新世界的、革命的和国内战争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同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尊重、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对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的好客和民主主义，自然地结合了起来。

经过许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她在这个令人羡慕的、在道德上同周围生活和谐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精神世界，成了在那可怕伤亡和丧失自由的年代她内心的唯一支柱和靠山。幸福的蕴积其大无比，纯洁的意志和希望潜力无穷，要不是这样，她就会在心灵上被摧毁，忍不住、也经受不了她所经历的一切。

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有着军人的气质，是一个意志坚强、有时甚至很严厉的人。他对心爱的女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锻炼她，让她做早操，同她一块作长时间滑雪行军，总而言之，训练她的独立能力。一当他沉浸于内心的另一些需要时，还几小时地给她读诗，放心爱的唱片，带她去博物馆，看图画展览会的预展等。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也到第 175 中来，但不是凭着职务，不是为检查工作和作指示而来，而不过是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到这里同教师们推心置腹地聊聊天，同孩子们逗逗乐，

聊一阵，还带着指挥员特有的那种周到的礼貌在学校的晚会上跳跳舞。

在 30 年代中期，昔日那些古典中学的建筑在“红色首都”已经所剩不多了。标准的新型中学的建筑一幢接一幢地在深宅大院中拔地而起，教育人民委员为这用红砖建成的每一层楼的出现而高兴。他也经常带着女儿到列宁图书馆新楼建筑工地来，他想要她亲眼看到，亲自了解，并终生把这一切都牢牢记住……

当时人们无论谈起什么，都为取得的每一个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甚至在捷尔仁斯基广场设置自动售汽水机，也是作为当时莫斯科的欧洲面貌而展示出来的。说到地铁，按通常观念，那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人们都为苏联工厂的产品不亚于外国工艺而兴高采烈。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少年时代只有一辆男式自行车，当时我国的工厂还不出产女车，而布勃诺夫却不愿越出原则去给女儿寻辆外国牌子的女车来。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半夜。这是人民委员在写东西：写党史和军事方面的文章，准备教科书的方案。1937 年初，他准备了即将来临的普希金 1OO 周年逝世纪念日的讲演稿。就在大剧院纪念大会前不久，他又抽时间去参加了学校戏剧的首演式，女儿同班的同学们排演了普希金写的剧，即便象通常说的没有时间，也不能不光临一下哪。

布勃诺夫庄大剧院向国内知名人士所做的那个讲话，得到了苏联全国的共鸣。别林斯基当年曾经预言，每一个时代都将对这位诗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布勃诺夫的这个报告就是作为布尔什维克时代、才诞生 20 年的苏维埃国家的见解而被人们接受的。

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时代的人开始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世界了。“高炉”、“平炉”、“对策”这些词汇，他们象是理会“森林”、“河流”那样来理解的。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些街道上成长起来的，在这里，运动员们在国际少年日排着检阅式的队列整齐通过，少先队员们身着少年先锋服装，在喇叭和洋鼓声中迈步行进；在这里，他们心急如火地去看电影《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去观戏剧《乐观的悲剧》。他们怀着到西班牙去的理想，前去援助共和主义的马德里。他们一秒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最美好的国家，如果不是有敌人的包围，这个国家就会更美好。

突然一下子议论四起，说国内的敌人几乎同国外一样多。报纸上这样写，来自高层的喉舌也这样严厉地发出了警告，每个人这样的讲话都是以这种坚定的号召作结尾：要制止、揭露、痛斥一切敌人，要把他们无情地消灭掉！敌人在人们的想象中就象是由演员法伊特和库拉科夫在电影中扮演的罕见的游客、间谍和暗害分子一样。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敌人就住在邻近的楼群里，相邻的住宅里，或者甚至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们通常穿着托尔斯泰式的男短褂和半军人上衣，常到各部委、各托拉斯、工厂和报社编辑部去上班，还常去叶夫托里亚、基斯洛沃茨克休养，为“斯巴达”运动队和“季纳莫”队叫好。敌人原来都是新建工业的骨干、“红色厂长”，获得勋章的工程师、被青年迷恋的诗人、在成千上万人的体育场受到起立欢迎的运动员。谁能相信，那些国内战争的英雄，人民爱戴的人物，昨天还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父亲的战友，原来都被列人叛徒、间谍的死亡名单？

1937 年 10 月，已不准许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参加中央全会。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事情将要到来。于是，他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他的办公室，按照那些年的习惯一直工作到

深夜。临近十二点，惊慌失措的女值班员向他的办公室里看了看。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地向人民委员报告：电台刚刚广播，他被解除了职务。

母亲心慌意乱的那种痛楚样子，特别铭刻进了她那些日子的记忆里。母亲不太懂政治，却以女人的方式本能地感到了将要临近的灾难。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记得父亲有惊慌失措的样子。相反，命中注定被解职以后，他竭力振作起来，不愿承认自己已不在职，他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来安慰家里人。他说，他早就向往着要到远东去工作。有一天傍晚，他给女儿带回来了一个用薄纱作的玩具——一只很好看的、非同寻常的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公火鸡。他一般很爱民间艺术——薄纱制品、有金底带花叶图案的木器，特别是小型精致的帕列赫彩画。

1937 年 10 月 23 日早晨，叶莲娜 • 安德烈耶芙娜打算去上学。她按通常习惯想往父母亲那里去看看，但奶奶丧魂失魄地叫住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夜里有人把父母亲两个一块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了。现在在他们那边，还正在继续搜查。一个在披风的袖上带着盾和剑标记的年轻军人安慰他们说：要相信，主人很快就能回来，不过是检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但要严格提醒一句，他们的房间不能随便进。机关工作人员从房里推出自行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叶莲娜 • 安德列耶芙娜试图抗议："这是我的东西。"她得到的回答是："怎么是你的？这是男车。"她当时还不知道，在父亲一生送给她的所有礼物中，只有这只五颜六色的公火鸡——薄纱玩具，给她留了下来。

人就是这样，即使遇到不幸，在悲痛欲绝、毫无希望之中，也能找到哪怕一点点什么乐趣。就说叶莲娜 • 安德烈耶芙娜吧。她在孤独中象翻阅日记似地逐一回忆着她早早成熟、早早同家人、同童年、同亲爱者、同心爱之物分别，同构成她无忧无虑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切分别的那些可怕的日子，想起关于她父亲是"人民敌人"的消息在班上和学校并没有使任何人疏远她的情形。固然，她没有被接收人团，因为要人团必须同被捕的父母断绝关系，而这样做，她联想也没有想。当 60 年代初她被接纳入党的时候，对父亲、对这位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忠诚，成了能使她人党的最好的条件。同班同学和老师对她特别友好和温暖。要是没有发生可怕的灾祸，可能她迄今也不会晓得，她有多少真正的同志。她在监狱中回忆着他们，思量来思量去，仿佛觉得有些奇怪，但恰恰是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培育成了有原则的高尚的人，他们不会抛弃朋友，而这些朋友在一夜之间却受到这同一苏维埃政权的怀疑。

有关父母亲命运的消息怎么也得不到，无论是书信、便条，也无论是什么片片断断的一言半语都没有。就连可能的诉讼程序的公告也得不到。有经验的人压低声音，悄悄解释说，这意味着前人民委员和他的妻子未经审判和侦查就被特别会议判决了。为什么要判决，联想想这一点就感到毛骨悚然。

叶莲娜 •安德烈耶芙娜同年迈的奶奶一块迁到了婶婶那里，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的公寓里。在学校里她是"优等"生，课后却得去挣些额外收入，到绘画合作社去给领袖肖像上色和修版。在那个年代，需要许许多多新的，以前为人民所不知的肖像。可是有那么一幅像却总是比其他别的肖像更常遇到。当世界著名作家里昂 •福伊希特万格向斯大林暗示这一点时，后者却狡猾地窃笑着答道，他不能拒绝当代人出于纯朴的感情要求到处陈列他的画像的愿望。

不管怎样，多多少少也是多亏这种习惯，孤苦伶汀的叶莲娜 • 安德烈耶芙娜得以勉强凑合度日，并且以优等成绩在中学毕了业。当时还没有金质奖章，但有带金黄条条的荣誉毕业

证书。

……夜间被传去审问的事已经停止。侦查员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也不再能吓住她了。在她看来，这个侦查员简直是在编造卑劣的侦探小说。她有一种人什 1 把她忘掉的感觉。不会再有审讯了，她明白这一点；但也应该哪怕有个什么解决办法啊！采取这样的折磨原来也是可能的：给你个真象不明。犯人逐渐完全被切断了同活的生活的联系，同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一切的联系，也被断绝了一切人际关系，亲近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她在何处和发生了什么事。有关那些敬爱的人们的消息她也一无所知，他们都在人世吗，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时刻，甚至以为任何判决都是一种解脱。那怕是集中营，哪怕是科雷马，只要不是这深层地下室的令人厌恶的四壁秃墙！是父亲的坚强性格挽救了她。是那种控制自己、支配思想的能力拯救了她，一下子把她的思想引向了得救的航道。

这里就是落满树叶的果戈里街心公园。她常沿着这里的路从学校回到自家的新住所。这就是索科利尼基，哲学、语言和文学研究所——当年著名的“哲文史所”（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最初这里不想接收她，后来到底还是把她接纳到了艺术史研究室。一下子战争爆发了。最早的空袭警报，最初是训练性的，后来就是真的了。象妈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一样，她上完了护士训练班，只是没有条件戴着额上饰有红十字的白色护士头饰到库兹涅茨克桥拍个照。这是什么样的头饰啊……空袭时候，只得在地铁中值班，把孩子和老人分散安置在车厢中。有些人害怕地叫：“您把我们往哪儿领啊？”对其他的人，则不能不径直安插在莫斯科人喜欢的索科利尼基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上。“乘地铁从索科利尼基到高尔基公园……？”在战前，马乔索夫这样唱道，那是另一种生活。而在 1941 年秋，整个地铁线路都成了避弹所，变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疾病、眼泪、谩骂、抱怨声和希望的巨大集中营。不，只有在单身牢房中才能懂得这拥挤、人群、甚至人们普遍惶惶不安的全部乐趣。只有在这里才能想念十一月里冰冻如铁的房顶，才能想念这房顶被德寇燃烧弹的化学火焰照得亮彤彤的情景。就连在塔尔多姆附近的劳动战线上采伐木材，那是在酷寒中，这路阻塞而又饥肠辘辘，就是回想这些，也是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可是，正如过去发生过的一样：一切都又这样同时发生了：战争、青春、恋爱、在黑糊糊的窗下、在烧红的小炉子周围的聚会、朗诵诗、唱歌、从战场回来的同班同学的故事，他们尽管受伤，尽管残废，但还活着，预感到胜利的来临，都满怀着文学创作和写电影脚本的庞大计划……这一切都被打断了，在 1944 年 4 月他们都被抓去了，所有的同伴伴们——12 个姑娘和小伙子，这些莫斯科市中心的孩子们。还有她丈夫的母亲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妇女。

她的思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牢房里……

现在在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指给我看她们全家的照片。许多照片都是档案馆工作人员在 60 年代赠给她的。要知道，这是人们保存下来的，尽管他们在铁的恐怖的威胁下，由于担心告密，曾有可能把这一切全部消灭、烧毁或者毁坏。在这本家庭像册巾看到在那些书籍和博物馆陈列架上令人熟悉的人物照片时，有种令人吃惊的感觉，伏龙芝、图啥切夫斯基、雅基尔、加马尔尼克、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旁边就是安德烈•布勃诺夫。他穿着军大衣或者同人谈话时常穿的那种指挥员便眼。他是工农红军中传奇式的人物——旅长、集团军长、组织家和统帅——中的一个。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有一次把她带到捷尔仁斯基广场一栋房里一间极其威严的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用老爷的架式问她，她还记得她父亲吗。她回答说，记得并且会永远记住。在大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注意地看了看她，命令把她带走。“你为什么这样带挑衅性？”——事后侦查员这样训斥她。——“你知道你是同谁说话？！是同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你应当追悔！断绝关系！可不能同敌人不分血亲！”

在被监禁七年半以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被草草发落终生流放。好象押解危险的恐怖分子一样，她被三个中尉和两个士兵押解着。在到达巴尔瑙尔以后她才知道，她无权越出城界，如果违反要关 25 年集中营。还告诉她，她作为行政流放犯必须在初到时每星期，一段时间后每个月向卫戍司令注册一次。这样，这位人民委员的女儿在生活中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应当生活下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无论什么工作也不拒绝，忽儿被安置在博物馆，忽儿又被调进图书馆。她还同天文馆馆长一块，在各俱乐部和红角已跑来跑去，亲自讲课、参加座谈。从家庭传统上说，她倾心于画家和雕塑家，在流放者当中，幸亏也有这样的人。

在 50 年代中期，一个令人震惊的传闻飞到了阿尔泰地区：人们在莫斯科见到了布勃诺夫。不，不，很确切，在国家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委员会上。是出版社领导人中有人来巴尔瑙尔亲自讲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晓得这消息可信不可信。命途多舛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往往靠传闻得到安慰。他们同人民的灾难、战乱、逮捕和大迁移一起，从车站到车站，从临时营棚到小农舍，和着歌声、寓言、在士兵当中和集中营里流传的民间创作，在全国到处流浪奔波。这种民间创作离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日还很远，然而先前那残忍冷酷的时代也已过去。在 1956 年，她同所有苏联公民一样，手上有了正常的护照。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到了莫斯科，她投宿在一个女朋友家，这个女朋友也刚服满刑期。她给党的检查委员会拨了电话。对方回答她，我们正在全国寻找您，立即赶来吧。她急奔老广场而去，得到了值得庆幸的消息：她的父亲，教育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根据苏维埃和党的路线在死后被恢复名誉。但是，关于布勃诺夫到国家教育出版社去的传说也弄清楚了。去的原来是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叔叔，她父亲的兄弟。战前时候，在所有这些悲剧发生之前不久，他的妻子曾写过一本法语教科书，为此他前去询问，看能不能再予重版……

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得到了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个电话号码。从听筒中听到了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熟悉的一个声音，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激动地叫了起来：“您好，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了，我是布巴。”她 1922 年生在罗斯托夫，当时在那里安·谢·布勃诺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两家同住在一套住宅里。

当她跨进伏罗希洛夫办公室的时候，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哭了起来，这个在婴孩时常常被他抱在手上、在小姑娘时总是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女子，又不知怎地从天而降了。她在国务办公室坐了不下一个小时，伏罗希洛夫给她讲着有关她父亲的事绩，讲着他们战斗的青春，回忆着布勃诺夫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宅，这中间他不住地擦拭着眼泪。

只是当她回到朋友们身边回答着他们的各种询问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才考虑到，她有关自己和当前处境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向国家元首讲到，她也没有来得及请求给她什么帮助。

然而，渐渐地，一切都安顿下来了。被恢复名誉之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莫斯科得到了住所，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艺术理论研究室。教授和教师们、科学工作者们，所有记得她父母亲、先前同他们工作过的人们，都努力给她提供帮助。这不是由于她的请求，这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出于想通过哪怕一点个人的行动能为肯定历史正义以尽绵薄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愿望。

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回来的人，那些年代在街上是不难辨认的。他们对久被他们遗忘的正常生活的适应情况是不同的。一些人无论如何总不能抹去心灵的创伤，他们虚弱无力，要重新温暖自己，就好象仍旧感受着那远方冰土的切肤寒意。相反，另一些人却力图更久地延长那突然降临的悄然自得的遥消状态和那碌碌尘世漠不关心的状态。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属于另一类恢复了生命活力的人。

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都是生平第一次。大学，展览会和图书馆庄严的大厅，各种会议上嗡嗡的嘈杂声，首映式的喧闹，巴特里阿什水池寂静的夜晚。还不习惯那种恢复过来的肩负着国家责任的幸福感。她学习，在博物馆工作，从事我国陶器和瓷器史研究，来往于工厂之间，结识技师，写书。她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现在 26 岁，是斯特罗加诺夫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艺术家之家，莫斯科式的舒适的住宅。在这里，雕塑家的丈夫、艺术理论家的妻子、复制绘画的儿子，兴趣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墙上有蓝色的格热利陶器和魏氏瓷器、圣象画、风景画和版画，书籍中有雕塑肖像的原作摹本。还有那只完好保存着的神话般的雄火鸡，这个因时间关系而变得色调发暗的薄纱玩具。

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告辞以后，我在街上突然想起寄到编辑部的一封信。用整个家庭名义签署的这封信的作者对目前报纸上关于过去悲剧事件的评论文章感到气愤。他认为，所有无辜死去的、被逮捕被流放的人，他们都“活该”受苦。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充满骄傲情绪。你们看到了吗，他们不想做小螺丝钉，一心想维护自己的个性。为此，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下场。我不晓得这种奴性的观点流行的程度有多广，但我知道并且坚信，革命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为自由劳动、自由思想而生时，才能开始。社会主义——这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们对生活的安排，是千百万独一无二的独特个性的意志体现，这些个性把人自身的尊严同正义社会的尊严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四周是莫斯科。一栋栋的独家住宅，一条条的小巷，一座座可以穿行的院落，一所所 40 年代还被认为是新式建筑的砖砌的学校，还有不久前刚刚拔地而起的大厦。

（原载苏联《苏维埃文化报》1988 年 3 月 8 日。马龙闪译）

鲁祖塔克案件

伊戈尔·东科夫亚历山大·尼科诺夫

扬·埃尔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887—1938 年），争取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战士，坚强

的布尔什维克，著名国务活动家，在短暂的一生中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巩固做了许多工作，在党和人民中间留下美名。

扬出生于一个拉脱维亚雇农的家庭，当过一个富裕的田庄主的牧童。曾有两个冬天上过教堂附设的小学。16 岁的扬同主人第一次发生冲突，就丢下工作，违背父亲的意愿购了，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带钱。

里加冷淡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反抗者——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熟人。在城市街道上流浪，偶然的临时工作：铺马路，帮助花匠干活，在剧院当装卸工人……生活很艰难，但渴望学习——一个天赋甚高的人的主要特性就这样表现了出来。

扬进人“奥托·埃尔贝”工厂的那一天，在很多方面决定了他的命运。1905 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办起了用拉脱维亚铅字印刷的印刷厂，发起了组织工会的最初的公开的运动。扬·鲁祖塔克，作为年轻的鼓动员，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他学会了发表演说、争论、散发传单。在这个复杂的思想纷乱的时期，他自觉而坚定地跟着列宁主义者走。

1907 年 1 月，扬·鲁祖塔克受拉脱维亚区社会民主党中央的指派，恢复了被宪兵破坏的温达瓦的党组织，并出任它的领导人。警察怎么也无法捉住不论是积极的利比赫，或者神秘的普姆普尔，而这两个正是扬·鲁祖塔克的化名。扬是一个优秀的秘密工作者，经常要冒生命危险。奸细引着宪兵追踪他的足迹。阿斯塔菲耶夫将军领导着这个捕获“最危险的政治犯”（指鲁祖塔克）的行动。

出色的秘密工作者使侦察员无法获得罪证。被告（指扬·鲁祖塔克——译者注）的未成年缩短了刑期：10 年苦役。扬被从里加的中央监狱转移到布特尔基监狱，在那里迎接他的是这样一句话：“从布特尔基出来的没有活人。”

然而，他出来了——在十年单独囚禁以后：二月革命解放了他。在布特尔基的“单独监禁”中，他学了三种外语，他渴望参加实际活动，从监狱出来后，接受了党的第一次任务——在莫斯科的纺织工人中开展工作。

1917 年 10 月，扬为莫斯科的革命胜利积极战斗。很快他的活动就具有全国的性质。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初岁月，扬·埃内斯托维奇曾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纺织工会主席、苏联职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水路运输总管理局局长。

第一次同列宁见面是在 1918 年 5 月 23 日克里姆林宫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他们之间建立了十分亲切的业务关系。扬·埃内斯托维奇有五年多的时间直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领导下工作，从他那儿接受指示、建议，向他学习如何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一次地和鲁祖塔克商量问题，和他交换便条和信件，当然，也常通电话，召他来克里姆林宫，送紧急函件给他，上面注有：“鲁祖塔克同志收（列宁缄）”，“鲁祖塔克收”，“鲁祖塔克收：怎么办？”；在有些函件上又写有：“鲁祖塔克同志亲启，机密（列宁缄）”。遗憾的是，许多这样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列宁在解决重要问题时常问：“同鲁祖塔克商量过没有？”还询问自己的秘书：“我请鲁祖塔克用密码告诉我详情”，“能不能让鲁祖塔克快些来？”在扬·鲁祖塔克的复件上，列宁通常都写上“鲁祖塔克写来的”，并

保存在最紧要的文件里。

鲁祖塔克的职务变换频繁，就象在万花筒里一样。他经常是同时在几个岗位上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无限地信任，把他看成志同道合者、坚定的革命家和经验丰富的经济部门工作人员。每当任务要求由有组织性、吸引群众的本领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去担任的时候，列宁就十分信任地委派扬·埃内斯托维奇去承担，其中包括一些业务性质的任务。1919年5月，水路运输总管理局主席扬·鲁祖塔克带着列宁的委任状去阿斯特拉罕，以便把必需的货物运出来，其中包括运载粮食的商队。

列宁的教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任，对扬·鲁祖塔克来说，是最好的帮助。而当时复杂的问题很多——在职工会的工作中，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里，在热那亚会议上，在中亚细亚的工作中，以及在扬·鲁祖塔克当俄共（布）中央书记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扬·鲁祖塔克提出的关于职工会生产任务的提纲，在工会问题争论炽烈进行的时候，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应当骂自己是个合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思索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思索就写出来的……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

工会问题争论之后不久，扬·埃内斯托维奇被选为苏联职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

1922年1月，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把扬·鲁祖塔克列为参加热那亚国际会议的苏俄代表团成员。会上讨论了偿还战前沙皇政府债务的问题。列宁事先向代表团作了指示。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从原定的方针退却，答应劳合一乔治，在履行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过去在俄国拥有企业的所有者现在可以获得拥有企业的权利，或者可以得到赎金。在当地，在热那亚，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鲁祖塔克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批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我认为鲁祖塔克在4月22日电报里谈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列宁的口述，给热那亚发了回电：“不要从中央委员会的指令退却。”

扬·鲁祖塔克为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各族人民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有好多年是在中亚细亚的几个共和国活动的。内战时期，他是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那儿去的。1920年3月，扬·鲁祖塔克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2—1924年，扬·埃内斯托维奇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在着手新工作时，扬·鲁祖塔克不止一次地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例如，1922年9月23日，他同病后初愈的领袖谈了两个半小时。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选择忠实的列宁主义分子扬·鲁祖塔克为俄共（布）中央书记，仍留在中亚细亚工作。

……列宁的逝世使扬·埃内斯托维奇十分震惊。他和伊里奇的其他最亲密的战友一起，抬着领袖的灵柩走向当时还是木制的陵墓。

1924年10月，扬·埃内斯托维奇出任交通人民委员。在六年的工作中，他为发展苏联

的运输业做了许多事，使全部车辆现代化，同时致力于发展水路运输，……扬一鲁祖塔克积极参加了苏联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参加了经济政策中具体问题的解决。直到 1937 年，他一直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表现出大经济专家的才干。他领导了向工业提供长期贷款的政府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苏联国民经济化学化委员会。他还十分注意加强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

扬•埃内斯托维奇还多年担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党的十七大选举扬•鲁祖塔克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

正当场•埃内斯托维奇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生命突然悲惨地中断了。他总共只活了 5O 岁……这一件事的发生从外表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和阴险的。1937 年 5 月 24 日，报上公布了党和政府领导人致北极征服者的贺电。扬•埃内斯托维奇注意到，在电报的签名言中间竟没有他的名字！但明明要他签字来着……难道又是记者弄错了？…什么“错误”也没有发生。最近一段时间，扬•鲁祖塔克几乎每天都要失去一些朋友和战友——被诋毁的和被撤职的、被开除出党的同志。他力图为一些人说话，要求仔细搞清楚另一些人的“案件”。作用不大。现在轮到他自己了……预感应验了。就在这个五月天，扬•埃内斯托维奇在尼科利纳山的别墅被捕。指控是千篇一律的和毫无道理的：“为德国进行间谍活动”。没有审讯，也没有侦查。谁也不要求作解释。没有任何对质，特别是同党的领导人的对质。可是要知道多少年来他就是同这些领导人齐心协力地一起工作的呀……一年多，充满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痛苦的一年多，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扬•鲁祖塔克坚决批驳了一切指控。1938 年 7 月 29 日，扬•埃内斯托维奇被枪决。

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多。

斯大林早就对扬•埃内斯托维奇怀有敌意，——不知是因为不能饶恕他对列宁的接近，还是因为不相信他个人的忠诚，或者是因为经常感到他是一种对立的力量，把他看成是一个竞争对手，他（也就是斯大林）的行动和目的的反对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列宁称鲁祖塔克是一个“最稳健的人”，“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漂亮”。列宁从来是支持他的，总是倾听他的意见和建议，把最重要的使命交给他……斯大林记得，在他斯大林违反列宁的主意提出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杏院的建议时遭到了扬•埃内斯托维奇的反对。斯大林明白，鲁祖塔克，这样一位列宁的忠实学生、诚实而又原则性强的人、在信念上和行动上少有的坚定的人，在列宁领导下工作过、接受过教育，这样的人对斯大林来说，在 3O 年代中期形成的形势下是靠不住的……不仅仅是靠不住的，而且是危险的……鲁祖塔克——斯大林的又一个受害者。斯大林不能容忍卓越的、心胸开阔的、独立思考的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人。而主要的，是不能容忍那些忠于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作风的人。

真是怪事——在国内社会主义胜利的背景下，弥漫的却是告密、秘密侦查和搜寻“暗害分子”的空气。斯大林括不知耻地把采取镇压手段说成是肃清党内和国内“间谍、杀人犯、暗害分子”的需要，似乎苏维埃制度因此将无疑地得到巩固。斯大林在 1939 年 3 月联共（布）十八大上说：“1937 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暴徒。随后，我们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选举中所有参加投票的人的 98．6％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 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津果里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暴徒。随后，我们举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选举中所有参加投票的人的 99．4％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哪，为什么这个‘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这就是斯大林的算术。

1985 年四月全会后，苏共中央采取了生活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祖国的历史需要清除歪曲现象和“空白点”。应该让历史摆脱教条、烦琐议论和人为地神圣化的英雄的束缚。时间本身会引导人们去直率地、坦白地谈论党的事业，谈论苏维埃国家的艰难道路。我们即将迎接建国七十周年的光荣节日。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儿女。重要的是，历史应该为今天服务，为创造未来服务。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将活在人民的记忆中。他所具有的品质，正是我们希望在领导人和我们一代的代表身上看到的。

（原文题为《扬•鲁祖塔克》，原载苏

联《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36 期。曹特金摘译）

“共青团案件”始末

阿纳托利•戈洛夫科夫

时间不可逆转。

历史上曾有过宣告有罪和无罪判决的年代，充满恐惧、兴奋和失望的年代……

有过似乎比实际更强有力的胜利时代。

饥饿和死亡，错误和忏悔，悲观和希望的年代——人们渡过的每一天、每一刻都不能抹掉。

今天，我们正走向光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疾步走向未来。这样，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会问自己：还有没有必要一点一滴地重新汇集往昔的每一瞬间，拂去蒙住它们的灰尘，象把已经破碎的镜子的碎片粘在一起一样……

那些警告有危险，并指出这些危险的人，不可能为那些与其走在对立的道路上并决心把其他人和自己一起消灭的人所喜欢。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 年）

1936 年 3 月，列宁格勒州共青团委的瓦莲金娜•皮基娜（她在基洛夫时期就已在这儿工作了）出席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苏

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她被调往莫斯科，开始在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到中央来工作的还有丹娘·瓦西里耶娃、热尼亚·法因贝格、帕维尔·戈尔舍宁、德米特里·卢基扬诺夫、彼加·韦尔什科夫，她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们。应基娜负责大学生工作，领导共青团组织委员会，同时兼任预算工作。她还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作很有意思，是颇吸引人的。

1937 年大事记

3 月 3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这里有成千上万能干的有才能的人。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地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停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开始腐朽。这种人要找就能找到。”

3 月 21 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和革命的敌人的斗争中，政治素养决定一切。”

7 月 21 日。斯大林召见团中央总书记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书记瓦莲金娜·皮基娜和巴维尔·戈尔舍宁。……叶若夫已经在办公室里。斯大林没有问任何事即开始指责科萨列夫说：共青团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发敌人。斯大林对叶若夫说：“尼古拉·伊万若维奇，您讲讲共青团是怎样和敌人做斗争的？”叶着夫打开厚厚的卷宗，说：“最近在萨拉托夫，州团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纳札罗夫已被逮捕，他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他随后念了纳札罗夫的“供词”。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说：“你们还说没有敌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已逮捕了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科萨列夫鼓足勇气说：“共青团中央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有这方面的材料。”皮基娜说；“斯大林同志，我很了解纳札罗夫。我们在列宁格勒的瓦西里耶夫岛共青团组织里一起工作过。最近我还出席了萨拉托夫州团委全会。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纳札罗夫投人了人民敌人的营垒？”她这个问题主要是问叶若夫的，但他一个字也没回答。

斯大林最后总结说：“你们不愿意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科萨列夫等感到很沮丧。他们没有力量马上分手，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亚历山大公园，科萨列夫一根紧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神情抑郁地摇了摇头，对皮基娜和戈尔舍宁重复地说：“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敌人？”

他的奇怪是正常的，一年多以前，斯大林看过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作的总结报告的全文，没有提任何意见。可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时，斯大林却紧皱眉头，充满怀疑和严厉的目光……科萨列夫真诚地相信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看来好象斯大林也很信任他。他作为团中央总书记，能在任何时候给斯大林打电话，并被立即接见……。他对斯大林无比信任，以至他的内弟、党的白俄罗斯科佩尔区区委书记巴维尔·纳奈什维利在大会前夕以组织谋杀斯大林罪被突然逮捕，也未引起他的动摇。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发狂了，粗暴地对他的妻子说：“你的巴维尔怎么能这样！他是敌人，他有罪！你怎么能为他流泪？！”

科萨列夫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愁眉苦脸地和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商量：“斯大林要人，要人头……可我能说出谁？敌人在哪里，怎么办？”

阴魂。叶若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 年生于列宁格勒，14 岁起当工人。1917 年 3 月人党，1921 年在红军一些部队任军事委员，1922 年任联共（布）卡查茨基边区谢米巴拉京斯克省委书记，1929—1930 年任农业副人民委员，1930—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分配处和干部处主任。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 193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又任内务人民委员。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叶着夫没能列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被任命为水运人民委员。1939 年 1 月 22 日，《真理报》刊发了有叶若夫参加的列宁逝世 15 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的照片，叶若夫站在贝利亚旁边。不久，叶若夫被捕了。

……他走进侦察员办公室时，满脸胡子茬，穿着一件服了色又脏又破的红军旧军装，没有领章和皮带，显得很消瘦。他首先提出要吸烟，回答审问时萎靡不振，非常吃力。当问到他，“在审讯右派托洛茨基反党联盟时，你说布哈林的人企图用浸透了融解在酸里的水银的窗帘来谋害你。……”，叶若夫狞笑着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进我的办公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窗帘的事是我编造的，因为这样说在斯大林看来会显得好一些。”

叶若夫后来说：“顺便说一句，我很了解这里审讯什么，怎么审讯……”。他要求给他纸和笔，然后把他押送回牢房

“想一想”……

1940 年 4 月 1 日，叶若夫以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处死刑。

1937 年大事记

7 月 20 日。苏联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因“在加强革命法制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成绩卓著”获得列宁勋章。

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强调指出，镇压，这个强制性手段在进攻中是必要的，但却是辅助的而不是主要的手段。”“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结束了过低估计我们国家、国家机构和它的侦察机关的意义和作用的状况。”

8 月 21—28 日。共青团中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团中央和中央书记处的错误，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关于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不可容忍的麻痹，忽视了共青团中的人民的敌人用腐朽的生活方式这一特殊的手段进行破坏……”

8 月 29 日。《真理报》社论。列宁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助手》写道：“凶恶的人民敌人萨尔塔诺夫、卢基扬诺夫、法因贝格、布别金、安德烈耶夫等利用苏联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首先是科萨列夫同志在政治上的无知和愚蠢，进行着他们卑鄙、肮脏的活动……”

10 月 3 日，科萨列夫检查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团组织的工作返回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指出："自我保护对党的敌人有好处，因为对流言不去分析，不分青红皂白，不进行应有的核查就会把诚实的人赶出我们的队伍，使其怨恨我们。在哈尔科夫，拒绝审理提出的指控，这只能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瓦·费·皮基娜说：

——这就是暴行的开始……现在的青年幸好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他们很难明白，科萨列夫给斯大林写那封信，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他没有象有些人因为害怕而做"公开检讨"和去告密。科萨列夫向"各族人民的领袖"挑战了！他实际上给自己判了死刑。你们可能会问，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为什么没有立即被捕？

我长时间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完全相信，斯大林有一个庞大并具体的计划，去消灭共青团中央领导和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就是所谓的"共青团案件"。事情在按计划进行，镇压逮捕、死刑、好象魔鬼都排好了队一样……

许多人都面临着复杂的选择。团中央指导员米沙柯娃也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当我们派她参加楚瓦什州的共青团代表会议时，她要求"取消"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太早了，还没有展开"粉碎敌人"的工作，她还要求把州团委书记瑟莫金和捷连季耶夫开除出团。州党委全体会议决议一致谴责米沙柯娃的行径，都无济于事。我们团中央也收到不少上告信。科萨列夫在做些什么呢？他召集了常委会。

1958 年大事记

3 月 8 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应该指出，米沙柯娃犯有严重错误，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的同志被置于政治上可疑、甚至是人民敌人的帮凶的位置上。"

会议决定米沙柯娃留在机关，从指导员工作调做其他工作。

3 月 17 日。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以伊·德·帕帕宁为首的苏联第一个北极地区漂流考察站"CJ－1"人员的招待会。

玛·维·纳奈什维利，科萨列夫的遗孀说：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我和萨沙一起应邀出席了。不知为什么是其洛托夫祝酒。那些得到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赞扬的人，不仅感到非常荣幸，而且仿佛同时得到了免罪符，……按照惯例，讲完祝酒辞，需要到斯大林面前去碰杯，……我记得当谢·米·布琼尼被莫洛托夫提到时，是多么激动。因为那几天莫斯科到处流传说布琼尼被捕了……突然提到了科萨列夫，我感到很奇怪。因为萨沙的好多同事和团干部已经人狱了……莫洛托夫提到科萨列夫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说"为了我们天才的充满希望的……"，萨沙也到斯大林面前干杯。斯大林拥抱并亲吻了他。科萨列夫在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上帝呵！过了半辈子，他那苍白的激动的面孔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他到我跟前说，"玛莎，求你，我们回家吧。"

我们一起回到了绥拉菲莫维奇街 2 号，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后来被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称作“滨河街公寓”的那座房子。萨沙对我说：“你知道斯大林在我耳边说了些什么？他说，你如果叛变，就把你杀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这句话并不重视，我还开玩笑说：“可是萨沙，你并没有想背叛他，你干吗那么激动？”科萨列夫顾不上同我说笑话，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吗？玛莎，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容易把团中央总书记变成祖国的叛徒。……”他的话使我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注的那个大院里，几乎每天都在抓人。有一天早晨，看门人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吗，玛利亚•维克多罗芙娜，我们这个大院现在用不着管理了，只剩下三家了……”

我和萨沙一起生活了 11 年。他从来不曾想对我讲政府中的内幕，或上层人物的坏话……他从不耍滑头，怎么想就怎么做。萨沙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在谈话中说斯大林的好话时，那也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萨沙完全相信他，萨沙的内心是非常坦荡的，因此也是非常不谨慎的。

1936 年的一个晚上，他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别墅时带来一位客人，米•巴吉罗夫。我和妈妈薇拉•巴夫洛芙娜依照惯例摆好桌子准备吃饭。萨沙站起来致祝酒辞：“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的外高加索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杯！”我和母亲都被吓呆了。因为贝利亚任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已经四年了，……巴吉罗夫默默地喝着酒。大约过了两个月，贝利亚找了个机会质问科萨列夫：“萨沙，你反对我什么？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吗？”这件事在 1938 年的悲剧中也起了作用……

阴魂。巴吉罗夫

米尔一扎法尔•阿巴索维奇•巴吉罗夫，生于 1896 年，1917 年 3 月入党。1920 年任卡拉巴赫州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委员，阿塞拜疆师团军事法庭庭长。1921 至 1930 年，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自 1933 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巴库市委书记。

巴吉罗夫在 1955 年被宣判有罪，处以死刑。

1938 年大事记

10 月 7 日。奥•米沙柯娃写信给斯大林，控告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其他常委。米沙柯娃在 1939 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因为我参加了对楚瓦什的人民敌人的揭发，所以受到了科萨列夫匪帮的疯狂陷害……”

10 月 29 日。《真理报》发表《纪念共青团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说：“全国人民为共青团的成就感到高兴。假如团中央在最近肃清共青团内部的敌对分子时不犯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这些成就就会更大。”

11 月 19—22 日。共青团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召开全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11 月 23 日。《真理报》报道：团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 • 费 • 什基里亚托夫关于审查奥 •波 •米沙柯娃同志控告和关于团中央情况的报告……由于对那些揭发团中央工作中缺点的正直的团干部采取冷酷的宫僚主义的敌对态度，并迫害优秀的团干部（米沙柯娃同志案件），全会决定免去亚 • 瓦 • 科萨列夫、C • E • 博加乔夫、瓦 • 费 • 应基娜同志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职务，开除 J • A • 韦尔什科夫出共青团中央……

瓦 • 费 • 皮基娜说：

——大约在这次全会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开始说服我。先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后来是米沙柯娃："我劝您，瓦莲金娜 • 费多罗夫娜，还是和科萨列夫划清界限，否则您的日子不会好过。"后来，《共青团真理报》的责任编辑米哈依洛夫也光临了……

在全会上，米沙柯娃立即得到斯大林的保护。记不清是哪个人发言时，认为团中央在工作中还犯有许多错误。但根据斯大林的看法，这样说未免太轻了，于是，斯大林立即在坐位上生气地说："也许是个体系，而不是错误。在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以后，讲错误是不是太多了？我们清理破坏活动已经进行两年了，还有那么多错误，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要消灭我们，只用犯错误的提法显然是"不相宜"的。领袖是不满意的。需要上纲上线地控诉我们一贯进行破坏活动。

我当然为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辩护，日月诺夫说我的发言是"机会主义的"。科萨列夫的发言不长。他说："我觉得个人是很平静的，因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应该声明，我从来没有背叛党，从来没有背叛苏联人民。"我们从全会回来时，已经被撤职了。

为了捍卫真理，纪念我的牺牲了的同志们，我应该说，在这次以民主为幌子的摧残中，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毫无疑问也起了作用。马林科夫批准了米沙柯娃迫害楚瓦什州团委书记。而马特维 • 费多罗维奇 • 什基里亚托夫……他在 3 月初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将科萨列夫叫去说："告诉你们，米沙柯娃给我们写了控告信，希望你们采取措施。"可是在全会上，什基里亚托夫被吓破了胆，说科萨列夫"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说团中央常委会想"消除米沙柯娃头脑中的全部的斯大林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思想……"

阴魂。米沙柯娃

奥莉加 • 彼得罗芙娜 • 米沙柯娃，生于 1906 年，1937 年入党。1937—1938 年任团中央组织部指导员，后任团中央书记。1956 年前，搞党务工作和经济工作。

当瓦莲金娜 • 应基娜完全恢复名誉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命运又使其和米沙柯娃相遇了。监察委员会收到许多包括个人和集体的申诉，要求开除米沙柯娃的党籍。监察委员会审查米沙柯娃专案时，尼 • 米 • 什维尔尼克当着皮基娜的面问她怎么能诬陷那么多正直的人，米沙柯娃回答说："那时候我错了，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相信处处都是敌人。"1956 年 6 月 28 日，米沙柯娃被开除出党，"因为她诬陷共青团领导和党的干部"。

瓦 • 费 • 皮基娜说：

——11 月 22 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心里很痛苦，感到空落落的……怎么能忘记

这一天呢？！晚上我通过内线给科萨列夫打了电话，我们的办公室是相邻的。开会时没有人同科萨列夫打招呼，也没人同他握手……我到他那里去简单地谈了一会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逮捕我们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开始他还很乐观，安慰我说："明天我给斯大林打个电话，我们还会有工作的！"我从没见科萨列夫哭过，可当时他的眼睛里却充满泪水。他说："我有独生女，我以我的孩子的名义向您发誓，在党的面前我没有罪！"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玛·维·纳奈什维利说：

——瓦莉娅·皮基娜不知道，就在22日那天晚上，萨沙被扣留在团中央保卫处办公室中，被拘留了两个多小时，这中间，不知请示了谁，说了些什么，后来便将他放了。我们的别墅已在监视之中，后来的六天是在精神极度紧张中度过的。当然，科萨列夫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焦急不安。11月28日，他打电话给安·安·安德烈耶夫询问："我将会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安德烈耶夫安慰他说："萨沙，你放心吧？你太着急了，你太疲劳了，你一定会有工作的……"也许当时安德烈耶夫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晚间10点钟，萨沙想起了我的已被镇压了的兄弟巴维尔。他问道：

"你们帮没帮过他的忙？人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帮助。"我说，我偷偷地给他寄过钱和食品。我们睡觉时已经是深夜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大约夜里2点钟时，抓我们的人来了。当我送别已穿好衣服被押着走的萨沙时，在客厅里见到了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他喊道："把她也带走！"这次他搞错了。我后来知道，11月30日才签发我的拘票。我和萨沙被分押在两辆车上，从一条奇怪的路送到了卢比亚卡……

瓦·费·皮基娜说：

——在那天夜里，团中央的所有书记，还有科萨列夫的司机 E·C·柳比莫夫都被逮捕了。来抓我的是阿尔沙茨卡娅上尉。在卢比亚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她带我去受贝利亚的审讯。

瓦莲金娜·皮基娜回忆起第一次受审的情况。

贝利亚：您在全会上的态度是错误的，您掩护了科萨列夫。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他在波兰的动物园里被外国谍报机关收买了。您现在应该分析他的行为，同时对他不执行党关于在共青团内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指示，作出正确的评价。……你们对米沙柯娃干了些什么？她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你们却撤了她的职，还扣许多帽子！

皮基娜：共青团一贯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最近我们选派了500名优秀团员去训练班，以便到你们的机关去工作。……

贝利亚：当然罗，您给我的是些什么人？是间谍？还是好好想想，说出关于科萨列夫的真实情况吧！

皮基娜：我所了解的科萨列夫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一布尔什维克，是青年公认的领袖。

贝利亚：您有亲属，有儿子，……您再好好想想吧！

用无法思议的，摸不透的纲领，用青年人的手把共青团消灭。被团中央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500 个小伙子中，有许多人找科萨列夫、皮基娜恳求，“把我们叫回来吧！我们不愿意在那里工作！”他们最初到这些机关，是因为他们深信真的是去“抓外国的间谍”，共青团巴库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亚历山大·沃尔乔克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的，后来并担任很高的职务。

瓦莲金娜·皮基娜说，——我同沃尔乔克的妻子济娜早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有一次见到她时，她说：“不知道萨什卡现在怎样了！那天我在洗他的军服时，从衣袋中找到了一个带血的字条……不知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丈夫全身患了神经性湿疹，夜里常说梦话……”沃尔乔克本想辞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但还没来得及，已经建立了他的专案，很快被逮捕、处决了。

……监狱厚厚的高墙外面生气勃勃，车间的墙上写满口号……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发动并组织起来的共青团员们正在建筑公路和港口，打通地下铁路的隧道，学习驾驶飞机和跳伞，争取到西班牙去参战。他们开展竞赛，进行争论，歌唱，去建立功勋。以斯大林的名义……似乎没有任何人怀疑什么，至于科萨列夫、皮基娜、戈尔舍宁，活该！……要砸烂人民的敌人的狗头！共青团在全国辽阔的土地上掀起了集会的浪潮，并纷纷作出决议：共青团员要记住，到处都有敌人在窥伺！……要学习米沙柯娃同志的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歼灭叛徒——就是这样！

审讯时提的依然是那些问题，只是面孔换了新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处长，国家安全政委，长着狼似的黄色的眼睛。他说：“我们正在准备青年审判案，您应该说说，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怎么搞到了参加反党组织的地步？是不是科萨列夫收买了您？”由基娜有时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接着说：“您放明白些，如果不是斯大林亲自批准，你们任何人连根头发也不会掉！我们这里可以把你们变成这样……而且不负任何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罚站、殴打、精神折磨，240 天的单人囚禁。

1934 年 7 月 10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第 8 项，建立直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特别会议，并根据有关条例授于它以行政方式遣送、流放、去劳动感化教育营接受 5 年以下教育，或驱逐出苏联国境的权力……”

瓦·费·支基娜说：

——在劳改营里，我认为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挺住，不灰心丧气。否则，将会影响其他人。……这里有 5 个人是因“自己”的案件，其他人则是“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我经常想起列宁，他在沙俄的监狱里何等坚强地忍受着……还在团中央时，我们有时通过共产主义青年国际，送同志们去国外从事地下工作。我想起他们便提醒自己，要“动员起来”，应忘掉自己，不要去可怜自己。

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斯大林写封信，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误会。安娜·雅科夫列芙娜·罗津娜帮了忙（她现在还活着，住在列宁格勒），她把信缝在鞋里。在会见家属时，我把鞋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母亲，看守没有发现。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和国代表瓦・费・皮基娜上

报告书

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报告，在两年半的时间中，在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口号的贯彻方面，我亲眼见到了什么，这使我们有可能基本上铲除敌人在我国的巢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尤其是特别会议犯了错误，其结果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和祖国的人受到迫害。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敌人插手的目的，是企图消灭布尔什维克干部，并人为制造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在宣判时，特别会议有时对无罪的人进行判决，纵容莫须有的诬告，而忘记了每个案件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

我很清楚，在大的历史性的行动中，很可能出现个别的过火行为。但您一贯教导说，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本。我一刻也不曾忘记，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反而会更加剧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曾成为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牺牲品的人，如果他们是正直的，忠于祖国忠于党的，却不能恢复名誉和恢复他们有价值的生活。需要您亲自千预来改正这些错误。请您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监察机关下达指示，或者组织特别委员会，认真处理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我为何被逮捕并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作为被告，我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一切足以使有罪的人认罪。但是，这些做法对我无济于事，因为我没有什么罪可承认。军事法庭因材料不够无法定罪，但特别会议却判我 8 年劳动改造。现在我还等着服满刑期。

我的地址：莫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

国雅瓦斯镇 n / H241a 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

瓦・费・皮基娜 1941 年 5 月 9 日

至今无法查清斯大林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但她为这封信付出了代价。很快就有了反映，……当时西部边境已开战了，莫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撤销了特别会议的原判决，重新判决剥夺皮基娜自由 10 年，送惩戒营服刑，同刑事犯一起去伐木……

那时，瓦・费・皮基娜对许多事还不知道。她不知道当时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包括亚历山大・科萨列夫都已被处决了；不知他的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纳奈什维利在审讯时受尽折磨，然后被匆匆捏造罪名，送到诺里尔斯克，一去十年，然后又第二次被捕，被流放到杜金卡；不知她的父亲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纳奈什维利，一位商学院的院长也在 1938 年秋天被捕，受刑，有一年多的时间同精神病人关押在一个牢房中，他始终不承认有“罪”，在 1940 年被处决……

直至1954年，从莫斯科来的一位检察官找到皮基娜，对她说："老实说，我们都没想到你还活着……"皮基娜完全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党证，后来还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她还为几十名受迫害的正直的人恢复了名誉。直到1984年，她才成为苏联一级个人退休金领取者。

1953年大事记

7月11日。《红星报》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说："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用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骗取信任，钻到了领导岗位。"

阴魂。贝利亚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生于苏呼米附近的梅尔呼利村。1917年入党，1921—1931年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苏维埃侦察机关担任领导。1931年11月任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书记，1932年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9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1953年被捕，宣布有罪，并被枪决。

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国家二级司法顾问根纳季·阿法纳西耶维奇·捷列霍夫说：

——我参加了对贝利亚的侦讯。贝利亚未死时，报刊上发表的他在1917—1920时期的正式自传，是伪造的。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摩沙瓦特"的奸细，他千方百计隐瞒这一事实。1920年4月，该组织被粉碎后，他混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知道这点吗？作为一个出色的冒险家，贝利亚起初觉得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后来他不放心的是，"摩沙瓦特"的侦察档案还保存在巴库的一个地下室里……

捷列霍夫继续说，因此当贝利亚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得到了无限的权力后，他下令自己的部下梅尔库罗夫把这些档案转移到莫斯科。这事照办了。奇怪的是，直到他被捕时，他的案卷仍存在他的办公室中的保险柜里……

瓦·费·皮基娜说：

——当我已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突然让我同以前侦查我的侦查员施瓦茨曼对质。他是负责审理"共青团案件"的。我凭记忆写下了这次谈话，并保存起来。

问：您认识这位妇女吗？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答：1938年11月27H，贝利亚把我、罗多斯和阿尔沙茨卡娅叫去，命令我们在11月28日逮捕团中央书记，并对由谁抓谁进行了分工。从11月29日起，我任皮基娜案件的侦查员，那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问：在侦查过程中，您是否对皮基娜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手段？

答：是的，使用了。存在过的一切都是对的。请应基娜公民原谅我。

问：为什么过了一个月，您把皮基娜转到列福尔托夫监狱？

答：这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执行的。还因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她没有任何口供。

问：那么，在列福尔托夫她有什么口供，她供出了谁的名字？

答：皮基娜仍没有任何供词。

问：你们在逮捕度基娜时，掌握了什么材料？

答：除了贝利亚签发的逮捕皮基娜的命令之外，什么也没有。

问：你为什么使用令人无法容忍的手段企图使她招供？

答：如果我不按贝利亚和卡布洛夫的命令办事，那我也得在关她的地方呆着了。

瓦莲金娜•皮基娜说，——后来，我要求侦查员向施瓦茨曼提两个问题，他同意了。事情是这样的，关于科萨列夫的命运，甚至在50年代还流传着矛盾的说法。比如有人肯定地说，他仍活着……

问：科萨列夫真的活着吗？仍在集中营服役，在浴池工作？

答：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科萨列夫在1939年2月23日被枪决了。

问：科萨列夫关进死牢后，他最后的请求是什么？

答：科萨列夫找我去，要我给他铅笔和纸。我给他了。他给斯大林写了一篇声明，说他没有任何罪，请党中央建立专门委员会，对捏造的反对团干部的案件重新审理。我将这个声明交给了贝利亚。他看完后对我大声喊叫："怎么，他疯了，想让我去告诉斯大林这个？！"贝利亚把科萨列夫的声明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篚，并说："这就是给他的回答。"

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皮基娜作为证人出了庭。施瓦茨曼承认他有罪，并哭哭啼啼地请求皮基娜原谅因他而使"她不得不受到的一切痛苦"。

＊＊＊

……折磨者、告密者、刽子手的阴魂销声匿迹了。人们希望尽快压上墓石，把灰烬撒开，但不能让它们落入合适的土壤中，否则不消一小时，就会重新萌芽……他们在掌权时，是多么希望他们的牺牲品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党和人民的敌人"，为此他们施加种种压力……1938年3月，维辛斯基在出庭审理"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件时，曾慷慨激昂地大叫："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会长满杂草，遭到正直的苏联人民的永远的鄙视。"

但历史另有安排。不仅如此，1937—193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们在彼此不知道每个人命运如何的情况下，没有提供有关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供词，没有丝毫的反侮，没有招认，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但他们不是白白地死去了，他们履行了布尔什维克的、公民的义务，

用自己的功勋保护成千上万个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生命。贝利亚输了，“共青团案件”被击碎了！

＊＊＊

……似乎不是因为怕斯大林，或象《星火》杂志的一位读者所说的那样怕“翻车”并回复以前的秩序，团中央甚至在赫鲁晓夫时期，更不用说在“停滞时期”，也不愿为亚历山大 •科萨列夫组织纪念会。但是，在玛利娅 • 维克罗洛芙娜 • 纳奈什维利和叶莲娜 • 亚历山德罗芙娜 • 科萨列娃的坚持下，这些会还是在坐得满满的大厅里举行了。

今年，共青团准备庆祝自己的 70 周年。比共青团大 15 岁的亚历山大 •科萨列夫在 1988 年 11 月 14 日将满 85 岁……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纪念碑、博物馆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土希诺的青年航空俱乐部和苏波边境的哨所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63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科萨列夫的小册子……后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在“名人传记丛书”中，给他和他同时代的共青团领导留出了地位。但是，还没有出版真正全面地严肃地介绍亚历山大 • 科萨列夫及其战友们的工作、生活和命运的书。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彼此问心无愧地凝目相视呢？！

瓦莲金娜 • 皮基娜在一本薄薄的学生练习本上记下了令人心酸的名单。不久之前，1937—1938 年的共青团书记还有四位在世。去年 12 月，人们把弗拉基米尔 •亚历山德罗维奇 •亚历山德罗夫送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墓。1937 年，他代替后来被处死的团中央书记绥拉菲姆 • 博加乔夫领导了莫斯科州团委。1938 年 12 月 1 日前，他也被捕了……他们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1937 年被捕的原列宁格勒州团委书记阿列克谢 • 巴甫洛维奇 • 塞韦利耶夫，也是这个州的原农村青年处处长亚历山大 • 卡尔洛维奇 • 达米和皮基娜自己……

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他们是你们的同龄人，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吧！

（原题《不要否认自己》，原载苏联《星火》1988 年第 7 期。于沛译）

亚历山大 • 科萨列夫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A • 波利亚科娃 B • 霍伦日

“……纽拉，你应该原谅我，我给你写信那么少。然而，我毫无办法，根本没有时间。在工厂里，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有些班每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一般的紧张程度超过了界线。我们从早晨九点钟直到深夜都在厂里工作。”

这些话是熟悉的，话题是清楚的。从“真理报工作人员”雅科夫 •伊利英给妻子安娜 •谢韦里亚诺娃的信中摘录的这段话注明的日期是 1931 年。正是在这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向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帮助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请求。

两个作业队——“真理报工作人员”作业队和共青团作业队来到了斯大林格勒。苏联列宁共青团和《共青团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加入了第二个作业队。作业队长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当时，科萨列夫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组织者和共青团工作者。他很清楚，目前主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振奋起悲观失望者的精神，同时，鼓励情绪激昂的人们。那时，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中 60％是青年，难道这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吗？

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干脆就在车间、宿舍，甚至在郊区列车上组织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他竭力给大家解释，坚持工作进度如何重要，不要再搞突击。

1931 年 5 月 27 日，第 5000 台拖拉机经过萨沙之手走下流水线。这是工厂大院里的第一批。

亚历山大感到激动和自豪。工厂职工把斯大林拖拉机厂的新产品第 500O 号拖拉机命名为“共产国际”号，并赠给了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科萨列夫在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上作共青团联合作业队的工作结果的报告时说，在斯大林格勒，为共青团赢得了信任的声望。应当不使它下降。现在，主要问题解决了，他又在考虑另外的问题，面对未来。在拖拉机厂里，技术文件极其缺乏。重要的是要尽快地充实图书馆和安排开馆。然而，最迫切的任务是把主要车间的美国设备的说明书译成俄文。所以，必须请青年共产国际的精通多种语言的人给予帮助。

高尔基汽车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希比纳、别列兹尼亚基、哈萨克斯坦的有色冶金业，西伯利亚的煤炭和冶金业，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厂——整个国家在迅猛向前发展，建筑工地需要一批批新的劳动力。共青团能够提供这些劳动力。尽管常常不都是能工巧匠，比起操纵拖拉机来往往更习惯于使用铁锹，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渴望工作的人。

科萨列夫在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谈到那些建设祖国和改造自己的共青团员大公无私的精神力量时，他强调指出：“‘我毕竟是合格的’——这就是对共青团堡垒及其勇往直前运动的评价。”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如镜的。它常常充满着坎坷和崎岖，同时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险。

亚历山大把那些给青年的独立活动设置条条框框来束缚团的工作者和积极分子的人称为“把大海装入瓶子”的宫僚主义者。

科萨列夫从不同文牍主义妥协，他与共青团中央的同志和地方的团委领导人一起抨击和制止文牍主义的拖拉之风。虽然已是 80 年代末，但我们不妨看看科萨列夫精确观察到的怪现象：“通令有时候遭到破坏，而它又如此巧妙地利用和采取决议的形式，而决议也是那样巧妙，它变成了措施计划。”

共青团的着眼于人的心灵的种种设想常常最接近于科萨列夫的平民气质。

手风琴，这个民间最喜欢的乐器在那些年代遭到了冷落。

工人居住区醉汉的游娱场所、富农子弟大喊大叫的晚间集会搅得农村不得安宁，一直吵闹到鸡叫才肯罢休，他们败坏了手风琴的名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人过早地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手风琴是没文化人的一种消遣物。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伊也火上浇油，在报刊上激烈抨击“叫卖式的大喊大叫”。

然而，共青团员则一致表决赞成深受人们喜爱的手风琴。

这是第一次莫斯科手风琴演奏者比赛。1926 年 12 月 12 日在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在毗连实验剧院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青年人热情激动地唱着歌。汽车不得不停下，让欢笑的男女青年通过。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勉强挤进了礼堂，看见了萨沙。

——你们好像已经开始比赛了，——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

——这是非正式的——对啦，正式的——我们等着您致祝词。现在请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话。——科萨列夫举起手，大厅里静下来了。

教育人民委员说：“在我们共青团里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向人民大众提供人类文化的优秀财富，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蓬勃发展的源泉……人民创造力的汹涌澎湃的源泉……”

“广泛宣传人民创造力的汹涌湃澎的源泉”——亚历山大很快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所喜欢的思想，他在对竞赛参加者的讲话中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强调指出：“恰恰是共青团要促进这一工作”。

在苏联列宁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下成立了手风琴手工作委员会，这也是萨沙的倡议。共青团“在手风琴的基础上”吸引优秀的专业力量进行合作。现在 C•C•普罗科菲耶夫和 A•K•格拉祖诺夫写了乐谱。伴随着乐声悠扬婉转的旋律，A・B・涅日丹诺娃，M・C・科兹洛夫斯基，M・H・玛克萨科娃唱歌，E・B・黑尔策尔跳舞。参加手风琴手比赛评比工作的有作曲家 M・M・伊波利托夫一伊万诺夫和 A・N・卡斯塔利斯基，以及著名实验导演 B・梅耶尔霍利德。

在手风琴方面，天地是如此之大。在共青团诗人亚历山大・扎罗夫赞扬了手风琴后，另一位共青团诗人约瑟夫•乌特金称颂了吉它。青年工人和农民也很喜欢古典乐器、交响乐队、贝多芬音乐会以及青年的天才竞赛……

在那些年里，共青团已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发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共青团队伍不断发展，它的组织网络日益扩大。

共青团开展了对空军力量的支援，建立了中央航空俱乐部。还同苏联国际和航空化学建

设促进会合作，培养不脱产的飞行员和跳伞员。培养能飞行的一代是科萨列夫的理想。

然而，他自己却失去了奋飞的机会。

1937 年 7 月 21 日，在斯大林那里进行的一次谈话。被召去的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A·科萨列夫、N·戈尔舍宁和 B·皮基娜。斯大林说："现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作者注)向你们讲讲你们共青团员要进行什么样的对敌工作。"叶若夫从桌上拿起材料宣读了共青团萨拉托夫州委书记米哈伊尔·纳扎罗夫的"口供"，说什么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

皮基娜忍不住说："这是不可能的，从童年起我就认识米沙·纳扎罗夫。在瓦西里耶夫岛我们曾是邻居，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一个月以前我曾到萨拉托夫出差，纳扎罗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工作正常，有三个孩子。"叶若夫无精打采地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我们掌握的材料就是这样"。科萨列夫气愤地说："这些材料是不真实的，纳扎罗夫表现得很好。"斯大林说："我们向你们宣布的是事实，而你们却感情用事。"

非难如冰雹般纷纷而至：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不协助内务机关揭露共青团中的人民的敌人。不论在普通的共青团员中还是在共青团各级领导中，都有不少敌人。对这种暗示的反映冷淡。"科萨列夫，我看你不愿意领导这项工作"，斯大林告别时已有永别的意思。

在那些年里，科萨列夫不仅在青年人中间，而且在全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1933 年）指出："授予亚·瓦·科萨列夫列宁勋章——他是久经考验的共青团领导人和共青团群众的卓越组织者……"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 年，他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然而，就在这些年里掀起了一股镇压浪潮。

亚历山大尽可能地解救同志们，特别是解救那些认识很久又非常了解的人和他本人可以作担保的人。如果他了解到这些人遭到诽谤，那么，他就千方百计地努力排除怀疑，把他们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后来人们回忆起他的这些事）。他同瓦莲金娜·皮基娜一起请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A·A·安德烈耶夫释放被捕的谢尔盖·乌特金和季娜伊达·阿德米拉尔斯卡娅，他们是共青团列宁格勒州和伊万诺夫州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下面一件事情充分表现出科萨列夫的性格：1937 年 7 月，斯大林责怪科萨列夫不愿意领导揭露共青团中人民的敌人的"工作"。而在 10 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分析了出差调查的材料之后，在书面报告中明确地答复斯大林，说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挑战，斯大林就记住了他。

当写到共青团总书记一生中最艰难、最悲惨的篇章时，评论家们的笔便会发冷。今天，当我们了解到那些年月的真相时，当那些至今还沉默的文件开始说话，少有的见证人又激动、热烈、有时是互相矛盾地站出来说话时，你就会理解，那些生活和工作在 30 年代的人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平凡。

科萨列夫是否总是坚决反对把一些人无充分理由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呢？我们坦率地回答：不，他不总是这样的。为了理解为什么当时没有看清一切，必须了解那些年月的气氛，了解青年人对革命老战士的尊敬。很长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志们无条件地信仰斯大林，也就是说无条件地相信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公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时期的比较年轻的一代人。斯大林掌权时期，他们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得到了斯大林的祝愿赠言。共青团领导人是党的真正战士，准备为党献身。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是党的思想的体现者，他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因此，当他们说“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列宁一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并不是违心的。

我们不要忘记，1929—1938 年，当科萨列夫担任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领导时，斯大林个人迷信正在不断滋长。

不知情的一些人便不知不觉地把斯大林的理论、思想和口号当作指导性的经典。觉得“两个领袖”的肖像并挂和他们的思想“本质上”的一致是自然的。这种情况逐渐进入了群众的意识，使他们认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因此，只要稍微想想就可以理解，对亚历山大来说情况是多么复杂，他被认为是斯大林喜欢的人，但却又敢于不仅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反抗斯大林。即便是现在，在长期沉默之后，当已出现很多评论时，坚持客观性的道路仍是很重要的。既要避免“文选书本式的圆滑评论”，也要避免不公正和不客观的议论。

在不同的年代里，科萨列夫的表现也不同。因为人并非像沼泽地里的死水，人象一条流淌的河水。河水既会遇到浅滩，也会遇到暗礁，忽而风平浪静，忽而波澜迭起，忽而激流勇进，忽而从容不迫。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条河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重重困难后，已是精疲力尽，变得婉如一条细细的小溪静静流淌。然而，当它再次积蓄了力量后，又以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冲开一条巨大的水路。因此，很难同意 1987 年 8 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的关于亚 •科萨列夫的文章的结论，即“科萨列夫出现过个人精神颓丧过程，自相矛盾。在报纸上发表的演说……和从前的演说不同，其中既无‘从前的激情，也没有勇敢地提出问题’”。

不对，在共青团工作中，亚历山大 • 瓦西里耶维奇始终保持着思想上的勇于创新和革新者的风格。请看 1938 年 1 月他在青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上的发言。当时不幸的预感已无形地笼罩着他，他不能不明白这一点。然而，你们看看，在这里既谈到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最现实的状况，也有共产主义教育同政治、思想、同日常实践有关的问题，也有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追求纪录现象的有教益的考察。

科萨列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与什么息息相关，为什么而斗争。因此，我们既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装腔作势的英雄，也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要成熟到能进行最后几年的英勇斗争，需要经历许多事情。需要经历朋友们的被捕和死亡，经历自身的痛苦思索，经历在心里同斯大林无休止的对话……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特别全会的速记记录。这是亚 • 瓦 • 科萨列夫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全会。三个很重的文件夹，内装 500 多页记录，这是一个充满可资借鉴的重复词句的报告（M • O • 什基里亚托夫的报告），也是一个塞满侮辱人的标签的报告。

——召开全会的主题你们是很清楚的，——安·亚·日丹诺夫在宣布第一次会议开幕时说——这就是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对待米沙柯娃同志的极端错误的态度问题。

整整四天（1938 年 11 月 19 日—22 日），严厉抨击的词句象石块一样从讲台飞向大厅。巧妙的指挥者们有意识地加强了气氛。党中央委员会的五个书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一致反对科萨列夫及仍信赖他的人。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1937 年 12 月底，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奥莉加·米沙柯娃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被派往楚瓦什州共青回组织参加选举总结代表会议。而她超越自己的权限，积极地从事起揭发“人民的敌人”的活动。

她不仅捏造败坏共青团州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A·瑟莫金和 N·捷连季耶夫声誉的材料（她控告他们生活腐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有联系，搞间谍活动以及在共青团委员会中安插敌对分子），而且还捏造了败坏联共（布）州委第一书记 C·N·彼得罗夫、内务人民委员丘瓦什·罗扎诺夫声誉的材料。

米沙柯娃曾多次从契博克萨雷打电报和电话给莫斯科。她的行动没有得到科萨列夫的支持。然而，她却从马林科夫那里得到了“好处”。最终，她以挑拨、讹诈和恐吓的手段达到了把瑟莫金、捷连季耶夫和其他一些人开除出共青团的目的。

但是在莫斯科，她所做的蹂躏人的努力并未得到支持。

米沙柯娃在报告中诽谤了数十名善良的劳动者、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说有很多“被青年反革命集团彻底破坏的地区”。科萨列夫对这些报告并未给予放行。米沙柯娃自己倒失去了信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解除了她所担任的职务。

奥·米沙柯娃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控告科萨列夫。“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检查一下，为什么没有根据我的信号采取措施。由于谁的过错，楚瓦什的人民的敌人一年来还未被揭发和揭露出来。为什么我写给科萨列夫同志的报告信没有转交给叶若夫同志。”

这个控告也就成了召开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合适的借口。然而，不过是形式上的借口。这里主要的是关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状况问题，因为斯大林对此状况早已不满意了。而他本人为完全不同的行为作出了榜样。会上有人说：“斯大林同志在掌握一些事实后，就把事情直接引向对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中的全部敌人匪帮的揭露……然后，在各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中的敌人也被揭露出来”。

亚·瓦·科萨列夫、B·O·皮基娜和 C·R·搏加乔夫……被解职，被开除出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11 月 28 日前，他们一直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进一步决定。

热爱的工作被剥夺，往日认识的朋友渐渐地疏远，这使科萨列夫非常惘然。过去隐藏在意识深处的零零落落的东西如今接踵而至，产生了一连串的必然联系。

——萨沙，有人对我说你娶了你的速记员作妻子。

——不对，约瑟夫·维萨里奥维奇，玛露霞是普列汉诺夫学院的大学生。

——她从哪儿来，什么家庭出身？

——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布尔什维克，父亲是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人，在阿斯特拉罕和阿塞拜疆同基洛夫一起工作过，19O3 年入党。碰巧的是，他也出生在梯弗里斯省。对了，我把最主要的东西给忘了。斯大林同志，您一定记得他在格鲁吉亚的情况，要知道，他是同您，马哈拉泽、邵武勉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文学协会”的。他叫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纳奈什维里，您想起来了吗？

——萨沙，你说得够多了，怎么不一下子说出姓什么。你简直是在复述履历表，你在向谁背诵这些？向我。而我可是非常了解纳奈什维里的，他是我的敌人。想想吧！——斯大林瞥了一眼科萨列夫那张变得石头一般的脸，他很满意得到的印象，突然间改变了话题。

……后来科萨列夫才知道在纳来什维里和斯大林之间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然而，萨沙并未考虑斯大林的事先警告，也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很崇拜自己的岳父，对此并没有隐瞒。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谁是你的朋友？再没有别的朋友啦，而比较远一些的有……

瓦西里·切莫达诺夫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当亚历山大任俄罗斯列宁共青团鲍曼区委书记时，“发现”了瓦夏。他建议瓦夏去苏联党校学习。以后也一直注意着瓦夏。30 年代，共青团有一切理由为有切莫达诺夫而自豪。他写过一些关于青年运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说服力的文章。在青年共产国际中，他当之无愧地代表了苏联列宁共青团。“切莫同志”意外地被召回，然后就失踪了，这对年轻的国际主义者是极大的打击和震动。

帕沙·戈尔舍宁。科萨列夫推荐他担任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军事工作书记。戈尔舍宁是个很严厉的人，他外表整洁，神态端正，穿着军便服，腰上扎着不时作响的皮带，一群小孩子跟在他的后面叫着：“好叔叔，带我们坐坐飞机吧”。他的书《共青团和航空学》被读出了窟窿，帕沙是共青团工作人员中第一个开飞机上天的人。然而，主要的是他把数千名献身于军事事业的男女青年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帕维尔·戈尔舍宁，他现在在哪里？是否也带着“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而被捕了？

亚历山大·科萨列夫提拔、推荐和建议过很多人担承共青团的各级领导工作。

科萨列夫反对共青团蜕化变质，也反对试图把共青团由一个起教育作用的组织变成惩罚性组织。

科萨列夫捍卫共青团免遭诽谤。我们应该注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A·A·安德烈耶夫指责亚历山大的是什么：……“当我们党已经开始揭露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各方面的敌入时，不只一次地从科萨列夫同志那里听到，(……)说是在共青团里没有敌人(……)。

这种态度是虚伪的，科萨列夫同志不止一次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那里得到警告，其中包括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得到的警告：在共青团里不可能没有敌人和各种两面派（……）。要留神，科萨列夫同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你们要十分警惕，揭发共青团里的敌人，要把右派一托洛茨基特务清除出共青团。”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科萨列夫回忆了自己的一生。14 岁时，他第一次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从心底深处大声呼喊：“革命！快到院子里来！不能再让资本家捞钱了！”1917 年，莫斯科工入开始了二月罢工。“针织厂”的儿童和少年丝毫也不想落后于成年人。

……照片帮助他回顾过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玛露霞收集了那么多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有时候，萨沙工作的首都鲍曼区的共青团员通过她跟列宁取得了暗中联系。1922 年 10 月 3 日，亚历山大考虑大多数积极分子的意见后，口头传达了俄罗斯共青团区委会的决议：“立即把反映年轻鲍曼人愿望的当天报纸《青年之路》送给列宁，把这一切都委托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她担任《真理报》的秘书）。

奥尔忠尼启则……当他们刚刚相识，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第一次与萨沙那双粗糙的手相握时，他开玩笑地说：“科萨列夫，你的手掌里好象有金刚砂。”亚历山大感到很窘，把拳头藏到了背后。“谢尔戈同志，这是由于酸性造成的。正如作家们描绘的那样，这就是无产阶级童年的标志。”

……萨沙，突然大笑起来，在这些令人忧郁的日子里，这是他第一次笑。

——玛露霞，不要灰心丧气，我们的双手是完整的，头脑是健全的。哪怕是去远东，去天涯海角，只要有工作就行！——于是，他很快地站起来给斯大林打电话。当然，斯大林并未接电话，然而，管接待的人告诉他说：“你不要着急，科萨列夫，工作会有的。”

——我跟你说过，玛露霞，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亚历山大带着妻子在房间里旋转起来。

不，什么都没有解决……恶习总是卑鄙的，贝利亚式的——悄悄地在行动。有一个阴沉的人，身着水兵制服上衣，脚上没穿靴子，只穿着袜子，正偷偷地顺着他们的二层别墅的楼梯往上爬。他在寻找武器。大家都知道，科萨列夫是个有瘾的收藏家。很显然，在“一堆”已经出笼的诽谤中，仅仅指责搞恐怖主义是不够的。

亚历山大和玛丽娅在默默地告别，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互道珍重，都明白这是他们的诀别。萨沙在小莲娜的床前站了一会儿，他没敢去吻别，因为他害怕惊醒她。当冒着烟的汽车转过弯去并消失的时候，贝利亚出现在房子里——他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的——他不客气地对自己的人说：“也要把她抓起来。”第二辆车跟在亚历山大之后也把玛丽娅带走了。

在卢比亚卡，玛莎与叶卡捷林娜·伊万诺芙娜·洛尔别尔克——加里宁的妻子同关在一间牢房里。每次审讯后回来，她从不抱怨，也不呻吟。几乎刚刚喘过气来，她就把头转向玛莎，试图对她笑一笑。她回忆着自己的已成年的孩子们的苦难命运，她为孙子和当时已经疾病缠身的丈夫而担心。他们谈起了萨沙。她告诉玛露霞怎样才能挺得住，劝告她不要丧失信

心。

怎么能不思考那些在道德上要两面派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宣扬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而同时却又在破坏这个基础。要人相信自己的亲人犯了公民罪和党内的罪并与之断绝关系，进而把他从自己的心灵上抹掉——这要付出什么代价？

然而，莲娜·科萨列娃并未与亲人脱离关系。既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言论，更没有这样做。她几乎所有的亲人——父亲和母亲、外祖父和舅舅都被捕了。当自己还是孩子、少女时，她就一直坚持沉默的原则。她的祖母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科萨列娃，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教她这样做。

正是凭着这个非常坚定的信念——甚至到了绝望的边缘——她终于活了下来。

到了 1949 年，莲娜中学毕业并获得奖章，考进了季米里亚泽夫学院，这使祖母感到极为不安。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感到惊慌失措：莫非这是个圈套。人民敌人的外孙女和女儿会被学院接收吗？人们会相信你的——莲娜这样看待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从内心里放松了，准备去证明，别人相信她是没有错的。莲娜越来越感到需要父亲，越来越难于控制那种不向自己学院里的新朋友讲述自己父亲的愿望……

结局来得很快。有一次，有两个人闯进莲娜的房间，其中一个立刻扑到床的一端，把枕头扔到地上，把“罪证”扔在桌子上。“你还敢在自己手里保存人民的敌人的照片？”——“这可是我的父亲呀。”

审讯和查明“真相”开始了。出乎意外地被判流放十年，原因是“赞扬人民的敌人”。

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给女儿打电报说：“莲娜也得了你那种病。”玛丽娅·维克多罗芙娜写信给 A·H·波斯克列口舍夫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设法求得允许她和莲娜迁到一起。经过有伤尊严的折磨和拖延后，他们在诺里尔斯克“重新相聚了”——玛·维·科萨列娃，她的弟弟帕维尔·维克多罗维奇·诺来什维里（被捕前任白俄罗斯科佩尔区党委书记）和莲娜。现在，莲娜的生活道路被再次打断，她面临着向老一辈学会怎样生活的问题。

老一辈们仍在进行斗争。

马里自治共和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前代表瓦·

费·皮基娜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报告

“我认为向您报告二年半来我所直接目睹的一切是我的义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其中包括特别会议，犯了错误，结果使许多诚实的，忠于党和祖国的人惨遭磨难……潜人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人民敌人搞阴谋的目的是杀光布尔什维克式的干部，有意造成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那些唯官是图和给自己留后路避免承担责任的人——一部分是为自己官运亨通，一部分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表现得很充分。

特别会议在判决时，判处的是完全无罪的人，提出的控告没有充分理由，忘记了在每一个判决的后面都有活着的人（……）。

作为一个受审人，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第一次站了 36 个小时，第二次 58 个小时，在列福尔托夫监狱我惨遭拷打……在单人牢房里我被关了四、五个月，经历了心理上的冲击。如果一个人有罪，为了使他认罪，这一切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所有这些办法都未获得任何结果，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承认的罪过（……）”

这封信是 1941 年写的。这封信并非通过普通的邮政送到莫斯科的，它是通过人们团结一致组成的接力棒传到莫斯科的。这也是凭着绝对英勇的精神送去的。

根据特别会议决议，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被遣送到波季马（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妇女感化营，她惊奇地发现不少老熟人。这些人都是人民委员、党和共青团工作者的妻子、女儿、姐妹和远方亲属。

在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共青团积极分子阿尼娅·拉比诺维奇（罗津娜）。她在波季马一个皮鞋厂里工作过，帮助了皮基娜。她使用的是过时的、祖先传下来的秘密活动方法。从皮基娜那里收到鞋子后（似乎要修理），阿尼娅巧妙地把一封危险的信分成几部分“塞进”鞋里的鞋跟和鞋底之间。信早已写好了，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方便的机会。

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久久地等待着回信，在波季马等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卡扎钦斯克区的卡扎钦斯克村等待过，她被流放到这里永久居住。信已经送往莫斯科，然而，却没有落到收信人的手里。很幸运，那些在我们的土地上永远不会消逝的仁慈而诚实的人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停止转送信件的接力棒。信被藏到可靠的地方。否则这封信就不会保存到为瓦·费·皮基娜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1954 年，撤销了对她从前的一切判决，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被恢复了党籍。她毕业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党、苏维埃和报刊工作人员培训班，1984 年以前，她在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她奇迹般地活了下床。她拼命地工作，要追回对同志们无法报偿的义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她走访了一些感化营，又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人们的痛楚。她参加了筹备释放那些无罪受难的人们的工作，恢复家庭对亲人的洁白无瑕的记忆。

在深入到她现在可以接触到的那些文件的时候，在出席审讯贝利亚主管部门的前“司法人员”的时候，瓦莲金娜·费多罗美娜似乎重新了解到“科萨列夫案件”的极端荒唐。在这个案件之后，是制造“青年诉讼案”的罪恶阴谋。

最初，瓦丽娅是在贝利亚本人那里听到这几个字的。1938 年 11 月 28—29 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三个书记——科萨列夫、皮基娜和绥拉菲姆·博加乔夫同时被捕了。清晨五点时，瓦丽娅被带到日利亚办公室。他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眯着眼睛，透过夹鼻镜看着瓦丽娅，使人感到难受。他不是在说话——而是不停地大声地迸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您为什么在全会上不揭发科萨列夫？大家对您有另一种看法，您这个出身于列宁格

勒无产阶级家庭的姑娘，却与特务结了婚！是的，您不要装出愤慨的样子。科萨列夫是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他是在波兰动物园中被招募的。这已经被证实。而共青团因此出了风头。发现了一个特务训练所。我们已抓获500名特务。您想想自己是什么？我们正准备一个青年诉讼案，要您谈谈您是怎样被科萨列夫招募的。

她挺立在贝利亚面前，象一根细而晶莹的蜡烛，静静而顽强地燃烧着。无论是贝利亚，还是他的帮凶都无法熄灭这个火焰。

她思考着，回忆着。原来如此：在制造一个青年诉讼案。真是不可思议——青年人有不可胜数的突击工作要做：开发北极地带和萨哈林岛，建设第涅伯河水电站，"亚述海钢铁厂"，"乌拉尔机器制造厂"，莫斯科地铁。然而，突然要搞一个青年诉讼案！

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同谁去商量？在旁边，很近，就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然而，一堵墙却隔断了他们的联系。这事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了，因为他是主要的靶子。

…科萨列夫被扔进死囚牢房里。有一天，他要了纸和墨水，给斯大林写了一份申诉书。他肯定他自己和因为他的"案件"而被捕的共青团工作人员没有犯任何罪。他强调指出：消灭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干部是丧失理智。他要求成立一个正派而有权威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审查所有的材料，并做出客观的结论。

侦查员施瓦茨曼把亚历山大的申诉书交给了自己的上司。贝利亚大发雷霆，把申诉书撕成碎片。1956 年，在审诉施瓦茨曼的过程中，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参加了这次审讯。当时另一个侦查员谈到了关于对科萨列夫最后一次审讯的情况。科萨列夫被无休止的审讯折磨到了极点。他意识到结局已近，他再也不能，也不想抑制自己愤怒的感情："你们这些恶棍和罪犯，你们要毁坏苏维埃政权！你们这些坏蛋迟早要因这一切行为受到惩罚！"

他们一直反抗到最后，没有站污共青团，也没有挑起"父辈和子辈"的冲突。就这样，"青年诉讼案"的阴谋没有得逞。皮基娜表现出不畏强暴的平静（为这平静她付出了什么代价！）。科萨列夫则表现为满腔怒火的抗议。他们二人拥有正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自己优秀的同志们的支持。象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绥拉菲姆•雅科夫列维奇•博加乔夫、共青团莫斯科市团委书记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就是这样一些同志。

1939 年 2 月 23 日，35 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列夫被枪决。

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我们不仅怀着强烈的和无法弥补损失的感情来怀念他们。我们无限感激和赞颂那些为了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而奉献一切的人们。他们没有在别人的疆域寻找乐园，也不会不付出力量和心血就去接受现成的哪怕是太阳城。这就是为什么，纪念他们——就是纪念英勇而又惨痛的 30 年代。没有 30 年代也就没有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我们今天的改革。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 3 月且 7 日。徐丽娟译，董智忱校）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

——他是怎样的人？

奥·哥列洛夫尤·托姆斯基

这是我们从《劳动报》读者来信中取出的一封信。这几天投到编辑部的许多信，请求说明关于同列宁一起建设党、准备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镇压的人的生活和悲惨命运。在他们当中，也有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原姓——叶夫到莫夫）。

历史学副博士奥·伊·哥到洛夫和托姆斯基的儿子龙·米·托姆斯基的谈话，回答了有关这个人的一些问题。

不久以前，报刊上公布了关于给尼·布哈林、阿·李可夫和其他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审判案参力。者彻底恢复名誉的报道。那末，米·托姆斯基怎样了呢？我听说，他在1936 年 8 月用枪自杀了。所以，对托姆斯基的判决没有作出，因而也就没有通过法庭为他恢复名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一个身居国家和党的显要职位、多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人，现在仿佛仍被编在“人民敌人”的不幸的名单里？

加里宁大学学生 B·勃卢多夫

奥·哥列洛夫（以下简称奥·哥·）——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据很熟悉您父亲的同志证明，据我研究他的生平时了解的资料，我觉得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是个坚强、刚毅的人。他几次被沙皇警察逮捕、坐牢，服过五年苦役。殴打、单人囚房、押解、饥饿、寒冷……，一切都经受住了……

尤·托姆斯基（以下简称尤·托·）——但父亲就是受不了凌辱、委曲，受不了捏造指责他背叛党的事业。1936 年，我已 15 岁。一切部记忆犹新。尤其是 8 月，那成为他生命最后的、很可怕的月份。当时开始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其他人的审判。报上公布审判材料后，父亲给当时联共（布）中央书记和附属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叶若夫打电话，并告诉他：“如果一切诽谤和造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末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再不需要我了”。据父亲讲，叶若夫对此回答：“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信你。”在解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以后那个时候，父亲领导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管理国内出版活动。8 月 21 日，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开党的会议。父亲很晚才回到在博尔舍沃的别墅，可是整夜没有睡觉。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并送来报纸，报上公布了关于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党的会议的材料。父亲读完后就走到花园去。然后叫了我。我们沿着花园走。父亲说了话。当时我不晓得，这是他对我——最小的儿子的最后的临别赠言。他说，什么罪过也没有，没有党不能活。就在这个早晨，他死了。

奥·哥·——1937 年，关于他的死，这样写道：“由于难以解开自己同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联系，1936 年 8 月以自杀结束生命。”现在甚至重复这样的话，都有点为难。但按您的意见，他究竟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他想用自己的死得到什么？

尤·托·——显然，这种举动有很多原因。做判断的不应是我。对于我们，他的孩子来说，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父亲想以此把我们、家庭保住。父亲自杀那一天，在他别墅的书房里找出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其中托姆斯基请求不要触动家庭。在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父亲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写给中央的第二封信。这是一封篇幅很大的公文，然而我们和哥哥维克多把它转交到叶若夫私人手中。他读完并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他对我们保证，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量代替我们的父亲。

奥·哥·——好啦，那末这些保证的代价呢？托姆斯基家庭以后的命运怎样？

尤·托·——两个哥哥——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枪毙。母亲被判刑 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他们全部在死后恢复名誉。我本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从 16 岁起我就受到迫害——集中营 10 年，流放 9 年。回来和恢复名誉后，我已在苏联能源电气化部系统工作 20 年以上。

奥·哥·——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一致认为，20 年代和 30 年代之交，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提出的建议含有合理的内核。他们的立场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在国内开始确立了行政命令的领导制度。由于斯大林的偏执，任何其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些观点的代表者是危险的。

现在，当我们坚决拒绝行政官僚制度的时候，正在引进经济杠杆、人的因素，深化民主。过去在这个方向思维的人会对我们很有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意恩的是，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作为一个人，是什么人物。他是怎样的人？

尤·托·——是坚定的人。记得我哥哥维克多讲过，当父亲带他和自己的同志赴巴黎时，他亲眼看到发生在火车上的一件事。当大家刚离开波兰某个小站的时候，一个什么东西从车厢开着的窗户飞进来，——所有的人见到一颗手榴弹，它在地上转动不已。瞬间不动了。然后，父亲抓住它，用力把它往窗户外扔去：在远处斜坡下爆炸声轰隆一阵……

奥·哥·——米·巴·托姆斯基的工会履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开始了：1905 年他在雷瓦尔建立五金工人工会，1906 年在彼得堡建立雕版师和彩色石印工工会，19O7 年被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会的重要决议。关于这段时间，您父亲什么也没有讲吗？

尤·托·——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可以引用发表在 1927 年而现在不知道的父亲回忆录的两段摘录。父亲考虑了工会实际的、日常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在 1907 和 1908 年之间的短期内，当时……我们不明白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谈到承认党对工会的领导——原编者），就来到工会，并开始问：瞧！你们接受不接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但那些人说：我们不谈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谈能否给我们这些千粗活的工人提高工资 5 戈比？！对他们的回答是：这是小事，而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怎么样呀？——我们不讨论这件事。——‘但我们要求你们讨论’。——于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那就到门外去，在那里讨论吧’。这就是 1907—1908 年的情况，当时很多幼稚而又热情奔放的孩子带着这个决议直接投向工

人。但是，到 1909 年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很大部分工会理事会中已经坐着布尔什维克。他们为此做了什么？他们已经不讨论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实际实行”。

第二段摘录是关于反动时期的。那时候，不但利用工会，而且利用其他工人阶级合法组织的任务，特别重要地提到党的面前：“1907 年底，布尔什维克在泰里约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讨论了我们在工会工作的纲领。在那里发生了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要求一定的重新布置力量的反动时期就要来临。讨论了关于职业的和其他的工人组织，关于利用合法的可能性等等。其中，我是相当正统的工会工作人员，可以经受一切，但是不能经受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去互助会工作这件事。我当时认为互助会是头号机会主义组织，不值得我们注意。‘瞧，工会——这是工人的阶级组织，可以在里面工作，并且我们应当建立这种组织，而互助会——不值一提’。我由于年轻，当时作为自己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论据之一说了如下的话：‘您怎么啦！还想推荐我们去三弦琴手小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这是三弦琴手工人小组，——我推荐你们去，虽然那里只有 3—5 名工人。如果他们弹奏三弦琴，奏《上帝啊，保护沙皇》，那就教他们第一次奏《马赛曲》’。”

奥·哥·——二月革命时，托姆斯基正在西伯利亚，即伊尔库茨克省的一个居民点。3 月底，托姆斯基来到莫斯科，在弗·伊·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他又去彼得格勒，在那里和伊里奇谈话后开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

十月革命后，托姆斯基在莫斯科工会委员会工作，12 丹在那里被选为主席。1918 年 1 月，在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关工会任务的报告发表了结束语。他很快成为国内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他的信念是什么？

尤·托·——父亲不止一次地说，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是由大量细小的、有时不明显的事情逐渐形成的。按照他的话说，工会工作人员应该始终处在群众中间，感觉他们的利益，了解他们怎么生活，什么使他们着急。1926 年 3 月 2 日，托姆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领域的任务时，这样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共产党人能对工会的作用和工作估计不足吗？坦率地说，文学家习惯于写关于非常重要的世界问题的抽象题目的富丽堂皇的文章，鼓动员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和在掌声雷动下作关于世界任务的响亮的演讲是唯一重要的事，对于他们来说，工会的工作（有时归结为争取给工人 5 或 7 文比的津贴，或者归结为捍卫关于开水的要求），好像是平凡、单调的工作。为了使为革命而奋斗的战士了解必须弄清楚关于五戈比的问题，——不值得多纠缠！你们记得，工人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弗·伊·列宁在一篇初期的作品里曾写了关于要求开水、洗脸盆等等。这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这就是从最初几步起就明白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人”。

1924 年 1 月 26 日，父亲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剧院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言时，对列宁在工会运动领域的遗嘱做了这样的概括：不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不要把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如果阶级的利益要求，就应牺牲一切个人的东西，一切集团的东西，一切小团体的东西；不断地教育成千上万的工人，吸收他们加入国家机关，使之得到改善、重新调整、巩固和接近群众；工会应当更“接近群众”，应当成为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

奥·哥·——托姆斯基是工会行政命令方法的鲜明反对者。1920 年 11 月，托洛茨基发

表“整刷”工会的口号时，正是他第一个充满不安。

尤•托•——他曾反对工会中的官僚主义。这样，在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工会通令过多的问题。托姆斯基总是说，如果不及时着手医治这种似乎不伤人的病，那末，对于病人，事情可能结束得不好。他说，工会机关这类病症的萌芽，可以形成“……机关的僵化，站在群众之上的帮会的建立，工人贵族、工会官僚帮会的建立。对于工会官僚来说，工人组织的工作不是应尽阶级义务的事业，而是生活的手段——而是职业……”。

奥•哥•——您说了关于通令和关于托姆斯基在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因此回忆起 1924 年在《鳄鱼》杂志上的一幅漫画：“‘您知道——在画着两个工会工作人员的图画下面的说明写着，——托姆斯基在代表大会上怎样谈通令问题的吗？他说通令，这是工会运动的敌人！’——‘对，对，妙，正确！关于这点一定要散发通令’”。

尤•托•——这是很典型的。当时由于真正有批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简单、更民主。所以，接受批评是正常的。例如，母亲说过，父亲有时来时，没有任何顾虑就说：“真是，伊里奇今天把我痛揍一顿，把我摔得两肩着地！”

奥•哥•——列宁不止一次批评了托姆斯基。但在急剧转变关头，在决定党在工会方面的政策问题的工会争论的时候，托姆斯基站在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上。列宁支持他。当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在“整刷”工会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来找列宁，并且，按伊里奇的话，开始激动地叙述托洛茨基怎样说到“整刷”，而他，托姆斯基，又怎样与之争辩。弗•伊•列宁继续说，“……当事情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剧’政策是根本错误的”。

弗•伊•列宁保护托姆斯基不受似乎他犯了严重理论错误的批评，指出：“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主要是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并且如果群众感到一些痛苦，却不知道是什么使自己痛苦，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痛苦，如果他在这时大声疾呼，那末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在托姆斯基那里可以找到很多理论上的小错误。不过……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好处。”

如果继续谈关于托姆斯基的错误，那末，错误基本上发生在他担任苏维埃工会领导人职位活动的初期。例如，1921 年春，在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姆斯基的行为遭到弗•伊•列宁尖锐的批评。党中央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托它起草代表大会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决议草案。托姆斯基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受委托把这个草案提交代表大会的共产主义党团审理，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这个草案。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通过了梁赞诺夫提出的错误决议。中央全会停止托姆斯基对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和继续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在 1922 年 1 月前的一些时候，托姆斯基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尔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之后，又回来做工会工作。此后，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工作上就没有犯严重错误了。

尤•托•——1936 年 8 月，在他离开工会活动许多年以后，明显臆造的托姆斯基的错误，被看作是他的罪过。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忘记。

奥·哥·——托姆斯基和斯大林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

尤·托·——在苏维埃政权初创年代，父亲和斯大林常常互相来往。我们保存了注明1926 年的斯大林照片和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927—1928 年，我们全家常常到索契的普查诺夫卡斯大林那里去。阿·李可夫也住在那里。尼·布哈林常常来。记得有一天是谁的生日。妈妈和斯大林做了烤羊肉。斯大林亲自在煤火上烤羊肉。然后，大家唱俄罗斯歌曲和革命唱曲，还走到海边散步。

奥·哥·——托姆斯基和谁是好朋友，他讲到过谁？

尤·托·——父亲讲过谢·米·基洛夫。1929 年，他和父亲一起在希比纳从事磷灰石开采。离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后，父亲在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工作。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

2934 年秋，基洛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

我从父亲那里听说过许多关于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伏龙芝的热情的话。1927 年，父亲被派到土尔其斯坦。当时在那里有鲁祖塔克和伏龙芝。父亲和伏龙芝很要好。

奥·哥·——托姆斯基有什么样的爱好？

尤·托·——父亲绘画很好——用木炭、水彩、油画颜料。喜爱照相、收藏武器。例如，记得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布柳赫尔、斯大林、图拉工人都送过他武器。我们被逮捕后，收藏物失掉了。

奥·哥·——托姆斯基埋葬在哪儿？

尤·托·——8 月 23 日前夜，叶若夫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来。他和母亲长久谈话，并且告诉她，打算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8 月 23 日早晨，有人打电话转告母亲，要埋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地。过了一些时候，通知要临时埋葬在博尔舍沃墓地。父亲的尸体被涂上防腐剂。在安葬那天，别墅附近聚集了很多人。有人紧急做出决定，把托姆斯基埋葬在别墅的地里。稍后，他的尸体在夜里被挖出。他是否还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

奥·哥·——谢谢这次谈话。今天，我们一再追忆不平凡的工会历史，学习它的教训。米·巴·托姆斯基是工会运动的出色人物，关于他生活的详细情节将是读者感兴趣的。

（原载苏联《劳动报》1988 年 4 月 2O 日。孙成木译）

……也有我洒的一滴血

——布哈林及其绝命书

列夫·沃斯克列先斯基

我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促使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表于1931年的组诗《波涛》中写下这样几行："你在近旁，社会主义的运方……你透过理论的烟雾抽吸，国家免遭流言蜚语中伤

用生活兑换生活

在我末遭还击的地方，

我的意义只在于我的付出，

而我知道多少就付出多少"？但当我后来知道这几行了不起的诗句是献给谁的时候，我实在是惊讶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一个非党员，按照普通的看法"不是自己人"，不顾"上面的愿望"没有给斯大林写过诗，却把自己的"波涛"献给另一位党的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被称为彻头彻尾的政治家、1906年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2月后的中央委员、主要党报的主编、不同时期内担任政治局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人。而当这位活动家的头上乌云密布的时候，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他拍封电报（另一说是写信），向他表达自己的同情、支持和对他清白无罪的坚信。在30年代公开寄发这样的信件是不容易的事。当然，这一举动可以说明许多，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是这样，对他的收信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也是这样。

好了，可诗人总归是诗人，感情用事的人。那末——列宁呢……让我们想一想在1922年短暂的12月的日子里，拨给他这个垂死的病人的每一分钟有多么宝贵，想一想在关于他的最亲近的战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人的政治遗嘱中，每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困难地口述的字有多么宝贵。看来，值得写的只应该是业务上的和政治上的评语，而不应有任何"感情色彩"，因为——顾不上这些。可是突然——是充满人情味的、热诚亲切的话语："布哈林不仅是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也在这里，一句又一句，也写了批评意见（这在下面还要谈到）。但终究是："党所喜欢的人物"。

在不久前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日子里，在悲惨难忘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审判案"（1938年3月2日—13日）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米·谢·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报告中谈到尼·布哈林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布哈林在20年代末的错误，这些错误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就都承认了。众所周知，中央政治局建立了全面审理有关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问题的新的和已知的事实和文件的委员会。毫无疑问，关于审判尼·布哈林的问题和为他在党内恢复名誉的问题都会被审理。谁也无法超前预料最终的裁决。

但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对布哈林个人的看法。这看法既没有什么超前可言，也谈不到什么晚到：不论个人，还是人们对他的议论——正式议程以外的议论——都是这样。有什么好掩盖的——现在在谈论布哈林，过去也谈论过。

战争刚结束后，我不知在哪里弄到一本20年代《星火》杂志的合订本。当时的一张照片至今在我眼前：布哈林在一包烟卷上写下了他向围住他的少先队员们许下的诺言："我戒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关于这个人的印象形成了，——哪怕这种印象是幼稚的，是天真的。

我记起了我的父亲关于20年代，也就是他的青年时代讲的话：

——在尼基茨卡娅大街，正好在动物博物馆对面，我在街上面对面地遇到了布哈林。他穿着长筒靴子，工人的皮外套，敞开着未扣扣子。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在跑：这位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匆忙地要去给莫斯科大学学生讲课。我当然紧跟着他。布哈林登上共产主义礼堂的舞台后，很快地脱下上衣，把它挂在椅子背上，然后走向讲坛。大学生们简直象疯狂似地欢迎他……

许多年以后，我有幸认识了安娜·米哈依洛芙娜·拉林娜，即尼·伊·布哈林的遗孀和他们的儿子——艺术家尤里·拉林。

在克日扎诺夫斯基大街离地铁"工会站"不远的这间房子里，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你听着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讲话——会感到时间缩短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就象昨天的一样出现在眼前："……我从楼上下来——斯大林正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儿作客，他们喝着茶……我要说，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关系是友好的。斯大林经常请他到自己的别墅去。他还坚持要我们从'大都会饭店'搬到克里姆林宫里去住……在我们隔壁的住宅里——隔着一层培——住着奥尔忠尼启则。"

我看着墙上挂的布哈林的照片：高高凸起的前额，明亮的眼睛，真诚友善略带讥讽的目光，嘴唇上慈祥的皱纹。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体格魁梧高大、休态匀称的人，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个子不高、长着红褐色头发、象水银一样好动的人。他虽然占据了党和国家的高位，象当时说的，成为领袖之一，但他依然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富有朝气的、快活的、吸引人的和十分坦率直爽的人。

在对面的墙上一是两幅油画风景画，这是不知什么奇迹使之保存下来的布哈林的作品。

从他身上发出一种电流，用今天的话说，他创造一种生物场。谁进人这个生物场，都会无意中感受到他的作用。这就是又一种独特的心理因素。

请想象一下1920年的极其困难的春天。国家的经济瘫痪了，面临着可怕的饥饿的威胁。弗兰格尔的军队不断施加着压力。恰恰就在这些日子（而最可能是——这些夜晚）列宁钻研着布哈林刚刚出版的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转换过程的一般理论，第一部）》，读完后，写了篇戏谑性的书评，有意带讽刺意味地模仿作者繁冗的文风。

这在今天看来会觉得突然，同常见的列宁形象不相符合。这是怎么回事？！讽刺性的模仿？而且还在这种时候，完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列宁的书评发表了不止一次，可以找出来读，可是布哈林的书《过渡时期经济学》呢……也应该读一读。譬如说，我们现在习惯说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在当时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词汇巾，这样的说法是很刺耳的。当时经常

说的是另一种说法：引进、确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哈林差不多是第一个，他懂得并且写道："社会主义需要去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个人资源只是发展的出发点，这种发展包括很长的一整个时代。""十分正确！"——列宁在书页边上写道。现在保存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的列宁个人所有的那一木书，在书页边上写满了各种评注。有时列宁同书的作者争论，有时更准确地补充作者，有时是："正确！"、"十分好！"、"很好！"、"正是这个字！"、"正是这样！"、"这一章很精彩！"

不，列宁在 1920 年极其紧张的几个月里，认为需要抽出时间来仔细阅读布哈林的书，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对《过渡时期经济学》文风上的缺陷嘲笑一阵之后，他突然改变了那种友好的讽刺模仿的口吻，十分严肃地指出："可以表示希望，这个不大的缺点在以后再版时会得到改正，新的版本对我们广大读者来说是多么需要……"

让我们回到在前面已经引证过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布哈林的批评："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事实上：如果把学习理解成学院里有计划的课程，他的确学得很少。19O7 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专业，当时他还是哈莫夫尼基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宣传鼓动家，一年半之后就同莫斯科市党委其他委员一起被捕。在四年"大学"期间——三次被捕，苏舍夫监狱和布特尔监狱，被流放到奥涅加和非法出境。

他的六年的流亡生活可以拍一部惊险电影。在奥地利被捕，关在军事要塞里。在英国被捕，后来又在瑞典被捕。被驱逐到挪威，偷渡到美洲，在美国各大城市巡回宣传。一听到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布哈林就急着回国（经过日本，绕过地球），并成为（象《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里写的那样）"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之一"。

但这只是布哈林的外部生活轮廓。还有另一面：在图书馆里的紧张工作，长时间的沉思。在维也纳，他听了柏姆一巴维克这个（至今）公认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鼻祖"本人"的课，为了以后用争论的武器与之交锋，就象同奥本海默，司徒卢威、图甘一巴拉诺夫斯基交锋一样。同时——是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组织斗争，在国外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工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发表学术著作。

是的，在这些著作里"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是有的。但请注意列宁在同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作出的重要保留条件：对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强调指出，是"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1922 年 12 月 25 日）。

而尼古拉·布哈林在 1922 年 12 月是几岁呢？10 月 10 日他刚满 34 岁。在这之后又写了许多文章和书，有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争取彻底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斗争，被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在这之后——有在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说，有他第一次提出来，后来成为常用的词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这之后——有在起草所谓"斯大林宪法"委员会里的积极工作。

在 1937 年中央二月——三月全会前夕，他知道他的自由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感到没有希望在世时证明自己无罪以后，——安·拉林娜回忆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被捕前写了一封绝命信。我们等待着搜查。害怕这封信在搜查时被发现，他委托我把它背熟。在深信我已牢记这封信以后，他把信的手稿销毁了。在被监禁和流放的所有岁月，我象念祷文似地不断重复这些话：

"我就要离开人世。我不在无产阶级的斧铀前低头，这把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感到自己在凶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约采用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巨大的力量，有组织地制造谣言，果断而坚定地行动。捷尔任斯基已离开人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当时革命思想指导着它的一切行动，证明对敌人的残忍是必要的，保卫国家不受各种反革命的侵害。因此，契卡的机构享有特殊的信任、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

拉林娜重复这些话不知多少次了。可以把它用录音机录下来嘛，不知为什么又怕录音带会断。

"……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都可以被碾成诽粉，都可以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怀疑自己的话——那末证据也立即会有的。

乌云笼罩着党。我的丝毫无罪的头会牵连到成千上万无罪的人。因为需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一个不仅在现在，在我和党之间已经七年毫无分歧的时候不存在的组织，就是在右派民对派时期也不存在的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留京、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是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的。

从 18 岁起我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这几天来，有一个神圣名称的《真理报》却刊登极其卑鄙的谎言，说我尼古拉·东哈林似乎要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厚颜无耻的行为，这是谎言，其厚颜无耻的程度，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有下述谎言可以类比：'现已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争，献给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

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但愿后代们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责更严。我们是沿着尚未开辟的道路第一次走向共同的目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尚。当时在《真理报》上辟有《争论之页》专栏，大家争辩、寻觅途径、吵架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怕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残着党。我向全体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深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会把我头上的污秽清洗掉。我从来不是叛徒。如有可能我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也从未想做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下面是印在记忆中的最后几行话：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洒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他去出席中央全会了，但没有回家，永远也回不来了。这是 2 月 27 日。很快，安娜·米哈伊洛芙娜也被逮捕。尤拉当时还不满周岁，被送往保育院。

1938 年 3 月 13 日，宣读了判决书。这是应该遭到控诉的判决之一。

（原题《同志们，你们要知道……》，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 1987 年第 49 期，1987 年 12 月 6 日。曹特金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安·拉林娜费·梅德韦杰夫

（《星火》杂志记者同尼·伊·布哈林的遗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谈布哈林的遭遇）

——要把我最近 5O 年来所经受的一切的力度和深度转述出来，人类的语言是不够用的。况且，叙述过去的事，意味着是重新再经受一次。唯一使我认为需要这样做并给我以回忆的勇气的，是我对党、对丈夫所负的天职，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象我那样保留这些证据……

——安·米·拉林娜

有一天，一个相识的艺术家向我谈起关于他的同行尤里·拉林的难以忍受的遭遇。这个艺术家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这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就是布哈林的遗孀。

——难道她还活着？

——还活着……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尽管国际局势还紧张，我仍向您提出关于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的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死后党员平反的问题……我提这一申述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最后一次出席 1937 年二—三月中央全会时（中央全会不是开一天会），预感到他已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当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这个难以忍受和充满痛苦的时刻，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记。布哈林被侦查、被可怕的和他无法解释的当面对质弄得疲惫不堪，因对荒唐的指责表示抗议进行绝食而变得极为衰弱，他跪在我的面前，眼睛含着泪水求我不要忘记他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的信的任何一个字，求我为他的平

反昭雪而奋斗：‘你要发誓，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发誓！你要发誓！’于是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你们需要布哈林的鲜血吗？你们要明白，我们是不会把他的鲜血给你们的”。——摘自斯大林 1925 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同志们，让我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了解他和爱戴他，而谁要是重提旧事，那他就是瞎子！”——斯大林 1935 年在为军事学院应届毕业生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1918 年夏天，尼·伊·布哈林在柏林。他被派去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家里讲起过，有一次他听到了关于一个令人惊异的女算命者给人算命的故事。由于好奇心，他决定同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去访问了住于柏林城郊的这个女预言者。手相术上给他卜算出的预断是令人吃惊的：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不知怎么读了罗曼·罗兰的著作，她选择了贝多芬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经过痛苦才有欢乐”。不，这句话没成为布哈林遗孀的座右铭，但是实际生活表明，她不由自主地既有痛苦，也充满了欢乐。这是当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想起了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安·米·拉林娜是在革命成功后成为执政的职业革命家的家庭里长大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很早就开始对党内生活感兴趣。这种兴趣同布哈林接近后变得特别强烈。因此，拉林娜生活的一切情节，甚至特别是个人生活情节，都没有体现出任何纯粹轻松的欢乐，而始终感觉到被一些那时看不见的复杂社会气氛所困扰：政治上的争论、争吵、纠纷，而最后是恐怖手段。

尤·拉林（米哈伊尔·亚力山德罗维奇·卢里耶，1882—1932 年）的名字今天渐渐被遗忘了，尽管他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关于他的资料在各种辞典和手册中都可以找到，可是这些材料没有提供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个性和伟大的可能性，他走过了特别英勇的一生道路。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温柔亲切地回忆起他的父亲，他是她的最亲近的人。关于他，我只想说几句话。拉林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年代里是很有声望的，有一次在游行中阿尼娅听到人们唱着提到他的名字的短歌：“我们在书中学到布哈林的智慧，拉林那里从早到晚开会。”

在革命前，拉林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部，公开和秘密地监

视警察局，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被捕、被流放，逃走。革命使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了各个革命事件。他作为经济学作家写了许多关于经济生活问题的作品，出版书籍，完成列宁的个人委托。可以说，拉林是处于苏联经济政策的发源地。

在女儿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是个不寻常的人。她说："很难想像一个生来身体就有缺陷的人怎么能够这样英勇地走过自己一生的道路。很容易被暗探局辨认的人，他怎么能够经得住无休止的追捕呢？他怎么能够从监狱中逃出来呢？逃出来，他就是挪动一下也是很吃力的。"他向女儿讲述，人们是怎样把他装在大柳条筐里从雅库茨克流放地点带出来的。有一次在乌克兰，人们怎样把他直接扔到监狱围墙外，同志们在墙外接住，又用手抬着走了一些时候。今人惊奇的是，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作家怎么能够这样富有成果，既然他的双手是这样不健康，他没有左手帮助，一只右手甚至拿不起电话耳机子。拉林一生中的一切都是用付出极大的毅力得来的。

H·奥辛斯基写的祭文说："他是我们的一位伟大、卓越而与众不同的工作人员，是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一位著名活动家，是特别忠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拉林的葬礼上，卢那察尔斯基说：拉林的非常美丽的眼睛好像在黑暗中也在闪闪发光。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记事很早。长到四岁时，她就开始倔强地关心自己的父母，她很少见到父母，常问她的妈妈和爸爸在哪里。她记得祖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了不满的回答："你的父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宁愿坐牢，宁愿躲避逮捕逃往国外，也不愿意待在你的身旁给你煮饭。"小姑娘不懂得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人，可是监狱就离家不远，祖父向她说，坐牢的都是小偷和强盗。沮丧的阿尼娅再也不敢问关于父母的事了。二月革命后，他们从国外回来了，她能"秘密地"和长期地见到他们。

——我非常喜欢妈妈，——安娜·来哈伊洛美娜回忆说，——她很漂亮，很端正，有一双被长茸茸的睫毛围起来的善良灰色的大眼睛。于是我得出了答案：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那么坏。

同自己的爸爸相会的时候，简直像演出一段话剧，女儿一瞧见他，却吃了一谅：因为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走路时把脚往前甩，同时手的动作也很不自然。由于恐惧，阿尼娅溜到沙发后边去了，号啕大哭，并叫嚷起来："我要到爷爷那里去！"母亲用手杖把她从沙发后边撵出去了，引起了父亲脸红和不安。可是到了傍晚，他使她折服了，而且他们成了永远的朋友。

＊＊＊

我清楚地记得与布哈林相识的情景。有一天，母亲带我去艺术剧院看梅特林克的戏剧《蓝鸟》。整天我都在所看到的东西的影响之下，而当我躺下睡着了的时候，在梦中重看了这个剧。而突然有人揪我的鼻子，我害怕了，因为剧中的猫大得有一人高，我就大喊："猫校开！"在睡梦中，我听母亲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在干什么，为什么您把孩子弄醒了？"可是我已经醒了，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面孔非常清晰地开始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时，我已抓到了自己的蓝鸟。蓝鸟象征着追求幸福和欢乐。这不是童话里虚构的蓝鸟，而是尘世上的蓝鸟。为了这只蓝鸟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我父亲的许多朋友中，布哈林是我最喜欢的人。在幼年，我喜欢他的充满活力和乐观愉快的性格，顽皮、酷爱大自然和通晓大自然（他是个不错的植物学家和顶好的鸟类学家），

以及他酷爱写生艺术。

我那时没有把他当作成年人看待。这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和幼稚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对父亲所有的亲密同志都叫名字和父名，并对他们称“您”；那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则没有获得这种尊敬。我把他叫作尼古拉沙，对他只称“你”，因此把他本人和自己的父母混淆起来了。当父母对此尚不习惯的时候，试图纠正我对布哈林的亲昵态度，但是毫无效果。

同布哈林的初次会晤之一是同回忆列宁有关。有一天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平常一样满屋是人，列宁也来了。在我的眼前，他同普通人一样是平等的。我模糊地记得他。我不想讲述，他说话时 n 和 P 发音不清楚，稍微眯缝着眼睛，说“头等重要的话”等等，许多人在关于他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这些。但是，一个有趣的情节永远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进人父亲的办公室时，布哈林刚刚走了。很明显，话题讲的是他，我不能了解列宁所谈的关于布哈林的一切，但是我记住了一句话：“布哈林是革命的金娃娃。”列宁对布哈林的这个评价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并接受了这个形象的说法。而我当时从列宁所说的话中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因为我对一切都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我向列宁表示异议。我说：“不对，布哈林不是用金子做的，他是活着的人！”列宁回答说：“当然是活着的人，我所以采用这个说法，因为他是有棕红色头发的人。”

我绝不想把革命过程的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或理想化。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战友的关系中具有极高的原则性。不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所有观点他都赞同。但是，我从幼年时起就永远记注了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道主义性质——坦率和友爱，原则性和忠实，追求预定的目标。

……1924 年 1 月 21 日晚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哥尔克打来电话通知说，列宁逝世了。我还没有睡，看到父亲悲伤的眼睛里的两行泪水，只有两行泪水顺着他毫无生气的苍白的面颊流动着。葬礼的那天——1 月 27 日正值我的生日，这扰乱了我童年的节日。父亲对我说，废除 1 月 27 日作为你的生日，现在这一天永远是个哀悼的日子。以后我们将在 5 月 27 日庆祝你的生日，那时大自然在苏醒，一切都兴旺。

最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带我到彼得罗夫卡户籍登记处去更换出生证。被拉林的申请弄得非常惊讶的户籍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长期坚持自己的意见，建议 5 月 27 日庆祝生日，但是不更换文件。最后他终于退让了。在我出生后过了十年，我进行了第二次登记。根据这个出生证，发给我公民证。在公民证上至今也写着 5 月 27 日是我的生日。

我同父亲一起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去，那里放着列宁的遗体。汽车不能开到那里去，我扶着父亲艰难而缓慢地步行走去。我们为了不迟到而提前到了。在圆柱大厅后边的一个屋子里，我们遇到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布哈林——其他人我记不清了。我很激动，同父亲一起走向列宁的遗体，被安排在侧面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她在离死者的床头很近的地方站着，好像一座雕像。

列宁的葬礼是不可能忘记的。关于这事，人们已经写了许多。我也是这一切的目睹者。从“大都会饭店”我们住宅的窗户就看见了去圆柱大厅昼夜不断的行进队伍的全部情景。我

夜间从床上起来观看连绵不断的人流。天气严寒，有火堆，有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的红军战士。我记得的一切就像在昨天发生的。

布哈林同我父亲早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就相识了，他们最初是 1913 年在意大利相遇的，而从 1915 年夏天起到 1916 年夏天他们一起又在瑞典居住过。从 1918 年起到 1927 年年中我们同时都住在“大都会饭店”，我父亲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观点上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友谊。他们彼此都是开诚布公的……过了许多年，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愿望，我们把自己的儿子叫作尤里以记念我的父亲。

……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很伤心，自己频繁地往他那里跑。当我去布哈林那里的时候，父亲很高兴。父亲总是觉得自己的病使我过着忧郁的生活，我没有享受到童年的欢乐。因此，当我有时到布哈林住的第 205 号房间去的时候，他骂道：“去打短工啦。”是的，父亲自己也竭力把我“扔给”他的这位朋友。

……我多次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里见到斯大林。有一天，这大约在 1925 年，我在童年温情突发之下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写了一封诗信，其结尾的话是：“我想见到你，没有你我总发愁。”我把诗给父亲看，他说：“好极了！你既然写了，去，把它送给你的尼古拉沙去。”可是我不好意思拿这样的诗到他那里去。父亲建议把诗装在信封里送去，在信封上他写上：“尤·拉林寄”。我决定：去，叫门，交出信后立即跑开。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顺着楼梯刚从第三层下到第二层，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斯大林。我明白，他是到布哈林那里去的。我立即决定，请他转交这封信，斯大林同意了。就这样，我把自己孩子气的第一次爱情表白通过斯大林转交给了布哈林（多么不吉利的命运经历）。

……1927 年对我来说是很凄凉的。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布哈林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没有通行证是不能到那里去的。虽然后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给我办了一个常用通行证，但是赶上他正好在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特意改变了自己上学的路线，走比较长的路，只从共产国际大厦旁边走过去，这个大厦在练马场对面，在特罗伊茨基大门附近，希望在此遇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不止一次地走运，我总是高兴地奔向他。时间是紧张的，因为党内的辩论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程度，正准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哪能顾得上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我父亲这里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是逗留的时间更长了。他们交谈关于当时党内的事情。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而那时没有什么使我担心的。但是较晚些时候，当我的年纪再长大了一点，在布哈林受到斯大林尖锐批评之后，我开始忐忑不安了。

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几乎每天都到我们的银色森林别墅来。母亲有点暗中嘲笑我们的迷恋，不认直接待他；而父亲不作声，并不干涉我们的关系。

1930 年秋冬和 1931 年初，我们力求在一起度过空闲的时间。经常到剧院和艺术馆去。我喜欢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同他一起度过时光。在墙上挂着绘画作品。在沙发上边挂着我喜欢的水彩画《晚霞下的厄尔布鲁士峰》。有各种鸟的标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猎获的战利品——偎开翅膀的大鹰，带点浅蓝色的佛法僧鸟，深棕红色的红尾鸲，蓝灰色的红脚隼，大量的蝴蝶搜集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大声朗诵。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朗读福楼拜的《萨朗宝》的。尼

古拉·伊万诺维奇非常赞赏满腔热血和刚毅的英雄人物，被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迷住了，因为他自己非常需要俄罗斯人的自由快乐的性格，“直到粗卤勇猛”。

当我们读到乐天派和爱开玩笑逗乐的布勒尼翁时，他像是受感染而笑了。布勒尼翁是同自己的朋友公证人帕亚在一起的。帕亚非常满意地给他荒唐无比的弯弯曲曲的文字，并以严厉的方式教会坐在笼子里的鸫鸟唱法国新教徒的赞美歌。

一到晚上，我们就长时间地在索科利尼基公园里散步，那时索科利尼基公园在莫斯科的城边。我们乘电车到那里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经常利用城市交通工具。有时乘客认出是他，就相互告诉：“你瞧，你瞧，布哈林在乘车走！”客者听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好！”有的人走到他跟前善意地同他握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只好不断地打招呼致意。由于人们表现出对他的注意，他很不好意思。

现在我已记不清了，我们从索科利尼基公园返回来的路上是怎样到了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的。我们坐在长凳上，背后是当时立在广场另一边的普希金纪念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下定决心郑重地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已陷入困境，他在两种可能性中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同我结合在一起生活；要么我们分手，长期不见我，让我能够不受他的干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有点开玩笑地指出：“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他精神错乱”，但是他自己又否定了个第三种可能性。

我没有立即进行回答，而痛哭起来。

现在，我很难解释自己的心情：这种流泪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深受震动；是由于在青年时期我的性格所固有的犹豫不决，还是由于在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长凳上在我身旁坐着的不是任何一个同龄顽童，而恰恰是布哈林，——可是我泪如泉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莫明其妙地看着我。他深信我已经作了选择，否则他也就不会先开口了。我们不吭声地坐了很长时间。我冷得打寒噤，他用自己热乎乎的双手温暖我冻僵了的双手。我们该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他请我到大剧院去看歌剧《霍万斯基叛乱》。我愉快地同意了。夜间很晚，已过半夜，我们俩个才回到了“大都会饭店”。母亲已经睡了。父亲还坐在写字台旁边，看到了我张惶失措的样子。他建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留下过夜，像以前那样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我睡得很不好，醒得很晚，我们的客人已经上班去了。

我已提到过，我的父亲任何时候都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关系。可是这天早晨，他出乎意料地向我开口说话了。

——你应当很好地想想，你的感情认真到什么程度，——他这样说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很爱你的。他是个细腻而感情充沛的人，如果你的感情不是认真的，就应该分手，否则这可能对他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这次谈话使我警觉起来，甚至使我害怕了。

我们的约会，上剧院，大声朗读仍在继续进行。

有一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谈起了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胜利女神》。

——很少有谁能写出这样细腻的爱情作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道，——《胜利女神》是爱情的赞歌！

我认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对这本书具有极大的兴趣不是偶然的。他是选着读的，他只愿意读这些地方：

“什么是爱情？这是玫瑰花丛中风的沙沙声。不，这是鲜血中通红的火焰。爱情，这是震耳的音乐，在爱情的音乐声中甚至老年人的心也会跳动。爱情像雏菊一样随着夜的来临而开放，像银莲花一样由于轻风微微吹动而合上自己的花瓣，如果你碰她一下就会衰落。

这就是爱情……。

他中止了朗读，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然后转过目光看着我。

他那个时候想什么呢？

“爱，这是造世主的第一句话，是他第一个突然闪现出的想法。当他说：‘亲爱的！’——爱就诞生了。他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他不愿意自己创造的任何一个生物不生存下去。于是爱就成了整个世间的源泉，成了整个世间的主宰，但是在爱的整个大路上——有鲜花和鲜血，有鲜花和鲜血！”

——为什么会有鲜血？——我问道。

——你想只要鲜花？在生活中不会是这样的，生活不会没有考验，爱情应当能经住考验，能战胜考验。如果爱情不能经住生活考验，不能战胜生活考验，那末也就没有爱情，也就没有克努特·汉姆生所写的真正爱情。

然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给我读老修道士温德怎样描述关于永恒的爱情，至死不渝的爱情，关于疾病怎样使丈夫卧床不起，怎样使他变得极为难看，可是他的经受了严重考验的亲爱的妻子，为了使自己也像由于疾病而头发全部脱落的丈夫的样子，也剪去了自己的卷发。后来，妻子也瘫痪了，她不能行走了，不得不把她放在轮椅上推着走。丈夫也这样做了，因为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妻子。他为了使彼此处境相同，往自己的脸上倒了一些硫酸，把自己烧得极为难看。

——喂，你怎样看待这样的爱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道。

——你的克努特·汉姆生讲的是神话！为什么要特意毁坏自己，把自己变成麻疯病人，往脸上洒硫酸？难道不这样做就不能相爱吗？

我的回答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笑起来，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克努特·汉姆生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情的力量和爱情的必然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突然用忧郁和不安的眼睛看着我，并问道：

——你能爱上一个麻疯病人吗？

我惊慌失措了……

——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回答呀？

我很激动，像孩子那样幼稚地说出：

——爱谁——爱你吗？

——爱我，当然是爱我，——他很自信地这样说道。他很高兴，微笑着，被我还是以孩子似的直爽态度泄露自己的感情所感动。

我刚准备回答，我可以爱他（虽然用不着使用将来式，因为一切都是发生在现在），他请求我：

——不需要，不需要，不要回答！我怕你回答！

我在很长的痛苦时期里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个非常不幸的问题：“你能爱上一个麻疯病人吗？”

＊＊＊

我现在谈谈关于我父亲的死亡，因为这事直接涉及到我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关系。我们对父亲的病情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什么情况也没有预示他会死得这么快。1931 年 12 月 31 日，他坚决要求同青年一起过新年。通常我同我的父母一起过新年这个节日。这次，我到我的同龄人斯塔赫·加涅茨基那里去了。我刚进了加涅茨基住宅的门（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是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他从 1917 年起先后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过——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我的父亲就打来了电话，他说：“你立即回家来，我要死啦！”家中很难想像的情景立即出现在我的眼前：平常移动都很费劲的父亲在住宅里以很快的速度从这个屋跑到另一个屋。什么事使他处于这种状态呢，现在也是个谜。我们怀疑是精神病，请了精神病学家克拉默教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默是苏联神经外科学奠基人之一，列宁患病的晚期，他是给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医生很快来了，但未发现任何精神异常现象。内科医生进行了诊断，发现肺的两叶发炎。父亲坐在沙发椅上，躺着根本不能呼吸，被折磨死了。经过两周的痛苦折磨，他死于 1 月 14 日。当他开始十分不好的时候，母亲把这事通知了他的好友。李可夫带着妻子来了，米柳京，克里茨曼也来了。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纳尔奇克度假（我给他打电话太晚了，他没赶上葬礼）。

在这永别的危急时刻，斯大林打来了电话，叫拉林接电话，可是我父亲已经不能接电话了。斯大林说：“真可惜，我还想建议他担任高级职务……”

一直到最后的时刻，父亲也是神志清醒的，母亲把斯大林打电话的事转告给他了。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奇。无论就我父亲的性格还是就其健康状况来说，他都不能当领导人了。加上拉林与斯大林也合不来。米柳京对这个电话比大家更吃惊，因为就是在前几天他报告给

斯大林说，拉林的情况很不好，甚至他好像要死了。“难道他忘了？”——米柳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并耸了耸肩膀表示英明其妙。

有一天，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了（斯大林的秘书——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我父亲请我母亲把装着当前经济计划草案的文件夹转交给斯大林。

然后，我父亲把话题转向了我。他的问题使、我焦急不安，给我出了难题。“你至今还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吗？”——他这样问道。他知道从 1931 年 3 月起我们同他就没有见过面。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要在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场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也不愿意我的回答使父亲临死前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可是我又不知父亲的愿望如何。但是，我不能说谎，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以为，父亲马上就要说：“要忘掉他……”可是他用很勉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度过十年比同其他人度过一生都有意思。”

父亲用手势向我表示叫我向他靠得更近些，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他几乎是对着我的耳朵发出嘶哑的声音说：“光热爱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因为由于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你生活得不坏，如果需要的话，应当能够为它献出生命，为它而流血。”他以巨大意志的力量勉强地略微抬起一点右手，攥成拳头，立即呆板地落到了他的膝盖上，嘶哑地喊道：“你要发誓，你能这样做嘛！”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武装干涉者反对苏联时，应当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我发了誓……父亲的遗嘱是这样的：“你们要把我的骨灰从飞机上撒向各方”，“我们会胜利的。”

＊＊＊

1987 年 11 月 2 日一整天，安娜·米哈伊洛芙娜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她留神地听取苏共中央总书记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每一句话。她激动和焦急地等待着对她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她认为，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对她来说比任何人都更重要。当她听到列宁说“……布哈林……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这句话的时候，她满意地松了一口气。50 年来，布哈林的名字在上下文中用正面的语言说出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使人更高兴和更明白易懂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性格是复杂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继续沉思着说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准确地预言他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再说，他自己也不总是任何时候都能预见到自己的举止，他能够做出考虑欠周的举动。政治打算归根到底与他是格格不人的，这妨碍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

布哈林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其实是能够强烈地甚至恶意地作出回答的。他能够以自己政治激情的猛烈的力量向自己的敌人扑去。同时，他的精神心弦的键盘是惊人的细小，我甚至要说，是过分地磨损了的。他的性格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动荡时代的日子里形成的，他那时所起的不是决定性作用，非常沉重而过分地承担了感情上的累赘，因为“准许接触的事务”极少，他的精神心弦也就断了。

他的性格的这个特点对政治活动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他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取得胜利，甚至在他正确的时候也是如此。

对比较小的问题方面的让步也是他所固有的特点。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对被他的批评意见刺激了的诗人道了歉。这些怀着最善良愿望提出来的关于提高写诗的技巧的

的意见是公道的，一般说来没有什么要道歉的。在 1937 年二——三月中央全会上，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请求中央全会原谅他为了抗议对他提出的前所未闻的指责而宣布的绝食，他也表现了这样的弱点。

这种性格的特点——精神上高度敏感和过分充满感情——使他常常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他很容易哭。我不能说，任何理由都会使他哭，他哭的理由总是严肃的。由于列宁逝世，我看到他的许多战友眼睛流泪，可是像布哈林那样号啕痛哭，纯粹像妇女一样，可能只有他一个。在集体化时期，他到乌克兰去，在一些小车站上看到成群饿得肚子发肿的孩子。他们讨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带的全部现钱都给他们了。他回到莫斯科后，顺便去看我父亲，谈到这种情况时大喊着说："如果革命胜利后十多年还能看到这种情况，这怎么能行？"——在歇斯底里的大哭声中他跌倒在沙发上了。我母亲用穿心排草酊把他灌活了。当布哈林知道莫斯科发生的十月起义，不是像彼得格勒那样没有流血，而是死了约有上千人时，他抽咬着大哭起来。

感情上过于激动导致他身体不舒服。他经常有病。这个很结实而有惊人毅力的人，是有着角力士的强健肌肉的运动员，由于剧烈的神经紧张而发蔫了。他的机体像是失去了抵抗力。

我不愿意根据我所说的造成一种印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一个"爱哭的婆娘"。不是这样。过分易动感情是他的复杂而丰富性格的一个方面。同时，布哈林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激情和奔放气概的革命家。他的革命潜力是巨大的，并需要有活力和行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全神贯注于革命地改造社会和使社会人道化的思想。如果不改变人的气质，不提高基层群众和革命前被认为是"平民出身"的人——工人和农民的文化，他认为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的。也许这个评述似乎有些一般化，可是正是他的这种思想变成极强烈的、永放光辉的和日益动人的理想，几乎成了他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唯一目的。新世界，他所想像的新世界，无论如何是应当实现的，同时他认为这绝不意味着"对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精神上的冲突总是折磨着布哈林，他也看到了对他有吸引力的思想的悲剧方面。"有些非常忧郁的人怀有乐观主义思想，也有些人是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布哈林有非常好的完整性格，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爱伦堡这样描写布哈林。

＊＊＊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布哈林在生活习惯上和在家庭里怎么样，他穿着如何，是追求物质享受还是对物质享受无所谓等问题，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谈了一些情节。有一天，斯大林在讨论布哈林外出去巴黎时指出：

——尼古拉，你的西服穿旧了，这样去很难堪，应当穿上好西服……

同一天，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裁缝打来了电话，他想要尽快地从顾客身上获得缝制西服的尺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请他不要量尺码缝制西服，并试图向裁缝解释他非常忙。裁缝惊讶地说："不量尺码怎么做。布哈林同志，请您相信我的经验，任何一个裁缝不量尺码都不能缝制西服。""你照着旧西服缝制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建议。

但是，他忘了这种摆脱困境的出路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是因为唯一的一套旧西服在他身上穿着。如果把西服给裁缝，报纸编辑（当时布哈林是《消息报》的主编——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只能穿着贴身内衣去上班。布哈林找到了访问裁缝的时间。裁缝给他缝制了一套新西服，他穿着这套西服去了巴黎，后来他也是穿着这套西服被捕的。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在丈夫被捕后过了两个月，同自己的儿子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父亲就从克里姆林宫搬到政府在大石桥附近的房子住了。这所房子曾被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称为“滨河街公寓”，到这时已经有一半废着。送来了交房租的帐单。没有钱付房租。因为房子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给米·伊·加里宁写了一个便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分子侦察机关在物质上没有保障自己的雇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我没有能力付房租，现把未付款的收租单给您寄去。”

根据安·米·拉林娜的证明，布哈林任何时候都没有攒下一点钱。他把自己写的著作的稿费都划拨给党的基金。他拒绝领取《消息报》编辑的工资。他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在那里按规定领取工资。

还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自己的司机尼·尼·克雷科夫那里借钱。

＊＊＊

布哈林是个受人欢迎的人。因此，我想回忆一下与我们逗留在捷列茨科耶湖有关的一个情节。有一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正和两位学者谈鸟类学的问题，他以目己的知识使他们惊讶不已。突然门开了，一个已过中年的阿尔泰人进了屋子。他仔细地环顾周围，想要知道在屋里的人中谁是布哈林。阿尔泰人身穿到处打着补丁的棉袄，脚上穿着破旧不堪的鞋子，他一只手提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另一只手拿着一包东西。

——您有什么事？——一个鸟类学家问道。

一我来看看你，一阿尔泰人说道，并转向戴大檐黑毡帽的鸟类学家，这顶帽子显然使客人误认为他就是布林。他认为，布哈林一定要戴着毡帽。

——是的，要看看你，——阿尔泰人重复说道，并望着鸟类学家，——我听说她来了，并住在这个木房子里。

他在自己的讲话里用的代名词都是阴性，字母既不变格，也不变位。

——喂，既然“你”要看看，可我不是“她”，——鸟类学家笑着说道，——那你猜猜“她”在那儿？

——不是她？——阿尔泰人惊讶地说道。除了这个鸟类学家，谁都没有戴毡帽。这使他非常沮丧。他想了想后，看着旁边用烟斗抽烟的第二个鸟类学家，并指向他。

——也不是“她”，——戴着毡帽的那个鸟类学家又笑着说道，并决定帮助阿尔泰人辨认出布哈林。还剩下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警卫员。

——你看，就是那个！——戴着毡帽的鸟类学家用头朝布哈林那个方向指点了一下。

——是她？——阿尔泰人惊讶地说道，——你说的是真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脚穿长筒靴子，身穿运动夹克衫，头戴鸭舌帽而不是毡帽，个子不高，这给阿尔泰人留下了没有料到的印象。

——布哈林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怎么能这样。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哈哈大笑声，两个警卫员比所有的人笑得更久。最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发言了。

——你为什么来看我，我又不是新娘，正如你所看到的，我长得既不高也不漂亮，——你完全失望了。

阿尔泰人不知道什么叫“失望”，但是对于新娘的一切是清楚的。

——我不需要看新娘，我有婆娘。她给你们烤好了饼子，——阿尔泰人说道。他把一个不大的包递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包中是用上等小麦面烤好的饼子，应当说是烤得技艺精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开始请在坐的所有人吃饼，这一下可得罪了阿尔泰人。

——我的老婆只用饼子招待你，因为面粉很少。

——可是为什么我这么荣幸？——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阿尔泰人。

——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老婆只给我烤饼？

——我的老婆说：用烤饼招待布哈林，因为他热爱人们。

——是热爱人民，——一个鸟类学家这样指出。

——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对——对——对。——阿尔泰人这样进行了确认。）

——喂，你们现在在集体农庄生活得怎么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道。

——我要说给你听的，可是这里的人很多。

——你说吧，说吧，不要伯，——尼占拉·伊万诺维奇请他说。

——我都说了，您也要这样理解我，我们生活得怎样！我说了，人很多，我不能说。

阿尔泰人在自己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后，开始向门口走去。我们大家送这个来客到湖边。在岸边拴着他自制的小船，船上有一个在一块锯下来的粗粗的圆木上凿出的坐位。阿尔泰人用绳子把口袋绑在背上，只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告别，然后离开了岸边：

——祝你健康，亲爱的！

＊＊＊

……我们谈到了“布哈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问题。议论了布哈林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作品给予极好的评价。回忆了这位诗人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诗《波涛》：

他自己讲出事物的缺陷，

它们的得来本非轻易，

他在前人的经验中破浪向前，

哪怕离我们已有百年。

“他在前人的经验中破浪向前……”，多么漂亮的词句，多么鲜明的形象啊！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指出，在布哈林被捕前的使人痛心的日子里，有一天报纸宣布：布哈林的案子终止了（这是斯大林经常使用的诡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收到了罗曼·罗兰的贺电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贺信，因此他非常激动。而后来，当 1937 年 1 月下半月布哈林作为《消息报》主编的签名被取消时，事态变得非常明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事情已经十分不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又写给布哈林一封短信，奇怪的是，信没有被扣留。他在信中写道：“什么力量也不会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为。”他还表示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困惑莫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收到这封信后，对这位诗人的勇敢精神大为震惊，但是他非常耽心诗人以后的命运。

＊＊＊

……根据我的请求，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谈了她同尼·伊·布哈林一起生活的最后一些日月里的情况。那时是悲惨的和艰难的，当时斯大林完全表现出了他的专横性格的实质，特别是对待布哈林。事态后来就是如此发展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认为，布哈林在被捕前生活的最后几个月，是非常明显地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要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起诉开始算起，即从 1936 年 8 月开始算起。

在此之前的三个半月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带着妻子从巴黎回国。在巴黎，他同两个同志打算为苏联买回卡尔·马克思的档案和其他文件，但未成功，这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要卖的东西。由于这次旅行没有结果，布哈林很伤心，但为时很短，在同斯大林谈话后这事就忘在脑后了。斯大林对他说：“尼古拉，不必着急，档案我们会买到的，他们还会让步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过着同往常一样的生活：在《消息报》编辑部和苏联科学院工作，起草所谓斯大林新宪法。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47 岁的父亲非常高兴。他很幸福。儿子出生一个月后，全家到《消息报》的别墅所在地斯霍德尼亚去了。8 月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获准休假，到帕米尔去实现他很早就想到山里去打猎的宿愿。陪着他旅行的是出版工作人员谢苗·良德列斯（顺便说一下，他是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的父亲）。在出发前不久，布哈林告诉妻子说，他的朋友格·雅·索科利尼科夫被捕了。他推测，此人被捕很可能与他在伦敦当大使时挥霍国家钱财有关。

在帕米尔，布哈林钻进了密林，那里既没有邮局也不通电话。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怀着焦急的心情等了两个星期，没有得到任何音信。而在 8 月 19 日出现了意外而可怕的消息。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所谓托洛茨基联合中心案开始审讯的消讯，这个中心的许多参加者提出了不利于布哈林的供词。不久，报上发表了检察院的声明，要开始侦讯该案审理中提到的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群众会议纷纷作出愤怒的决议："被告人必须接受审判……"。报上还公布了托姆斯基自杀的通告。

关于布哈林没有什么消息。最后，他乘飞机从塔什干回来，在路上，偶然知道他所面临的生命危险。他担心一到机场会立即被逮捕。当他看到妻子后便大嚷起来："要是我能预见到是这样，我就会躲开你，去让炮火炸死"。"我们到哪儿去了"——沮丧的司机这样问道。布哈林迅速地想象着，从哪儿他能用自动电话同斯大林通话。"听其自然吧！"——他这样决定了，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值勤的警卫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也许他没有读报纸？"——布哈林这样想。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非常急燥地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索契。""这个时候会在索契？"——布哈林这样想。布哈林认为给雅哥达打电话是无益于事的。他没有想到，雅哥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日子已经不多，即将要同布哈林一起在同一个诉讼案中受审。他就这样整天整天地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等电话。有一天，《消息报》编委会委员卡•拉狄克打来了电话，询问布哈林没有去上班的原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回答说；"只要报纸上不正式驳斥卑鄙的诽谤，我就不会到编辑部去。"9 月初，布哈林又接到了电话，请他到中央委员会去同卡冈诺维奇进行谈话。"为什么要同卡冈诺维奇谈话呢？"——布哈林莫明奇妙。布哈林又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了同样的回答："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索契。"布哈林从中央委员会回来后，讲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安排了布哈林同索科利尼科夫当面对质。索科利尼科夫是布哈林青年时代的朋友。他提供了不利于布哈林的假证词。1936 年 9 月 10 日报纸上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公告，其中说已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侦查，——这是斯大林的一步战术，为的是表示侦查的"客观性"。布哈林就其禀性而言是个轻信的人，而斯大林正是利用了他的性格的特点，假装喜欢他，而在暗中准备消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1 月 7 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天根据从编辑部转来的请柬，他决定偕妻子去红场庆祝十月革命十九周年。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回忆说，布哈林在观礼台上站着的地方紧靠列宁墓，斯大林发现了布哈林。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突然看到一个卫兵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她很紧张。她认为卫兵是来逮捕布哈林的。然而，卫兵敬了个礼并说，斯大林同志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列宁墓上边去，他的位置在那几。布哈林登上了列宁墓，但未能同斯大林谈上话，因为斯大林站在远处，并第一个走了。此后，约有一个月过得比较安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甚至没有排除人们还会请他到编辑部去上班。他不想什么事也不干：读德文书，并作了摘录，写了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块文章。到 11 月末，他的神经十分紧张，已不能再进行工作了。他在住宅里像个筋疲力尽的野兽辗转不安。有时看着《消息报》——是否用其他编辑的名字签署了报纸。可是签名照旧是："主编尼•布哈林"。他莫明其妙地把肩膀一耸。12 月初，有电话通知要召开中央全会，但是关于日程什么也没讲。布哈林从中央全会回家后，向他的妻子说：

"介绍一下吧！你的忠实仆人现在是叛徒——恐怖分子和阴谋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人民委员叶若夫极力攻击布哈林，指责他组织阴谋和参与杀害基洛夫。布哈林听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和荒谬的指责，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他在会议大厅里直截了当地大声喊道："住嘴！住嘴！"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他，可是任何人都没有说话。斯大林说话了，他说不要急于作决定，而要继续进行侦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的跟前对他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性的供词。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绩。然后，他就走到一旁去，不愿意继续谈下去了。以后是折磨人的三个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主要是在自己住宅的一间不大的小屋子里度过的。这个小屋子原先是斯大林的寝室（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悲惨地死后，根据斯大林的请求，布哈林同斯大林互换了住宅）。所谓侦查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和按照谁的指示进行这种侦查，变得越来越清楚了。然而，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向“亲爱的科巴”申诉，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驳斥对自己的诽谤。安娜•米哈伊洛芙娜除了出门到孩子那里去以外，几乎经常与丈夫相伴。有一次，她看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手里拿着手枪，她大叫起来。“你不要紧张，我不会自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说道，——我想你是会看到我叹气的……”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拿下一册维尔哈伦的著作读起来：“有时在受难的晚间因死亡的痛苦而流出的鲜血，像远处天空出现的紫红色的曙光……从沼泽中流出的是悲惨的晚间的鲜血，是寂静的晚间的鲜血；在明镜般的平静水面上到处显现出受难的晚！司的鲜血……”被监禁在自己住宅里的布哈林渐渐瘦了老了，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布哈林又被传去同拉狄克当面对质。他又向斯大林进行徒劳无益的解释。虽然在比较清醒的一瞬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还抱着活下去的希望，可是一切都朝着早已周密考虑好了的判决的结局发展。“如果我被驱逐到非常遥远的地方，阿纽塔，你跟我去吗？”有一天，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到街上去吸点新鲜空气，碰到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他站住了。可是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无话可说。谢尔戈用如此悲伤的眼睛望着她，她就是到今天也不能忘记他的眼神。然后，他同她握手，说了一句话：“要坚强些！”他上车走了。奥尔忠尼启则再活不了几天了。布哈林决定给谢尔戈写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他被逮捕，请他关照一下家属。门铃又响了，送来了关于召开联共（布）中央全会的通知。这就是“二——三月中央全会”。议程是：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中央全会，并宣布绝食。他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为了抗议无端的指责，我宣布致命的绝食……”门铃响了，来了三个男人，送来了关于搬出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斯大林打来了电话问：“尼古拉，你发生了什么事？”“竟有人来叫我们搬出克里姆林宫……”“那你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2 月 16 日，布哈林告别了父亲、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和孩子，开始绝食。布哈林的这个妻子后来也被镇压了（她给斯大林写信说，当有人向布哈林提出骇人听闻的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时，她不愿意再做党员，并亲自把党证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的脸色变白了，消瘦了，眼睛下边出现了青紫斑。他要了一口水，一润了润嗓子。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给他挤橙子水喝，他仅咽了一滴，他把杯子打飞到了角落，并说：“你迫使我欺骗中央全会，我不会欺骗党。“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感到，自己也要同丈夫一起死去了。布哈林以极轻微的声音唱了一段诗歌：“优美异常的月亮在小河上空慢慢移动……”听到谢尔戈逝世后……布哈林作诗说：“他像花岗岩一样坚硬……”

由于为奥尔忠尼启则举行葬礼，中央全会延期了。然后，由于布哈林宣布绝食，又提出了关于布哈林反党行为的新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中央全会，但不停止绝食。只有两个人决定同布哈林握手，他们是；乌博列维奇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库列夫。斯大林说：“尼古拉，你向谁宣布绝食呢，向党中央？你请求中央全会原谅你吧……”“如果你打算开除我的党籍，何必要这样做呢？”“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布哈林再次相信了科巴的话，请求中央全会原谅自己。

＊＊＊

1937 年 2 月 27 日，这是个非常不幸的日子。那天晚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电话，通知布哈林必须出席中央全会。我记得如此清楚，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最后分手的悲痛时刻是无法形容的，到今天还在我内心存在的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不能描

述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跪在我的面前，眼睛含着泪水请求我原谅他断送了我的一生。他请求我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一定要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重复说道。他请求我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奋斗，不要忘记他的绝笔信的任何一个字。

——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的，——他坚定地说道，——你还年轻，你要活下去。你要发誓，你能够牢牢地把我的信记在心上吗！

我向他发了誓：一定牢记在心上。他站起来，拥抱着吻了我，并以颤抖的声音说：

——阿纽塔，注意，别发脾气，在历史上有时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真理会胜利的。

由于忐忑不安，我充满了内心痛苦。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的永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穿上皮夹克，戴上皮帽子，往门的方向走去。

——尼古拉，注意，别诬陷自己，——临别时，我只能说这样的话。

他虔诚地信仰十月革命的理想，希望我把历史上的这个黑暗时期看作是暂时的，寄希望于澄清和正义。正因为如此，他才嘱咐我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由于这个缘故，他把自己的信写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

这封信是布哈林在被捕的前几天就写好了的。他精神上已有准备，他要遭到逮捕和离开人世。他已最后失去申辩的希望，就决定向未来的一代说明自己是无辜的，请求死后恢复他的党籍。那时，我是 23 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深信我会活到能够把他的信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确信，在搜查时他的信会被拿走，他担心，如果这封信被发现，我要遭到镇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要求我熟读并背下这封信。他把自己的信向我读了许多遍，我也跟着他逐句逐字地背诵了许多遍。呵，当我背诵得不准确的时候，他是多么生气呀！最后，当他确信我已把信的内容牢牢地记住之后，他把信的手稿烧掉了。

布哈林在放着列宁给他的信的小桌子上，写了自己对人们、对党的最后呼吁，——他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反复地读了列宁给他的信……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整理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48 期。董智忱译）

尼古拉·布哈林重返历史

列·卡尔平斯基斯·科恩

尼古拉·布哈林的名字，无论有人怎样竭力竭其革出教门和打入冷宫，它总是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并不停地唤起世人的巨大兴趣。今天，在不久前举行的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之后，布哈林被恢复了公民权到，他单个世纪蒙受的被 1938 年“反苏右派托洛茨基

集团”诉讼案定的罪名得到了澄清。在此之前，米·谢·戈尔巴乔夫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为布哈林回到我们的历史中来奠定了基础。下面是《莫斯科新闻》周报组织的有关这个主题的一次对话。参加者为该报记者列恩·卡尔平斯基和美国学者、《尼古拉·布哈林》一书的作者斯蒂芬·科恩。

列恩·卡尔平斯基（以下简称列·卡）：教授，为什么在您着手研究苏联社会和它的历史时，要从布哈林开始，并写成了《尼古拉·布哈林》一书？

斯蒂芬·科恩（以下简称斯·科）：我想，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历史学家来讲，布哈林是一位重要的和必须研究的人物。作为党内同志，他是列宁的战友。当然，列宁与布哈林之间的个人关系，这是另一个题目。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一点上好似严父与不太听话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布哈林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消息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共产国际的领袖，着有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是许多重要文献的作者。列宁去世后，正是布哈林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家和捍卫者。

我在自己的书中，并不认为布哈林一贯地和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我力图证明这的确是一位无法排除的历史人物。我是 20 年前开始做这项工作的。这本书在我们美国几乎是 15 年前出版的，在西班牙、法国、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都有译本。

列·卡：不久前，我读了来自卡马河畔切耳内市青年工人瓦列里·皮西金的一篇书介。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恢复布哈林的名誉？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主义区分开来，并将后者从前者中清除出去，不要再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或者部分地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主义”。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时不研究布哈林的问题是不行的。

斯·科：研究布哈林的生平，也就要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而进行这种研究就不能不为其内部的丰富性，这一政治的和理论的潮流的多面性与活跃性而感到惊讶。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停滞的，而正是一种潮流。列宁在世时，党的内部、甚至党的领导内部都曾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列宁认为这些意见分歧是正常的，而斯大林则认为是违法的。这当然是巨大的差别。

列·卡：这种党的生活内部的精神损失难道不是使其“肉体”受到巨大损失的前提吗？假使不先用恐怖手段反对民主本身，斯大林对人的镇压是不可能发生的。

比起其他任何人，布哈林同列宁的争论最多，并且争得相当厉害。但是，他们在论战时没有成为敌人。可是斯大林不争论。甚至在他急欲获得无限的权力并使列宁主义遭受沉重伤害的时候，也还以列宁的名义宣誓。对于党内外反对自己的人，归根到底，他也不去争论，而是简单的消灭。

斯·科：斯大林是这样的。但列宁给予布哈林的不同评价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怎么又会有不能“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要知道，列宁并没有说错。

列•卡：显然，这里抓住了布哈林思维方式中的真实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列宁评价中表面上的两重性。我觉得，“缺点往往是人的优点的延伸”这一众所周知的格言似乎是亏为布哈林这种人想出来的。

思想家布哈林有一种无法遏止的习惯，即把一切问题的理解提高到完备的理论水平上。思想家常与自己的思想融为一体，并完全生活在其中……。而对思想是怎样脱离实际生活的却没有发现。当已经不是思想家驾驭思想，而是被思想牵着走时，便会丧失良机。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锁哲学的东西”。这是说的布哈林。

斯•科：我也相信布哈林是一个“理论人物”。这对于理解布哈林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当他迷路时，他会站在理论高度上论证，这就会使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甚”。但反过来当他正确时，也会是同样的情况。

列•卡：您能说些具体情况吗？

斯•科：主要是他迷路时的情况。譬如，从理论上论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布哈林不仅论证了这一政策，而且还为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唱颂歌”。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国内战争要求把国家所有现存的资源置于国家的管制之下，要求建立强制没收和“摊派”这些资源的有许多地方分支的行政机构。布哈林以理论结构的形式反映这种必要性，甚至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非常时期的条件，经过布哈林的抽象推断后，丧失了非常时期的特点。他确信，他描绘的是由混乱中产生社会主义的普遍适用的模式。

列•卡：布哈林的观点作为对那个使我们念念不忘的时代的遗产的特殊教训，终究是有教益的。我指的是行政命令的实践，这种实践损害了经济，而且不仅是损害了经济。

斯•科：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布哈林 32 岁。他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列宁的创议，并发现现在的思想与他当初幼稚的想法不同了。他的战时共产主义幻想消失了。

列•卡：如果用准确的说法，大概应该说不是幻想的消失，而是观点的更易。原因是具有根本性质的。那么，当时布哈林得出什么看法呢？

斯•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布哈林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政治中民主因素的尊重，这点决定了其他各点。例如，他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超集中化在经济上的不合理性。按照他的意见，国家一般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组织的和不应该这样做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作为对战时共产主义过火行为（当时极端集中化被看作是计划化）的反动，布哈林曾嘲笑总体计划的思想，这种总体计划由上面强制推行，“突然出现”，就像大雪落在头上一样。

沿着这个轨道产生了布哈林对“群众消费”的关心，或象他纲领性地表述的那样：“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而存在”。布哈林同样也有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思想，这样可以提高工作质量。布哈林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市场机制可以最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列•卡：这是与后来成为时髦的准则相反的，这种准则把长宫意识加人每种商品以代替它的价值，让人们坐在那里，大声喊出自己商品的价格。

但是，可不可以这样看，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认识中有某种中心思想？

斯•科：这确实如此。布哈林把列宁关于工人和农民必须历史地联合的思想看成是革命的“口号中的口号”。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布哈林成熟时期社会学中的主霎东西。对于布哈林来讲，中农不仅是农民阶级内部的“最重要的阶层”，而且是全体农民的象征。

列•卡：从中学时代起，我们就被灌输说：布哈林是“代表富农利益的思想家”，他的一条特别罪状是提出“发财吧！”的口号。

斯•科：依我看，布哈林这一提法的真实涵义是，让各阶层的农民都富起来，包括中农和富裕农民在内。在同持左倾观点的人争论时，布哈林力图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共同贫穷”，并补充道：“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该有贫农”。

布哈林他当然赞成合作社，而不是象可能认为的那样反对合作社。他尤其赞成“一般的合作社——采购合作社、销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他把建立生产合作社推迟到将来，推迟到自愿建立起来的、机械化的、收支相抵的集体经济在同个体农民竞争中巳可证明自己的优越性的时候。

列•卡：根据一切来判断，布哈林在这里巳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这是他们共同跟左翼反对派进行斗争之后。

斯•科：这可以根据布哈林的报告和演讲来考察。1924 年他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超工业化纲领，说成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惊人地相似”，而 1926 年时已认为斯大林的观点——等于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不过，不能把布哈林的主张称作美化农村的民粹主义思想。

如何解释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的决裂并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推行自己的路线？事实上，对这一立场能回答什么呢？——战争已迫在眉睫，没有时间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模式来使国家工业化。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布哈林的纲领是天真的。

列•卡：“预言”过去同预见未来是一样地困难的，正因为历史发展已经有了结果。然而历史应当深刻反思，为了使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展起来的各种可能方案，在我们今天寻找最佳答案时，不失去自己的认识价值。

斯•科：再过若干年，我可以从你们的作者那里了解到比他们今天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哪怕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比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要好。

1988 年是布哈林诞辰一百周年。许多国家都因此提出组织学术会议的建议。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是苏联代表参加的西方的学术会议，而应该是西方学者参加的苏联的学术会议。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88 年 2 月 21 日。弓弘译，陈启能校）

时代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札记

奥列戈·乔穆什金

人们的生命和命运是在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参加者的监视下决定的。而每一次都象初次那样，当谈及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被违法镇压的人们时，就揪心。好像被违法镇压的人们的幽魂进人了会议大厅，要看看后代怎样评价他们的案件和结论。好像是历史本身的再现。我关心的是正义是否恢复，人道主义是否胜利。

苏联最高法院最近 30 年来审理了许多“恢复名誉的”案件。这就是在最近一次全会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撤销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成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阿尔卡季·帕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诺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莱温、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卡扎科夫、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基、彼得·彼得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的判决，因没有犯罪事实，此案不成立。早些时候，上次全体会议还为因这一案件而被判罪的 10 个人恢复了名誉。

许多报纸既谈到了关于这次审理的总检察长为这个案件平反的过程，也谈到了这些在人民中间又恢复了清白名誉的人们……我作为一个法学家想谈谈这一过程的法律方面，谈谈必须从中吸取的教训。

在审理“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案件的平反时，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起了历史法宫的作用，这毫不夸张。既然这样，让我们平心静气地研究清楚：是谁，是怎样和为什么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的？

1938 年 3 月 2—13 日审理这个案件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是该法庭庭长瓦·瓦·乌尔里希领导的。当时他带着“军队军法官”的军衔，这相当于现在的司法上将军衔。军事法庭的成员还有 N·0·马图列维奇和 B·N·叶夫烈夫。乌尔里希这个人物自然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援引人员编制表才能称乌尔里希为法宫，因为他是那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了司法机关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

瓦西里·乌尔里希是继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列宁主义者瓦连京·安德烈耶维奇·特望福诺夫（顺便说一下，是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的父亲）之后，于 1926 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职务的。

他是个特别内向而孤僻的人，没有朋友，不与人们来往。实际上，他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所有“案件”的签字使死刑判决“神圣”化了。他到自己临终前没有要住宅，而在“大都会饭店”占了一个豪华的房间。在 1948 年，显然时候到了，这个知道如此之多的人也应遭到他的受害者同样的命运。把他从军事法庭调到一所军事学校不显眼的岗位上……1950 年的死救了他，使他免遭镇压。

同乌尔里希一起的另外两个军事法庭成员都是唯命是从不敢说话的人：在整个一大卷关于诉讼过程的速记报告里，找不到他们对报告人和证人的提问，也没有他们对法庭会议进程作出反应的任何一个证据。

安·亚·维辛斯基坐在检察官的台上。他的名字同叶若失、贝利亚、乌尔里希的名字一样同斯大林的镇压有密切联系。过去，他是孟什维克，在临时政府时签署过作为德国间谍逮捕列宁的途捕证，他在 1938 年又揭发伊里奇的朋友和战友是德国间谍……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贯毫无原则的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案件进行了侦查。刚接受委任的人民委员尼·伊·叶若夫亲自领导了这个机关。他代替了在这个岗位上的由于“属于”这个“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而被捕的根·格·雅哥达。

这种变化实在奇怪；领导伪造了使成千上万清白的人丧失性命的间谍案件的雅哥达，现在也被列入“敌人”集团。这种审判把戏的导演者们是非常需要明显看到有反苏犯罪组织的极可怕的分支机构的。

但是把雅哥达列入这个“案件”，不难猜想也有另外的意思。他在组织过去的诉讼案中已经耗尽了自己，到了由其他的间谍“创造者”代替他的时候了。为此选了叶若夫……但是很快他也“不受欢迎”了。

大概应当解释一下，为什么对雅哥这“没有平反”。当然，他不是间谍，不是破坏者。但是他在制造许多案件中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无可争辩地得到了证实。就是他把内务人民委员都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惩罚机关，正是他是组织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中心人物之一……

侦查以什么为根据，检察长根据什么认定被告人有罪呢？可以用两段引文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段是引自 50 年前写成的判罪结论：

“……侦查认为，……1932—1933 年根据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关的任务，被告人建立了名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家组织，其目的是为外国进行间谍活动，搞破坏，搞捣乱，搞恐怖，破坏苏联军事力量，挑拨军事进攻苏联，支解苏联和使苏联的乌克兰、自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组织了一系列暗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活动，暗杀了谢·米·基洛夫、维·鲁·明任斯基、瓦·弗·古比雪夫、阿·马·高尔基……”

1938 年的起诉结论实际上被一字不差地抄在了判决书上。第二段引文引自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 1988 年 2 月 4 日的决议；

“事实上没有赫·格·拉科夫斯基、米·亚·切尔诺夫和阿、帕、罗森戈尔茨犯有间谍活动罪的证据，没有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犯有领导上述这些人进行间谍活动罪的证据。主管机关所进行的审查判明，没有关于被判罪的任何人同外国特务机关有联系的资料……指控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在北高加索……和其他地方建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犯罪集团也没有任何东西加以证实。根据法庭的结论，好像在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进行这种活动的，原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B·O·沙兰戈维奇，原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阿·伊克拉莫夫，原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法·霍贾耶夫也参加了，他们也因此案受了审判。上述这些人受审判是毫无根据的，并由苏联最高法院完全恢复了名誉……

关于被审判的人犯有组织反革命和破坏活动罪的结论是同事情真实情况矛盾的，因此是没有根据的……指控被审判的人犯有暗杀活动罪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给他们平了反。说他们中任何人参与谋杀谢米·基洛夫都是不能成立的，同样说尼·伊·布哈林 1918 年参与谋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以及指使社会革命党人卡鲁兰暗杀列宁也是不能成立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审判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有些人是应当受到审判的。为什么恰恰要审判他们呢？如果从被指控的关键人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我国革命中所起的政治作用出发，是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寄·布哈林在 1929 年的百科全书中被称为“联共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联共中央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早在中学时就开始了革命活动，而 1906 年就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屡次被沙皇的暗探局逮捕，被流放……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编辑。党的最严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作家，院士。

布哈林不只一次地同列宁发生过理论争论，但是，他总是在确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和行动是正确的之后，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报告中指出：“尼·伊·布哈林、费·埃·捷尔任斯基、谢·米·基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等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所谈到的关于布哈林的许多情况也适用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他是最老的党员之一（1898 年入党），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里是列宁的战友和副手，后来代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阿·伊·李可夫在 20 世纪初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后，也是不只一次采取过各种反对派的立场，但是后来总是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上。从 1917 年起始终是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1919—1929 年是政治局委员。被逮捕的时候，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担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为什么正是他们遭到了这样非常不幸的命运？

苏联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会议决议中的一段话又做了回答：

“在革命性改造国家的不同阶段，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在估计政治形势，

阶级力量对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有时采取特殊的立场。他们的某些观点，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实践活动被联共（布）领导机关作为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进行了评价。但是，尼·伊·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当时所承认的这些错误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事实。”

我在引文中强调“特殊的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当然，不是因为参与了关于工会的争论而审判了布哈林。不是因为 1917 年 11 月 4 日（旧历）退出人民委员会和在关于“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上不同意列宁而审判了李可夫。

对许多人公认的党和政府最著名的活动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是斯大林在党内彻底树立自己无限的统治权所需要的。因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一系列观点上不同意斯大林；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当时还活着的列宁主义近卫军的活动家，有勇气作出“自己的判断”，有点同“人民的老子”顶嘴。

但是，我们现在转到法律问题上来。

“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申指出：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对本寨的判决中未举出指控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犯有特别危险的国事罪的具体证据，认为他们在预审和法庭上的口供，他们以一般的形式承认自己犯有罪行活动就够了，这是违法的。在评价这种口供时，侦查机关和法院无视法律最重要的要求：任何证据，其中包括被告人承认有罪都没有预先定罪的效力，只有在用其他证据总和证实的条件下才能是定罪判决的基础。本案被告人的口供……是矛盾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由于在预审和法庭审理过程中粗暴破坏法制取得的。”

是的，乌尔里希主持的军事法庭硬是坚持“被告人的承认就是证据之王”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中世纪时期起过极大的作用，是宗教裁判者同异教徒作斗争的可靠武器。现在，维辛斯基复活了这个原则（在获得斯大林奖金的维辛斯基的小册子《苏联刑事诉讼审判证据理论》中就包含了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

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 1956 年提供的见证说明，侦讯是怎样进行的。

“克列斯京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被捕时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因这次指控被判罪，70 年代由苏联最高法院恢复了名誉。——作者注）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严厉地毒打，整个背部密有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三天。”

在苏联总检察长的平反书中，这样谈到关于在这个“集团”案件预审过程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

“在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等人被捕后，几个月期间没有对他们提出公诉，侦查和拘留时间没有延续多长。

审查……判定，对被告人审问、对质的许多记录和其他指控文件是伪造的。是通过威胁、暴力和欺骗手段迫使被告人提供了假口供。

在最初的一些审问中，布哈林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解释说，他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和违法活动。这些审问记录没有归卷，被放在特别的库房里，只是在 1961 年才被发现……

而归卷的只是一些被告人承认了有罪并对这种记录签了字的事先打印好的审讯记录。如果被告不承认以前提供的合乎审问心意的口供，在这种情况下，就采用威胁、恐吓，常常是采用直接暴力和其他违法措施。”

读这样的东西是沉痛的。因为在这稀稀拉拉的几段文字之后是许多无辜的人的痛苦、流血和难以忍受的屈辱。

由于伪造刑事案件在 1940 年被判罪的叶若夫的助手、原副内务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本“集团”案许多被判罪的人死后仅过了 13 个月就宣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准备让一些被捕人对质，讨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对问题的答复。在这种“讨论”之后，叶若夫亲自传唤了一个被捕人，以便获取使已得的口供得到证实和在对质过程中不改变这些口供的许诺……如果被捕人不承认以前的口供，那么叶若失就把他“交还”给侦查者，并指出“恢复”口供，也就是说——取得以前的假日供。

法庭审判也是随着侦查唱。

法庭事先知道的这种形式本身就破坏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

担任法庭主席的乌尔里希讯问每个受审人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证实自己在预审中的口供无误吗？”虽然法律规定：法官在审问开始时应当问被告人，他是否承认自己犯了被追究的刑事责任的罪？然后才有可能谈及案情……显然，这个法庭不需要这样做。100 多卷“卷宗”完全是由“承认”组成的。

这是摘自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的一段话：

“在审案时，侵犯了被告人的辨护权。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阿帕·罗森戈尔茨、米·亚·切尔诺夫、赫·格·拉科夫斯基，帕·彼·布拉诺夫、韦·阿·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彼·彼·克留奇科夫被剥夺了具有高度技能的法律上的帮助，不得不自己承担为自己利益的辨护。他们都没有参加法庭辨论，因为命令他们必须使辨护词与最后的话一致”

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古罗马法学家确立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在这里被剥夺了。1936 年苏联宪法也保证了同样的权利。是的，从表面看一切都很有“礼貌”——好像被告人自己拒绝了辩护律师。审判把戏的导演者显然事先就关心这一点了。为什么做冒险的事呢？因为事实本身使公诉的组织者害怕，在国家公诉人那里可能出现对手，哪怕是对公诉的一句话能够提出怀疑，侦查的“脏水”对大家就会成为显而易见的。

被告人的同最后的话一致的辩护词听起来软弱无力，何况这是在维辛斯基要求对所有被告人处死刑之后。

布哈林到底还是鼓起勇气努力揭露对他这个受害者的违法行为。正如全体会议决议所讲的那样，布哈林在最后的话里“以一般的形式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了案情：案情证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也是无罪的。

这是这个发言中的几段，它们代表了整个发言；

“我们被告人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我承认自己对失败主义方针负有政治上和法律的责任，因为这一方针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里占了上风，但是我个人肯定地说：……我个人没有站在这个立场上。

检察官企民在自己的指控发言中解释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可能在各地抢劫，终究要彼此负责。后者是公正的。但是，一伙匪帮的成员应该彼此认识，以便成为一伙，彼此多少有些密切联系，然而我是第一次在指控结论里才知道沙兰戈维奇的名字……第一次知道马克西莫夫的存在。从来不认识普列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

我坚决否认我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他们是我的主子，我为执行他们的意志进行了活动。

我坚决否认自己参加了暗杀基洛夫、明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

我拒绝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控……。

当然问题不在于这些悔过，其中包括我个人的悔过。没有这些悔过，法庭也能做出自己的判决。被告人的承认不是必须的。被告人的承认是中世纪的法律准则。

我抱着这种想法等待判决。

也不能不谈谈社会舆论是怎样准备这次指控的。

指控开始的那一天——3 月 2 日——各中央级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其中列举了“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包含有从肉体上消灭“血腥的狗强盗”的口号（这是来自维辛斯基的语汇）。第二天，报纸把 3／4 的版面让给了“一个定罪的结论就足够枪毙这些坏蛋！”的典型口号。发表了工人、集体农民、著名学者和军人的信件，其中包合同样坚决的建议。

军事法庭在法庭审讯过程和判决中违反了法律的要求，越出了公诉的范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构成判决相当大一部分的许多“情节”在定罪结论中干脆就没有。在所谓法庭凋查过程中，当被维辛斯基的狡猾问题逼得万般无奈的受审人开始诽谤自己和自己活着的及已死去的

同志有新的罪行时，这些情节才“被发现了”。按照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必须使本案再进行补充调查。但是，对于乌尔里希、维辛斯基和站在他们背后的人来说，是不存在包含在法律中的“常规”的，当提到站在法官背后的某人的时候，我应当讲几句题外的话。

我不只一次地听到这种意见，认为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大规模镇压中，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麦赫利斯、维辛斯基、卡风诺维奇、什基里亚托夫有罪，一句话——随便说谁有罪都行，只是不能说斯大林有罪。这种意见被顽固地坚持。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中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有时人们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情况并不了解。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事情并不是这样。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对布哈林“案件”总结了一个特点：

“由于在预先调查和法庭审理时粗暴地违法，受审人的口供不能成为给他们定罪结论的基础。案卷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因“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的案子被判有罪的任何人都没有活到今天。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 18 人在宣布判决后过了二天便被枪毙了。而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三个人——普列特尼奥夫，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后来也死了。

1941 年 5 月正在坐牢的卓越的苏联外交家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基，被捕前是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局长，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阿伦森说：

“以前我只请求赦免，但没有写案件本身。现在我要写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叙述所有‘马德里宫秘密’……让人民知道，出于个人的政治报复是怎样‘搞出’这些夸大的案件和指控的，因为任何申诉都要经过人民之手的。让我快点死吧，让我成为一具死尸吧，但是要记住……死尸到时候也会说话的。”

＊＊＊

回过头来再看“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案件，现在需要暗暗地想，我认真地想了——对这个“案件”采取最新的决定是为谁呢？

我回答了自己：是为了一些妻子和子女，他们至今还带着可怕的，尽管是经过 50 年磨损的“人民敌人的亲属”的标签，是为了许多受个人迷信魔力影响而迷误的入。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些“为了”，而是下面这些“为了”——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正义的胜利。

为了正义，正义现在永远得到了恢复。

（原载苏联《星期周刊》1988 年第 7 期。李其译，董智忱校）

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

——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案件

H·波波夫

1938 年 3 月 2 日开始了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的审判。但还在此前几天，甚至来不及等待开庭，各报便竞相登载了揭露“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徒”罪行的文章，要求无情惩治这些被告。在当时这只能意味着一种结果：被列为罪犯的那些人的命运已被预先决定了……

法庭早庭审讯记录摘录：

“在宣读起诉书后，主席乌尔里希同志逐一询问每一个被告，是否承认对他提出的罪状。除被告克列斯京斯基以外，所有被告都完全承认自己所犯之罪行……”

他是谁，竟有如此勇气，不怕那曾经迫使一些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名的暴力，唯一敢面对可伯的指控轻声地、但坚决地说道：“不是”？

履历表摘录：

姓、名、父名——克列斯克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1883 年 10 月 13 日（新历 25 日）生于莫吉廖夫。

知识分子、职员。

受过高等教育。

革命前是律师，现在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19O3 年在维尔诺入党，没有脱党。

1905 年初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成员。

没有加入其他政党。

因参加革命活动在维尔诺 1904 年、19O5 年（两次）、1906 年（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克 19O5 年被捕，在彼得堡 1905 年、1907 年、1914 年分别被捕，19O5 年被当局从彼得堡放逐，1906 年被从维捷布斯克放逐，在 1914 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没有在国外居住过。

在国内战争时期曾在莫斯科任中央书记和财政人民委员。

党对我最后的审查没有发现问题。

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遭受党和苏维埃法庭的审讯。

现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您需要些什么？什么可以不仅改善您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您为争取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斗争的能力？”此格空着未填。

工作单位——外交人民委员部——克里姆林宫。

工作地址——克里姆林宫。

填表日期——1931 年 7 月 11 日。

今年 2 月初在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全体苏联人民的注意。消息题为《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公报。。

千百万苏联人民把这则消息看作改革的又一现实的事例，看作是在黑暗的、无人道的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被蹂躏、在停滞年代被隐瞒的真理的恢复。由于人为地隐瞒了一系列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众多著名的革命家。他们的事迹理应彪炳史册，他们的思想直至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性。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在克列斯京斯基的生活里，如同各种职业革命家一样，是把个人和革命斗争事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按自己的方式讲的一件有意思的事件说明了这一点。

在 1905 年，当克列斯京斯基又一次被捕并被关在维连斯基监狱之时，党内同志给他派了一个以“未婚妻”身份联系的同志。这个年轻的、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这个被逮捕的人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京斯基同志关于某些问题的意见。然而当克列斯京斯基出狱后，联系人真正成了他的未婚妻，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在尼·尼·克列斯京斯基生活里的独特的“篇章”是和《真理报》联系在一起的。从《真理报》1912 年 4 月创刊直到 1914 年 7 月战争前夕被关闭，他一直在该报工作。在真理报工作之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同时又是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维克党团的法律顾问。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初，克列斯京斯基又被逮捕，几个月后被行政流放到乌拉尔……

沙皇暗探局文件摘录：

“致彼尔姆省省长亚·谢·涅茨韦塔耶夫：

密件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阁下：克列斯京斯基、阿夫谢耶夫、波利亚科夫、格沃兹杰夫、博尔塔耶娃几个人在警察公开监视下住在叶卡捷琳堡城，由于他们参加了一些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因此被禁止到某些地区去。

这些人利用其可以得到的一些权力，通常选择大城市或工人区居住……在自己新的居住地他们企图和工人及革命组织的成员建立联系，活跃这些组织的活动。所以对这些人必须特别留意并组织好对他们的监视。

M·洛津纳一洛津斯基

1915 年 11 月 9 日”

尽管有暗探局“特别留意和有组织的监视”，克列斯京斯基从到乌拉尔的最初日子起就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

密探致彼尔姆宪兵署长官的报告摘录：

“……在社会民主党人召开的会议上，克列斯京斯基说，叶卡捷琳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缺乏足够的经费，建议他们尽快着手筹集组织活动需要的经费。而当有了足够的资金后，克列斯克斯基将采取一切措施，在叶卡捷琳堡城里建立乌拉尔委员会，并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提出要筹办胶板印刷以便刊印他手里的传单……”

尼·尼·克列斯京斯基在乌拉尔参加了 1917 年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后的局势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待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党的策略……。4 月中旬，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叶卡捷琳堡筹集和召开了首次（自由的）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护国派”分子的立场给予了充分的驳斥。他宣称：“我们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并且将从它手里夺取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和农民。”会议选举克列斯克斯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州委员会主席。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克斯基被缺席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党的老战士 K·瑙莫夫回忆录摘录：

“在科科温斯基广场（现在那里是中心市场所在地）举行了士兵群众大会。快到晚上的时候，从各个工厂、部队源源不断而来的代表把会场延伸到歌剧院，那里是举行大型集会的传统地方。

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主持了大会，他隆重地宣告了苏维埃政权成立和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首的新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消息。”

苏维埃政权在乌拉尔建立后，克列斯京斯基调至彼得格勒工作，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及人民银行副总委员。在他直接参与下开展了银行国有化的工作，建立起了苏维埃国家的

财政和司法体制的基础。

1918 年 8 月，尼 • 尼 • 克列斯京斯基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任此职位期间，从 1919 年 11 月起，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还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正是克列斯京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党中央组织报告。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最足以表现克列斯京斯基个人特点的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发言者在自己讲话中称克列斯克斯基为党中央的总书记。克列斯京斯基注意到了此事，因此在自己的组织报告的结语中说道：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党中央那时一共三个书记（克列斯京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等的权力。作为一个正直的、纯洁如水晶般的人和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也不容许对个人过分“赞扬”，那怕是以一种并无恶意的形式来表达的这种“赞扬”。至于说到党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在党的十大过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克列斯京斯基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组织家，而且是一个理论家，尤其在研究合作社运动问题方面。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党的合作化政策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领导人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反对生硬的把合作化运动从属于国家机关的做法。他认为，党对合作社的影响，不是通过命令或指示，而是通过在合作社的共产党员的工作来实现的。

很易发现，克列斯京斯基的主张与我们今天关于真正的合作化的观念，同我们目前在合作社运动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何等一致。……然而在那个时候，多数代表并不支持克列斯京斯基。最初作为关于合作化决议草案的基础的乃是另一个发言者 B • 米留金的提纲，他是坚决要求把合作社运动生硬地从属于国家机关的。只是由于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最终在此问题上通过了由克列斯京斯基所提出的“少数人的决议”。

总之，列宁高度评价了尼 • 尼 • 克列斯京斯基的业务和道德素质。伊里奇非常了解克列斯京斯基一家人。在列宁重病期间，甚至当医生严厉限制他与最亲近的人接触时，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 • 克列斯京斯基还同自己的小女儿娜塔莎到哥尔基去拜访列宁。克列斯京斯基的妻子以前曾是医生，并曾照看过负伤的领袖。

从 1921 年起，尼 • 尼 • 克列斯克斯基调往外交部门工作。他曾作为苏联驻德国的代表，在 1922 年直接参与了缔结拉巴洛条约。这项条约乃是苏联外交为建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平等关系所取得的最杰出成就。

从 193o 年起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他的女儿，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功勋医生娜 • 尼 • 克列斯京斯卡娅的讲述：

“父亲是一个‘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这，大概在那些年的对外接触中不是没有影响的。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非常强。顺便说一下，列宁也常常称赞父亲的这种能力，有时当他难于回答某个问题之时，便说‘去问问克列斯京斯基……’。

在父亲的一生中工作始终是占第一位的。那时候，在 30 年代，象父亲这一类人经常是

工作到深夜，很少在三点以前返回家来。但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始终亲自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议。我经常告诉他我心中的秘密，甚至比告诉妈妈还多。

除了工作之外，父亲唯一的爱好便是书。他总是经常到各地买书，为此有时引起母亲的责备：因为当时作为外交副人民委员的工资也仅仅够糊口。家里没有任何积蓄。”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是否犯过错误？犯过。例如，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他是不赞同列宁的立场的；在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他开始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但后来，在党的十大上，他投票支持了列宁的决议。尽管克列斯京斯基在某些问题上有过错误，有时也与自己的党内同志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纵观其一生的活动，他始终是站在列宁的路线上的。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研究者来说，问题十分清楚：当党和国家面临完全新的、“第一次遇到的”、以前从未解决过的问题时，错误、动摇，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从来不把党内持不同的、甚至错误观点的自己的同志视为有罪。

自斯大林获取政权后，党的这条原则改变了。作为一个有原则性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克列斯京斯基在与社会主义本性矛盾的虚假的气氛中，没有“站在”颂扬斯大林“天才”的行列中，也不可能适应处理党内同志之间关系的“新”作风。

在 30 年代中期，当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任何试图反对他的意见无异于是自杀的行为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仍没有从自己的原则上后退。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克列斯京斯基的性格。在 1935 年，有一次他与家人一起到剧院看戏，已经被黜的布哈林也在那里。在布哈林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疏远的气氛，他从前的很多朋友、熟人都不敢保持和他的关系，自然，克列斯克斯基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然而，在剧院休息厅里，他走到布哈林跟前，长久地与之交谈。事后他对妻子说道：“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

那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尚不知道，对他来说困难的日子已经来了。1937 年春天，他被逮捕并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成员交付法庭审判。可能，斯大林没有忘记那些事情，即克列斯京斯基的意见与他这个“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立场对立的场合。这类事情从前不止一次发生过。例如，当年在关于对待临时政府态度的争论之中，克列斯京斯基曾宣称：“在实际行动上斯大林与沃伊京斯基的立场并无二致”。顺便提及一下，沃伊京斯基是孟什维克右派。

娜。尼·克列斯京斯卡妮的讲述：

“父亲被捕前二个月，他到我这儿来，说道，斯大林叫他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是，鉴于克列斯京斯基过去的‘错误’，已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觉得，父亲当时是平静的，工作仍一如既往。

1937 年 5 月 20 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夜已很深了。当时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母亲没有在家，她是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很晚才回来。门铃声惊醒了我，走进来八个穿制服的人，开始动手搜查。我很想睡觉，一直希望这些人快一点离开。然而我并不清楚的是，他们将不会单独离开。

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激动的情绪。母亲很快下班回家来了，刚一踏进门坎，她就什么

都明白了，惊恐地叫了起来……此时所有的人都走到门口，父亲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准备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走到我跟前，亲吻我，郑重地说道：‘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在我父亲被捕后几天，我的母亲——她从 1903 年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也被从党内清除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从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搬到了另外一个区的一间小屋子里。而在 1938 年 2 月，母亲也被逮捕了。被判八年劳改营。到 1939 年 6 月。命运又轮到我的头上。在监狱呆了半年，审讯 35 次，后被流放。

有这样一个名称‘叛属’——祖国叛徒的家属。我和妈妈多年来一直带着这个恶名。”

在可耻的审讯中，克列斯京斯基的回答常常毁坏了审判者事先精心设计好的“脚本”。由于找不到证据（证据本来就是没有的），审判委员会不得不几次休庭。……还记得“除被告克列斯克斯基以外”这句话吗？干巴巴的一句话——登在报上的只有这句话。可事实是怎样的呢！

法庭审讯报告摘录：

“乌尔里希主席：被告克列斯京斯基，根据向您提起的公诉，您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

克列斯京斯基：我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也不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员，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对某些人强加于我的那些罪行，我甚至没有犯过其中的任何一项罪。我尤其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

主席：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

克列斯京斯基：在被捕之前，我曾是联共（布）的党员，现在仍然是党员。”

在 3 月 2 日法庭审讯第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在第二天晚上，克列斯京斯基宣称：“我请求法庭记录下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对我指控的一切罪行……”（摘自 1938 年 3 月 4 日《真理报》）在这句话之后，有维辛斯基满意的一句插话：“我暂时没有问题向被告克列斯京斯基提出了。”……

从 3 月 2 日早庭到第二天晚庭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原告用何种手段取得了这个变化，为什么“执拗”的被告不得不接受这样真正致人死命的痛苦？使这类执拗人“恢复正常”的手段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请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前卫生所负责人罗森布吕姆 1956 年的供词：

“克列斯京斯基被审问后送到我们卫生所来。他被打得十分惨重，整个背全部是伤，甚至无法在上面找到一块好庆……”

很难设想，这些暴虐者是怎样卖力地从克列斯克斯基那里拷打出（真正地是！）对他来说如此痛苦的虚假的承认的。

然而历史记载下来的却是在前一天他所说的另一句令人自豪的话：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正是这句话可以成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悲惨地中断了的光辉一生的一种碑文。

恢复事实真相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案件平反以后的思索

尤里·费奥法诺夫

我刚刚参加过苏联最高法院上午的全体会议。6 月 13 日，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同志的案件的判决。他们在 1936 年和 1937 年被处决。

担心错过这一事件的记者们早已在互相询问："会平反吗？什么时候？不会吗？那又为什么"？他们说的就是会不会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平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说明，有两次对人民的敌人的公开审判仍然暧昧不清，因为，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还在二月份就被平反了。

我不敢说，"人民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我可以大胆地肯定"社会舆论的关注"。而且，这不是无谓的好奇。须知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令人担心：要是恢复事实真相的既定进程受到破坏，某种东西作梗，人们自然就会产生怀疑：事实真相将会基本上恢复吗？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异母姐妹的幽灵不会在天边出现吗？

不过，现在公布了这个判决书，那些案件的判决被取消了。当时这些案件确实是尽人皆知的：一切都公开刊登，给人的印象鲜明、严厉、可怕。1934 年，斯大林可能会用鲍里斯·戈东诺夫说过的话形容自己：我已达到了权力的高峰，一种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能做到"，"一切"都会毫无疑问地得到拥护——一致的全面的拥护，没有丝毫的疑义。从报刊上可以看出，某种虚幻的东西如何进入了当时的生活，这种东西是恐惧和热情，有组织的顶礼膜拜和甘愿抛弃自身的奇怪的交织物。

过去，人们对于会议演说家或者报纸评论作者提出的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也要表示赞同或者及对，只要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大约是 1934 年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流行病，可以称之为"一窝蜂综合症"。大家知道，人群生活的规律具有一种反常的辩证法：他们无所制约，同时又会轻易地受到一声警呼"抓住他"的驱使；他们虽然不信，却会为一时感情迸发所控制；他们顷刻之间可以聚集上百人，但也可以转瞬即散，不过，他们也能够无限地膨胀，并且长年坚持……

为了把一群人排除于社会之外，需要极其有力、疯狂和致命的打击。需要一种粘污了党和国家的耸人听闻的罪恶行动。于是，这种罪行完成了。1934 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

谁杀的呢？12 月 20 日，侦查部门就已确认，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受地下恐怖组织“列宁格勒中心”的指使干的。起诉书中说，“这个反苏集团是一个秘密集团，它对群众的支持完全丧失了希望……”交付法庭审判的有 14 人，当月全部被枪决。

但是，究竟是谁杀的呢？显然，尼古拉耶夫案件的审判没有给予所需要的回答。于是，1935 年 1 月重新审理。不是审判此前默默无闻的尼古拉耶夫，而是昨日的领袖、极著名的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后来又开庭审判了加米涅夫、他的一名兄弟等一些人，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件”。这是一次“试笔”，是测试社会舆论的气球：缺乏罪证的起诉，没有证据的判决会通得过吗？“工业党”已经被判决，“沙赫特案件”也已通过。可是，这些都是国内不知名的人。而现在则是……

起诉书谨慎地说：“审讯设有确认据以向‘莫斯科中心’成员就下列问题提起直接控告的事实：他们在组织实行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上曾经表示同意或是曾给予某种指示”。没有事实。但是，苏联检察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苏联检察院重大案件的检察员 n·台伊宁仍然签署了对 19 个人的起诉书。苏联检察院检察长 N·阿摩洛夫批准了起诉书。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瓦·乌尔里希·N·马图列维奇、A·戈里亚切夫）的巡回审判会作出了判决。最高法院同样“没有确认事实”，但是起诉足以成立，因为被告“知道‘列宁格勒集团’的恐怖意图并且煽动这种意图”。结果，季诺维也夫判了 10 年，加米涅夫 5 年，其他人 5 至 10 年不等。从法制的角度看，不太令人信服，……但“试笔”之举通过了。

但是，这种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作出的残缺不全的判决，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它仍得到大家的拥护。总的来看，需要施放烟幕，制造一种惹人注目的闹剧。于是，1936 年 8 月，著名的“莫斯科审判案”的第一幕揭开了。这些审判在联盟宫公开进行，大厅里坐满了人，还有外国记者参加。审判程序的所有形式得到了遵守。被告，即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另外的 14 人当众供述，检察长讯问，称呼被告时用“您”。这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一案。所有人都被枪决了。在判决书上签署的是瓦·乌尔里希、N·马图列维奇、N·尼基琴科。

不必叙述审判本身是如何进行的。它与随后进行的对皮达可夫一拉狄克“平行反苏中心”一案，与最后一次公开审判即 1938 年对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战友一案的审判，如出一辙。对最后一次审判的详情，报刊已陈述得相当充分，有细节、引文和评述。因此，叙述其他的审判就显得是简单重复。情况是相同的。只不过在第一次审判中还没有指控被告是间谍。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是已经接近，因为他们实际上得到社会舆论对其任何举动的无条件的支持：来自上面的一切都受到一致拥护。

1936 年 8 月历日，在《消息报》第二版右上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但是，所有报纸立即表达“劳动者的愤怒”：“对敌人毫不留情”，“把坏蛋消灭掉”等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人士通过了决议；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员大会；一些最先进的公民单独写信和附署集体信件，向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还没有看到被告的供词、判决，可是“群众”已经怒火中烧。社会变成了人群。可是，究竟所有这些要求消灭坏蛋的决议的真诚程度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什么也不能确定。但是，难道说人群的疯狂的冲动不是真诚的吗？

整个这次运动发生在全国讨论已被称为“斯大林宪法”草案的时候。无线电不知疲倦地

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苏联这样，“人民如比自由地生活”。《消息报》刊载一篇题为《人格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说：法官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迟早应该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问题”，甚至提到了“人身保护法”，这是许多世纪以前论证无罪假定的文件。人们也读了这篇文章。可是却立刻要求“把坏蛋消灭掉”，尽管还没有开庭。

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执着地、大规模地加以灌输。很少有人想到法制。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确的“政府”的行为混为一体。

可是，出现了怪事。审判进行的第三天，《消息报》上登载一封信：“发自巴黎。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尽管被告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一直是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工会联盟的最凶恶的

敌人，我们仍然不能不提出一个请求：给予他们一切诉讼的保障，允许他们有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辩护人，不要判处他们死刑，并且无论如何不要实施什么剥夺其上诉机会的法律程序。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布鲁凯尔，国际工会联盟主席西特林。”

多么天真的人们！他们不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自然地立刻得到了应有的回击：“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杀人犯的辩护人钉到耻辱柱上！”这就是回击。这一文告想必会使人清醒吧。但是，难道投机商会倾听“理智的声音”吗？况且，天真的巴黎人在谈论保障、辩护人和上诉问题时，根本不知道 1934 年 12 月 1 日前这里已经在“法制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我想，现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满有意义的。

那年 7 月 10 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附设一个非诉讼机构“特别会议”。其成员包括苏联检察院检察长。这样，不但被赋予“法律之权柄”，而且能“监视”它。1934 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遭害的当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对待准备和进行恐怖活动的规定》的决议。同一天就作出了决议！是效能高吗？这样短的时间就制定一个法律文件吗？抑或是有对事件预见的特殊天才？不过，事实是文件有了，并且由它确定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规定》。审前调查的期限不超过 10 天；审前一天提交起诉书，检察员和辩护人“双方”都不参加审讯；废除上诉，甚至不准请求宽恕，立即枪毙。（1937 年这种规定施用于破坏行为案件。但是，程序这样简化还嫌不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非法庭的审理可以判处死刑，而莫洛托夫则以案件太多为由，建议大体上“判定”后立即按名单枪决）

显然，同样也进行了“社会舆论”的准备。开始时，反对派“在思想上被粉碎了”，其最主要的代表被撤职，开除出党。后来，他们表示悔过，于是对其宽大：1933 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恢复了党籍。

这一切过后，公开审判的闹剧本应向世界展示客观事实和真实情况。被告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招供。审判的组织者也关心起“诉讼问题”。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时，他们只不过是给了“不请自来的辩护律师”以坚决的回击。而在审判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时，维辛斯基的起诉中已有整个一节冠以《程序问题》的题目。他竭力证明，似乎审前调查合乎规定，法庭遵守一切法律程序。维辛斯基的表白此前已为被告们自己的供词所佐证。

摘自审讯诺尔金的速记记录（他全部招认）：

维：或许，有人向您逼供？您大体过得怎么样？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诺：非常好。您问的是外部压力吗？

维：是的。

诺：任何压力都没有。

维：可以不叫人吃好。不让人睡觉。我们知道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史中知道的。可以不让人吸烟。

诺：任何类似情况都没有……我懂得顽抗没有希望，懂得必须揭发全部事实。

法学史上未必有过原告和被告思想如此一致和如此合作的先例。而且下述问题也不知产生过多少次了：他们为什么在公开审判时都承认那些无稽之谈的事情？（诚然，伊·尼·斯米尔诺夫在过第一堂时并没有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供词；布哈林也否认自己是间谍）。有人坚持一种说法：那都是冒名顶替的人演出的活剧。我甚至听说，似乎在审判时“布哈林的胡须都掉了下来”。这种说法很有吸引力，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一切。不过，我们会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会同意用这些冒名顶替的人吗？

现在，许多文章都论及斯大林。关于他搞的血腥案件、他所建立的体制、“斯大林现象”、“斯大林之谜”，人们正一件件地分析其事及其人格。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材料看，未必可以认为斯大林会同意用冒名顶替的人演戏。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他需要的是复仇，并且静观猎物在他的复仇的火焰中挣扎。我想，别的解释将不合乎逻辑。简单地处死吗？这是以后的事情，他会不加审讯，大规模地杀人的。镇压机器即将开动，它是按其设计者的程序，在他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动作的。他会知道在他手下毙命的成千上万人吗？

他个人是知道的。那些人是在论战中败在他脚下的对手。这样，他自然也取得了夺权的胜利。那末，他会放弃自己瞬间的狂喜吗？

20 年代，列宁不再视事和列宁去世后，党和国家上层确实充满了争夺影响和权力的斗争。开始时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反托洛茨基；后来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后来是斯大林反自己的忠实伙伴布哈林。只要您读过历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就会看到一切了如指掌。表面上看，他们并非为个人权力进行辩争，而是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关于这一建设的道路，关于世界革命的前景，关于新经济政策，关于对列宁主义的理解等等。要回答究竟是谁和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不难看出其踪迹：斯大林的每一个对手都力图捍卫其理论，以图这一理论能使自己成为领袖。斯大林愿意采纳任何一种纲领，只要能取得专制权力即可。斯大林把“螺丝”和“螺母拧紧”论的创造者了击溃后，放心地把其理论变成了自己的实践。

他记住一切并且一切都不能原谅。他成为领袖以后，未必没有记起加米涅夫在第 14 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

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人”。

顺便说说，这种说法当时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人们这样做时并不踌躇，这是常事。奇怪的是另一种情况：看领袖的眼色，揣摩如何说才使他适意。列宁就是一个热情的雄辩家。我们从他的演说、辩论和文字中看得出这一点。这些证明了列宁对别人的意见的宽容大度。他极其严厉地谴责过宗派斗争，但却尊重哪怕是敌手的论证。我们摘引列宁的著述时，常常距离上下文和当时形势，忽略论辩的激昂热情。在列宁著述中可以看到“应当枪毙”、“把官僚主义者关起来”等话语。但是，如果说列宁赞成不经审讯的镇压，那便是侮蔑。他在热烈争论中说的话并非供法令草案，甚至也不是供报纸社论用的。他的战友、对手和敌手也是这么严厉。他们狂怒地争论时，想的不是他们的话将来如何评价，而是今天的事业。让我们回忆一下“布列斯特和约的冲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民族问题等许多事情吧！

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即使在热昏的梦幻中也不能想象，关于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的总结将会拿到审判桌上受审，而且他们甚至失去了辩护的权利和说明真相的权利。而且不仅被告如此。社会本身也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并且如我在前面冒昧说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了人群，缺乏思想感觉、只受热情驱使的人群，只会如痴如狂地向上帝膜拜的人群。而这种使人头脑发胀的运动还会来多少次呢！

呜呼，从各方面来看都体面的人也会沉湎于这种痴狂中。这些明天的牺牲品在火上浇油。让我引用 1936 年的一段小故事为例。

审判的最后第二天，即 8 月 21 日，卡尔·拉狄克写了一篇长文：《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其中写道：“案件审理时有几百人参加，其中有几十名外国记者。任何没有失去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被告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第二天，当作者在同一张报纸上读到维辛斯基的声明，即已下达开始审查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的命令时，他的感觉如何呢？而一年以后，当他同样如此地诽谤自己时又如何感觉呢？当他倾听维辛斯基引证他抨击“人民的敌人”的文章时，又如何感觉呢？

真是可怕的年代：人们怀着对光辉未来的理想，同时又一致拥护血腥的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完成了审判”。我们现在是追溯到那个时代，尽力去理解它和重新评价它。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得极不彻底，有些忙乱，我们仍不想正视事实，正视整个事实！比如，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瓦维洛夫等许多人，还在发布正式文告以前很久，在大家的心目中就已经平了反。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列宁的朋友，党所爱戴的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李可夫，与其一起受谴责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以及其他几十名大活动家，总的来说也没有引起疑问。起码从我的感觉说，人们是把他们的平反当作斯大林专横枉法的“纯粹的牺牲品”的名誉恢复而加以接受的。

可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在 1935 年和 1936 年的审判中首先被判刑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反动派。这实际是说：他们对革命发展最重大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观点。过去，而且现在仍被认为：列宁去世后，他们反对“总路线”，背离了列宁主义，滑到

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相对抗。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宗派活动进行了谴责，于是这就仿佛预先肯定了对他们的指责，这次已是法律上的指控，说他们犯有难以想象的罪行。早已无人相信他们是恐怖分子和杀害基洛夫的罪犯。可是，据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是正直的革命家，忠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本不是党和国家的敌人，那末人们还有怀疑。就说他们并非在被指控的所有方面都有罪，但终究有罪，即使是“大体上”说。

哲学副博士 F·马特维耶茨今年 4 月 30 日在《苏维埃文学报》刊载了一封信，以回答早些时候登载的一篇文章。他以战前小学生的天真责备作者说：“科学博士应该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已经变成了反对革命的反对派，从事反党反苏维埃的活动……”

这样的反苏维埃的即反对国家的行动是什么呢？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反对斯大林的路线就是反党？反党反在哪里呢？上面提到的哲学副博士本应知道，不掌握罪证是不能起诉的。可是，1936 年维辛斯基根本不掌握任何罪证。什么时候公开表达的意见，只要不同于官方的路线，在不能容忍的斯大林专制的条件下，就注定了说话者的命运。一旦持有异议，就意味着是异教徒，就意味着该处以火刑。可是，现在为什么还要煽动这已经熄灭的火焰呢？

那个哲学副博士有权就列宁的战友的立场发表任何见解。但是这个“众所周知”却……

其实，人们是否知道反对派分子是哪些人呢？

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主要人物，对于他们，疑云至今还未消释。您可以看出，人们迄今谈论这些人时仍象在谈论各方面都可疑的人物一样。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早年踏上革命斗争的道路，直到列宁逝世一直与列宁在一起。我不再叙述他们革命前的经历，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摘的，我只提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十月革命前夕他们在公开刊物上着文对起义的冒险行动提出了警告。列宁愤怒地斥责这一行为时，甚至使用了“工贼”这个词。但他由此得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季诺维也夫 1917 年 10 月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胜利后继任此职。11 月他到乌克兰组织反对拉达的斗争。同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918 年 1 月出任彼得格勒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主席，2 月成为彼得格勒劳动公社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布列斯特冲突期间坚定地站在列宁的立场上。稍后是红色彼得格勒抗击尤登尼奇进攻的组织者，第 7 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1919 年，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他此后 10 年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第七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加米涅夫十月革命前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加米涅夫宣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宣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成为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因参加布列斯特谈判代表团，将此任交给斯维尔德洛夫担任。1918 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 年任国防委员会驻国内战争前线的特别委员。1922 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去世后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的增补卷大约可以认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出版物吧，其中写道：“列宁患病期间将自己的私人档案交给了加米涅夫，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列宁研究所，加米涅夫任所长”。

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那些审判案，特别是因这些案子而发生的一切，这是今天大家所关切的问题。我们正在学习民主，同样是在紧张的斗争中去掌握政治争论的原则。我们的先辈，20 年代的人们，未能驾驭局势，因而出现了 3O 年代，在迫害的大火中自已被烧毁了。他们信奉对反对派意见的不加容忍的态度，导致了恐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恐怖，对少数派的镇压导致一个人践踏大多数人的状况。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这一概念本身的缺乏，造成了那种愚昧的“一窝蜂综合症”，它以人民的名义使任何专横神圣化。

总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的特征早已形成了。经过半个多世纪后，这种争论现在重新开始，并且争论点与过去一样：围绕革命发展的道路、党的作用、“领袖”的地位。同时还围绕那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建造了我们的国家却又“丧失”了它，而我们的国家在半个世纪以后才给他们恢复名誉。

当然，最高法院并不审查被平反的公民的“党员面貌”，不评价他以前争论中的正确与错误。但它明白地说：在法律面前，在国家和人民面前，他们是无罪的。

我们今天重新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所以，昨天发生的一切同样具有现实性。须知，争论仅仅是刚刚开始……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 年 6 月 13 日。康春林译）

“我要向全世界大喊：我无罪……”

——著名医疗专家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的悲剧

J·德米特里耶夫

从少年时代起，就记得普列特尼奥夫大夫这个人的名字。原因何在呢？早在小学初年级时，每当我们打开高尔基的一木书，耳畔就响起这样的声音：作家让人杀害了。据说，他是受到错误诊疗，叫以这个魔鬼医生为首的一伙穿白大褂的暴虐之徒给送到了阎王那里。这个魔头大夫也同他的助手一起，“凶狠地毒杀了”（要不然，当时报刊上也不这样说）人民爱戴的古比雪夫……

长久以来，这个被重复了千百遍的看来无可争议的可怕的神话，在习惯于对一切都信以为真的我们的心里流传着。只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才一下子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斯大林及其同伙的罪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平反昭雪的正义浪潮并没有波及每一个被无辜判罪而被置诸忘川的人……

次第轮番，只是近年来才轮到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没有人为他奔走斡旋，因为这个当时已届中年的人已没有直系亲属。着手为他恢复名誉的是一些敬慕他的天才的人和远房亲属。我们翻阅着苏联最高人民法院给我们提供的、于 1985 年结案的德·德·普列特尼奥夫刑事案材料，这个地地道道的俄国知识分子，在 1938 年被沙所谓“右

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大案的人，仿佛向我们走过来了。

……1872 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在哈尔科夫省鲍勃里克村出生。上完中学后，晚些时候又以优异成绩读完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他出身于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的家庭，是 20 世纪头 30 年俄国优秀的临床医师之一。他不曾加人过党。也没有跻身过任何政治流派。推动他的“只是一股火热的激情”——在医学领域内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普列特尼奥夫仔细详密地研究了俄国生物学和生理学经典作家，首先是伊·米·谢切诺夫的学术观点，分析了诸如谢·彼·博特金、格·安·扎哈林、阿·亚·奥斯特罗乌莫夫这样一些祖国医学巨擘的著作和临床实践。他曾屡次出国，考察西欧的临床工作经验（后来，审讯他的内务部侦查人员“很工于心计”地利用了这一点）。

“人民公敌”的可伯骂名多年以来罩住了普列特尼奥夫的科学著作。现在终于到了把它们告诉世人的时候了。在 1906 年成为科学博士之后，他发表了优异的学位论文《心律不齐根源问题实验研究》。后来又发表了在血液循环生理病理学方面具有革新思想的著作。多亏这些著作，祖国和世界的临床医学因为心肌梗塞诊断学方面的这些极为珍贵的研究成果而得到了丰富。

临床医师普列特尼奥夫的著作以分析研究的新颖、独到和深刻为特色。在各种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普列特尼奥夫教授阐述了他对病理学过程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落人当时习惯的空白。他的论题的出发点是：绝不能认为发生病变的仅是一个器官而不是人，因为人的机体不是细胞的简单的总和，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各器官只要其中有一个在机能上遭到了破坏，就必然要反映到整个机体上。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作为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生来有才华的人，作为一位热爱人民、热爱世界上这一最人道的职业的人，他坚定地站在先进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忠诚地、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职守。然而，这样却

……没有刮脸，带着疲骨嶙峋的模样和一副疲惫黯淡的眼神，他坐在连夜间例行审讯前总要睡足睡够的侦讯员面前。以名声不佳著称的卢比亚卡，是一座塞满“人民公敌”的内部监狱。在这些“人民公敌”中，也有普列特尼奥夫大夫。往后就是剃光头，剪下裤子上的扣子，对个人采取侮辱性的搜查。再后来就是日日夜夜的单人禁闭，没有光线，没有空气。而早在这之前，是在住宅里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搜查，无论是对个人收藏的专业图书，还是甚至火柴盒和装粮食的坛坛罐罐，无不抖搂个这儿，搜得底儿朝天。当然罗，——“你是恐怖分子、杀人凶手”!“你要缴出武器来，缴出毒药和同谋者名单……”

卢比亚卡的审讯老是一个样子，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这些荒诞无稽的问题：“政治谋杀计划是怎样制订的？你们居心何在？对苏维埃政权，对它的领导人，你们早就怀恨在心吗？”真想对天长啸：不，不，这都是谎言！捏造出这个无耻的案件，真能让人发疯……但是侦讯人员却一再重复着他们的话。勒令坦白，命令在他们编造的记录上签字。要不然，就……

这个“要不然”意味着什么，只是经过许多年以后，在今天我们才明白。在以前严加保密的普列特尼奥夫的卷宗中，保存着判刑后他从奥尔洛夫监狱写的一些信件。他求助于在他看来似乎能恢复公正的那些人——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和维辛斯基。让我们摘引其中的第一封信。

“……我因牵涉布哈林一案，被判刑 25 年，也就是说，我将终生遭到监禁，直至步人坟墓。可怕的辱骂，处死的威胁，揪衣领推搡，掐喉咙窒息，通宵达旦的拷打，我都适应了。在 5 个星期当中，每昼夜只能睡 2—3 个钟头的觉儿，有用拔喉管胁迫我承认的，有用橡皮棍子毒打的……我被这一切弄到了半身瘫痪的地步。在四周的谎言和严寒里，在那些进行着破坏工作的小人和姐虫中，我处于半僵死状态。请指出来吧，在我们苏联也能象其他文明国家那样，有获得真理的可能。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囚徒的希望落了空：信根本无人审理，给维辛斯基写的那封信也是这样。维辛斯基后来在审判中用拙笨的问题折磨这位被告，当时他已“屈打成招”。让我们引用一次这样的“审讯”（如果能这样称呼的话）的例子：

维辛斯基：您怎样说明您被雅哥达雇来策划杀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时的情绪？您当时有反苏情绪吗？

普列特尼奥夫：有过。

维辛斯基：您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了？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在毒害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事情上，您和莱温一块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内容？

普列特尼奥夫：把身体搞得疲倦不堪，这样来降低抵抗力。

维辛斯基：一直到人的体力可能承受的极限？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利用疾病为的是要干什么？

普列特尼奥夫：为的是要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

维辛斯基：为了什么目的？

普列特尼奥夫：为了毒害高尔基。

维辛斯基：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你们实现了这个计划？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李斯基：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您也是同莱温一起制订了毒害他的计划的？

普列特尼奥夫：也是，同莱温一起……

没完没了的、明摆着的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问题，“被提示式”的回答，和一成不变的“是的”。这个极其纯洁善良而又被无比凶残的“审讯”摧残的人，是以何等折磨人的痛苦，艰难地重复着这个荒诞无稽的“是的”，他为这种驯顺付出了何等痛苦的代价？！

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可怕的戏剧。现在我们知道：30 年代的一些非常“法”不是建立在根据之上，而是建立在口号和指示之上的。假如本人自己承认，说声“是的”，那还需要什么呢？要证据、见证和技术鉴定干什么？……被告认可也就是证据，这就是“法”，据此可以实行判决。实行真正的技术鉴定仅是在 50 年代中期和后来在最近为普列特尼奥夫及其同事恢复名誉的年份。苏联医学界最有权威的专家做出了一致肯定无疑的结论：根据对阿·马·高尔基和瓦·弗·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证据！认定有罪的判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人的供词——假日供。

在多卷的刑事卷宗中，有一卷中有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 1940 年 5 月 26 日给维辛斯基的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当我不做退让时，侦讯人员的的确确说了如下的话：如果最高领导认为你有罪，即使你百分之百无辜，那你反正也是有罪的……”

30 年代的法官就是这样“玩弄”法律的。上面一有指示，那就一定要找出罪人！这位检察宫能对自己的牺牲品答复什么呢，如果他本人就是这个可伯体制的合伙发明者？

贝利亚对给他的信避而不答，尽管普列特尼奥夫也向这个丧尽天良的人发出了呼吁：

“所有认定我有罪的文件都是假造的。用暴力和欺骗强迫我‘坦白’……连续 15—18 个钟头的审问，强制性的不准睡觉……已使我心理失常，这种时候我已不清楚我干了些什么……我任何恐怖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过失也没有。我现在为什么该死？我要向全世界大喊，我无罪。意识到自己无罪，死是难受的……”

这些信除了在有限的官员范围内，没有任何人阅读过。现在让人们了解一下它们吧，让人们听一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吧，他甚至在自己最可伯、最无望的时刻也没有丧失这样的信心：“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被监禁在牢狱中、被革出教门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他的名字已多年没人公开提起，他的著作也被没收并遭到禁止。但是，这位教授纯洁无瑕的形象仍留存在铭感他的学生和战友们的心里。近日，我们有幸同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医学史著名学者 B·A·彼得罗夫进行了交谈。他本人认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并且曾在联盟院十月大厅里旁听过审判。他回忆道：

——我作为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曾邀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我们讲过几次课。这是一位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学识非常渊博。在他的课堂上，青年人团团围坐，把我们最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知道，教授是医师进修学院开创者之一，他主持着该学院的内科门诊部，从 1932 年起，他就担任官能诊断研究所所长职务。他还应邀作为我们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治疗大夫和咨询专家。当然，对普列特尼奥夫的逮捕和判刑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打击。大家痛苦地观看着这次审判。好几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好象清醒了过来，大声喊道。“我要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

这不单单是一个声明。就是在监狱中，普列特尼奥夫仍然是一位学者。他请求给他的牢房里送来许多书籍和专着。以便把科学工作继续下去。一些书是外文的，教授对其中许多著作都了如指掌。曾有传闻，说普列特尼奥夫在监牢里写出了 10 个印张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现在何处？最好能找到它们，——这些在牢房的昏暗的灯光下用化学铅笔写成的无价的手稿。顺便一提，“卫生”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的著作。由 B．博罗杜林和 B．托波利扬斯基编辑的德·德·普列特尼奥夫一卷本《选集》明年就将与读者见面，责任编辑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 H．P．帕列耶夫。我们期望《名人传记丛书》中能有这个卓越人物的单独一卷……

在案子卷宗中还保存着这样几句令人痛伤的文字：

“1941 年 9 月 8 日，为反苏鼓动和在奥尔洛夫监狱散布诽谤性谣言事由（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名单，包括其他一些犯人），德·德·普列特尼奥夫被判处枪决。该判决于 9 月 11 日付诸执行……”

请注意“按名单”这句话。未经审判，未经侦查，也没有律师。枪决是在黎明时分，在监狱的地下室里执行的。到此就完事了，没作任何解释。看来，被判了 25 年苦役的这位教授的那些信，他的绝望的呼喊，是让什么人物大大厌烦了，于是，送他一颗子弹比“纠正不可纠正的事情”要更好一些……

生活到底是要各就其位的。虽然有时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这样迅速。花费了整整数十年时间，才终于取消了 30 年代错误贴在我国那些极其诚实、最令人尊敬的人物身上的可怕标签——“人民公敌”、“特务”等等。正在使我国整个生活实现民主化的改革，清洗着苏联社会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遗留下来的污垢。由于践踏法律和正义，曾使千千万万象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这样德高望重、富有专门才干的人遭受重重苦难。而这种对法律和正义的蹂躏，正在成为历史的过去。

（原载苏联《劳动报》1988 年 6 月 5 日。马龙门译）

一批学者被恢复名誉

娜·菲古罗夫斯卡娅等

公正（大或小不重要）获得胜利的日子——幸福的日子。1987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就是这样的日子。这一天，苏联最高法院审理了苏联总检查长对 30 年代初被判处的 15 名公民案件的异议书，决定撤销 1931、1932 和 1935 年涉及他们的决定，并且由于以上人员并无犯罪行为撤销刑事案件。被恢复名誉的人已经没有一个还在人世。

让我们回忆一下 15 人中的每一个人，而且一些名字往后读者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是我们祖国科学的骄傲。他们的名字是：亚•瓦•恰亚诺夫，H•N•孔德拉季耶夫，A•H•切林采夫，H•N•马卡罗夫，N•H•尤罗夫斯基，A•F•多亚连科，A•A•雷布尼科夫，N•H•利托申科，N•H•恰亚诺夫，N•B•卡芬豪斯，A•B•泰特尔，N•H•列昂季耶夫，A•0•法布里坎特，O•A•豪克，H•B•根捷哈捷。

在一个报纸版面上不可能详细叙述他们的情况。的确，也不用着急：一定会重新出版他们的著作，会写出科学研究著作、纲要、书；他们的名字会写进教科书。我们才仅仅开始这项工作。这里主要从叙述亚历山大•恰亚诺夫教授开始。1988 年 1 月，是这位卓越的学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在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出版或准备出版他的学术著作；拉丁美洲一些以恰亚诺夫命名的合作制农民协会也要纪念这个日子。而在我们这里——在亚•瓦•恰亚诺夫的祖国——却是沉默，据说完全不合时宜。

《莫斯科新闻》编辑部就向内行的和知道问题实质的人求助。

经济学博士、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杰日达•菲古罗夫斯娅发言：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1888—1939 年在世。他毕业于彼得罗夫（今季米里亚捷夫）农业学院，并长期在那里工作，起初当助教，后来当教授。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农民经济，在经济方法基础上的合作化。

列宁在酝酿《论合作制》一文时，克鲁普斯卡娅为他征询必要的参考书。寄来 7 部书，其中有恰亚诺夫 1919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农民合作制组织的基本思想和形式》。

《基本思想……》问世以前，30 岁的恰亚诺夫，据我所知，已经出版了 30 种巨著。只要列举出名称，就足以了解他的兴趣有多么广泛，以及深究到现象根源的志向：《俄国亚麻业、亚麻市场和亚麻合作制》、《北方农民的组织》、《社会农艺学的基本思想和工作方法》、《合作制销售组织》、《农民经济的性质》（与 H•N•马卡罗夫合作）、《法国牲畜的合作制保险》等等。

——我们重新出版过这些著作吗？

——最后一些著作的写作和出版在 20 年代末。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恰亚诺夫的书，包括列宁读过的那本，早已成为珍本了。

——而在国外呢？

——在法国，出版了 8 卷本的文集；在英国，一些书重版两次。一句话，恰亚诺夫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在许多国家很熟悉——从印度和日本到美国和拉丁美洲。1919 年，这位学者组织了农业经济和政策的高级研究班，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亚历山大 •瓦西里也维奇成为它的领导人。

——这个人来得及做这么多事，而在逮捕那天——1930 年 6 月 19 日——他只有 42 岁……

——我想提起恰亚诺夫不止一次地重复的一句话："我们祖国的整个未来，我们民主的国家机构的完全巩固将由我们农业充满活力的、迅速的高涨来决定，由我们使现在长一' 个穗的地方长出两个穗的成功程度来决定"。

今天读他的著作，感到非常惊讶，学者关于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的全套方法，关于非黑土地带，关于内部经济过程准确价值核算的必要，关于水、地租，关于合作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想多么真实。

为世界农业科学的进步做了很多事情的生产组织学校的创建是与恰亚诺夫、马卡罗夫、切林采夫、雷布尼科夫的名字相联系的。

——对今天大批读者来说，这一切听起来都觉得是新的：在几十年期间，学者们的名字从历史上被勾掉了。从 30 年代初起，写关于他们的东西倒比避而不谈更为可怕。

摘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1934 年）：

"恰亚诺夫是作为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来迎接全面展开了的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恰亚诺夫同孔德拉季耶夫和许多其他同伙一起积极参加建立和领导劳动农民党并同工业党干涉主义集团联系……恰亚诺夫和他的追随者的破坏行为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揭发"。

1930—1932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请了历史学博士维克多 • 达尼洛夫来回答这个问题。

——亚 • 瓦 • 恰亚诺夫学派的名称取自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为一地区和工作类型制定发展"家庭商品经济"的"生产组织计划"。对农民经济的组织和功用、其生产和消费、其经济周转、道路和对市场的适应等等，具体而又颇为仔细的研究，决定了这个学派完成的工作的内容，从而说明它的科学体系的成就和一定的缺点。集中注意力于农民经济的功用的内部机构和在抽象过程中舍弃整个社会经济因素体系对它的影响，导致总的科学概念的极大的局限性，使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同时它的切合实际的成就、对小家庭经济内部结构和活动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不相抵触。还应当指出它严谨的治学态度。总之，亚 • 瓦 • 恰亚诺夫学派 20 年的存在、工作和研究著作，对农业经济科学是很有益的。

好啦！"劳动农民党"问题，可以说是完全另一类的问题，和科学本身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观念里，大规模的镇压通常只与 1937—1938 年有关。实际上，这几年"只"是大规模镇压的最高峰。

国民经济的根本改造是必要的。不幸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难以置信的速度，这种速度引起在矿井、发电站、工地上的事故，引起破坏操作规则、工作和产品的质量下降、粮自供应中断、完不成计划任务、白白浪费资源。因此，工程师、计划工作者、供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而首先是旧科技知识分子和旧职员的代表，便受到惩罚。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斯大林利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对他的政策及其后果的批评者，这些后果在 1930 年春天以前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工业党”案的审判中（1930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7 日），在被告席上有以学者、工程师 N・K・拉姆津为首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1931 年 1 月 9 日，举行了对“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的审判，被判决的有过去著名的孟什维克 B・P・特罗曼、尼・尼・苏汉诺夫、M・N・雅库博维奇、B・B・舍尔和其他 20 年代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各部门工作的人。继他们之后，该轮到对“劳动农民党举行公开审判了。在报刊上点了它的首领的名字——亚・瓦・恰亚诺夫、H・N・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人，他们的观点同已经实行的全盘集体化方针有根本分歧。但是，公开审判没有举行。

——据今天的专门机关估计，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档案馆里，没有关于“劳动农民党”存在的任何资料。补充一点，1930—1932 年在地方由于隶属于“劳动农民党刃而遭到逮捕的有一千多人，现在“由于缺乏事实或者犯罪内容”被恢复名誉了。恰亚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是一回事，政治组织是另一回事。这样的组织不存在。

——关于“劳动农民党”的成立和活动的唯一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是在“孟什维克审判案”上被告和证人的供述。所有这些供述，乃是“口供”，这在当时已开始算作“在任何情况下最好的罪证”（这在 H・克雷连科在“工业党”审判中的起诉词中写着很别致的标题《被告为什么招认》的一节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看，今年 7 月 16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为卓越的学者和农学家、经济学家和实践家(他们都是不公正的法庭的被告)彻底恢复的名誉的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它证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基础上的改造具有普遍的和不可逆转的性质，并且不限于今天。它也开始公正地对持过去，从而保障这种公正在将来坚固不拔。

——作家、语言学博士玛里埃塔・丘达科娃在谈到作为文学家的恰亚诺夫（这真正是位不平凡的人物，他是发表于 1918—1928 年的小说的作者）时，给我们的谈话增添了意外的方面：

——我父亲在季米里亚捷夫大学时是他的学生，听过他讲课。我当研究生期间，知道小说家恰亚诺夫，读完很小的、式样雅致、巧妙模拟普希金时代散文、然而以 20 年代文学为背景写作的一些小书。但作者本人在自己文集的前言中却坚持说这些独出心裁、离奇的小说是完全得当的：“完全不容怀疑，任何尊重自己的世界城市都应该有装饰它的霍夫曼风格、若干个自己的‘家庭魔鬼’，像任何欧洲式彬彬有礼穿着的绅士在自己翻领扣孔里插着一朵花一样。没有这些东西，最可敬的样子都有些逊色和枯燥”。

在我们面前难道是布尔加科娃的莫斯科的霍夫曼风格的先声吗？

还有，更出奇的，是恰亚诺夫的一本小书——《韦涅季克托夫，或我生活中值得纪念的

事件。由值物学家X所作、植物病理学家Y插图的浪漫主义小说》(1921年)——按E•C•布尔加科娃的说法——受到米哈伊尔•阿法纳西也维奇的特别喜爱，无疑地促进了他的《大师与玛加丽塔》以及《死者札记》的构思和情节故事。

还在70年代，我就曾经写了这件事。在那些年里，我和清楚了解作为土地问题专家的恰亚诺夫并见过他的人交谈——在他去世以前不久——在哈萨克斯坦，同C·N·希波夫交谈。他叙述俄国土地思想发展的回忆录，以及许多关于祖国历史上悲剧式的、而我们又不那么知道的变故的珍贵资料，收藏在弗·伊·列宁图书馆档案库里……

这样，“教授案件”结束了。但工作仅仅开始：应当出版他们的书，应当适应今天的要求和需要去研究他们的著作。

列夫·沃斯克列克斯基记录和评述。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7年8月16日。孙成本译）

苦果

——生物学界的悲剧

瓦列里·索伊费尔

下面发表的瓦•索伊费尔的文章纪实性地叙述了我国生物学经历的一段悲惨时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八月会议和随后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接着是1952年的医生案件，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几格拉宁在小说《野牛》、B·杜金采夫在小说《白衣》中作了部分描述。然而，那个时期的生活本身要比读者从最直言不讳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要复杂得多，悲惨得多。这些事件给后来的几代科学家造成了影响，并且延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很多年。作为事件的后果，一些人在谈到敏感问题时谨小慎微，语言暧昧；而另一些人则相反——咄咄逼人，不愿理解对方。听不得不同意见，权力欲无限膨胀。鉴于“伽利略一乌尔班”和“莫扎特一萨利里”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有必要建立切实的保障，以使科学研究上的一言堂、镇压和在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意见者的事情不致发生。每个科学家有犯错误的权利，但是把辩论的权利变成权力的辩论，利用地位、暴力手段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对科学来说是灾难。这些事件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并且只要不搞清这种恶劣社会现象的心理根源，不建立可靠的法律机制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作有凭有据的分析。只有发挥集体智慧，才能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常化，并且确立一条界限以使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未来，这一切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F·P·伊万尼茨基“人民院士”

1948年，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正是50岁。他有理由对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

感到由衷的满足。他不是在暮年将至，而是在年富力强之时，成为全苏最著名的学者。早在1934年和1935年，他已分别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他和斯大林、维辛斯基一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至此，他已是集三个科学院院士头衔于一身的闻名人物。193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前两任院长A•N•穆拉洛夫和F•K•迈斯特相继被逮捕并遭枪决。在这之后，特罗菲姆•李森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这所由尼•伊•瓦维洛夫创建并担任最初领导工作（1935 年以前）的科学院的院长。瓦维洛夫同样未能免遇厄运。在遭受李森科本人和与他气味相投的一伙人长期围攻、打击之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于1940年8月6日被逮捕，1943 年 1 月因心力交瘁死于萨拉托夫的狱中。瓦维洛夫被逮捕后，李森科立即迫不及待地伸手抓由瓦维洛夫创建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权。新任所长非但对遗传学一窍不通，而且对这门学科耿耿于怀。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曾名扬苏联国内外的研究所所遵循的瓦维洛夫精神被破坏殆尽，遗传学研究所仅徒具虚名而已。当年曾和瓦维洛夫共事的科研人员仍留在这个研究所的仅有三人。瓦维洛夫曾任所长的另一个研究所——列宁格勒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也因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签署的一纸命令而遭受同样厄运。

无论是李森科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者都知道，触犯这位被报界称之为“人民院士”的人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他是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赏和支持的。确实，那些只是出于无意而“得罪”了伟大领袖所宠爱的人的人们，十有八九不是进了劳改营，就是蹲了监狱。

李森科最初博得斯大林的当众赞扬是在1935年的2月。当时，农业生产突击手们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李森科这时早已是苏联新闻界倍加推崇的人物。还在1929 年，他就宣布说，将育芽期的麦种进行低温处理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这种方法被称为春化处理法）。李森科的这个设想还未经任何验证，而从报纸媒介到乌克兰以至莫斯科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却随声响应并推广起来。1930 年，当时苏联生物学和农业科学的带头人尼•伊•瓦维洛夫院士出于对李森科扶持新生集体农庄的能力、智慧和愿望的深信不疑，开始对他的设想给予积极的支持。春化处理法尚未给国家增产一公斤粮食，而李森科已于1931 年被授与红旗劳动勋章。不过正当“春化处理法”被过分宣扬，李森科本人也自吹自擂之时，另外一些科学家——N•H•康斯坦丁诺夫、N•H•利西岑和他们所领导的遍布全国的农业试验站对35个品种进行了系统的、缜密的春化处理法作用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个方法对农民和国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这一验证结果于1935年底发表，不过这时已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了。

李森科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也没有沉湎于“成功”的赞扬声中。他不断想方设法以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每年他都要提出一些诸如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等等的新的引人注目却又华而不实的设想。他象马戏团里的魔术师一样，施展手法对这些设想添枝加叶，到处作大胆的却又是随心所欲的许诺。人们还未来得及验证他的前一个设想，一个新的设想又提出来了。

但是，无论李森科如何绞尽脑汁设法解释自己的设想，他提出来的那些办法越来越陷入与最基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遗传的新学科——遗传学知识的矛盾之中。觉察到这一点，李森科开始更加不遗余力地攻击遗传学家。他的论据未必站得住脚，但却是致命的。因为李森科对遗传学家的责难不是说他们前提错误或者论据不足，而是责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一套和颓废没落。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李森科的用语）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似乎是他本人和

他的门徒在苏联建立的。瓦维洛夫曾好几次试图以长辈身份委婉地劝导这个自己曾经扶植、提携过的人回到真理的路上来。但是只要一谈及此事，李森科对自己这位恩师的态度马上就变得明显的不悦起来。

踌躇满志的"创新学者"——李森科早在登上克里姆林宫的讲台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之前，与广大科学家的分歧已经发展到遗传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李森科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决定当着斯大林的面讲两个主要问题：宣扬自己的成绩，斥责科学研究上的对手。

于是，第一次从一位科学院院士的嘴里说出有人在科学研究上搞破坏的话，第一次有人把科学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上纲为政治问题。李森科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讲给大厅里与会的农民弟兄听的，而不是讲给斯大林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其他领导人听的。不过，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心里十分清楚，他的这些话会在谁的心里引起难以形容的喜悦。在揣摸别人心理与内心活动方面，这位"人民院士"堪称行家里手。

李森科说道：

"同志们，富农破坏分于对农业集体化的危害你们是很清楚的。然而，这样的破坏分子不仅仅在集体农庄里才有，在科学领域他们同样存在，并且其危害性和极端凶恶的本性一点也不亚于富农破坏分子。我们在确立春化处理法的斗争中和就这个问题与那些所谓'科学家'的争论中就常常遇到使人感到十分愤慨的事情，在实践中我们也频频受到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推广春化处理法这个战线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吗？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但不帮助集体农庄庄员们，反而去做危害他们的事情。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也无论是否是科学家，阶级敌人终归是敌人。"

稍过一会儿，他的话题又回到科学家的观点具有敌对性质的问题上。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只会白吃人民的饭。这位新任科学院院士宣称："我们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样的庄员在我国是相当多的）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比某些教授的贡献大得多"。

李森科的讲话越来越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以至最后他兴奋地从座位上一下子站了起来，带头鼓掌并大声赞道：

——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太好了！

第二天，中央各报都将李森科这篇讲话删节至斯大林高声赞许处予以发表。不过李森科还继续讲了下面一段话，对于这段话的涵意恐怕连李森科本人也未必明了，但是它不可能不给那位最为显赫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带来欣喜之情。

请看这段话：

"同志们，在苏联，人不是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只是人的躯体，人是造就成的——拖拉机手、司机、机械师、科学院院士、科学家等等。而我不是天生的，我是那些被造就出来的人之中的一个。我不是生而成为的人，而是被造就成为人的。

同志们，没有什么比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更幸福的了。被敌人杀害的基洛夫同志曾说过，非常渴望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要说，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一名科学家，我感到无比荣幸。”

1935 年底，李森科再次当着斯大林的面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主题——遗传学家的危害性问题。这一次，他关于某些科学家事事与他作对，专门干扰他工作的不实之词终于发生了效力。当时斯大林的心腹、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H·A·雅科夫列夫（此人于 1938 年被枪毙）从主席台上问道：

——你指的是哪些人，为什么不点名字？

李森科当即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人名。其中第一个人正是对他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大，宣传他，并且给他作了极好的鉴定和推荐（缺乏必要根据的），甚至于在这次会议上还在赞扬他的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

这次会议结束的次日，《真理报》报道了李森科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勋章的消息（李森科曾八次获得列宁勋章、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李森科的父母亲得悉这一消息之后，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寄给斯大林。这封信也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有一段话谈到：现在集体农庄的日子过得不错，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这段话给斯大林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他将这段话稍加改动，变成了自己的话。于是，这段话在全国不胜而走，传播开来，成为斯大林当政时期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

李森科在战后的困难处境

还在伟大卫国战争刚开始时，发生了一件直至战后仍困扰着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的事情。当德军逼近哈尔科夫时，他的一个在某冶金科研所工作的亲弟弟投靠了法西斯分子。（关于此人的劣迹，早在战前人们就有所耳闻。他曾对那些他所忌恨的人施用简单的却是有效的办法来惩治——写告密信。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人从此失踪了）人们对大名鼎鼎的李森科的这位亲弟弟都敬而远之。战争期间，哈尔科夫这个城市曾几次易手。每次德国人都带着李森科的弟弟一起撤走，当他们卷土重来时，又将他官复原职。战争结束后，他潜逃至西方。

可以想见，弟弟的所作所为使身为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处于何等微妙的境地。尽管没有撤掉他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等职务，但是上面对他的冷淡态度是不难体验到的。

可以说明这种态度的一件事，是战后不久即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安·罗·热布拉克院士的一篇文章。热布拉克不是一般的研究人员，他 1918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仅是季米里亚泽大农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上过红色教授学院。为了在遗传学方面进一步深造，他于 193D 年至 1931 年 3 司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进修（从师于染色体遗传理论的奠基人托马斯。摩尔根）。此后，他主持过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遗传学和育种学教研室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在不脱离教学活动的情况下，参加党中央机关的工作。1940 年，在他自己的家乡——白俄罗斯当选为白俄罗斯科学院院

士。1945 年，他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长。这一年。热布拉克接受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交给的任务，为美国。科学。周刊撰写一篇文章。这篇题为《苏联生物学》的文章经苏联情报局局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A • C • 谢尔巴科夫审阅并批准后发往美国。

这篇文章专门分析评述了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当有分寸地，但还是非常坦率地针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发表的不同意见由于事实上是由党的高层领导授意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安 • 罗 • 热布拉克的文章所预示的还不仅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对李森科的警惕与不信任的态度。1946 年，苏联科学院开始筹建新的遗传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将开展现代遗传学万面的研究。新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尼 • 伊 • 瓦维洛夫的亲兄弟——谢尔盖 • 伊万诺维奇 • 瓦维洛夫自 1945 年 7 月 17 日上任后不久，即开始积极促成组建这个研究所。热布拉克和被其吸引而参加筹备工作的尼 • 彼 • 杜比宁担负起编制未来研究所规划的事宜。科学院生物科学学部委员会对建立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的设想和该所的远景研究规划均表示同意。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此事向苏联政府呈交了申请（了解最高领导层内部相互关系的不成文惯例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表明此事已获基本同意，以至可以呈请审批了），科学院人事局甚至已经拨出工资额以备将来研究所录用人员。

另一个对李森科不利的迹象是 1946 年度的斯大林奖金没有授予李森科安插的人，而授予了两位众所周知与李森科关系对立的科学家：B • C • 涅姆钦诺夫院士因所着《农业统计学》一书获奖；B • N • 埃德尔施泰因因所写的教科书《蔬菜生》获奖。类似的迹象还表现在 1946 年当选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不是李森科的支持者，而是尼 • 彼 • 杜比宁。虽然李森科依然继续身居高位（例如，他照例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但报刊上对李森科观点的赞扬在这时已大大减弱。

1947 年 2 月，召开了讨论国家农业生产形势的党中央全会。从全会上的发言和全会公报中均不难看出，李森科的许多建议和许诺都受到了冷遇。多年来，李森科宣传的新品种培育、杂交玉米既无必要而且有害、将乌克兰的所有秋播小麦变为春播小麦而把西伯利亚的春播小麦改为秋播小麦是有益的等，一直在农业中推广。这次则不同，在中央全会决议里多处列入了与李森科的主张相反的内客。

所有这些零散的情况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即报多大和政府领导人对李森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他活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李森科本人对这点最清楚。因此，中央全会后，他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次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一方面继续自我吹捧，说明他的“春化处理法”、“土豆夏季栽种法”等建议是完全有效益的，另一方面，尽管是口头上，也承认了近亲杂交法（近交方法）是有益的。而在此之前，只要听到谁说到这种方法，他就会大发雷霆。

原来是达尔文错了

1945 年 11 月 5 日，各地育种站的工作人员被召至莫斯科听李森科作题为《自然选择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报告。李森科报告的主要精神，是要说明达尔文原来是错的，他错在不正确地理解了进化的推动力量，而这一错误只是由于有了他——李森科才得以被发现。用李森

科的话来说，进化论的创始人不加批评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论点。因此，他（指达尔文）做了关于自然界存在物种内部竞争的不正确结论。他说道：“物种和它们的变种永远不会过剩，恰恰相反，作为规律，它们常常是不足的。因此，物种内部的竞争是不存在的。”由这个论断，李森科得出了又一“科学发现”，表明他已从应用科学的研究转而深入到理论研究领域，并且与前人相比达到了全新的高水平——发现了植物具有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特性。

这一“理论”受到了生物学家们针锋相对的批评。李森科的“逻辑”一开始使人们都莫名其妙，继而感到愤怒。原来，李森科关于达尔文主义核心论点有错误的结论竟是以在数字上捣鬼，歪曲事实为基础的。自然，对李森科的嘲讽、抨击接踵而来。不过，李森科非常清楚他该如何反应。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所下的功夫并不在科学论证上，然而却是十分有效的。从 1946 牛 11 月 5 日起，《社会主义农业报》开始连载达尔文事业的继承人（李森科自封）的题为《自然淘汰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文章。

在这同时，关于生物学家（此时已不仅是遗传学家，而是生物学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准备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的传闻从各地不时地传到李森科那里。单凭这些传闻，还看不出其中包含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当然明白，在此时此刻开展又一次理论争辩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来自领导层的不满和科学界里生物学家们的对立情绪加在一起对他又是多么大的威胁。在头脑简单的人听来只不过是不明晰的街谈巷议的那些传闻，对于李森科来说则是预示风暴将至的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因而他绝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采取对策，迅速扭转局面。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当然，他很明白，斗争是不能从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在寻找并且找到了他在科学立论上的错误。那么，必须对这些科学家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错误发起攻击，给他们背上思想错误的罪名。这远比自己“区区事实上有所出入”的问题严重得多。很明显，在完成建立米丘林生物学的巨大任务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李森科认为，他的对策必须适应现今让会气候的需要。

时局也在变化。斯大林信守自己提出的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开始运用各种方式加强思想上的压制。

1946 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作了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个报告。报告指责《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存在什么立场不稳的问题。接着又对作曲家、电影工作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于那些为古罗马奴隶起义作了不准确的注释的学者大加责难。

这以后不久，又掀起了一场运动——挖出那些崇拜西方、主张世界主义、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的人。义愤填膺地宣布说这些人每时每刻部妄图出卖祖国，对这些人来说，得到西方同行的认可比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还重要，说他们忘了，轮船、火车、电话、无线电、飞机这一切都是最先在俄国出现的。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讥讽地说：“恐怕连大象的故乡也在俄国呢。”这一次运动非同小可，法院又是指控搞破坏、向西方出卖工业情报、搞间谍活动，又是判刑，搞得人心慌慌。

李森科决定利用这一国家政治形势中出现的变化。要紧的是选准第一个靶子，要打击最主要的敌手，最好是拿高层领导人赏识又愿意听其意见的某人开刀。

审判热布拉克

安・罗・热布拉克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其口实是他那篇于 1945 年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别人或许不记得这篇文章，但李森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这篇文章用来指控热布拉克背叛祖国是再合适不过了。1947 年 3 月 6 日，《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李森科的亲密挚友 N・N・普列津特的一篇题为《生物学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文章。文章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党中央最近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定，赋予了党的积极分子和苏联知识界重要的任务。他们责无旁贷，应该去清除任何对国内外各种思潮趋之若鹜的思想残余，勇于揭露颓废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

接着，普列津特无所顾忌地发表了对遗传学的看法：

“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时，在生物科学领域里产生了一个毫无意义而又先天不足的低能儿——形而上学的，反历史的，又是徒具形式的遗传学说。”

普列津特在引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一段同样怒气冲冲的话后，继续漫骂遗传学家。不过已经不是骂西方的，而是骂苏联的。他宣布，在美国有一份《科学》周刊如何如何恶劣，是法西斯性质的杂志，还谈到了一个在“哈佛大学四下活动的亲法西斯黑势力分子”（普列津特语）卡尔・萨克斯。接着，他话锋一转，宣称在苏联有那么一位与此人如出一辙的人——安・罗。热布拉克教授。普列津特在文中写道：“对卡尔・萨克斯不值得大惊小怪……令人感兴趣的倒是生活在苏维埃国家的一位教授与这位萨克斯先生一唱一和。不知这位教授对国外的东西还要卑躬屈膝至何种程度。需要指出，有上述行为的正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教授安・罗・热布拉克。他在国外杂志上就萨克斯一次讲话而发表的文章完全赞同了这个亲法西斯分子对以李森科院士为首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先进学派——米丘林学派的理论成就的评价。”

这第一次攻击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于是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幕后策划，准备给热布拉克以更沉重的打击。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得逞了。1947 年 9 月 2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鲜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副博士（此文中署为教授）N・H、拉普捷夫的毁灭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又一次指控热布拉克的卖国与背叛行为。拉普捷夫的原话如下：“安・罗・热布拉克与国外的反动学者沆瀣一气……贬低并辱骂我们苏联先进的生物科学和它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李森科院士……。由于热布拉克丧失了爱国情感和科学家的人格，为资产阶级的偏见所迷惑，卑鄙地拜倒在资产阶级科学的脚下，因此，他已经站到敌人营垒那一边去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使人联想起 1937 年时的风气：“所有阻碍这个任务（指在最短时间内超过国外科研水平）的人，所有以他们的卖国行为危害先进的苏联科学的人，都将受到舆论的审判。”

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此事非同小可。由于热布拉克在担任白俄罗斯科学院的工作的同时，仍在莫斯科主持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一个教研室的工作，因此，这件事由高教部负

责处理。当时任高教部长的是与李森科过往甚密的人——卡夫塔诺夫。他批示在“道德法庭”（类似于今天的同志审判会）上审理热布拉克的问题。一个月后，“道德法庭”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开庭，出席旁听者为数甚众。开庭之前，审判长、当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的米 •安 •苏斯洛夫作了指示。在法庭上发言的是当时对李森科还很信服的、年轻科学博士尼・瓦・图尔宾。热布拉克的辩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彼・杜比宁。

然而，这次公开审判并不成功。面对公众，法庭根本拿不出什么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而热布拉克却镇定自如地进行了自我辩护。法庭最后宣布，由于安・罗・热布拉克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非爱国主义”言论，给予他通报谴责处分。至于他发表否定李森科的言论，并认为他（指李森科）甚至算不上遗传学家而只是个农学家的问题，法庭认为不属于犯罪行为。

尽管如此，《真理报》上的文章加上“道德法庭”审判，其影响对热布拉克来说是相当严重的。这同时还表明，李森科并未声名扫地，而且在其身后有强硬的后台。同年 10 月，热布拉克这位全国闻名的遗传学家被撤掉了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职务。国家安全部的人员也突然光临他在明斯克的家。不过，他们未能找到安东・罗曼诺维奇・热布拉克。他没有圆明斯克，而是躲在莫斯科他的朋友们那里。在莫斯科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小日丹诺夫报告的风波

关于达尔文主义实质的公开论战的结果对李森科来说并不乐观。争论文章在《文学报》上登了好几版。N・H・施马尔家森院士、N・A・萨比宁、A・H・福尔莫佐夫、C・N・尤金采夫几位教授发表文章对李森科的新论点表示异议。而李森科的支持者（A、A・阿瓦基扬、N・A・多尔古申、H・F、别列尼基、N・E・格卢先科、B・H・斯托列托夫和尼・瓦・图尔宾）和以马・鲍・米丁为首的哲学家则对他们大加声讨。与此同时，报纸上还辟专栏发表军人、家庭主妇、建筑工人、大学生等各界读者的来信。尽管李森科分子们得到了哲学家和读者的支持，可总的来看，他们还是在这场论战中败北了。李森科的观点在战后第一次受到公开的当众抨击。N・N・施马尔豪森院士和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同行们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角色。谁如果要摆布他们，是不会博得什么好感的。形势不同了，什么是宗派主义、派别思想，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很多人（不只是生物学家）都了解李森科所搞的派别活动，同时也深知进化论者施马尔奈森、植物生理学家萨比宁、或是动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福尔莫佐夫并未结成任何形式的派别。此外，这几位科学家都是在本学科领域内在全国享有巨大声望的学术权威。因此，想用空洞而又笼统的对对方的指责充作科学上的原则性论战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李森科的那些一直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从春化处理法和品种内部杂交到橡胶草窝种法以至借助母鸡消灭田间害虫等大多数意见是有害的。

1947 年，两位生物学家——B・N，埃夫罗伊姆松和 A・A・柳比谢夫向党中央递交了各自关于李森科学派危害性的论文草稿（每篇均超过一百页打字纸）。他们充满激情而又内行地进行表述，又辅之以大量的数字和对比材料（特别是埃夫罗伊姆松的文章），毫无疑问，会使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李森科那一套的危害性。

党中央对这两位生物学家的文章表示了初步的热情。当时，在党中央机构中，党的中央书记安・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擢升至领导岗位。尤・日丹诺夫 1941 年毕业

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他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包括哲学，并且特别重要的是遗传学。还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尤·日丹诺夫就结识了一些遗传学家，亲手做过一些不很复杂的遗传学科目的实验并且确信孟德尔定律和受到李森科的拥护者口头上“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结论的完全正确。

1947 年，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出任联共（布）中央科学处处长。他终于有可能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因此而负有这方面的特殊的责任。他开始会见苏联生物学界持不同观点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并同他们座谈。由于他不困于自己起初对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见解，而是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因而他很快就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尤·日丹诺夫决定开展与李森科的公开论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1948 年 4 月 10 日，来自全苏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的宣讲员们汇集莫斯科参加定期举行的讲习班。举办讲习班是一项重要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需要贯彻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张和各种条例规定都可以通过宣讲员迅速传达给群众，而且由宣讲员亲自用生动的口头语言传达所产生的效果是广播、电影（当时还没有电视）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那时对于宣讲工作格外重视。因此可见，定期于莫斯科举办的这种讲习班，其作用是何等重要。

无须向听众介绍报告人——新任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讲习班上的宣讲员们都熟知，他是当时的思想家日丹诺夫的儿子，于是带着特别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小日丹诺夫所讲的正是生物学的状况和李森科的错误。他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谈到李森科垄断了生物学的研究，谈到了多年来李森科只是做一些在农业上能取得卓著成效之类的许诺，而这些许诺根本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又压制可以为农业带来切实效益的生物学界其他重要学派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小日丹诺夫对自己报告的内容未进行保密，因而，还在讲习班开学之前，有关这篇报告的消息已经传到“人民院士”耳中。得悉这个消息之后，李森科决定亲耳听听这位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要讲些什么，不过不能象众人一样前往会场去听，要想个别的办法。于是，他来到他的朋友、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代理副主席马·鲍·米丁的办公室。米丁的办公室通有有线广播线路，因而不必在会场抛头露面就可以听到综合技术博物馆讲演大厅内的发言。

采取这种隐密作法的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这之前，李森科从未采取过任何回避办法，并且总是毫不拘束地上场应战。看来，这次的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以至无论是李森科本人，还是他的挚朋好友都既未能通过幕后活动取消这次报告，或者再退一步讲，也未能在尤·日丹诺夫报告过程中予以阻止。可以想象，李森科——这个全国闻名，老幼皆知的特有的形象如果突然出现在会场上会给会场听众和报告人以多么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李森科坐在与会场只一条很窄的走廊之隔的那间办公室里，仔细听着十多年来第一次一位党的领导人谈到他李森科犯了决定性的错误。这样的场面似乎有点可悲。此刻，50 岁的农业科学院院长、全苏最闻名的科学家不得不孤单一人关在紧闭的门内细听在他有生之年就要将他赶下台的小日丹诺夫的讲话。从他那瘦削和略显驼背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某种受到屈辱的情绪。他没有勇气从别人的办公桌后站起来，走上十来步，进人会场，哪怕是稍微说点儿什么以表示反对，也没有勇气在报告之后随即与这位有影响的批评者针锋相对地交锋。他们互相没有照面，分别离开了会场。这场避而不见的捉迷藏游戏，其主导人物不是尤·日丹诺夫，而是在尤·日丹诺夫整个报告期间，始终独自一人躲

在报告大厅比邻的一间办公室内的托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致斯大林的信

这场报告后，李森科走出了颇具风险的一步。他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指望能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为此，他表示不惜以“退位”——自愿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为代价。

李森科此举的惊人之处在于象他这样级别的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会自愿采取如此拿国己前程作赌注的冒险步骤。因为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斯大林外表的平和冷静的背后是暴怒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离开谁也照样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上述那样的冒险举动，无异于是毁了自己。交给你工作，委你以职务，你就在那儿好好干。至于什么时候撤掉你或者晋升你，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对这条不容置疑的规矩李森科当然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决意冒险一试。

据我所知，时至今日无论是李森科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这一事实本身，还是那封信的内容都仍不为人们知晓（我第一次当众宣读这封信是 1987 年 8 月 22 日，在第七届逻辑学、方法论与哲学国际学术会议上），而那封信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那封信使李森科得以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对苏联生物学界施行了一次大摧残。现将李森科的信全文照录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同志：

我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至于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感到工作起来困难重重。因此，下决心求得你们的帮助。目前，在农业生物学界出现了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状况。

在这一学科领域中过去和现在，在旧的脱离实际的学派与新的米丘林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

当前，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人们知道的原因，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事实上是在对自己的基本观点未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米丘林的拥护者的。可是我们——本来就赞同并发展了米丘林学说的人却遭到非议。似乎是我们责难并歪曲了米丘林学说。这也让人看清，为什么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全部攻击矛头基本上针对我个人而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科学院的领导者，我感到工作非常难以开展。

不过，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正常现象，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检验各学派和各种科学研究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农业战线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领导者得以获得科学的力量去发展米丘林学说，去为我们的实践提供越来越大的帮助的基础。这也是与生物学界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

尽管反对米丘林学派的人不顾科学的客观性并且不时地进行毫不掩饰的诋毁中伤，尽管处境困难，但由于有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为依据，我还是尽自身之力顶住了他们的攻击，并且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自己的工作。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实在束手无策

今年 4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同志在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讲习班上做了一个题为《关于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他以自己的名义亲自讲述了反米丘林派对我的诋毁。

我很明白，由于反米丘林派污蔑我的话出自报告人——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之口，因而会使在场的众多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认为那些不实之词是真实的。此举还使反米丘林的新达尔文主义分子的错误言论得以在各州的基层科学工作者和农艺师以至农业战线的领导干部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严重阻碍我所领导的科学工作者进行正常的业务实践。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打击，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农业与生物科学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为此，我谨向你们提出一个对我来讲至关重要的请求；如果你们认为必要，请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帮助吧。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忌讳批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由于它实在不足为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在此不予细谈。我的任何一项理论的或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都由我本人亲自征求批评意见。我也从这之中学到了对事业、对科学有益的东西。我的全部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批评监督之下进行的。当然，这是好事。

可是，做上述那个报告的人一次也未找过我，他本人也从未和我谈过话，虽然他报告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我而来的。由于没得到报告的人场券，因而我不是在会场上，而是在另一个房间——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副主席米丁同志的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喇叭认真地听了这个报告。至于我是如何理解这个报告的实质的，从我对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所做的摘要记录中即可看出。这部分的记录稿另附呈阅。

有人曾不只一次地指责我为有利于自己所赞成的米丘林学派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受到压制的是我所赞成的那一学派——米丘林学派。

我认为，如果说我本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但不是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自己在科学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所做的工作对米丘林学说的成长与发展给予了很大促进，这话不为过分。

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深信这个要求是不正确的）——保障科学研究领域里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这话指的不是科学研究工作中各不同的分支，而是指不同的学派）。我作为院长在工作中感到棘手和难办的事情就在于此。

对我来说，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也不会做出压制对立学派的事情。因为首先，科学上的这些问题不是用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其次，新达尔文主义的保护势力十分强大，即便我想压制也不可能办到。

实际上我不是农业科学院院长，而只是在科学界上层暂且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的保护人和领导者。

困难还在于，我作为一院之长却不能不将在院内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代表人物的科研与实践工作作为全院的工作。因为，反米丘林分子与其说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不如说是在搞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诽谤。

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的。这个学派承认生活条件造成生物的变异，承认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

我很早就接受了，而且至今仍赞成并发展着威廉斯关于农业耕作与土壤培育的学说和米丘林关于有机体发育的学说。这两种学说理论上同属一个学派。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在这方面我感到力所能及，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农业部以及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做些有益的工作。

请原谅，信写得不够有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目前的心境。

信中提到的报告记录附后。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院士特·杰·李森科

1948年4月17日”

毫无疑问，这封信可称之为一篇杰作。李森科在生活中可以以各种形象出现——对待朋友诚挚热情，对待敌人冷酷无情，在领袖的面前则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可是这次非同寻常，以往的各种面具都不适用了，应当另辟蹊径。于是，他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语气：在柔顺、谦恭以至心灰意冷的表面形式下，透着实际上执着的强硬和对异见的不可容忍。他明白，在这种令他难堪的时刻，事情是复杂的。也正是因此，他选择了那些唯一可行的词句。

他在1935年第一次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时，曾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在这封信中则相反，他一方面竭力表现出一副遭到狼（反动的遗传学家们）威胁的不幸羔羊的样子，另一方面，十分出色地利用自己编造的关于狼的神话，将他难以推行自己的计划的责任推到遗传学家身上。

李森科没有责难小日丹诺夫。他用寥寥数语将小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对其批评一事归结于他（指小日丹诺夫）对人过分信任。说什么他由于年轻缺乏经验信任了那些人，以至他们才

敢胡言乱语。所有这些哀苦的语气，尽量少地提主要的攻击者和菲薄自己的作法，其用心是明白无误的——表白是恭顺的，并且准备义无反顾地完成任何命令，以期得到授权去惩治那些居然敢到尤里・日丹诺夫那里进谗言的潜在的和明显的敌手。

李森科在信中一方面抱怨有人“不上一次地指责他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另一方面又抱怨什么“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看得出，李森科并不掩饰，进行惩治正合他的愿望。这也是这封信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

凭李森科的机敏，他明白斯大林的意图。于是，他在信中还抱怨，有人向他提出不正确的（他在此强调：“我深信……是”）要求：除了自己这一学派外，“保障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

在这里，他不顾说出来不大光彩，提到与“米丘林分子”斗争的那些人仍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占据领导地位。他在埋怨这种状况时提到，他的拥护者至今“在科学院内仍处于明显的少数”，指望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帮助。

李森科指望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话也能投斯大林所好，是不无根据了。请看：“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了……。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

照他所说，只要不再既必须与科学上的对手斗争，又必须发展米丘林学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他将能干一番大事业，“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为我们的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作些有益的工作。”

信最后带有歉意的“信写得不够有条理”的附言和用“心绪不佳”——这一任何人都明白的原因作为推托之辞，看来是多余的。李森科这封信写得非常出色。他用恭顺的语言将他希望仍旧作一个斯大林宠信的人的激昂情感和强烈愿望表述得淋漓尽至。

李森科还随信附了关于他对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是如何理解的简短摘要说明。这个附件也很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报告中批评的基本要点。

“特・杰・李森科院士的信的附件

我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报告最后部分的笔记摘要

1．李森科是科学发展的阻碍（不承认激素、维他命等等）。

2．李森科只支持必要的研究领域中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即生物学领域。但是，他否定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

3．如果出于狭隘利益而做有损别人著作声誉的事情，那是很不道德的。李森科一派中一个名叫安德烈耶夫的人就在《选种和育种》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

（宣读引文）

4．李森科不承认存在激素（荷尔蒙）。

5．李森科将我国杂交玉米的推广工作迟缓了 13 年。

6．对李森科未采取批评的态度，而他是有错误的。例如，他曾许诺为西伯利亚培育耐寒品种，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消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从未说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错的。

7. 李森科常常诋毁科学上的新事物，这与他"创新者"的称号不相称。此外，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伪创新者（宣读引语），我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说，这与您——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也是有关的。

（特•李森科）"

虽然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它没有马上给李森科带来什么真正伤脑筋的事。另一方面，李森科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的信也没能很快得到回音。

于是，李森科决定加快事情的进展，他采取了另一个果断步骤。通过苏联农业部长 H•A•贝内迪克托夫，他搞到了小日丹诺夫讲演报告的记录稿。1948 年 5 月 11 日，李森科将该记录稿交还给贝内迪克托夫时，附了一份申请书。这次，他表示坚决要求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贝内迪克托夫同志：

现将《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记录稿交还给您。

我认为有义务声明，无论是从报告本身，还是从经过修改的记录稿中（其中不少地方与我听到的报告中谈到的内容相比，看来是作了一些修饰）都可以看出，报告人以其个人名义讲述的正是那些反米丘林分子和持摩尔根新达尔文主义观点的人很久以来就用以诋毁、中伤我的话。

背着我搞这种批评，其目的是使我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不能提出不同意见，不能进行反驳。

为鉴别对我的科学著作进行学术批评的水平，我摘录了报告记录稿第 3O 页上对我的一个论点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请将摘录的这段话与我的文章中对那个问题的说法作一下比较。我那篇文章相应的一页就贴在摘录这段话的纸上。报告其他各处的批评也是基于同样的学术水平。

在经过修改的报告记录稿中，既未指明我的著作的名称，也未指明从中所引段落的页数。这样，读到这份报告记录稿的人就不能将报告人所讲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与我讲的原话加以对照比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申明，在我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我无法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继续工作下去。

为有利于农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请考虑免去我的院长职务并且给我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如果这样，我将能够无论是在农业实践方面，还是在生物学各学科领域发展米丘林学派方面以及培养科学工作者方面做些更为有益的事情。

院士特·杰·李森科”

这封信用了另一种语气。这种语气令人作出一种谨慎的推测——此刻李森科已经得到有关斯大林对他第一封信反应的某些信息，并且他希望促一促事情的发展。关于这些，从他指责尤里·日丹诺夫不是内行，甚至是卑鄙的，那种坚决的口气中可以看出。

李森科起劲催促这件事是有其道理的。一段时期以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编制出现很多空额。已经宣布，由于这个科学院的不少院士死于狱中或劳改营，再加上一些人的自然死亡而空出的这些位置，将遴选新人递补。这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选举，很多与李森科对立的科学家被推荐为候选人。如果他们最终当选的话，李森科将彻底失去对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控制。

“斯大林多蘖小麦”

小日丹诺夫的报告给听众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李森科所作的诸如培育神奇的品种，一下子提高全国各类农作物产品等许多诺言，都是不攻自破的神话。不过，小日丹诺夫没有谈到李森科又对一个新品种津津乐道的事。这个品种还未经验证，但已经引起斯大林的期望。据说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小麦。这种小麦的产量可以比普通品种小麦的产量高出五到十倍。小日丹诺夫了解此事的原委，并且知道，斯大林对李森科的这个许诺很赞赏。由于这个设想尚处于研究阶段，因而他认为将其在报告中当众谈论还嫌过早些。不过，尤·安·日丹诺夫已不止一次地请包括热布拉克在内的遗传学家提供有关这个小麦品种的资料，自然，他没有向他们吐露为什么需要这些资料。做事不紧不慢的热布拉克，以及其他遗传学家也没有将这件事尽快去办。

这种小麦在全国引起关注，斯大林本人对此也出人意料地感兴趣，这在当时是不奇怪的。人们又一次隐约看到了用最简便也是最省钱的办法——推广一种神奇的种子来解决居民食品供应的前景。

还在卫国战争前不久，已经掀起过一阵多蘖小麦热、当时，在全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中亚地区一位名叫穆斯利玛•别吉耶娃的集体农庄普通女庄员由于播种了多蘖小麦而获得罕见的好收成。但是，战后别吉耶娃的事业进展不顺利，小麦不再分穗了。然而，据说她的那种小麦在格鲁吉亚得到了更新和改良。

1946 年，一小包多蘖小麦麦种从格鲁吉亚的卡赫季亚寄到了莫斯科。这些麦种未加任何验证便被列入国家植物良种全书中。这时，它已被称作“卡赫季亚多蘖小麦”。如此急急忙忙，原因很简单一这包麦种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他作为格鲁吉亚人，对自己的同乡取得这样重要的成绩感到高兴。

斯大林将李森科召来，把一包重 210 克的卡赫季亚多蘖小麦转交给他。斯大林表示，希

望对这种神奇的麦种加以验证，如果奇迹属实，就大量培育这个品种并且尽快提供给农民播种，李森科将这包种籽接受了下来。

正是这一时刻，对于评价李森科的个性特点至关重要。与李森科关系密切的人曾一直散布他在敖德萨时为人如何无比正直，甚至说这位年轻的农艺师生性腼腆等。而岁月是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既给人很多启迪，又使人遗弃不少东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也不例外，特别是他跻身上层以后，更是如此。以前，他的固执有可能是由于无知，冷酷无情也并非出于愤恨，而只是心情激动和要寻求出路。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带给他一个课题，解决这一课题对于坚持原则的人来说，可不是那么简单。

正当领导层中其他人对李森科不再理睬的时候，斯大林不鄙弃他，并且召见他，这样的时刻不仅仅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考虑到李森科面临的形势，这对他来说，还是一生中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

斯大林的要求没有任何使人难于接受的东西。对多蘖小麦的兴趣说明斯大林是个热心的当家人。

乍看起来，李森科的行为也同样是顺理成章的。领袖的指示，能不照办吗？然而只有初看起来，而且还是外人来看，才会得出上述结论。其实，李森科对这种多蘖小麦的所有情况都了解，并且说不定不止一次地思量过此事。他也完全明白，这是不值一提又徒劳无益的事。不值得为其费力劳神。

关于这种小麦，恐怕遗传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小麦研究的遗传学家也应该知道。因为一百多年以来，甚至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也对这种小麦有所提及。应该到图书馆坐上一个月，仔细翻翻资料，再为这个尤物——外表引人注目，而实质上产量低平的小麦品种出具一份确有见识、条理清楚的鉴定书。要知道，H·谢格洛夫早在 1828 年，M·B·斯帕法里耶夫在 1837 年就有过培育这种小麦未获成功的记述。至 19 世纪 50 年代又有 20 余位俄国科学家作过相同的记述。著名的小麦研究权威 A·M·巴扎诺夫教授在《小麦种植及俄国小麦品种概述》（皇家莫斯科大学 1856 年出版）一书中写道：

“……多蘖小麦就象娇生惯养的孩子，除要求土地肥沃，稀疏播种外，它的耐寒能力也很差，并且比其他普通品种小麦更易生黑穗病和锈斑病，尽管这种小麦每支麦穗所产的麦粒较之普通小麦为多，但是如果考虑到大小相同的地块所产麦穗的脱粒总量，就会发现，播种多蘖小麦所获收益并不比普通品种的小麦大。”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期望是没有根据的，而小麦专家应该将这种小麦的有关情况如实地明确地向斯大林说明。

遗传学家可以找到更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小麦，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当然，今天很难因此苛求他们。但是，假如他们对自己的学术对手了解得更多的话，假如他们注意考察后者的自我吹嘘的内容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记起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的父亲的一张陈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 30 年代后期，画面上是李森科的父亲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和另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在一起的情景……他手中拿的麦穗正是那种多蘖小麦品种。就是说，早在穆斯里玛·别吉耶娃之前，李森科一伙已经看中这个小麦品种，对它仔细研究过，如果从中

能搞出什么名堂的话，他们早就会搞出来了。这张照片不是收藏于李森科一家的家庭影集里，而是发表在《社会主义农业报》上。照片下面的题字是：“李森科院士的父亲——《布尔什维克道路》集体农庄（哈尔科夫州卡尔洛夫区）农艺研究实验所主任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李森科在 60 块实验田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谷物和蔬菜。图为杰尼斯•李森科（左）在向农庄主席介绍小麦新品种。这种小麦每穗可结粒 100 个。

萨波日尼科夫摄（苏联图片社发）”

只要有某个遗传学家把这张照片交给小日丹诺夫——苏联遗传学这一学科后来的命运将不知会好多少！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李森科了解多蘖小麦。那是 1940 年，在李森科任总编辑的《春化法》杂志上发表了 O•库珀尔曼的题为《关于秋播小麦、黑麦和大麦的多蘖现象》的文章。文章论述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条件。假如李森科其他什么都不看，那么他自己任总编辑的杂志大概总要过过目吧。其实，有关多蘖小麦的内容经常出现在科学读物上，尼•瓦维洛夫和他的学生们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以至 30 年代时就从事过育种工作的李森科不必特别留意那些发表的学术材料即可知道。或是退一步讲，他也能听说此事。因此，如果李森科真是象大多数人一样，那么纯洁、正直，或者那伯只是良心未泯，他也会对斯大林交办的这件事情予以婉拒。他显然很清楚，当他从斯大林手中接过那包麦种时，他是在进行欺骗。

李森科把使多蘖小麦品种达到规定标准的事交给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A•A•阿瓦基扬，N•A•多尔古申和 N•A•科列斯尼克。他要求他们尽快繁育种籽并对其进行研究、改进，然后在集体农庄广阔无垠的田野上推广播种这种小麦。有关多蘖小麦的工作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李森科的吹捧者之一根纳季•菲施写道：

“……斯大林同志以他那英明的预见力洞察到这种小麦的潜力，并且建议李森科院士着手进行这个品种的研究……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成功地解开了不少多蘖小麦之谜，并且与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这个小麦品种的说法和‘世界文献资料’上的有关论述不同，李森科将这种小麦从小片、小块的实验田和温室引至国营农场的田野。此后，他成功地把这种小麦培育成为人类所知的小麦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所有这些，只有在当今时代才能做到。”

斯大林总共交给李森科 210 克卡赫季亚多蘖小麦麦种。第一年，A•A•阿瓦基扬和李森科的父亲——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将这些种籽照老方法要求的，稀疏地种了下去，收获后，N•A•科列斯尼克带着麦穗回到了家乡乌克兰以便诱惑农庄庄员们。1948 年春，各报都开始大肆宣传这个新品种小麦。记者报道说；这种小麦在罗斯托夫州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和其他一些地方获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与此同时，A•N 多尔古申也“乱点鸳鸯谱”，着手将春播小麦“改造”为秋播小麦。

事情尚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他们就急忙向斯大林报告说；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初步结果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好，并且过不了多久，这种神奇的小麦就将在社会主义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播种开来。当关于这种小麦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吹嘘、赞扬之声就四下而起。李森科本人这样说道；

“……多蘖小麦每公顷的产量可以达到 50 公担、75 公担、10O 公担以至更多。用不了

多久，百倍于种籽的收成对我们来说只不过应该算是平均产量！”

新闻记者 E·马尔比李森科走得更远。他宣称：

“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田里，每公顷的收获量已达 150 公担，甚至是 200 公担。”A·T·菲施在宣称 1948 年 A·A·阿瓦基扬用一茶杯种籽种出的麦子，打了六口袋质地极好的麦粒时赞叹道：“我简直是到了共产主义的田野上了。”

下述一件事并非虚构。有一次，老日丹诺夫当着斯大林的面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表示不赞成，理由是李森科同志目前正在从事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工作。如果他全力以赴专注此事，有可能将全国小麦产量提高五倍，而只要能提高。50％，对于国家来说就已经足矣。因此，应该让他搞下去，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就这样，斯大林周围无一人能驱散这位领袖心头那过于乐观的期待。（或许斯大林对任何人的话也不会听得进去。因为任务是他本人提出的，而宏伟的许诺是针对这一任务作出的。况且，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在他看来最有学问的专家——李森科院士，还有谁能在小麦问题上比他更行！）小日丹诺夫虽然从 A·热布拉克那里了解到只有在稀疏播种的情况下，某些品种的小麦才会分出小穗，而由于这种“间距过于遥远”，多蘖小麦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比普通品种的小麦更好的收成，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在斯大林面前揭穿那位“创新者”。可就在此时，不断膨胀的多蘖小麦热，却使李森科非但得以把批评意见摆脱得干干净净，而且能够将批评者统统都打翻在地。

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据与李森科关系密切的人讲，1948 年 7 月，李森科被召至斯大林处谈话。在和斯大林谈话时，他内心里有一种感觉，斯大林对他态度并不算坏。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一点，他保证尽快改善农业战线的状况，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领导人哪怕能稍稍帮他一下也好，而不要中伤、损害他的名誉。要求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和各种各样对祖国利益漠不关心，而只是时刻不忘看西方的眼色行事的理论家、自作聪、明的人不要再干扰他工作。李森科列举了批评他的人常常提到的几个外国人的名字——魏斯曼、摩尔根、孟德尔，并且坚持重复道，如果放弃米直林学说而像以前那样，将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徒有形式的遗传学基础上，那么国家会遭受巨大损失，如果将对社会主义事业极为有害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科学——徒有形式的遗传学予以取缔，米丘林派学者则会精神振奋，尽快开展自己的工作并全力以赴去提高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李森科汇报说，对转交他的多蘖小麦麦种的研究已获得非常圆满的结果，接着他顺便提出请求批准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斯大林多蘖小麦”。

斯大林认为这样看问题是正确的，李森科的垮台得以避免了，非但如此，他还被授权毫不留情地惩治学术上的对手。斯大林为此取消了已经宣布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院士的选举，代之以由他下令安排李森科所需要的人填补空缺。斯大林还指示召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并且在会上以党的名义宣布禁上遗传学的研究。

1948 年 7 月 28 日，苏联各报都发表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增补 35 名新院士和这个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的消息。在新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当中，唯李森科之命是从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或是与李森科直接一起共事的，如 A·A·阿瓦基扬，H·C·瓦伦强，N·A·多

尔古申，N•H•科列斯尼克，M•A•奥利尚斯基，H•N•普列津特，或是无限效忠于他的N•N•卢基扬年科，H•F•别列尼基等人，以及B•N•布申斯基。在新任命的院士中，还有撰文攻击A•P•热布拉克的N•N•拉普捷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职业军宫，所谓“鞭与棒”特别监狱的负责人C•H•穆罗姆采夫。此人曾亲自挖苦、愚弄被关在他那里的N•O•兹德罗多夫斯基院士和N•A•西尔伯院士。

在全苏发表这条消息后的第三天，李森科在紧急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八月会议）上登台作报告，报告的原稿是经斯大林亲自审阅的。

李森科报告的基本精神，是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关于生物学有阶级性的论断与遗传学的结论水火不相容。报告最突出的一点是武断专横。报告宣布，从现在直至永远，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门学科是有害的。没有列举证据，因为没有必要，只须这一条就足够了。在这篇题为《两个世界——生物学界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报告的中间部分，李森科宣称：“产生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魏斯曼主义和随之出现的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其矛头所向，是反对唯物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在生物学几乎所有学科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完全不同、相互对立的两个学派之间，矛盾显得特别尖锐。毫不夸张地讲，摩尔根的虚弱无力而又形而上学的生物‘科学’，与我们卓有成效的米丘林农业生物学根本无法相比。”

在报告的结束部分，李森科说道：“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发现了伊•弗•米直林，并且使他的学说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由于他们慈父般的关怀，生物学领域卓越的米丘林学说才得以在困境中发展起来。”

第二天8月1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一早，全体与会者乘大轿车来到列宁居住过的高尔克村，他们将亲眼看到李森科的人创下的农业奇迹，全苏联前所未闻的奇迹。这以后的一些天，惯于阿谀奉承的多产文人们大唱颂歌，描绘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仿佛那真是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会议的人们亲眼所见似的。请看B•萨福诺夫在他的《繁荣昌盛的土地》一书中（一年以后，他因此书而获斯大林奖金）是如何写的：

“他们看到了一面墙似地直立着的小麦。每棵麦秆上都长着枝杈形分裂出的一支支麦穗。每支麦穗都有五克重。一小纸包种籽就能打六口袋粮食。这样，每公顷的产量已达100，甚至是 15O 公担。麦田旁边，流淌着帕赫拉河——莫科科郊外的一条普通小河，不远处可以看到一所房子。24年前，列宁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目前，这种小麦的研究工作，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由李森科和他的同事A•A•阿瓦基杨院士和N•H•多尔古申院士共同进行的。当这种小麦不是在实验田，而是在集体农庄的田野上结出果实的时候，莫斯科这一带……所有的州都可以做到粮食自给。……

是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米丘林工作者为这次会议献上了什么样的礼物。”

参观后的第二天，开始讨论李森科的报告。那些新任院士们谈的尤为起劲。

N•B•亚库什金这个在“尼•伊•瓦维洛夫案件”上作伪证的主要人物，对很多科学家进行过诽谤的人，在会上发言认为，美国的杂交玉米是“美国资产阶级种籽商搞的，引为

笑谈的骗人的把戏”。(应当指出，美国人当时对下述情况未作保密——由于用线型叶杂交玉米品种代替普通玉米品种而多收获的粮食其收益折合资金比“曼哈顿计划”——美国制造核武器的计划所耗费的资金还要多)

H•F•别列尼基肯定地说：“不存在任何特别的遗传物质正如不存在燃素——燃烧物质——和热素——热物质一样。”

C•C•佩罗夫也随声附和。他曾因实验做得不科学而多次受到批评。然而，他另有引以为荣的事情：维•米•莫洛托夫曾在他家住过。那以后不久，由于莫洛托夫的帮助，他进入党中央机关工作并成为苏联科学院蛋白质实验室主任，尽管他完全不具备蛋白质方面的知识。佩罗夫慷慨激昂地说道：“只有想以学术上的自我毁灭自取灭亡的科学家才会想出遗传基因象人体内脏、内分泌腺一样，有充分发育的形态学方面的特殊结构这样的概念。请看，……作为染色体一部分白基因具有释放一种不为人所知，又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特性，……这种说法明明是搞非实验性的、形而上学的投机取巧。这样搞对实验科学来说无异于是灾难。”

李森科过去的一名研究生，现任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的F•A•巴巴贾尼扬肯定地说:“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是生物学领域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代表(掌声)，而这种生物学认为，生物规律原则上是不可知的。”

与此同时，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议论接连发表了出来。E•M•乌沙科娃对高等院校继续讲授孟德尔定律，对有人还在介绍魏斯曼、摩尔根和其他遗传学家的著作愤愤不平。她说：“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专家，可是他们正在受着思想上与我们苏维埃社会、与我们的科学与实践精神不相符的教育。在我们的高等院校里一面讲授党史、列宁主义教程，一面却还在讲授遗传学！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是该认真追究责任的时候了!”

C•H•穆罗姆采夫不加掩饰地恫吓科学家们说：“如果孟德尔一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懂得解决生物学面临的课题所必须的创造性立场，不能意识到自己对实践负有的责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不仅是游离于社会主义科学之外，而且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格格不人的了。”

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与以往历次的讨论截然不同。已经当上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教研室主任的尼•瓦•图尔宾说道:“应该肃清研究所中摩尔根一孟德尔主义狂热信徒们的坏影响，清除那些身踞学术高位而实际上却时常做无益的事的人。”在以前，类似这样的话李森科分子也是说得出口的，但那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喧闹和加剧形势激化的一种愿望。而现在，这些话是他们要付诸行动的明确的号召。当局对生物学界的这场辩论亦十分关注，其主要标志是每天各报均以两至三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会议发言。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出任何理由发言反对这种公开嘲弄科学的起哄，好象是不可能的。

A•P•热布拉克（他的发言不断被插话反驳、以至侮辱性言词所打断)，B•M•扎瓦多夫斯基、H•M•茹科夫斯基、瓦•谢•涅姆钦诺夫几位院士和生物学博士约•阿•拉波波特还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在会议上发言捍卫科学。还有两位——C•H•阿利哈尼扬和H•M•波利亚科夫在会上发言对李森科报告的某些部分提出了批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他以自己的发言表明，科学家们是可敬的，他们并不是个个都屈服于高压政策。拉波波特是尼·康·科利佐夫的学生。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并且多次负伤。他由于勇敢过人而深罕众望。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在李森科作完报告后随即要求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安排在 8 月 2 日晚上的讨论会上。

可以说，正是拉波波特首先向李森科的主张展开进攻的，如同他在前线投身战斗一样。李森科分子们面对的是一位年轻的、具有坚强精神力量的战士。拉波波特的头上缠着一条窄窄的纱布绷带，护着那只因伤致瞎的眼睛（他曾 18 次负伤，但一直在前线作战）。他讲话干脆，充满激情。这样的风格，令人对他的讲话既信服又印象深刻。（顺便提一下，在报纸上发表的他的发言记录稿上，他讲话中提法特别尖锐的地方被删去了）

拉波波特在发言一开始就列举了遗传学的成就：认识了基因和突变的本质，弄清了突变节奏加快的方式；判明了病毒的本质并对它们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杂交玉米理论等等。他说，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昌盛而进行的实践中排斥遗传学，这令人感到羞愧。他说："国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应努力掌握。""只有以真理为准、在批评自身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在将来实现祖国对我们的召唤——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拉波波特发言的记录上在此处标有"罕见的掌声"的字样。这足以表明，这位身材削瘦、相貌平平的人对在场听众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从会议总结的记录稿中可以看出，拉波波特发言时始终没有人打断，发言后也没有人起哄。而其他所有鼓起勇气发言为遗传学辩护的人在发言时都免不了被打断或受到起哄。人们都屏住呼吸听他发言，他讲完后甚至还给他鼓掌。

但是随后发言的人——亚美尼亚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 F·A·巴巴贾尼杨开始了对拉波波特诋毁中伤。他认为研究染色体毫无益处，谩骂突变发生（遗传学的一个学术方向，拉波波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过非常出色的研究）。他说所有的突变都必定是有害的，而"用这种方法获取的生物体不是别的，只能是废品、丑八怪"。

巴巴贾尼杨说："须知拉波波特不能在此证明新获得的突变体与他以前所获得的突变体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而与此相反，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两者的本质完全相同。最后，即便真的能获取为数不多的无害的、不致命的突变体，那么谁会需要他们？谁会需要实质上毫无用处的果蝇呢？"

当巴巴贾尼杨如此贬低遗传学的时候，美国的遗传学家在米利斯拉夫·杰麦列茨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获取比抗生素效果高出数十万倍的霉菌突变体的研究工作。在全美数千万公顷的大田里播下了杂交玉米，每垄玉米都是突变型的。此外遗传学家与病毒学家合作，进行了以突变体为基础获取预防诸如脊髓灰白质炎一类病毒性疾病疫苗的研究。亚美尼亚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巴巴贾尼杨表现出一副所有这一切既不会也不可能确有其事的样子。似乎是在说，这些成就不过是那些意欲蒙骗全人类视听的人虚构出来的，是骗人的把戏。

拉波波特在自己座位上发言反驳巴巴贾尼杨。后者无言以对。只好诉诸人身攻击。（尤为甚者，他竟对这位残废军人说，因为他缺少一只眼，所以看不清徒具形式的遗传学的危害性和腐朽本质）现在，请看反映当时辩论情况的记录：

“约·阿·拉波波特：（以下简称拉——译者注）——但是，有益的突变是存在的，并且为数不少。为什么您对此视而不见呢？

F．A．巴巴贾尼杨：（以下简称巴——译者注）——首先，那些有益突变发生于无益的物体之中。（掌声）

拉：——我们有办法治疗肺结核和其他疾病。

巴：——您只是在作许诺。

拉：——而您曾许诺两年内培育出一个品种，可并未实现，也未承认自己的错误。

巴：——拉波波特常说：“我们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我要问您将什么理论运用于实践？您那一套理论就其内在本质来说本身就是反实践的。您的“理论”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实践。不仅如此，它也远不是不偏不倚的……孟德尔分子不仅是已经确立的、经过验证的成就的反对者，而且是所有未来成就的潜在的反对者。（掌声）”

另一位表现出公民的勇气和不愿出卖良心的科学家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瓦·谢·涅姆钦诺夫院长。他是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发言的。那时，会议事实上已经结束，李森科分子已稳操胜券——黑暗势力战胜科学已成定局。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李森科分子听到他们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发言。涅姆钦诺夫说，“染色体遗传理论是人类科学宝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不能同意李森科对孟德尔定律的评价。这个定律显然“不是什么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论。”他表示，他过去支持，现在仍然支持 A·P·热布拉克所进行的出色的研究工作，作为回答，他听到：

“听众席某人：——您应该辞职了。

瓦·谢·涅姆钦诺夫：（以下简称涅——译者注）——看来，我是该辞职了，我不是非占着这个职位不可。（全场哗然）

听众席某人：——这样就不好了。

涅：——但是，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禁止 A·P·热布拉克进行研究工作的咄咄逼人的发言和行为才是不正确的……。

听众席某人：——那么您谈谈，你对李森科的报告持什么态度。

涅：——我是这样看李森科的报告的：报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想是在使农业生物学适应集体农庄生产的需要，并且致力于将他的工作方法运用于集体农庄广阔的田野上，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听众席某人：——那么在理论上呢？

涅：——从理论上看，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对染色体遗传理论的态度是错误

的。”

听到涅姆钦诺夫这样讲，李森科分子开始更加猛烈地打断他的话。但是，涅姆钦诺夫丝毫未改变立场。他在发言结束时说：“我对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执行的路线承担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我认为我推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将继续推行这条路线，并且对其负责。如果日后表明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可以提醒我或者了却今天在这儿有些人说出的期望和心愿——要我让位。在我看来，停止热布拉克教授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工作是不能容忍的。

H·N·普列津特：——是不是指摩尔根性质的研究工作不能停？

瓦·谢·涅姆钦诺夫：——我对此现在和将来都承担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直到不要我负责的一天。”

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涅姆钦诺夫的行为也是勇敢无畏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行政领导人和洞察一切的科学家明白，召开这次会议要干什么，知道他自身也是难保的。但是，对他来说，人的尊严重于职位。要保持自己的名誉清白的责任感使他产生了大无畏的精神力量。（谈到这里要说明一点：N·H·康斯坦丁诺夫，尼·康·科里佐夫，N·H·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瓦·谢·涅姆钦诺夫等人这样的态度反倒最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即便是在最严竣的斯大林时期也是如此。涅姆钦诺夫积极地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心。今天，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9号——瓦·谢·涅姆钦诺夫从1950年起至1964年去世这段时间内曾住过的地方，安置着刻有这位科学家浮雕象的纪念牌）。

在会议发言全部结束时，N·N·普列津特不再斟酌词句，索性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嘲讽起来。他宣称：“用米丘林学说武装起来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家已经粉碎了摩尔根主义”。他断言：“现在在我国，公开的、直言不讳的摩尔根分子已所剩无几。要顽固到今天或许真要有个榆木脑袋才行呢。（掌声）”

普列津特还傲慢地批评自己的老对头N·H·康斯坦丁诺夫。这个院士培育出的与李森科的样版不同的品种几十年来一直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播种。可以说，是他培育的种子为俄罗斯人民提供着口粮。普列津特在谈到舍胡尔金和康斯坦丁诺夫两位育种学家在研究中利用了以遗传学为基础的优选法时，在讲台上放肆地教训道：“是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在当今的米丘林时代，在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系统的有计划的育种时代，旧的选种方法已嫌不够了……康斯坦丁诺夫院士，摩尔根分子企图将我们育种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您的成果窃为己有，这是因为您有一段时间未能与摩尔根主义的伪科学划清界限。康斯坦丁诺夫院士，这种事情您还会遇到，我相信您，您是真正的育种学家。（长时间的掌声）

普列津特继续说道：——很遗憾，摩尔根主义的腐朽影响也渗透到了生物学家以外的人当中……须知，涅姆钦诺夫院士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统计学家。然而，他居然也对摩尔根主义问题有自己的观点。（笑声，掌声）”

涅姆钦诺夫在座位上反驳道：“请问，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呢？”普列津特对此答道：“我不是责怪，而是夸奖您有自己的观点。尽管我要责备您的正是您居然会有那样的观点。（笑声）”

普列津特用同样的口气将 B·M·扎瓦多夫斯基、N·M·茹科夫斯基、H·M·波利亚科夫等人一一指摘了一遍。他对最后一位这样说道："当今的达尔文主义已不是达尔文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而您，波利亚科夫教授，理应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应该比达尔文更聪明。正所谓站在圣人头上的小鸟看得比圣人远。（笑声）"

普列津特此时是踌躇满志。他称遗传学家是顽固分子，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就要惩治他们。他说；"我们将不再与摩尔根分子辩论，（掌声）我们要继续揭露那个有害的、思想上与我们格格不人的、从国外贩来的、实质上是伪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掌声）"

看来，站在遗传学一边的一些人已准备屈从于自己的失败。最可能的原因是 N·H·施马尔豪森院士想与"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划清界限的愿望和 N·N·波利亚科夫的惊慌失措。

不过可以说，很多遗传学家都弄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特别是会议最初的那几天。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李森科分子还接连受挫，就在不久前，小日丹诺夫还公开地批评了李森科。曾向党中央写材料反映李森科反科学的活动并等待审阅结果的两位科学家之一的 B·N·埃夫罗伊姆松，在报上发表未经选举而产生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任院士和该院将召开院务会议的消息的第二天即打电话给联共（布）中央科学处，他对该处女工作人员 B·瓦西里耶娃说道："我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的一切完全属实。"他听到回答说；"难道您认为我们会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吗？"关于这个电话答复的传闻在遗传学家当中迅速传开，鼓舞了他们对于真理终究要占上风的信心。

促使人们怀有这种期待的另一点，是李森科在他的第一个报告里未明确说明他当时得到来自哪一层次的支持。有关李森科的报告事先曾经斯大林过目的情况也未予公布。李森科只是在报告结束语中说道："有人递条子问：党中央对我的报告是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党中央审阅了并且同意了我的报告。"

会议记录稿在这句话后面的注释："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热烈欢呼，全体起立。"（在斯大林下葬的那些天里，某报发表了李森科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科学的泰斗》。该文说道："斯大林……亲自修改了《关于目前生物学状况》报告的草稿，向我详细说明了他所作的修改，并且对某些段落应如何讲述作了指示。斯大林同志亲切地注视着八月会议的成果……"）

不过，直至会议最后一天李森科和他的那些心腹对上述情况都闭口未谈，而企图让遗传学家进行更为坦率的谈话，甚至表白说，他们并不愿象 A·A·阿瓦基杨那样参加辩论。其实，一句"党中央已经同意"再明确不过地向所有的人说明了一切。

会议最后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最终擦亮了遗传学家们的眼睛。这天早上，所有的人都在当天报纸上读到了李森科的主要批评者——尤·安·日丹诺夫（即小日丹诺夫——译者注）致斯大林的忏诲信。他在信中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并决心划清作为一名化学家和哲学家的尤里·日丹诺夫个人的观点与作为联共（布）中央科学处处长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的党性立场之间的界限。他首先承认在宣讲员会议上"作报告一事是错误的"。但他没有放弃对李森科的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他在这封信里对李森科的错误作了阐述：

“我不同意李森科院士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论点（否认物种内部的竞争和互助，对机体内部的特性估计不足），我认为他未能充分利用米丘林学说这一宝贵科学财富（李森科末能培育出任何出众的农作物品种，其原因正在于此），并且对我们的农业科研工作领导不力，在他的领导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的表示，当个人的观点，特别是领导者个人的观点与最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应该放弃个人的观点。他指出，由“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获得的有益作物（养麦、天竺葵、大麻、柑桔）的新品种质地优良，然而未能推广并遭到李森科院士以及拥护他的那些人的抵制。但实际上，小日丹诺夫又尽力阐明，为什么对遗传学家的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应再予重视。

他说：“我显然对自己的责任……估计不足，未能考虑到我的发言会被认为是党中央的正式看法。这是‘书生气’在作怪，在校读书时，在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争论中，我都思考不够，就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有人建议我在宣讲员会议上作报告时，我当即决定讲讲我的看法。这种‘教授式’的作法，无疑不是出于党的立场，是愚蠢的……。

列宁曾多次指出，承认这种或那种现象的必然性孕育着导致客观主义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未能避免这种危险。”

尤·安·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信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的错误根源，在于对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不够，为米丘林学说而斗争的战线部署不当。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和不成熟而造成的。我将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尤里·日丹诺夫。”

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发表这封信，其中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尤·安·日丹诺夫在提及李森科的主要错误时口气已不是那么尖锐。这一次，客观真理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既然尤里·日丹诺夫都顶不住而悔过，对那些小人物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8 月 6 日晚，与 N·M·茹科夫斯基过往甚密的某人得知了即将发表小日丹诺夫致斯大林的信的消息。他随即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转告给 N·M·茹科夫斯基，这个消息又从他那里向更大的范围内传开了。当天夜里，在那些虽然不象拉波波特或涅姆钦诺夫那么坚决，但毕竟在会上发过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遗传学辩护的科学家当中，有两位——N·M·茹科夫斯基和 C·N·阿利哈尼扬出于恐惧，决定紧急声明悔过。

看来这是在强制逼迫下人的灵魂自我泯灭的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全面禁止遗传学

由李森科以党中央的名义宣读的关于今后在生物学研究中，只许有一个学派的决定，使对科学家们的全面迫害得以放手进行。以前被李森科等人名为公开的或潜在的敌对者的人，这次都给戴上魏斯曼分子、摩尔根分子、孟德尔分子的帽子。全国各地最有学识和创造性精神的专家均被召至党的机关或党委会，强令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与以前的观点划清界线。答应这样做的人被逐个送到群众大会（这种会到处都在召开）上接受公众批判。他们被称作科学上的敌人，并且被强迫在李森科那伙人和他们的追随者——那些行为最渺小而嗓门却最

高的“科学上的平庸之辈”的一片恶毒嘲讽、起哄、戏弄声中当众悔过，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拒绝这样做的人则被赶出科研机关。（然而，那些具有声望的专家即便是过了当众检查这一关，也往往照样被赶出科研机关。正所谓挟嫌报复，不择手段）

领导干部的处境最为困难，因为惩治是依职务不同而逐步升级的。如果是普通科研人员性格又随和，那么他受的惊忧比较轻（相对的），而如果是领导干部，那么，无论你是年老多病还是战斗英雄，都要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揪出来。

地方上的审查规模和对人的精神折磨更是比中央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基辅为例，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这里召开了加盟共和国级别的会议，在会上，谢•谢•切特韦里科夫以前的学生 C•M•格尔申宗被强令悔过。他对所有的要求都照办了（承认以前的科研活动是有害的，批判自己的导师，宣布“与徒具形式的遗传学完全划清界线”，并且“坚决站到科学的米丘林学说一边”）。然而 M•A•奥利尚斯基仍揪住他不放，说什么格尔申宗，企图将自己的工作说成是从米丘林到摩尔根各种观点兼有的混合物，这是徒劳的。奥利尚斯基宣称，格尔申宗的全部活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跟在魏斯曼主义后面亦步亦趋”。

党员的处境也十分艰难。按照党的路线的要求，他们必须悔过。大多数党员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承认“错误”。A•P•热布拉克在 8 月 9 日发表了一封信，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指责别人，没有贬责自己，也没有诿过于人。他声明：“……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来自人民的科学家，不愿被人认为是党的背叛者，不愿在科学家们为祖国的昌盛而完成崇高使命的时候被弃之局外。我愿意用季米里亚泽夫和米丘林提出的方法，在国内公认的先进学派内从事研究工作。”

这样的声明自然未能使当时在台上的领导人满意。在热布拉克声明的下面登载了同样篇幅的另一篇声明——《编者按》。按语首先指出：热布拉克提到，似乎党曾对遗传学研究中的两个学派予以认可，这不是事实。本报编辑部声明，党在过去和现在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学派——米丘林学派。《编者按》随后宣布，在热布拉克的信中有五点错误。按语最后说，编辑部已将热布拉克的声明记录在案，而“这一声明是否出于真心实意，还要看热布拉克教授今后的行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编者按》发表以后。等待热布拉克的会是什么。

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也是党员，他的作法与众不同。他来到区党委，将党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放，然后表示要退党，因为在党对骗子和黑势力分子予以支持的情况下，他不能留在党内。当然，拉波波特这样的作法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分受到压力的生物学家，在基层农业科研部门工作的人员在李森科分子面前，只有忍气吞声妥协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是看不清，而是不愿去看清李森科等人主张的反科学性和盲动性。而大多数人则因弄不清争论的具体细节而未能对李森科等人的一套予以明确的抵制。对干那些名为科研人员而实际上不具备应有的知识的人来说，李森科成了他们免受来自真正的科学家批评的最好辩护人。

还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了解形势，也了解李森科的底细、他的策略以及他如何实现这些策略，尽管如此，他们仍决定投向胜利者的阵营。这些人或是出于恐惧，或是想不惜任何手段，包括不光彩的手段谋取政治资本，或是怀有无论如阿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都走上了昧着良心搞阴谋诡计的道路。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吹捧李森科以及他的仆从们的划时代著

作，卖力地寻找自己过去的同事们的错误，对在世界科学领域内声誉斐然的科学家们痛加声讨。他们杜撰出一些说法加在那些著名的俄国生物学家的头上，说什么似乎这些大科学家为李森科学说的出现作了准备，似乎他们早就保佑过李森科。他们还象斯大林时期一度曾有过的那样，尽力证明人类思想上的成就都出自俄国。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述李森科文章的意思，或是照引他的原话，指望以此来免受李森科分子的非难。

在那些年里，科学工作者受到甄别淘汰。李森科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不甘屈从的科学家都遭了厄运——他们被赶离工作岗位，致使有人患脑血栓，有人自杀。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即是一例。多年来，他一直与李森科主义进行忘我的斗争以致最终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下放到克里米亚工作。由于不堪忍受中伤和陷害，萨比宁于1951 年 4 月 22 日开枪自杀身亡。

如果说对未能完全认清形势和自己在科研事业与学术争论中作用的政工人员、正统哲学家、一般的专家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对那些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内心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然而却出卖自己尊严的科学家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H·N·努日京教授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写正统遗传学的，后来他猛然意识到应该将论文改写以投李森科所好。此后，努日京一直效力于李森科，并且受到他的赏识。作为报偿，李森科让努日京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只是由于弗·亚·恩格尔哈特和伊·叶·塔姆②和其他院士的原则性立场，努日京才未能象特·杰·李森科及其庇护人尼·谢·赫鲁晓夫很多年来一直希望的那样，晋升为院士。

对于那些“改变观点”转而与李森科分子合作的人未必都可以用形势所迫来解释。有的人如此进人角色，以至后来到了 5O 年代仍继续贬斥遗传学，甚至与遗传学无关的研究工作也被牵连进去。（例如，M·E·洛巴绍夫在 1954 年出版的《俄国畜牧史纲要》一书中，A·E·盖西诺维奇在编纂伊·伊·梅契尼科夫的《生物学文选》（1950 年出版）时都曾这样做过）当然，普遍的、常见的是意志薄弱和胆怯。而只要有哪怕是一次怯懦退让，你也就失去了对事情进程的实际影响。只图一时的名利，会导致未来的失败。每次的怯懦行为又会在周围人当中引起反响，促使他们也做出类似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杰出的遗传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所表现的无所畏惧的态度和不做任何愧对良心的事情的行为令人格外起敬。在高尔基市，大学校长 A·H·梅利尼琴科将遗传学教研室主任谢·谢·切特韦里科夫找来，要他悔过。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宁可被迫放弃研究工作也不愿悔过。C·H·阿尔达什尼科夫、B·B·萨哈罗夫、B·E·亚历山德罗夫都因不愿悔过而被停职。还有一些科学家由于不屈服于强制压迫，没有卑躬屈膝而被放逐到外地。他们是：E·N·格伦博茨基、H·H·索科洛夫和 B·H·西多罗夫（这几位被下放到位于远东地区的雅库特）、M·N·卡姆希洛夫（被逐放至位于白海的达里尼耶泽连齐）、E·N·瓦辛和 B·H·瓦辛（被下放到萨哈林）、J·R 克尔基斯（他成了中亚地区某国营牧羊场场长）、P·B·黑辛（他改了行，到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考纳斯市工作去了）。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刚刚结束，苏联高教部部长 C·B·卡夫塔诺夫随即于 1948年 8 月 23 日签署了第 1213 号命令，撤去了瓦·谢·涅姆钦诺夫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院长职务。他的职务由 B·H·斯托列托夫接替。A·P·热布拉克被停职，他的实验室道关闭。N·H·康斯坦丁诺夫在 H·N·利西岑于 1948 年 2 月 20 日去世后曾受聘出任田间作物

选种与育种教研室主任（同时继续保留实验方法教研室的工作），此时也被免去这个教研室的领导职务。他的这一职务由李森科兼任。这样。李森科的手就伸进了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这又一次表明，他不会放弃利用任何机会去占踞他人在教研室、研究所，以至科学院里的位置。

大规模的免职风潮也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很多农业、医学、教育、林业、食品等行业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中漫延。全国约有三千名生物学家被开除或免职。这场对科学事业的野蛮迫害有如一场真正的瘟疫。曾被举世公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出色典范的俄罗斯遗传学不复存在了，整个生物学也笼罩在茫茫黑夜中。

1948 年 9 月 2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特·杰·李森科 50 岁诞辰之际，为嘉奖他“在发展先进科学和在农业领域卓有成果的实践中取得的杰出功绩”，又一次授予他列宁勋章，苏联部长会议也同时决定，以特·杰·李森科的名字命名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在有斯大林本人在场的场合所做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报告中说道：

“关于生物学的学术讨论是在我们党的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从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场讨论为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在当年，谁也不知道，黑暗势力的荒唐行为还要持续多久，能否等得到真正的科学胜利凯旋的那一天。一些眼光敏锐的科学家认为，这场荒唐闹剧的结束和它的后果的消除要在数十年以后。他们的预言与事实相差无几。李森科等人横行无忌的痕迹至今依然可见，并且可以明显地感到，在生物学领导人中间，新的李森科分子已经滋生出来。

就这样，苏联失去了曾一度倍受尊敬的、引为荣耀的地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次会议后不过五年，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和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双倍螺旋脱氧核糖核酸。这一发现开创了分子遗传学的时代。可早在 20 多年前，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苏维埃俄国，尼·康·科利佐夫曾预言：“遗传分子应具有双倍结构”。难道不应该接过科利佐夫的接力棒，为他的学派创造良好的条件！可是没有。尼·康·科利佐夫本人就受到陷害，骂他是法西斯分子、黑势力分子，多次欲将他关进监狱，把他的学派消灭掉，使其无法萌芽，使人不再效仿。正是在苏维埃俄国，而不是在西方，谢·谢·切特韦里科夫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学科——群体遗传学。这一学科在当今生态危机时代，其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可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后随即被赶离莫斯科，受到人身侮辱和诋毁。当他双目失明，孤立无援，在高尔基市渐渐死去，在国内被人遗忘的时候，眨方却授予他金奖，将他的文章译成英文出版，收集他的画象。

此外，F·A·纳德松和 F·C·菲利波夫发现辐射诱变发生，M·H·迈塞尔发现化学诱变发生是在苏维埃俄国，C·F·列维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遗传医学研究所也是在苏维埃俄国。然而，列维特在狱中被枪毙，研究所被关闭，所有科研人员都被遣散，研究所的治学精神被破坏殆尽。列维特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C·H·阿尔达什尼科夫曾数年无事可于而荒废时光，最终也未能找到与他本专业相适应的工作。约·阿·拉波波特是世界上第一位就化学诱变发生做广泛实验的科学家。但是，登有他的具有领先水平文章的书籍在 1948 年被勒令焚毁，并且真的烧掉了！这以后不久，曾与李森科等人做过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战士——

B • N • 埃夫罗伊姆松一生中第二次被押解驱逐至外地。

我们的国家此后经历了多方面的磨难：在遗传学、育种学、医治遗传疾病、工业化生产抗生素等方面都落后了。最可惜的是，在一个具有经济、军事意义的首要领域生物工程里，完全失去了同西方竞争的能力。苏联落到了发展道路的边上。在这条道路上，过去在遗传学有关遗传的特性和结构的研究方面甚至联想也不敢想同俄国进行较量的那些国家也已经大大跑到前面去了。后来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格尔曼 • 梅勒普特地跑到俄国来生活，并和伟大的瓦维洛夫并肩从事研究工作。

李森科、普列津特一伙的堕落以惊人的速度萌芽，在适当的温度、雨露的滋润中发育成长，无孔不人地侵蚀国家的机体。在这片肥沃的土壤里，果实成熟了，而这是一枚苦果。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 1988 年第 1 和 2 期。秋实译）

枪声

N • 列平

德米特里 • 阿纳托利耶维奇 • 萨比宁——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决定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但却不能把他的命运从科学史上一笔勾销。

当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离开人世时，他身边通常是没有见证人的。人们永远无从得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又感觉到了什么。要是简短的、在仓猝中写下的三言两语的笔记或恰恰相反——一封用坚定自信的笔迹写下的信札都解释不了任何事情的话……

德米特里 • 阿纳托利耶维奇连一份笔记、一封书信都没有留下来。而 1951 年 4 月 22 日从格连吉克市附近的戈卢巴亚海湾岸边一座小屋里传出的枪声却在众多热爱德米特里的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人都不能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只能猜测。我在思索，反反复复地思索，思绪一直延伸到那个为了科学真理而斗争的遥远的年代。更准确地说，那是个为自身的平安而斗争的年代。当时，不仅持不同意见的科学流派遭到摧毁，所有不赞同官方肯定的学说的人都要遭到从肉体乃至精神的消灭。那是一种臆想出来的、毫无道理的荒诞学说，科学所具有的神奇有力的想象力与之毫不相干。这只是浅俗的伪科学，除此而外李森科的伪理论还能有什么东西呢……

因此，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人们不能不想一想：有人在整整十年间能够仅靠一些许诺就过着小康的日子，得到高官、奖赏和荣誉；作为交换条件的是空话连篇，自我吹嘘，并且在阴沉着脸的国家首脑眼前制造出一派令人惊诧、晔晔生辉的光明前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产生这种情形？自中世纪的炼金术时代始，科学史上尚无此种先例。炼金士毕竟还做了点好事：他们在寻找矿石的过程中创造了化学上的若干发明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化学科学。李森科却在掠夺科学，无论在直接的意义上还是在转义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而且正是为此他得到了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以及七枚列宁勋章！

然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现代杰出的科学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法兰西生物化学科学学会会员、德国植物学学会会员——却从未得到过国家级的奖章。

两者的生活道路也是迥异的。李森科，虽早已不工作，却自然老死于他所捞取的特权与荣誉之中。萨比宁，满怀毫无希望的思想，在创造力的高峰，在头脑清晰、记忆敏捷的盛年却抛下家人，用那遥远的、四月里的枪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何以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李森科曾经轻轻巧巧地把他从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撸下来。后来又撸了他一次，没有亲自出马，是假人之手干的。他们强迫萨比宁放弃莫斯科，抛下家庭，不过这回还保留了萨比宁的自由：他没被流放，也没有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遭到拷问，亲友也未受到骚扰。同时他还有工作的机会，他就工作——突然，发生了自杀，春天里的一声霹雳……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威胁他生命的因素。

然而，对他来说生命已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可为什么……

任何人都能够一眼判定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有着异乎寻常的科学天才和能力，青年时代就善于独立思考。这一切赋予他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有一对明亮的蔚蓝色眼睛。有一次他微微眯起双眼，含笑说道："不正确的但却是独创的东西往往比正确的但却缺乏独创的东西更有价值。"这句话自然常常使他的谈话对手大大发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不论萨比宁从事什么工作，他的每一项研究都必不可免地服务于经济实践。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为之献身的主要事业是植物的矿物质营养学。这一课题即使在当代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仍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萨比宁着手这项研究时，这个课题还完全是个谜。

他走着自己的路并把前进中发现的一切及时地贡献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成了那些只靠空话过活的人的眼中钉，这些人拿不出任何东西来。

大学生们忘我地热爱萨比宁。对他们来说，萨比宁既可亲又可近。他曾毫不拘礼地向别人借钱吃午饭；喜欢同快活的学生们一起去远足。有一回，在去克里米亚进行夏季实习时，几个年轻同事花光了钱。萨比宁就用自己的钱接济了他们几乎一个月。他所热爱的植物世界对他来讲并非整个宇宙：每夜在他头顶上空闪烁的群星吸引着他。深夜里，登上学院的屋顶，他能够连续几个小时地讲述生命和世界的萌芽，讲述星座；他怀着那样的一种自信遨游于密密的星座之间，就象漫步在地球上夏日的密林之中。听他阔论的人往往也都乐此不疲。

不过，大家当然还是最爱听萨比宁讲课。他的一个学生回忆道："听过他的课以后总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象是迎来了一个什么节日……"他在专业方面造诣极深，才思敏锐，反应极快——对于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他能迅速做出答复。他阐述自己的课目时带着挚爱、迷恋和深刻的领悟，他有着一种惊人的深入浅出地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以至于听众席间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掌声。

其实，还不仅止于在讲坛上。

不是所有的人在那个时代都能够勇敢无畏地面对李森科的。谁都知道：任何一句反对李森科的话都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萨比宁却毫无畏惧地与之斗争：怎样想的就怎样说。这里有个例子，是他多次发言中的一次；“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工作中有许多新东西，也不乏有益的东西。但是那些新的毫无益处，而有益处的却毫无新意。”

当然，一般说来萨比宁的确是李森科强有力的挑战者。不仅因为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论敌，还因为他向李森科表明了自己激烈公开的反对态度；他还时时转而反击，有时（那怕时间很短）甚至把李森科的追随者吸弓怪咱己一边。这样的事确曾发生过。对于苏联生物学界冒名的领袖来说他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若论对萨比宁的一般态度，李森科会这样大概其地说：“是他说的？让他说去吧！”战前，使李森科更为不安的是科学院院士尼·伊·瓦维洛夫和尼·康·科利佐夫。——他一直捍卫自己忠于斯大林的立场，以示与这两人划清界限——他们对李森科来说才是主要危险。归根结底，正是这两个人体现了遗传学以及李森科所仇视的魏斯曼主义—孟德尔主义一摩尔根主义。而萨比宁按自己直接的专业来说并不是遗传学家（尽管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遗传学家他将毫无疑问地永垂青史）。但李森科并不就此而放过他，李森科什么都不会忘记，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不是这种人。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也不是那种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眼见自己阻止无耻之尤的发明者和恶棍的努力落空时，当他感觉到不断增强的致命危险时他会终于屈服以至沉默。不，他不是这种人。

萨比宁在科学上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是重大的。最为主要的是：他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地测量了植物的根部压力。他通过玉米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所从事研究的现象是极有意思的，且从未有人研究过。

他是世界上做到这点的第一人，时间是 20 年代。而目前我们已经能从教科书里读到这些了。这是真正伟大的发现，现在已为全世界所知。

萨比宁的另一发现是他完成了（植物）根部在有矿物质参与的条件下的吸收理论。

当然，他在 40 年代还进行过另一项伟大的研究——影响植物生长及其发育的诸因素。

在下列方面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实验室里第一次通过实验表明，在所有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因素当中最主要的是核酸，即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组成成分。因此，萨比宁学派证实了：植物的生长发育与核酸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森科不懂得这个，也不可能懂得。即便是他有心弄懂都不可能——所以他便不接受这一切。须知对他来说萨比宁的研究成果发出一种不可容忍的、令人难堪的遗传学味道！

那么，从当代科学立场上来看，事实究竟如何呢？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首先揭示了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在地球上整个生物界——从病毒到人——的生命过程中的作用，其中当然也包括植物！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其科学的洞察力令人叫绝。科利佐夫预言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中的双螺旋线；萨比宁则预见到了它在植物命运中的生命作用。

这就是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他们把我国当时的科学领到了世界前列

并为其辟出一条光明的坦途。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偏偏不喜欢这条道路：对他来说这太复杂、太不可知了，更何况有一股子野蛮的西方腐朽科学的味道……他本人的理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即使是中小学生也容易了解它……哟，这才是我们的科学；而那个——是别人的。科学无国界？这算怎么回事？对不起，请便吧。

我记得，4O 年代末我所在的十年制学校里开设了植物学这门课——当然是按苏联生物学界的领袖、伟大农学家设想的那样。一位女教师激奋地抨击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她冷嘲热讽地讪笑着，攻击着种内竞争的学说；她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激动地讲述了李森科的物种“蜕变”论。时至今日，我的耳畔还回响着女教师低沉悦耳的声音：“植物能有什么竞争？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创出一些树根（她正是这么说的：‘刨出’。意思是说，这是李森科本人干的），它们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帮助！可那些魏斯曼们、摩尔根们（她把他们全都混为一谈！）却在说什么竞争！”

提到物种蜕变，女教师一本正经地宣称：小麦能够变成亚麻，燕麦能够变成燕麦草，松树能够变成枞树，而可爱的小柳莺假如给它们的小宝宝喂食毛毛虫——它们就会长成布谷鸟！她一边说还一边时不时地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话。一切都那么简单明了，怎么这些反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教授、院士们偏偏就不明白？！

而我们，怀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的虔诚一边用心听讲，一边也对此感到惊奇……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曾经两次被李森科们赶出莫斯科大学的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从 1932 年起他就是这个教研室的领导人）：第一次发生在 1937 年，一年后他又重返教研室；后来一次发生在 1948 年秋天。在一次大会上强迫大学生和最后一批不知为什么幸免于难的教师放弃反李森科的观点。怎么办？有人屈服了，忏悔了。谁都知道，那些坚持原则的人 1937 年都被打发到哪儿去了。而萨比宁却果断宣布——以他特有的明快直爽——他不打算做任何类似的举动。他怎能放弃自己终生奉行的科学观点呢！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之后，大学生们凑钱买了鲜花，当场献给了他们的导师。

1948 年初，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生物遗传学家来说，摧毁性的风暴尚无预兆。他们所存无几且其中多数业已退出了斗争。只有对那些最勇敢、最无畏的人来说斗争尚显得有意义，有希望。这其中就有萨比宁，他们单枪匹马地坚持斗争，使得人们既为他们担惊受怕又叹赏他们，一次，一位女大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找到德米特里，噙着泪水恳求德米特里多加小心：“您干什么呀，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您这是毁自己、毁您一家人……”德米特里只是忧郁地摊开双手做答。我想，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做了最坏的打算。

的确，1948 年起初并没有新的灾难的预兆。对李森科学说的斗争意想不到地增添了年轻的生力军。苏共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当时只有 28 岁）在一次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的观点，弄得李森科不得不以一连串的保证和致斯大林的一封信来回答他。这封信写得深思熟虑，就本身而言颇有说服力，可实际上却是孤注一掷的：李森科明白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那些关于物种蜕变和自生的荒诞理论给他自己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他曾向国家许诺提供的粮食仍旧长在辉煌的未来；他的（顺便说说——根本不是他的）多率小麦分枝了，却极不稳定。异常软弱，无法叫人指望丰收。

农科界独裁者的宝座动摇了，有些地方，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悄悄地把李森科的大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借口粉刷墙壁。但又不急着去修理，照片自然无法挂回原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接着就是 1948 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上完成了对苏联遗传学处心积虑、组织周密的摧毁。我国生物学的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读数：时光的车轮仿佛倒转回去，回到了蒙昧主义时代，回到了到处追捕女妖的时代。获奖的恶棍的大照片重新出现在老地方。可会议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新的灾难！除了那些一手炮制灾难的家伙。

杰出的苏联植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彼·米·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发言中书生气十足地为遗传学辩护，并以同样的书生气批评了到会的李森科。于是，第二天发生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情形：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请求发言。他不知怎么非常含混地开始了这次发言，他说一夜未睡，想了又想，现在终于得出结论：李森科是正确的。现在，他——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将以自己的全部余生为米丘林学说忠实服务。

又过了一天，已近傍晚。在学者之家的走廊里茹科夫斯基与萨比宁相遇。院士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伸出手迎上前去。萨比宁止步驻足，把双手背到身后："对不起，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您昨天发言表示悔过放弃了科学的生物学，在这之后我不能向您伸出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列·伊·克拉索夫斯基生物学副博士告诉我："就凭这一句警句，加上那么明显的姿态，——在那样黑云压顶的日子里——就该给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树一座纪念碑！"

我做点自己的补充。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本人多亏李森科及其食客们的警觉的关照，必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区住满遣送的期限。而我们这些当时的小学生及出色的植物课女教师则在为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又一次胜利而兴高采烈。

这次可耻的会议以后李森科彻底放手干了。从报刊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将近三千名遗传学家一下子被清洗出科学界，这都是些优秀的人杰。果蝇也未能幸免：作为罪大恶极的种族全体都被消除了。以至于六年之后不得不用外汇去法

国购买这些苍蝇。不过这又有什么？这些外国钱我们还能派什么用场呢……

有一个时期萨比宁失业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其著作在国外常被人引为经典，却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

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是萨比宁的学生，恰恰也是那一年被免职的。他对我讲述了他与萨比宁最后的两次会面。1948 年 10 月，他们曾邂逅于地铁的列宁图书馆站台。当时两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地方急着要去。萨比宁没有带那个平日里装满书籍的普通背囊，哪儿都不急着去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奇怪……

随便聊了一会儿。萨比宁突然说："现在的生物学界真是个有趣的时代——一切更有分量的东西部沉下底层，而分量轻的却浮上表面……"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笑的力量……老师继续说："但是摩尔根主义者和孟德尔主义者里也有些人，他们甚至在死刑的威胁下也没

法指出摩尔根与孟德尔的区别……”说这话时他带着笑容，可两人都已没了笑的兴致。

1949 年初，他们在莫斯科一所古老的房屋中作客，再一次不期而遇。当时萨比宁已经在格连吉克工作，这还得谢谢伊·德·帕帕宁，是他帮忙安排的；克拉索夫斯基则被命运抛到了北乌拉尔禁伐区。两人都精神饱满，竭力想让对方了解自己在自然的怀抱中生活得多么好。萨比宁令人迷醉地描述了藻类植物，那时他只能摆弄它们，他还顺口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压低了嗓门，时不时地侧耳听听动静。克拉索夫斯基知道，他本人以及这间房屋内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掩藏内心的恐惧。

天色暗下来。拉满了窗帘。这时才开亮了电灯，简直象战时防空袭一样。大门上传来一记敲门的声响，大家都一抖，闭住了嘴。

“是找邻居的。”——过了好一会儿女主人说。大伙儿这才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萨比宁不止一次动员克拉索夫斯基去格连吉克，去他那儿工作。他恳求克拉索夫斯基考虑考虑，但后者犹豫不决，心想：急什么，还有时间呢。可时间已经没有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导师。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不止一次从格连吉克来莫斯科。不仅为了探家，他试图找到工作。有人当面向他保证：“是的，是的，当然……”可过后又拒绝了他。大概他在那一时期体会到一种被困在抽去空气的玻璃罩下的感觉。无论如何他总是感到自己被人剥夺了唯一所热爱的事业，他只为此而生存，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到最后一息。

又一次新的打击：出版社原计划出版萨比宁的《植物营养的生物物理学原理》一书（这是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之一）。此时却宣布中止与生物学博士德·阿·萨比宁的合同。书已经排版了，眼看就可面世，突然来了这么一下……

铅版被拆散了。

对科学的强奸以突击的步伐进展着。遗传学基础本身被摧毁了。它的根基早已被清除，现在则是清除它的培养基。伟大的农学家及其追随者的新理论象不孕的花一样地勃发起来，这伙人轻松地、不知廉耻地击溃了路易·巴斯德和鲁道夫·微尔和的公设。列别申斯卡娅老太婆在水杯中“凭空”取得了细菌；机灵的伯什扬巧妙地从结晶物质中分离出了病毒——从非生命物质中分离出生命物质！这就是科学上的“杰作”……

萨比宁不能无动于衷地面对这一切，眼睁睁地看着科学遭到亵渎，变得日益贫乏。他简直无法忍受。

1951 年。整个冬天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是在为寻找工作进行的无结果的奔波中度过的。他已不能继续留在格连吉克——他同伊·德·帕帕宁的关系中有了某种裂痕，而格连吉克的科研所恰在帕帕宁的管辖之下。可是他仍是无处可去，不得不回格连吉克。返途是沉重的……

在火车站他默默地拥抱住儿子康斯坦丁，然后走进车厢。突然，他在踏板上停住了脚步，

回过身来病态地、绝望地挥了一下手。康斯坦丁想跳上踏板，可是列车的缓冲器哐当一响，启动了。不知为什么康斯坦丁的内心深处揪得紧紧的……

我感到我看见了这列遥远的列车，车上载着一位不知该去哪里的孤独的人，善良的蓝眼睛中满含着忧郁的神色。还看得见他的儿子，他站在空无一人的月台上目送着远去的列车。

灾难的预感攫住了他……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 6 月 18 日。陈明至译）

比任何传说更光彩照人

——火箭专家科罗廖夫案件

玛丽雅·帕斯图霍娃

[原编者按]20 世纪将作为宇宙时代的开端而进入人类史册。虽然它或许会被另一个，我们甚至暂时还不能预料的时代所取而代之，但每一代人都将怀着不可掩抑的惊奇感回首那最先发生的事件，回首那些事件的筹划者和参加者。1957 年 10 月 4 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打下了烙印。而在众多“宇宙远方”的人物中，首先并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他的生活、科学思维和创造性的洞察力，都象灯塔一样指引着不仅创业的一代人，而且使所有思考和探索的人在寻找“自我”冲更加坚强。象科罗廖夫这样的、影响着科学进程，甚至影响着整个文明的人们的命运的人，大都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联系，而这一个性又必然超越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兴衰首先表现于站在前列的人们的命运之中。每一位研究科罗廖夫生涯的人，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预见的潜能，都将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我们也不拒绝作者有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力，更何况他代表着积极把握前辈奠定的当今世界的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一代。

我们似乎了解科罗廖夫的一切。出过关于他的书，拍过关于他的电影。而究竟是……

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惯于雕饰的现象仍充斥于杰出人物的生活描述体裁里，在有关科罗廖夫的文献中，这弊端也是不胜枚举。雕饰品是索然无昧的，科罗廖夫其人才引人入胜，因此，我不敢奢望淋漓尽致地表现他的个性，只是试图借助于有关文献和见证人提供的材料来澄清其生平中最“模糊”的地方，探索这些问题引发的一切。

这里有一篇英国《太空飞行》杂志上的文章《科罗廖夫、赫鲁晓夫和人造卫星》，它的作者是詹姆斯·伊·奥贝尔克，1977 年优秀历史短评比赛的获胜者。在这篇政论中作出了不带成见地弄清科罗廖夫这一非凡人物的尝试。

“苏联传记作家称作‘学徒’的第一阶段，在苏联历史的官方记载中写得很清楚”——詹姆斯·伊·奥贝尔克写道，并列举了“科罗廖夫在乌克兰的生活，在莫斯科图波列夫指导

下的宇宙航行学的学习，最初几次驾驶滑翔机的飞行已成定论。30 年代初，刚好是他 30 岁的前夕，他步入了与火箭运动研究小组齐名的火箭设计师小组。他在工程师灿德尔领导下工作并造访了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后者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并从那里得到了对自己进行宇宙研究的祝福。”

文章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直到 1938 年之前，这些传记作家的描写都是十分翔实的，但是以后的 15 年，当这些优秀人物被加以‘选育’或者被隔离起来时，传记中就出现了真假难辨或者干脆是万马齐音的时期。”

我们对于谢·巴·科罗廖夫生活的这一时期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呢？

“1938 年——1947 年

各个地区都在建设工厂，制作新型的战斗机、强击机、轰炸机。谢·巴·科罗廖夫于 1938 年 6 月在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担任总设计师的一个工厂里开始工作。”

我们面前有一张他亲手填写的履历表，“……1938——1942 年——任实验设计室设计师，……1942——1945 年——任实验设计室副总设计师”——这些，我们可以在阿列克谢。罗蒙诺夫所着《一个宇宙飞船设计师》一书 1976 年第四版的增补版中看到。

《宇宙飞行，杂志中文章的作者也坚持认为:“在 1937 年……红军队伍中发生了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所有同事都遭逮捕并在以后被处决。受他支持的一些研究小组自然受到了怀疑。……科罗廖夫在 31 岁时同其他人一起被捕。他与赞成他火箭研制计划的留哈切夫斯基之间的关系是注定要追究的……科罗廖夫消失在吞噬了几千万俄罗斯人的劳改营系统中”。

究竟谁是对的？我们还是看看文件材料吧。

“1938 年 6 月 27 日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罪名是他们在审讯中告诉我的：我参加了一个反苏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我被指控在新技术领城中进行破坏。证据是我工作过的科研所所长同志由于格卢什科、郎格马克、H．T．克列伊梅诺夫和其他人的口供，同年秋季我被最高法院最高审判庭判处 10 年监禁。

1939 年这一判决被取消，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判决，……判处我在劳改营中监禁 8 年。

此后我在飞机制造厂安全委员会担任设计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局系统的新技术工程总工程师”。

这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亲手写下的，就是说从 1938 年起，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图波列夫身边工作了。是什么促使写回忆录的人写出了这种明显的不实之词而且还好象是在科罗廖夫本人帮助下写成的呢？在平反后又将定过的罪公诸于官方文件中——这是谢·巴·科罗廖夫的权力。但是传记作者是否有权如法炮制强加在科罗廖夫身上的事实呢？

那么 1938 年 6 月是怎么一回事呢？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原国家委员会主席格莫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秋林中将讲叙道：

——在一些因公出差的时候我与他推心置腹地谈过许多(在到宇宙飞船发射场之前的飞行持续了约 8—9 个小时人在那里我得知了他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当因有人告密而把瓦·彼·格卢什科逮捕并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时，谢·巴·科罗廖夫当众声明，他不能相信格卢什科是人民的敌人，这绝不可能。这样没过几天他本人也被抓起来了。

“在审讯我的案子时，我什么也无法证实和解释清楚，因为审讯是在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形式和情况下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真正的审判。

我被指控在那时工作过的新技术领域里进行破坏，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荒诞、更难以置信的指控，因为在新技术领域里的工作永远是我生活的目的和热爱的事业”——引自上述谢·巴·科罗廖夫对平反所作出的声明。

——此后在科雷马河他当过挖土工人，待遇随之大变，他的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格·亚·秋林接下去说，——坏血病的结果使他一半的牙齿都没了——许多年后他给我看了后嵌上的一圈用白铁罐头皮做的假牙，他说话时微微翕动的嘴唇象“啜饮”时的样子，科罗寥夫本来是不该落到这步境地的。

——在谢·巴·科罗寥夫被派往科雷马之前，他在单身牢房里坐了差不多两年，他对我这样说过——谢·巴·科罗寥夫的遗孀尼娜·伊万诺芙娜解释说。

——尼娜·伊万诺芙娜，关于那些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寥夫对您讲过什么吗？

——很少，我也不多问，我知道当时不仅是他一个人在受罪，不想使他再度受惊。当他一回想起那些年月，总是非常不安。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当通知他到科雷马并把他带到码头上时，他们来迟了，最后一艘汽船已经开走了。只好等下个航班。后来他听说那条船沉没了……。谢·巴·科罗寥夫经常说，“在科雷马挖的是金子”。他多次重复说：“我们应该去那些地方，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可没有来得及。我真想使他忘记那些年的事情，别再让他因之受折磨，希望他多放眼未来。

但是，当他生病或我们休养时（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索契我们去剧院看演出），这些事情似乎还在继续困扰他，他常常说：“我应该把那段时间记下来”。我看到他十分激动便极力把他的思绪转移，我对他说：“别人已经写过了……”，“瞧你说的，那些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他反驳道。

关于这个时期科罗廖夫并没有写下什么。囚禁岁月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有什么感受，有什么磨难呢？

唉，要找到答案真是不简单。在那本英国杂志中的确也说：“在这段生涯中，通过俄国特别监狱认识这段历史的俄国工程师把它描写成‘无耻和悲观者’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最喜爱说的口头禅是‘我们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此谁又能证明或是驳倒呢？

——我担心，已经没有人能讲叙这一切了，因为见证人越来越少——科学院院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科罗廖夫的副手及后来的继承者、总工程师说道。——可能叶格尔教授能讲，因为他同科罗廖夫共用监狱里的一个床位——从我的窗子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监狱，他们在那里和图波列夫在囚禁状态下工作。如今整个这条街叫做图波列夫沿岸街，就是这样……但是叶格尔教授不久前去世了。

——然而您不是在他获释后几乎立刻就与他相识了吗，他那个时候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我同谢·巴·科罗廖夫相识大约是在他获释一年后的 1945 年的 11 月，在柏林，我们是作为考察德国导弹技术的国家委员会成员被派往那里的。那时他 38 岁。在我们见面前我就听说过他。当时我在布拉格，从柏林打电话给我说，科罗廖夫希望我们一行易地柏林。并说科罗廖夫是一个果断的人，想做什么就非做到不可。并简短地评价说，他在火箭方面不是生手，是火箭运动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火箭科学研究所的发起者及领导人之一，说他也没有免于我们许多同志所经历的一切。我明白这说的是关于“37 年的事”。过后当我见到谢·巴·科罗廖夫时，他精力充沛，显得很有朝气，尽管他经历了沉重的磨难。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在于他作为一位设计师在导弹技术上的博学多识。

——科罗廖夫谈过他遭监禁的那些年吗？

——当然没有，他们被禁止在出狱或解除劳改后散布任何消息，可不知是否让他们写了保证书或者其他什么，但这。些大家是知道的，也理解他们的沉默。

况且在德国也顾不上交谈。我们忙于完成担负的任务，此外，我们的思绪还萦绕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上。

——那么，很久以后，你们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并且相互取得了信任，您有没有详细问过他呢？

——没有。您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和那种形势。您读过《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吗？就是写的我们。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上过学，经常有学生从班级中消失。今天你还与他坐在一起听课，明天他就不见了。而且谁也不会提出问题，提问题是在另一个地方（指监狱——译者注）。这样我们就被教会不提问题了。况且提问题有什么用呢？甚至不用知道事实也很清楚：是哪儿来的人，带走了什么。是工作挽救了科罗廖夫。看来，战争之前在开始逮捕的关头，他的小组已接近于从科研和实践的角度解决导弹技术领域里的任务，这件事关系到他的生命。在囚禁的年月里，他未必可能在此领域取得进展，他当时是与航空专家一道工作。你看现在在柏林，科罗廖夫一旦钻到自己的课题里，便象完全进人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时使我感到他是那么朝气蓬勃和精力充沛，——米申继续叙说着——思绪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并把那一个科罗廖夫同“我们的谢·巴·科罗廖夫”——同晚年的科罗廖夫相比，我只是现在才明白，1945 年秋我们见到的是怎样一位饱经磨难的人。

是的，关于谢·巴·科罗廖夫这段生活的完整情况，暂时我还尚未得到。看来詹姆斯·伊·奥贝尔克掌握的事实要广泛的多。

现在，在改革与公开性的时代，假如做出一副正是我们、正是现在什么都一目了然的样子是不公正的。不，还是有人（也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象我们和您现在这样发现过问题、气愤过，在那时对此并不是都缄口不言。有时被扣上了“背叛者”的帽子。光扣帽子是最好的情形了。

现在这些“背叛者”、“反对派分子”被公认为是进步人士。那么请允许我强调一点，那些杰出的思想，今天我们才省悟过来的东西，那些在日益增长的公开性下得出的结论从来并且理当属于他们这样“另一代”的人。

可能在 30 年代，忙于自己专业的科罗廖夫没有细致地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实质。我想，他未必意识到了他所遭罹的那场灾难有多大规模……（当众发言，对把他的同志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反驳——这不仅是一个正派人及学者的举动，也证实了他对国家正义的光明理想所持的信心），他是否彻底认识到了在科雷马，在 156 号特别监狱，而后在喀山这段时期的反常现象呢？

1944 年，谢 •巴 •科罗廖夫被减刑提前释放。下面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1944 年 7 月 18 日至 27 日记录”中的一段话：“1818，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 • 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一号案卷科——6874 页

1．同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 • 巴 • 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阿 • 戈尔金）”

但这绝不是说，从今以后他就成为社会上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了。尽管他在此期间因从事特种技术工作得到过“荣誉勋章”（于 1945 年），他身上还是留下了“被判过刑的污点”。

1952 年已经当上安全委员会总设计师的科罗廖夫申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可是“过去带有政治污点”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被信任的：说不定要对发展他人党负责呢。控告科罗廖夫的匿名信上说，他隐瞒了自己的民族。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他拿出了父母的出生证：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因此他什么都没有隐瞒。他参加过一次党委会议，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在区委党委……

——关于那里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请读一读这份文件——尼娜 • 伊万诺芙娜向我建议——这是 C • N • 莫索洛夫的回忆材料，他那时担任梅吉欣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经过他认可的由他口述的记录。

“除了我转给写谢 • 巴 • 科罗廖夫一书的作者的回忆材料以外，我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补充，目的只是为了让确凿的事实能成为一个伟大学者的生平历史的财富……吸收入党是议事日程的最后一个问题，而且决定在党委会上邀请发言的顺序是把谢 • 巴 • 科罗廖夫排在名单

的最后一个。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并非无意。当接待室只剩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一个人时，市委书记 H·B·布雷金把参加党委会的市委机关工作人员都支出去了。当办公室里只留下 11 位党委委员时，布雷金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工作过的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市委委员的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麦德科夫发言。麦德科夫的发言大致如下：‘现在要讨论我们设计局的一位总设计师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同志的人党问题。我们在党支部和机关党委会上已经通过吸收他，但我必须指出，科罗廖夫同志在 1938 年曾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判刑。他被赦免后甚至被授予荣誉勋章，但对他的判决从未有人予以取消。’

争论开始了。出现了意见分歧，大部分党委委员表示坚决反对。因此决定直接听取一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本人的想法。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并在发言巾为党委委员们展示了火箭技术发展的前景，指出了他和他所在的设计局面临的任务多么复杂，而他作为一名总设计师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给党委委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人感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充满智慧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寥夫回答完问题之后便被请了出去。辩论继续进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坐了很久，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当然明白党委那里所正在发生的一切。最后在科罗廖夫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表决。结果是 6 人赞成吸收科罗廖夫为苏共预备党员。5 人反对。于是，大家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进来表示了祝贺，希望他在艰巨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各种没有根据的猜测，我请求叶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图莫夫斯基把我的叙述记录了下来，他是科罗廖夫当过领导的、一个企业的原机关党委书记（1958—1961 年间）。”

我们不想臆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感受和经历。关于使科罗廖夫不安的这一切，都在他给苏联军事检察总署的平反声明中说了：“我请求军事检察总署重新审理我的案子并给予彻底平反，因为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反苏组织，从不知道也不认为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

我没有发现也不知道伊·捷克列伊梅诺夫，格·埃·朗格马克和瓦·彼·戈卢什科有任何反苏性质的行为。如果有这些人的供认，那么，这显然是某种天大的误会成者是他们杜撰的结果……。

再一次请求军事检察总署复查我的案子并洗刷掉我被判刑的污点”。

声明是在 1955 年 5 月 30 日发出的（发出后的收据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答复，同年 10 月 1 日从检查总署寄来一张正式名信片：“通知您，1955 年 5 月 30 日您的上诉已寄到苏联检察院并正在审理中。复查结果将随后通知。”

一年过去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收到一张通知书；“通知您，您寄来的上诉，军事检察总署已经复查并将您的案卷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它将会把结果通知您。”

又过了一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出去考察了。尼娜·伊万诺芙娜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来函：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

1957年4月25日

N4H—018811/56

莫斯科，沃罗夫斯基街13号

格式30

证明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于1938年6月27日被捕入狱，此前在国防工业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第三科研所第二小组任高级工程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于1957年4月18日重新审理了对他的指控。

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1940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谢·巴·科罗廖夫的判决。此案件因构成犯罪的证据缺乏而予以取消。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决

小组执行主席，司法上校

（齐尔林斯基）

盖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

尼娜·伊万诺芙娜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里有科罗廖夫1957年5月9日写给妻子的一封回信。

“……你告诉我关于最高法院的决定，使我非常高兴，这一切终于彻底结束了。

当然，在此我不便提过多的往事，免得心里不痛快，况且你自己也能想象到这一段可伯的历史有多么令人难过。

请你在下封信中把最高法院证明书上是怎么表达的逐字逐句写给我。

并请你到公证处复制3—4份证明书，我回来后会有用的。

关于案件审理他们（最高法院）说了什么吗？他们提出了审理案件了吗？这本来是极为有趣和极有教益的。请写信告诉我。”

科罗廖夫知道对于自己的被捕、克列伊梅诺夫和朗格马克之死谁负有直接责任，知道是

谁告的密。他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呢？要知道，因工作的缘故往后他们还要打交道呢。

——因此最好还是听听谢尔盖 •巴甫洛维奇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尼娜 •伊万诺芙娜建议说——这是他关于克列伊梅诺夫之死的来信:“有人打电话通知了我亚 •捷 •克的死讯(昨天在报上已经看到了)。命运就这样把我们永远分开了，他生命的最后一行字就这样被永远抹去了。那么，就让他安息吧，过去的事应该被忘记和原谅……”这是 1950 年 12 月 12 日的来信。

下面是克列伊梅诺夫的遗孀玛 • 列维茨卡娅一克列伊梅诺娃的回忆：“1965 年 11 月下旬我与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 • 科罗廖夫谈过一次话……

谈到最后时，我说:“谢尔盖 •巴甫洛维奇，我知道连 N •K •K •都写过不少指控伊 •捷 •克列伊梅诺夫的告密信。称他是追随图啥切去斯基和不少其他人的有害分子。图哈切夫斯基被他诬为人类败类，是妨碍他 K（即 N • K • K • ——原编者注）进行火箭研究的有权势的恶棍和下流坯。接着，我回忆起我同 R • 见过面，那是我和朗格马克（被 K • 当作带有政治污点的人）的妻子把克列伊梅诺夫和朗格马克的照片交给他，以便在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上展出（根据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的倡议）。他对我们说，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并说了一通好话。我说，‘我不能理解，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你干嘛还把他留在身边？’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这样回答我：‘这我明白，可怎么跟你说呢？那种人又不只是他一个。亲爱的玛格丽塔 • 康斯坦丁诺芙娜，您唾弃他吧，反正他是一位头脑僵化、微不足道的家伙（说到这里，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您不值得为他费脑筋。在我们这里他没有、也不曾有过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从不善于创造性地工作。就事业来说，上帝保佑，我们根本不需要他。往后他也不会工作了。因为他已经 70 岁，又患有血管硬化病，他请求别把他赶走，让他干点什么，就是这样。他正在写关于液体燃料火箭推动系统的文章，这是琐碎的工作，真正的工作由别人承担着……’”

在瓦西里 • 巴甫洛维奇 • 米申那儿读着这些回忆文章，我再一次认定他的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宇航史目前还只是在期待着自己真正的撰写者。需要“提供一幅公正而客观的历史画面”，需要对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正象来申院士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的名字被遗忘了，很多事实被夸张了。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些人的后代和亲属问题。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切记保护他们的尊严。的确，目前仍会遇到另一种现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里不能不提出科罗廖夫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当我们今天正力求反思个人迷信的产生及其后果时，科罗廖夫的观点对我们极为宝贵。

尼娜 • 伊万诺芙娜 • 科罗廖娃回忆说。“谢尔盖 • 巴甫洛维奇从科雷马给斯大林写过几封信，当然不仅是他一个人写过。但没有收到回信。然而，对斯大林强烈的信念，使谢尔盖 •巴甫洛维奇无论如何也没有怀疑过斯大林的可靠和正直。只是到了二十大以后才……！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大会呀！这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以致于不能够一下子意识到这一切。”

……还是回到 1945 年的德国吧。西方报刊认为，我们在宇航事业中的成功不是地地道道“自己的成功”，说维尔纳 • 冯 • 布劳恩和他的 V 火箭的工作帮了我们的大忙。这在多大

程度上是合理的呢？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院士说：“说到冯·布劳恩，他的图纸和 v。是落到了美国人手里，我们不得不同中等级别的德国专家依据不完全的资料重新设计 V 的图形，这些资料中的全部秘密的技术文件已被人取走。然而在同著名的德国学者及后来同美国学者的竞赛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加加林——是我们的。冯·布劳恩对科罗廖夫的成功感到不舒服。他在近期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根本没提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在那时，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科罗廖夫是敬佩的。于是，没有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对我们的成就首先当然是对科罗廖夫的成就表示疑义。而我们却一直被内部麻烦困挠着。在战争结束时，大家都尽力避开火箭技术研究。勿庸多言，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在《真理报》（194年）上发表的文章讲的就是火箭技术的危害性。活下夫的人中有许多优秀学者被抛进了劳改营。不到一小时的功夫，一切都可能会重新变化，谁甘愿作出头鸟被打中呢？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上层中你推我让，谁也不想被有关‘谋反’的问题牵扯进去。所以说，这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功绩，是他解决了问题，才使我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秋林中将补充说；

“在德国工作过程中，我们明白了如果不发生清洗，那么，在 30 年代末，我们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水平。对军队和学者进行镇压的结果是，我们的火箭技术停留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直到上层得知 V。火箭前一直没有发展。那个时候斯大林才刚刚开始对火箭发生兴趣。可以说，V 火箭的设计程序没有使科罗廖夫感到惊讶，科学的直觉告诉他还有超越实验的方法（喷气技术的发展速度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德国火箭制造基地的规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过，解决喷气技术领域的纯科研任务，离不开相应的试验和生产基地。他知道象比如莫扎伊斯基、茹科夫斯基那样靠单干的时代过去了，于是开始掌握火箭制造的科学组织的新原则。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也认为我国火箭技术占领先地位。我仍旧引用他对平反的声明；‘我参加了苏联在此领域里最早的一些工作，后来在 1937—1938 年我逮捕后这一切都中断了好几年。只是从 1943 年起，我才得以重操旧业。不能不指出，近 10—12 年苏联本身乃至世界科技工业的发展的进程对 20 年前苏联在新技术发展之初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根据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来加以判断，那么整个宇航史就是一部完整的胜利进行曲。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传记作家们造成的，他们形成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写法。因此，要通过这一切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疑惑，他的探索和迷茫，该是多么困难哪！这不是追求无谓的好奇，而是要发现生活的真正脉搏的正当愿望，以便用一个最高尚的人的毅力来充实自己，来充实自己本身的思想。

在我看来，科罗廖夫写给他妻子的信最能说明问题。

“1957 年 6 月 15 日

谢谢，一千次深深地感谢你！我忠实亲爱的朋友，感谢你关心和支持的一席话。

当然，我自己过去懂得、现在也依然懂得。不能指望走一条便捷的道路，我们也没有指望过。不过，目前一切都太艰难了。

的确，面临的任务还是我国科学界，或许是整个科学界所亘古未见的。

今天，某种疑惑缠绕着我，亲爱的，你看到我这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信不知该怎样难受呢！看来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我当然十分需要你来分担这些忧愁，要知道，除了你，这些话我是同谁也不能推心置腹地谈的。可你却要因此承受双倍的苦楚，因为你远离我，而且信中也只能把事情的一点消息传达到你那里。

为此，我更加强烈地爱你，再次感激你。

昨天我的小屋里聚集了所有我们‘设计总局’的人……经过一次冗长而‘可恶’的会议后，大家都牵拉着脑袋坐着。那时，我拿出了刻有一只小兔子的巧克力蛋糕，（是妻子寄给他的——原注）可以说，立时就收到了无法形容的效果。

要知道这里一无所有。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品尝起这个尤物。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拍一封致谢电报给你，我现在表达的是同志们的共同心愿——向你转达他们的问候和谢意。

今天呢，我这里还有个聚会，又有啤酒和鳄鱼可吃了！！！

总之，无法表达出我们共同的欣喜和感激之情。”

“1948 年 10 月 12 日

……愿你成为生活中的刚强者。你知道连我都在力争成为这样的一种人，而且首先是为了你。

无论我们的分离有多么痛苦，可这是我们祖国的伟大事业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强。”

“1947 年 2 月 1 日

……全身心都向往着莫斯科，尽管很快回去的希望不大。这使我极为伤心，因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终究是不能重复的，而时光流逝并带走了金色的年华。可能我懂得和感受到生活的喜悦太晚了，所以想尽快回归于生活。可是……唉，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凝聚全部忍耐力，以便能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期待下去。”

“1953 年 3 月 18 日

……我感到生活和工作是如此艰难：全身乏力，感觉疲劳并心烦至极。

……我们的象雪山一样巨大的事业把一切都向前拖着，拖着，不允许在此刻撒手不管，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所需要的啊!”

“1953 年 2 月 29 日

……我甚至回忆起了我来到楚科特卡时的情形——你是知道的，这段回忆令人十分忧伤。”

“1964 年 3 月 30 日

我们事业中叫人伤心的事太多了！两次失败接踵而来（第一次是在 N •，然后是 B •)，两次事故都出于疏忽大意，发生了失误……

的确，正如常言所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可能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事先料定。可这不会改变总的结论。因此也不会改变我们总的现代化的水平。

从未象现在这样糟!

我将于今天向尼・谢•（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原注）做汇报——他会给我们讲点什么，一定会的!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重要的是没有一丝心安理得的情绪，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件事，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两天后，我们将在与万能的大自然的奥秘进行斗争中，重新尝试我们所拥有的力量。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1964 年 9 月 15 日

我们的事业并不轻松。刚开始就光是出毛病、出故障。糟就糟在大部分情况下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粗心大意，不经心……”

“1964 年 9 月 25 日

……近几天我似乎处于一种冲动之中。实际上，我们近几年来的整个工作受到了所谓实践的检查，而且并非光我们一个单位，还有其他单位都是如此。万幸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我这时的心情也是最好的……”

“1965 年 3 月 7 日

……我们力求不急不躁，有根有据地做一切。我们主要的座右铭是——爱惜人。但愿上帝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使我们永远如愿以偿，而不要象老一套生活规矩那样。我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我的努力、我的理智和经验都花在预测和预防让我们在每走一步时部不免要碰上的倒霉事上。”

“1965 年 2 月 27 日

……我在这儿大约有两个星期了。时间飞逝如同超音速飞机使人来不及回首。

……从早到晚每天几乎一刻不闲地抓日常事务。而事情又不全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全部任务的‘试验期’还没结束，由于远地点的一个操作人员的过失（最愚蠢的各出人意外的过失），项目被迫中断，而且‘试验期’本身也被取消。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可以被看作是真正获得了，什么无疑还需要得到又怎么得到？哪里是所希望的和不可或缺的界线呢？

你自然明白这一切多难确定。我现在也并非都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我们的基本任务和计划甚至要到 3 月下旬才能完成了。

在此之前，我们将进行各种补充性的工作和研究，以便补偿我们的无知，并取得在‘试验期’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资料。

关于尝试在 N 地点软着陆的工作也挤进了日程——正如你所知，这是我们的一个老课题，它被搁置了很久。而现在，在这个 3 月份（恰是现在？！）最佳时间内进行。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好处。可上头和我的所有同事都坚持同时进行这一工作。说实在的，我现在没千这一工作，可是看来不得不马上千了，因此工作够干的了。”

瓦·巴·米申说：“真正的科学家的一生都是戏剧性的。就连其认识过程本身也是戏剧性的——经受迷惑、醒悟，经历无益劳动的年代，还有超越时代的个性同周围环境的矛盾，科学家总是带有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命运就是如此。遗憾的是科罗廖夫的生活被一些非科学属性的原因复杂化了，被其他一些外部的情况复杂化了。指出这些原因，不仅是为了在现实历史的前后关系中再现科罗廖夫，更是为了思索科学的未来。

使人惊奇的是，当科罗廖夫一个人单独开始国家的任务时，他要显得轻松些，只有此刻的科罗廖夫才是真正的科罗廖夫。而当他打开了通向太空的道路，当这一事业变得大有前途和声名显赫的时候，在宇航界出现了许多其利益与科学__相去甚远的人，他们追求名利，贪图虚荣……（我决不想往所有人身上抹黑！）

您听到过科罗廖夫似乎只是一位天才组织者的说法吗？就是说，别人都是巨擘，而他进行了‘天才的组织’。许多这样说的人本身就尽其所能地剽窃他的思想和他做成的工作……你们也应看到，一些只善于往科罗廖夫的计划里塞‘附加商品’的人悄悄地把他的功绩窃为己有。要举实例吗？远的不说，看过 70 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里宇航厅陈列的人，就会记得是谁的照片挂在首位，而科罗廖夫的肖像却放在哪里。

就连科罗廖夫的名字也是首次见报，遗憾的是还只出现在追悼文章里。他的名字在我国被莫名其妙地加以保密，尽管整个（！）外部世界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他被公诸于世、他所得到的如此的承认，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即使在今天也对科罗廖夫的名字和工作成就缄口不言。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工作的最后几年是艰难的。而科学界的平庸之辈，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却在官僚主义者日益占上风的情况下踌躇满志。比如，通常不是倾听专家的内行看法，而是靠行政命令。宫僚的吆喝胜于学者的意见。

关于那段时期，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札记，而没有依赖记忆。一切正在被遗忘，如果我们想有所体会，就应该借助于客观事实。下面我给您读其中的一页。

这是关于 1966 年初，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接受如他所说的‘荒诞不经的’手术（您知道，手术的结果如何……）的时候。

在他住院期间由我接替其职务……大约两天后，我们局隶属的那个组建不久的部召开了部务会议。显然是因为误会，也可能是故意地，我们第一特别设计局被招去‘光临’会议，听取批评的不是我，而是科罗廖夫的另一位副局长。他在新部长面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恭听后者关于第一特别设计局及领导者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意见。从会议大厅出来时，我无所顾忌地大声说：‘为了让他们弄清第一特别设计局正在解决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实质，就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否则就是对总设计师打击迫害。’

这件事使我愤愤不平，散会后立即决定写报告要求解除我的职务。这在我近 20 年宇航生涯中从未有过。我的理由是：同这样一位对新技术的本质缺乏了解又十分粗暴的领导无法共事。

晚上，科罗廖夫打电话把我叫去。问我在搞什么，会议进行得怎样。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告诉他我正在写辞职报告。对此科罗廖夫以他特有的方式激烈地说：‘你把报告撕了，扔进纸篓。他们正等着我们写这样的报告呢。部长们来来去去的，而我们却留下来不动。因为我们身后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成功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工作着的集体。我马上就出院——我们倒要弄清谁对、谁错。’

我们察觉到，有人不想使我们科研部门的领导是一个学者和思想家，而是只知无条件服从的顺从的执行者。这种企图遭到科罗廖夫义正词严的反对。

对科学的轻视，对科学家作用的贬低，其结果使许多领域里的科研事业和科研成果水平下降。这些现在广泛议论的东西，其根源就在那个时代。科罗廖夫预见到了不幸，并身受其大害。”

尼娜•伊万诺芙娜回忆说：

——最后一年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总是神色倦怠地走进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尼娜，我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我要走，我要离开。”

——往哪儿走，谢辽沙？你是离不开图纸，离不开制造，离不开集体的。

有一天，他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积蓄点钱吧，哪怕每月从工资中剩 50 卢布呢。

——我能剩 100 卢布，可我们手头并不富余呀。

——可无论怎样应该这样。

我更为惊呀的是，他已找到了退休的地方，这证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回顾我们的宇航历程时，让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成就和胜利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

格·亚·秋林说："在我看来，对科罗廖夫科学贡献之巨大根本未给予足够的评价。而我们的成功，即使是今天的成绩仍旧依赖于他：他的一些工作决定着当时世界科技的总的水平，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也就是说，科罗廖夫当时就解决了的问题有些至今世界上也无人能回答得出来。他工作的保密性也就因此未被解除。

总而言之，还是你们自己去评判吧。就拿我国宇航发展中的两段时期来说吧，即有科罗廖夫的 20 年和没有他的 20 年，让我们看一下在此期间的事件。1947 年是重建的 V 火箭试飞，1957 年是宇苗纪元中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而在此期间，仅科罗廖夫一人就研制出了 P1、P2、'带五个弹头的导弹'，接着是带核弹头的'带五个弹头的导弹' NC（最简易卫星）。在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工作更为紧张；先是我们的两只狗别尔卡和斯特列尔卡，稍后是一颗重卫星。紧跟着，人第一次飞向太空，而很快——列昂诺夫走出飞船进人太空……在最后十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实现他构想的'联盟'号宇宙飞船的环 B 球飞行。（5－8 探空仪），第一批装有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军事火箭综合休，'礼炮'号长期轨道站……

同科罗廖夫共过事的每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他具有深邃的预见力。我们开始研制最简易卫星是在 1951 年，而当时科罗廖夫已经有了载人飞往宇宙的想法。"

最后，还有一个传说，一个在回忆中总要提到的传说——"科罗廖夫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卡卢加的会见"。这大概是传记作家们没有搞错的唯一事件。

尼娜·谢尔盖耶芙娜回忆说：

——去医院前不久，当已经明确断定要给他做手术时，有一天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说："我应该向你承认，尼娜，我不知怎么记不清齐奥尔科夫斯基老人家了"。"谢廖沙，你为什么要说谎呢？！""我是幻想过。"他带有某种忧郁地说。

关于他见过康斯坦丁·爱德华尔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说法，出现在他相当困难地被接收为预备党员之后。1952 年 2 月，科罗廖夫在自传中亲笔写道："1929 年了解康斯坦丁·爱德华尔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从事特种技术……。"稍后在另一部自传中及平反声明里他突然指出 1929 年的了解和会面是与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

1957 年，我同谢辽沙参加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纪念碑在卡卢加的奠基仪式，还参观了纪念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以一种初来乍到的神情观看了馆中的一切。要知道，他是怀着何种理由在回忆"自己的首次到来"呀！

我想，由特定情况唤起的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偶然幻想已被大家广泛接受，这使他变

得不安，所以他决定向我承认。

不，真正的科罗廖夫是不需要传说的。他的真实生活比任何传说更加光彩照人。

（原载[苏]《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49 期。志咏译，康春林校）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件

阿·霍列夫

在国内战争统帅们的光荣行列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他在指挥集团军或方面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在他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一系列战役。他在用新技术重新装备红军方面，在完善部队组织结构方面，在发展空军、机械化部队、空降兵部队方面，在培养指挥人员方面，攻勋卓著。作为一个非凡的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对未来的战争进行了预测，在制定战略、研究作战艺术、制定战术、研究纵深战役和战斗理论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对战前的军事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

由于斯大林的专横和镇压，苏联元帅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于 1937 年无辜被害，使他未能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然而，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在战场上却得到了光辉的证明，从而加快了我们的胜利。

一

斯大林管他叫好作空洞计划的人。不知是斯大林真地认为图啥切夫斯基的思想不切实际，还是故意找词，以发泄他对这位年轻的、好吵嘴的集团军司令的不满。一旦在斯大林的心里产生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感情并且日益加重，那么他本人大概也很难说清这一点了。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知道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曾经得到列宁信任和器重的有才华的和走运的军事长官。1920 年 1 月，住在南线司令部的图哈切夫斯基告诉革命军事委员会，说他无事可干。列宁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写给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中问道：“图哈切夫斯基在哪儿？高加索战线的情况如何？”

高加索战线的情况不妙。由于我军进攻失败，人们提出撤换方面军司令的问题。在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交谈时，斯大林曾经通过直通电话从库尔斯克告诉他们：“8 天前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接受了绍林的辞呈并任命留哈切夫斯基为新的方面军司令，后者曾征服西伯利亚并战胜高尔察克。他今天刚到萨拉托夫，近日即将接受前线指挥权。”关于图啥切夫斯基的一段话讲得铿锵有力，不是么？斯大林亲手提拔了他，转瞬之间又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恶感……

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其他任何人，恐伯都不能讲出任何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坏话。但是有些领导人对他却坏有戒心，关系冷淡。而在图哈切夫斯基所热爱的列宁和伏龙芝去世后，

他本人对这一点感觉特别明显。从这时起，在他的生活中仿佛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职衔几乎在不断地升迁，在晋级，但他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提出的建议，却越来越难于被采纳。看起来，由于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参谋长之职，在这方面似乎为他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举荐他担任此职的伏龙芝死了，所以事情也就进行得很不顺利……1927 年 12 月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出重新装备军队。而到了 1928 年 5 月，他却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命——任命他为列宁格勒军区的集团军司令……

他在列宁格勒与基洛夫合作共事 3 年，得到了基洛夫的积极支持。他为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做了许多工作，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刻意求新。下面就是当时的前军区司令部作战处主任 N．H．尼基舍夫少将在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在列宁格勒军区的活动的回忆录中所写的一段话：

“……他的创造性思想不断涌现，他的想像为简直漫无止境。在 1930 年的冬训期间，根据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倡议，给整个师团穿上了滑雪板，而大口径炮和榴弹炮则被装上雪撬。在那一年的海上训练中，平底船被用作步兵和坦克登陆的工具。

图哈切夫斯基为奉命在林地和森林沼泽地带行动的部队建立冬季可移动营地开创了先例。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反对在部队军事训练中墨守成规，他不能容忍指挥员不动脑筋，他不允许指挥员不顾敌情瞎指挥。

图哈切夫斯基能以身作则影响整个军区，从军区指挥部直到连队。的确是直到连队！他在连队一呆就是几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他既教人又向人学习。”

下面是苏联元帅基·阿·梅列茨科夫的证词：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的创造兴趣和实践活动的范围是广泛的。他对一切新事物和先进事物都特别敏感，对于在部队中推广这些新事物和先进事物特别热情。经过他的多方活动，人们对用新技术重新装备军队的问题、对建设强大的空军、强大的装甲兵团和机动步兵的兴趣大为提高。他很注意外国的技术资料，曾亲自试验新式武器，而每次都一定参加部队进行的实验训练……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直接依靠发明新的武器和发展旧的武器装备来加强部队的组织、战术和整个教练体系。”

图啥切夫斯基很关心最新作战技术和武器的研制，因此全力支持设计师们，与他们中的许多入结交，深入了解他们的活动和需要，帮助扩大巳有的设计院和建立新的设计院。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重视研制火箭推进器和火箭武器。他倡仪组建了统一的科学中心——火箭科学研究院。

图哈切夫斯基干劲十足地用实践来验证自己那些大胆的理论观点。

1930 年在列宁格勒近郊举行的大演习中，采取了混合跳金和空降兵登陆方法。图哈切夫斯基称这是建设空降登陆部队的奠基石。

1931 年，他以新的方式组织了列宁格勒宫廷广场上的五一节阅兵。受检部队坐在被动员来的汽车上绕广场行进。后面跟着坐在汽车上的由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组成的空降登陆兵。这是对以新技术重新装备军队和使军队转向机动作战形式的前景的一次演习。从而也就肯定了下述思想，即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日益降低。

从技术上重新装备军队，当然需要国家拿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而这些东西正是国家十分紧缺的。如果不是因为明显地忽视这个问题，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应当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图哈切夫斯基的想法遭到了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其中就有托洛茨基，他对军队建设持有冒险主义的和粗俗肤浅的观点。某些骑兵指挥员和司令宫也缺乏应有的远见。

——摩托化战争、机械化战争、空战和化学战，——例如小有名气的骑兵更坚科说，——都是军事家们杜撰出来的。眼下主要的还是马儿。在来来的战争中，骑兵将起决定性作用。骑兵能深人敌后并在那里杀伤敌兵……

信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一个夏坚科……在审判因哈切夫斯基的法庭上，布琼尼甚至提到他的这样一个破坏活动，说他以减少骑兵数量和骑兵开支为代价，迅速建起坦克兵团。这就使人想起了谢尔盖•叶赛宁的优美诗句：

你可曾看见，

火车用它的铁掌，

怎样在草原上奔驰，

在湖边朦胧的雾霭中飞跑，

打着钢铁的响鼻？

而在它的身后，

在深草里，

象节日的一场绝望的比赛，

一匹红鬃的小马在狂奔，

纤细的双腿向头前甩去。

多么可爱又多么可笑的傻瓜，

它向哪里，向哪里追去？

难道它不晓得，活马

已被钢马打得一败涂地？

这首诗写于 1920 年……真是怪事儿；对于一个敏感的、怀念逝去的罗斯的抒情诗人来说，对于一个有名气的农民诗人来说，对于一个生来就喜观“我们的小人物”的诗人来说，关于活马和铁马争论的结果，早在那之前就完全清楚了。可有些军事家和政治家却依然在三棵松树之间徘徊。

二

在国防部干部管理总局保存着苏联元帅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的人事档案。残缺不全的一份——既无个人自传，也没有一份鉴定书……但是不管怎样，总还有一份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有趣文件。这就是图啥切夫斯基用红墨水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书法流畅。下面是这份履历：

“文化程度——中学及士官武备学校一年。

何时参军——1912 年入军校。

在何种部队服役——在谢苗诺夫团任排长、连长。

最后的军职和以前的军衔——在旧军队里任连长，被授予大尉军衔。

何时参加过何种战役——参加过 1914—1917 年的对德战争。

曾否受伤——没有。

目前的身体状况——健康。

政治信仰和党派——共产党员。

何时担任何种选任职务——选任连长。

第 5 集团军司令员米·图哈切夫斯基。

1919 年 7 月 4 日”

下面是附在这份档案里的其他调查表中的简短资料。

“出生年月——1893 年。

民族——一大俄罗斯人。

会哪几种外语——法语、德语。

社会出身——贵族。

受过何种军事教育——1914 年亚历山大罗夫军校。

党派——1918 年 4 月 5 日加人联共（布），党证号码 50136。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担任何种党政工作——其间被俘。”

是的，在这位未来的元帅的履历中有这么一个时期——当了两年半德国战俘。他的表现坚强无畏。他曾经几次试图逃走，但均未成功，为此他被关进了城堡监狱。即使在这里，在狱规森严的情况下，他也决不安于被国的状况。他自己甘冒风险，帮助一位法国军官逃出城堡，后者过了许多年在谈及此事时，对他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很快，图哈切夫斯基自己也逃掉了，并且回到了祖国。他把他被俘中渡过的时间，称作失去的岁月。从提高一个军宫的战斗素质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如此。但是，对于形成公民的自我意识，对于认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对于领悟正在到来的革命，图哈切夫斯基的俘虏生活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对俄国战俘讲的话，号召他们返回俄罗斯后要站到人民一边，无疑已经传到了他们的耳杂里。象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思考祖国的命运，思考自己在争取使祖国摆脱沙皇和资本家统治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因此不能不重视下面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年表；1917 年 10 月图哈切夫斯基摆脱俘虏生活返回祖国，同年 12 月被推举为谢苗诺夫团的连长，而 1918 年 4 月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年 6 月 26 日被任命为东线第 1 革命军军长。即使是在那样风云突变的年代，一个人的命运中发生这样的转折也是不寻常的。对此必须有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充分准备。

同志们回忆起被俘中的图啥切夫斯基时，说他在那里，在有刺的铁丝网后面，曾急不可耐地想尽快回到祖国去，并说他将去追随列宁。

他确实去了。最初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而后又在莫斯科防区任军事委员。当伏尔加河上爆发捷克白匪暴乱的时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H·H·库利亚布科向列宁报告了图哈切夫斯基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位“中尉党员”很感兴趣，曾邀请他到自己那里去，请他陈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军队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显然就这个问题谈了看法。他这个人正所谓是彻头彻尾的军人，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解决军队及其纪律、组织和军务问题，他对这些问题了如指掌。

留哈切夫斯基中尉打仗的时间确实不长——只有半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却充分地表现出了一个战斗指挥员的勇敢和老练。只要提一提他曾因功荣获 6 枚战斗奖章，也就够了——三级安娜勋章、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这是真正英雄主义之冠。

图啥切夫斯基在红军中身居高位，这就要求他不仅个人要有勇敢精神，而且要有广泛的知识、组织才能和善于领导广大士兵。他充分地证明了列宁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是正确的。在图哈切夫斯基的人事挡案里有一篇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0 年 5 月 22 日下达的调他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在这份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斯克良斯基和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谢·加米涅夫签署的命令中特别谈到：“西线司令米·尼·图啥切夫斯基参加红

军队伍后，因其有天赋的军事才华，能继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军事理论知识，能熟练地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战役，出色地领导一个军的部队，甚至指挥共和国各战线的军团，使苏维埃共和国在东线和高加索战线打败敌人，取得辉煌胜利……”

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战斗经历中也不光是胜利。他指挥的西线部队在 1920 年的华沙战役里遭到失败。在谈到我方在华沙城下的失败原因时列宁写道：“我军进攻时运动速度过快，几乎直抵华沙，这无凝是犯了一个错误……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军兵力的优势。”图啥切夫斯基老老实实地承认了他所犯的错误，并没委过于人，虽然别人对这次失败也负有罪责（例如，西南战线指挥部没能如期执行总司令关于将骑兵第一军交由西线作战指挥的命令。该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斯大林，他自己违抗了这个命令。也许恶感就是由此而来的吧？）列宁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态度始终没变，继续重用地。稍后，正是图哈切夫斯基受命领导了对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平定和粉碎安东诺夫叛乱的战斗。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因国内战争期间的战斗功勋而荣获了红旗勋章和革命荣誉金制武器。1933 年“为表彰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国内和国外战线上为加强苏联国防事业而为革命立下的特殊功绩和后来为巩固工农红军的战斗力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1934 年，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1935 年，他荣获最高军衔——苏联元帅。但他仍未感到斯大林对他的充分信任。

三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同他的《回忆与思考》一书的编辑交谈中，在谈到斯大林镇压军队干部时指出：

——特别可惜的是因哈切夫斯基。这个人有巨大的军事天才。知识渊博，聪明过人，强健有力，经常从事重竞技活动，而且一表人才。（他猛然在圈椅里转动一下身子，不知为什么往旁边看了一眼，再一次重复说；“真是一个美男子。”）

熟知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人都说他的外表和内心世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图哈切夫斯基迷恋军事科学，这大概是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它来自于对军事上发生的变化所作的努力思考，力求找到最适宜的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艺术，这并不是他的职责所致，而是出于他那不寻常的智力。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开始研究“民族的和阶级的战略”了。后来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再后来在就这个题目讲课时，他都曾以其深刻的思想使老教授和将军们大为惊异。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和《阶级的战争》，在列宁的克里姆林宫私人图书馆里也占有一席之地。

1964 年，军事出版社出版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两卷本《文选》。只需列举一下若干著作的篇名，人们对他的学术兴趣的专一程度，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战争是武装斗争问题》、《战争的新问题》、《边防战的性质》、《目前德国的战争计划》、《机动与炮兵》、《现代战略诸问题》。在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看到的思想观念，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我们应当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例如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在 1926 年出版的单行本《现代战略诸问题》中写道，——如果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爆

发的战争是长时间的，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苏联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和十分残酷的……我们苏联并不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松散联盟，将来一旦爆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当我们不得不占领资本统治下的某个地区的时候，那时我们也将扩展成社会主义同盟。”

作为一名真正的战略家，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囿于探索纯军事和军事技术问题，他也十分重视军人的道德因素和政治素质。“只有政治上成熟，——他写道，——才能使红军战士对胜利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和坚韧不拔，舍此，则他无论是对队列训练还是对战术训练，都将一窍不通。”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个人的崇高的学术的、道德的和其他方面的优良品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1—1922 年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任该学院院长）党委会所写的鉴定，对此有精彩描述：

“……积极主动，善于进行广泛的创造和推广活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做工作与刻苦自修、学识渊博密不可分。对革命忠贞不渝，无半点虚情假意（不爱媚上，等等）。对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诚挚、坦率、信任，深得人心。党员道德完美无缺。在共和国军事战线的显要地位，善于从事巨大的组织工作。”

下面再从他的姐妹伊丽莎白·尼古拉耶芙娜和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的回忆中，引述几点对图哈切夫斯基肖像的特征描述：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把一生都献给了他一旦选中的军人的事业，而且如醉如痴，一无反顾。然而他又不能放弃音乐、绘画和系统地阅读。在他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里，既有贝多芬、巴赫、舒曼、穆索尔斯基、莫扎特、斯克里亚宾、肖邦、门德尔松，又有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科学、技术和艺术中的一切新事物都使他感兴趣。从小他就迷恋上了天文学。”

“才思敏捷”、“真诚坦率”、“能言善辩”、“以身作则”——图哈切夫斯基的朋友和战友对他的人品的誉美之词不胜枚举。关于他的干才已经说得很多了。尽管如此，他身边却仍有不怀好意、充满恶感的举动和种种阴谋诡计……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据朱可夫证明，对自己的副手表示不大喜欢，原因是妒忌他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一起，以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对待他提出的某些改组军队的建议。最后斯大林根据国哈切夫斯基的一份报告断言，采用他的纲领似乎会导致取消社会主义建设，而以“红色军国主义”取其而代之。伏罗希洛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斯大林的这份尖刻陈述。图哈切夫斯基再也不能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教授战略学了，他曾经在这里多年卓有成效地执教这个科目。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和阴谋，图哈切夫斯基 1931 年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武装力量司令，而从 1934 年起又担任了副国防人民委员，成功地为巩固军队战斗力做了不少工作。他本来可以为击退希特勒进犯而做更多的事……然而，1937 年 5 月 11 日图哈切夫斯基却突然在不说明原由的情况下，被解除了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被任命为伏尔加军区部队司令。

四

“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他对困难和不公正的待遇抱怨和发牢骚——米哈依尔 •尼古拉耶维奇的姊妹们说，——只是到了 1937 年冬天，当他感到有不祥之兆时，他才对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

——我小时候是怎么请求给我买一把小提琴的呀，可爸爸由于始终没钱一直不能买。我大概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小提琴手……

这样的人也许到了一生最痛苦的时刻，才会懊悔他选择了那条为祖国做了许多事情的道路。他当然想在这条道路上继续热情洋溢地生活和工作，但是事情看来正在接近悲剧的结局。国内和军内在进行大逮捕。感觉到斯大林在用阴沉的目光注视自己，图啥切夫斯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受危险的预感所煎熬。当他得知早在列宁格勒就与之一起共事并荣任军区参谋长的 B • M • 费尔德曼军长被捕的消息后，他说：

——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挑拨离间活动。

然而挑拨离间活动仍在继续着。5 月 26 日他本人也遭到了逮捕。6 月 11 日开庭审判。就在当天（法官们，你们干嘛这么急不可耐？！)，法庭判决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另 7 名重要军事人员——一级集团军司令叶罗尼姆 •彼得罗维奇 •乌博列维奇和约纳 •埃马努依洛维奇 •雅基尔、二级集团军司令奥古斯特 • 伊万诺维奇 • 科尔克、军长维塔利 • 马尔科维奇 • 普里马科夫、维托夫特 • 卡济米罗维奇 • 普特纳、罗伯特 • 被得罗维奇 • 艾德曼和鲍里斯 • 米罗诺维奇 • 费尔德曼死刑。他们都被枪决了。

什么罪名？……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他们有罪……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2O 年之后，苏联检察院复查了这一案件，并向苏联最高法院提交了撤销对所有被告的判决并通过诉讼程序终止此案的结论，因为他们并没犯有上述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 1957 年 1 月 31 日裁决，撤销原判并终止此案。

这桩假案以 1937 年 5 月为肇端。关于在红军中存在一个似乎由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其他人领导的军事阴谋的第一批口供，是 1937 年 5 月 8 日和 1O 日得到的。供诉人是前工农红军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米哈依尔 •叶甫盖尼耶维奇 •梅德韦杰夫，此前他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所逮捕。在 5 月 8 日的审讯中，他供认，关于这个阴谋，他是在 1931 年 8 一 9 月份从一个同事的谈话中得知的。后来他好像打听到了，阴谋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普特纳、普里马科夫及其他人。

关于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些材料的问题，早在 1939 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管理局长 A • N • 拉济维洛夫斯基就曾供认：

“叶若夫给我的任务是，尽快审讯被捕的梅德韦杰夫，以便从他那里取得关于工农红军中存在一个有大批人参加的军事阴谋的口供。为此叶若夫曾直接下令对梅德韦杰夫施用肉刑，可以不择手段。

在开始审讯梅德韦杰夫之后，我查出他在 3—4 年前已被开除工农红军军籍，被捕前任某医院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任何反苏活动，否认与军界有联系。当我向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报告这一情况时，他们建议从他身上‘榨出’他与‘阴谋家们’的联系，并一再重申，对他不必客气。

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梅德韦杰夫早已和军界断绝关系了，他的申辩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为了执行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命令，我还是从他那里取得了关于存在军事阴谋和他积极参与其中的供词，而在以后的审讯中，特别是在弗里诺夫斯基当着叶若夫的面毒打了他以后，梅德韦杰夫咬出了大批重要的军队领导干部。

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我看到也了解到，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关系纯属捏造，而他也一直向我而后又向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申明，他的供述是假的，不符合实际。然而，尽管如此，叶若夫还是把这份记录报告了中央。

叶若夫下命令逮捕了梅德韦杰夫，而没留下一点有损自己声誉的材料，并以此为突破口别有用心地开始夸大关于工农红军中的军事阴谋案。”

以现已推翻的梅德韦杰夫的这些供词以及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在被捕 9 个月后的供词为据，于 1937 年 5 月末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费尔德曼、科尔克、艾德曼、雅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在最初的几次审讯中，他们都断然否认从事过任何犯罪活动。只是后来他们才供认参与反革命军事阴谋。通过检查确认，这些供词全是假的，是用非法的侦讯手段获取的，如欺骗、恫吓和肉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前局长 A·A·阿夫谢耶维奇在 1956 年 7 月 5 日在检察院受审时说：

“……大约在 1937 年 3 月，我审讯了普里马科夫。他疲惫不堪，极度虚弱，破衣烂衫，一副病容。

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在最初的几次审讯中，断然否认自己参加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组织。我传讯了他们 10—20 次。他们告诉我，除了我传讯他们外，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也多次审问他们。在一次审讯中，普里马科夫声称，前天他被叫到叶若夫那里去，在那里他受到警告：如果拒不认罪后果严重……普里马科夫答应叶着夫考虑问题，现在他将招供……

普特纳也被叶若夫和列普列夫斯基传讯，但他很久都不承认自己有罪。

1937 年 5 月在一次会议上，副处长乌沙科夫向列普列夫斯基报告说，乌博列维奇不愿招供。列普列夫斯基下令对乌博列维奇采用肉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前工作人员 B·N·布达列夫回忆道；

“我本人没有参与普里马科夫案件的调查，但侦讯过程中我曾受命陪他坐了几小时，看他写供词。处长和他的副手指示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陪着普里马科夫，直到他写完供词。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不睡觉，催他写出参加托洛茨基组织的供词。因此不能留下他一个人。在普里

马科夫和普特纳案件的侦讯期间得知，他俩供认了曾参与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列福尔托夫监狱遭受毒打之后……这期间开始逮捕图哈切夫斯斯、乌博列维奇等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前副局长 R·N·卡尔别伊斯基供认：

“在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被判罪的军人中，我只参加了艾德曼一案的审理……审讯是在没有向艾德曼提示具体材料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却对他说，有人揭发他参加了‘军事阴谋’，他拒不认罪是没有好处的。然而，艾德曼并没有承认……在审讯艾德曼期间，隔壁的办公室不断传来人们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吵闹声……”

早在 1938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前副处长 3·M·乌沙科夫就曾供认，对被捕者曾广泛施用非法侦讯手段，因为他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费尔德曼的审讯。

下述事实也可证明，当时对被捕者曾施用过酷刑：在 1937 年 6 月 1 日开始的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讯记录中，记述图哈切夫斯基曾经承认有罪，在案卷第 165—166 页上能看到污迹，根据生物化验鉴定，这是人血滴在上面或抹在上面的痕迹。

正象案件调查所确认的那样，被告在法庭上都肯定了自己在预审中提供的假口供，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审问人员的监视之下，直至诉讼程序终结。审问人员陪着受审者去法庭，在候审室也和他们形影不离。所有被捕者都被单独关押起来，每人配一个审问人员。所有人都被告知，在法庭上认罪将得到从轻发落。

可见，所有侦讯都是力图达到一个目的——使被捕者自己承认有罪。之所以必须叫他们认罪，主要是为了制造公正审判的假象，对此叶若夫和斯大林也未必相信……受审者的供述不足为信，这些东西玄而又支，空口无凭，矛盾百出，纯属臆造。

例如，费尔德曼最初供称，是普里马科夫把他拉进阴谋集团的，而在后来的几次审讯中又说是图哈切夫斯基吸收他参加的。

科尔克一开始说，“政变指挥部”成员有图哈切夫斯基、普特纳和他自己，后来又说没有普特纳，而有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艾德曼。

图哈切夫斯基在审讯中供认，早在 1925 年他就曾把秘密消息传递给波兰特务多姆巴尔。而在法庭上又宣称，他不知道多姆巴尔是特务，只知道他是波共中央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承认自己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而在法庭上却暴露出，他们对所谓由他们拟定的“宫庭政变”的细节一无所知。

可见，被告的供词完全是假的。案卷中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判定有罪的材料……

早在 1938—1940 年，参加侦讯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人案件的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列普列夫斯基、乌沙科夫、阿加斯、米罗诺夫、弗里诺夫斯基，就因实施非法逮捕、制造假案和采用非法的审讯手段，而被枪毙了。被枪决的还有他们那嗜血成性的头子叶着夫。斯大林对此当然了如指掌。然而，图啥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

德曼、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的英名和功绩，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却被遗忘了。继他们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祖国忠实的儿子——红军的司令和政委们人亡誉毁。仅从 1937 年 5 月到 1938 年 10 月，在军队和前线就镇压了近四万人。而为这场真正血腥的大屠杀，我们在战争中又付出了更多的鲜血。

五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假案的起因，还有另一种今天广为流传的说法。此说的根据是外国史学家提供的。德国侦察机关力图削弱红军的力量，他们伪造文件，说留哈切夫斯基曾和德国人商谈组织反斯大林的阴谋活动。

为此而利用了 1926 年德国和苏联统帅部签定的秘密协定，根据该协定“容克尔斯”公司将为苏联建立空军提供技术援助。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是工农红军参谋长，他自然要和德国军官发生业务上的接触。在 1926 年的协定文本上就有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签字。这就有可能模仿他的签名制造假信。从信上看，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似乎已经达成协议，以便摆脱文官的管辖并夺取国家政权。在假信上有德国侦察机关“阿勃韦尔”的各种真的印章如“绝密”、“机密”。还有希特勒的亲笔批示：命令对那些和图哈切夫斯基似乎有联系的德军将领进行监视。这封信是主要文件，整个“专案文件”共 15 页，除了这封信之外，卷宗星还有各种用德文写成的文件，均有德军将领的签字（签字也是假的，是从银行支票上模仿下来的）。为了把这份专案文件转送到斯大林手里，假造了“阿勃韦尔”大楼失火，文件被盗的假案。然后，“专案文件”的照像复制件就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贝奈斯手里了，他又把这个公文夹转寄斯大林……卑鄙的种籽落进了准备好的土壤。外国文学家断言，叶若夫所管的部门为这个伪造文件付出了 300 万卢布。

在我们的文献里——苏联总检查长的结论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关于撤销对图啥切夫斯基等人的判决的裁决中，都没有提到德国检察机关的假文件。这就是说，即使在法庭上，这个东西也不曾以罪证的面目出现过。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特别法庭的成员可能是知道的。

……在杀害了国哈切夫斯基之后，又开始逮捕他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一位被捕者住所的墙上的元帅肖像时，惊奇地问：

——你怎么还不把它摘下来？

——不，——被捕者回答说，——你要知道，将来人们会给他树立纪念碑的。

今天，这个预言应验了。现在我国许多城市的街道就是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名字命名的。为了对他表示敬意，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为他立了纪念牌。在武装力量中间，要使这位元帅留芳百世的思想是自发产生的。例如，任何一所军事院校都会兴高采烈地同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并且以此为荣。

（原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原载苏联

《红星报。1988 年 6 月 4 日。李树柏译）

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责任

——作家的评论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值此胜利 20 周年前夕，我作为多年研究卫国战争题目的作家，想谈谈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的某些想法。

现在很难想象，在战争结束 10 年之后的 1955 年，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回忆作品。这倒不必责怪战争的参加者，因为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才为产生这种作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战争的人们往往会想起 1945 年 5 月斯大林“为俄国人民健康”的祝酒词：

“我们的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我们曾有过 1941—1942 年的绝望时刻……别国人民或许会对政府说：你们使我们失望，去你们的吧，我们要搞另一个与德国媾和并保证我们安宁的政府。然而，俄国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并为了保证粉碎德国而去牺牲……”

无疑，这段话既包含着对一系列错误的坦率承认，也包含着对 1941—1942 年最危机时刻的公正评价。这些话还包含着自我批评，因为斯大林习惯于使用“政府”一词来暗指自己。

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我认为应当指出，正如通常评价斯大林的言论与行动一样，在这一切之中一般还有它的相反的方面。斯大林绝没有以自己的祝酒词号召别人，其中包括历史学家主公正而批判性地评价战争的整个进程。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犹如最高法官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段历史，其中包括他自己同俄国人民的关系作了评价，并制止了日后最可能进行的任何批判性的评价。这段祝酒词似乎是号召人们讲述过去的严酷真情，而实际上这些话的明显意图是，一劳永逸地给过去作总结，不许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不难想象，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凡以这段祝酒词为指导，试图用具体的历史资料去发挥斯大林关于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这句话的人，或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以个人回忆来具体说明这句话的人，是怎样一种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在那些年代里，以各种不同的军职肩负着战争重任的人们谈论战争，比作家们更为困难。

在评价我们当今回忆战争的作品时，应当指出，它的问世被强制性地推迟了，如果指记忆的清晰程度的话，它几乎失去了最珍贵的整整 10 年。尽管如此，它现在正进入自己的繁荣时期，人们决定以自己的生活和战斗行动为例证来说朗党、军队和人民历史上最艰巨功绩的全部英勇而悲壮的真情，我们有权骄傲地把这种功绩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人们的这种热情，应当予以高度评价。尽管我们的文学在战争年代和战争刚结束后在这方面早就

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这种意义上，仍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不赞同最近几年以各种不同理由出现的偏激理论，对最近几年出版的关于战争的书籍，一会儿称这本书是“真正的战争史开端”，一会儿又称另一本是“关于战争的首次真情”。

当然，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深入揭示伟大卫国战争史提供了可能性。尽力说出战争真情的愿望永远支配着每一位诚实的艺术家。而根据当时情况，还远不能说出一切，艺术家们自己也认为远不是什么都能说。那时的作品中有不少诚实的谬误。事物就是如此，对此也不必隐瞒。但是也不应忘记，当时的好作品，尤其是在 1941—1947 年之间趁热打铁地写的作品更道出了有关战争的许多真情，这样的作品有，《瓦西里·焦尔金》、《仇恨的科学》、《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星》、《同路人》、《不朽的人民》、《致同志的信》等等。

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作品，在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并想强调指出，当时说出有关战争的真情并非易事，它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另一种精神价值。

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作家在描写历史事件的进程时有着不同的观点，对勇敢精神有着不同的尺度。不能不考虑到不同作品的写作时代，但也不能都推给时代。

对战争、对关于战争的作品、对这种作品的教育任务的不同观点，不仅在战后、战争中、而且在战前也存在。这种争论有深刻的根源。现在这种争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我想引用有关 1941 年 2 月战争前夕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都谈到当时“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的文集《这些天未丧失荣誉……》。第一个文件这么说：

“……文集从‘我们的国家是英雄的国家’这一根本错误的论点出发，宣传‘轻易取胜’的有害理论，并以此错误地引导青年，以骄傲自大和盲目轻信胜利的精神教育他们……由这样的论点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没有必要进行旨在培养青年勇敢、无畏和英雄主义的宣传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就都是英雄……”

第二个文件说的内容相同，仅说法不一样：

“材料中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和称颂。非常轻易地、简单地就取得了胜利……只要照老规矩，一鼓作气冲锋就行。我们不能这么教育我们的青年。看来，作家们没有从红军所进行的改造中为自己得出任何结论……”

第一段话引自当时军队政治宣传总局局长亚·扎波罗热茨致安·日丹诺夫的信。第二段话引自当时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辛哥致共青团中央尼·米哈伊洛夫的信。

在战争迫近时写的这两封信，值得从事战争史写作的作者们思考。以我之见，这两封信说的是什么呢？在 1937—1938 年军事干部遭到严重毁灭，芬兰战争明显地暴露了这种毁灭对军队产生的致命后果。在军事干部严重毁灭和芬兰战争之后，曾采取了改造军队的坚定方针，以求恢复它的真正威力和战斗力。

然而，在 1937—1938 年迫害的局势下，谁略微提一下敌人的力量或我们对大战准备不足便意味着政治自杀。

情况已经好转，但 1937—1938 年的那种心情在社会生活中，在作品中，继续以最危险的方式显示出来。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种心情，只须举出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战前小说《第一次打击》就足够了。我已记不清楚，在这部小说中说我们只用一昼夜还是两昼夜便把整个法西斯德国彻底粉碎了，不幸的倒不在于这部小说平庸，而在于它出版了 50 万册，并且得到来自上面的强有力的支持。

引证的文件说明，尽管在战前我们社会中的思想意识已开始转变，但 1937—1938 年的惰性仍然很强有力，这就导致对军队和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发生尖锐冲突。

说到这里，我想更详细地谈谈 1937—1938 年的难题，或者说是当时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人民直接咒骂的“叶若夫恐怖”。顺便说一句，那些喜欢拐弯抹角地使用“个别不合理现象”和“某些违法行为”术语的人们不妨思考一下当时人民的这种说法。如果是“个别的”和“某些”，那么在人民中间就不会出现诸如“沙皇特辖制”和“叶着夫恐怖”这样的话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谈论 1937—1938 年，只是从它使我们缺乏战争准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谈。很遗憾，诚心诚意诅咒那些年代的可耻事件的人们有时又狭隘和片面地解释这些事件对以后军队命运的影响。请读一读那种依次列举出在 1937 年死去的一些军官名字的文章。作者暗示，假如他们还活着，战争中的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请思考一下，难道作者真的把所有一切只归结到这一点吗？

听了这些议论之后，有一天我也这么设想，假如 1937 年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一次悲惨事件，即一架正在演习中的飞机失事，而在后来的伪造的审判案中成为牺牲品的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恰好在这架飞机上。这次空难是悲惨的吗？当然是。它给军队建设造成了损失吗？不言而喻。它会导致四年以后（1941 年）的深远后果吗？

我内心里这么自问自答：不，不会带来这种后果。悲惨事件的损失只会迫使我们按照我们的革命传统将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只会从党和红军培育的人们中提拔新的能干的人物。

不，不能把一切都同当时的几个光辉军人的名字联系起来。也不能把这些人在以后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同那种气氛分离开。他们是在那种气氛中死去的，由于他们是带着叛国的恶名而死的，因而那种气氛就更加严峻了。

首先，死去的不仅是他们。在他们之后并与他们的死有牵连的是成百上千的、构成我军精英的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死亡，而且不是普通的死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他们是带着叛徒的恶名声离开人世间的。

这里所说的还不仅是与去世者有关的损失。应当记住，仍留在军中服役的人们心灵中出现了些什么，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精神打击。应该记住，在这些可怕的打击之后军队（这次

我只谈军队）要开始恢复元气须经历多么不可思议的困难。

直到战争开始，这一过程尚未结束。军队不仅处于尚未完成重新武装的最困难阶段，而且处于尚未完成恢复精神价值和纪律的阶段，后一阶段的困难并不亚于前者。

不弄清这个问题也就不能彻底弄清战前和战争初期我们的许多行动失败的原因。我喜欢同偶尔出现的、微微露出的一种倾向进行争论。这种倾向把 1937—1938 年死去的干部同那些不管愿意与否而不得不承担起战争义务的干部对立起来。

看来，某些人觉得是他们恢复了图哈切夫斯基或雅基尔应有的个人地位，并暗示如果在战争的第一天便由他们而不是由基尔波诺斯或巴甫洛夫在前线指挥，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种看起来生动的对比不仅是轻率的，而且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

是的，用我们一位高级军官的形象说法，“战争选拔干部”。靠过去的功劳生活而落后于时代的某些著名军宫并不称职。临战前某些提升很快的年轻指挥官也不称职。

然而，战争选拔了干部。不应把率领着师、军和方面军退却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但没有让这些城市投降，而后又转人进攻。学会了作战，并最终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德国军队），并打到柏林的人们同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对立起来，尽管我们十分尊敬他们的名字。

当我们谈到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失算的时候，应当记住，其主要失算是对我们干部评价上的失算。在 1937—1938 年，这些干部的确带有可伯的创伤。而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认为这种创伤是不可弥合的，我们的军队在大战的条件下缺乏战斗力。

然而，正是那些尚留在军队中的曾经经受 1937—1938 年精神折磨而在战争开始时尚未康复的干部表现出了自己的艺术和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事实表明，他们同图啥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雅基尔一样，是同一所苏联军校培育出来的人物，终于做出了不论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盟军都没有科想到的事情，——使我们成为这场可怕战争的胜利者。

我们不清楚，至今仍不清楚，布柳赫尔或别洛夫，德边科或菲季科在 1941 年会如何战斗。关于这方面只能推测着说。但我们肯定地知道，如果没有 1937 年，也就没有 1941 年的夏天，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如果没有 1937 年，1941 年夏天无疑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更强有力些，其中包括纯军事方面。这首先是因为，1937 年从军队中除掉的成千上万忠于共产主义的有军事经验的人们会加入我军的指挥行列，去同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这些人在战争初期占我军高中级指挥宫的半数以上。

没有任何历史的必要性将这一重大问题人格化，去猜测谁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地方、并如何战斗。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大家都会同法西斯作战，而且战争会选拔干部（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选拔他们），会说明军宫的真实价值。但第一，会在更加良好的气氛中选拔干部；第二，会从大得多的范围内选拔。

谈谈关于战前的气氛。写战争的人，出发点最重要。我们往往把当时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看得过于简单化，譬如这样认为；1937—1938 年事件和芬兰战争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

软弱性，于是开始重建军队；为军队顺利重建创造了正常气氛。一切都已好转，如果再加上斯大林相信利哈尔德・佐尔格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一切都会正常起来。

乍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历史真情要更加复杂和矛盾得多。

是的，当时与军队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芬兰战争之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领导是以什么样的毅力努力去整顿军队秩序，首先是改造军队的战斗准备的。

是的，从芬兰战争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包括加紧重新武装，它已危险地被拖延了。但是，因此而说在国家和军队中已造成反击敌人的有利条件，那是不真实的。

有时人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 1938 年秋谴责了所谓“过火行动”，并因此惩办了叶若夫，斯大林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仟侮；已不再宣布人们为人民的敌人，而是把他们释放和复职了，其中包括军人。从一方面说，这是对的。在 1937—1938 年被捕的部分指挥官重返军队，其中某些人参加了战争，并指挥了师、军、甚至方面军。

但从另一方面说，1940 年和 1941 年还在继续发生阵发性的怀疑和指控。

在战前不久，当时塔斯社发表了备忘录声明，半指责半威胁地指向那些似乎接受了关于德国敌对意图传闻的人们。红军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察长斯姆什凯维奇和国家防空司令施杰尔恩因而被捕并被处死。

为了说明全面情况，还应补充一点，战争开始之前被捕的还有前总参谋长和武装人民委员，幸而后来被释放了。

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前夕的战前气氛实际上就是这样。斯大林仍旧坚持以狂妄多疑的态度对待自己人，其结果是对敌人失去警惕。

现在，在了解当时的这种气氛并非臆造而是真实的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些军人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们分析了许多情报，认为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这与斯大林武断的意见相反，斯大林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现实之上。

事过多年之后，当我们评论他们当时的行为时应当记住，问题不在于当一个人认为唯一正确的措施遭到坚决否定之后，他示威性地提出辞职所需要的勇敢程度。很遗憾，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以自己对未来战争的观点同斯大林的观点对立，不仅意味着丢官，而且意味着带着人民敌人的罪名去死。

我们毕竟从许多相互交叉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仍然有这样的人，他们尽力让斯大林对事物的真实情况有所认识，冒着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去采取一些那伯是局部的措施，以免在战争来临时完全猝不及防。

斯大林以令人难于置信的顽固态度不愿考虑侦察人员的最重要的情报，他不仅对这一事实负有责任。他对国家的主要罪过在于他制造了窒息的气氛，当时有几十个掌握着确凿证据的、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没有可能向国家元首陈述危险的程度，也没有权力采取足够的措施以

防止此危险。

在战前出现的斯大林对待干部的最后一幕悲剧是夏天他对西方面军司令部巴甫洛夫、克里莫夫斯基以及一系列其他将领的变节和叛卖的指控，后来才弄清楚，在这些人中，有的牺牲在战斗的最初时刻，有的在俘虏营里至死不屈。

更难说清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斯大林去宣布这些人为叛徒和变节分子。是指望把人民的愤怒和疑惑从自己身上转嫁到他们身上（人民没有意料到战争会这样开始因而产生了愤怒和疑惑）？或者是真的怀疑？我们想，二者均有可能，或者指望，或者怀疑。因为他早就习惯于从叛变、危害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中，而不是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去寻找这样或那样失败的原因。

后来，在战争进程中，尽管有时还重犯，但他还是不得不从这种习惯中解脱出来。

在战争进程中，在战争的考验中，战前的许多概念、口号和理论都经受了严酷的检验。战争肯定了一些，否定了一些，而对一些曾被否定的东西又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意义。对于我们从事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重要的是用心观察，人们的心理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变化了，怎样改变了军事行动的领导作风，在战争中诞生的新事物和在战争进程中恢复的事物是怎样同一切过时的和在 1937—1938 年的气氛中败坏了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进行斗争的。

我想举一个战役的例子。在这一战役中明显的暴露了战争科学的真正意义同关于战争的虚伪的、口号式的概念之间的冲突。那种概念所依据的不仅是对战争的无知，而且是 1937 年所产生的那种对人的不信任。我说的是对 1942 年冬、春刻赤事件的痛苦回忆。

7 年以前，我们的一位战士作家给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1942 年我曾在刻赤半岛。我清楚地知道那次可耻失败的原因。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梅利斯根本不信任军团和方面军的指挥官，刚愎自用和恣意妄为……以不破坏战士的进攻精神为由禁止挖战壕。把重炮部队和军指挥部部署在阵地前沿，等等。三个军部署在 16 公里长的阵地上，一个师占据 60O—700 米的阵地。在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过士兵如此密集。这一切都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被抛进了大海，牺牲仅仅是由于前线指挥者不是战略家，而是一个狂人……”

我也曾在该信作者所在的那个地方，尽管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还是同意他所说出的上述事件的实质。

我谈这个事件，丝毫不想再次用非善意的词句去回忆梅＄IJ 斯。顺便说一句，他的个人勇敢是无可指责的，他做的一切部不是为了眩耀自己。他深信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在刻赤半岛的行为很有意思。他是这么一个人，在战争的那个阶段，不考虑任何客观情况，认为凡是在距敌人 100 米占据有利阵地而不在距敌人 50 米占据不利阵地的人都是胆小鬼；认为凡是考虑到保障士兵的起码安全避免可能的失败的人都是惊慌失措者；认为每个现实地估计敌人力量的人都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将自己生命献给祖国的梅利斯是 1937—1938 年气氛的典型产物。

即便是有知识的和有战争经验的人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指挥方面军，也照样表现为 1937—1938 年气氛的产物，只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害怕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害怕以理智的军事决定同“前进就是一切”的不合情理的强攻相对立，害怕将自己同梅利斯的争论被提到大本营从而对自己有危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严重的刻赤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在此事件中 1937—1938 年后果的两个方面拧在一起了。一方面以梅利斯为代表，另一方面以当时的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科兹洛夫为代表。

顺便说说，在回想戏剧性的刻赤形势时，可以不偏心地说出当时在战争进程中已经涌现出来并处于方面军指挥地位的一系列其他人的名字。假使这些人能不顾梅利斯既接近斯大林又是大本营的代表，不让他压自己，同他争论到底，直吵到斯大林那里，或许能以自己的道理说服斯大林。

要历史地理解情况好转，就不应当忘记这些人。他们在军队中、在战争进程中，随着战争的最初失败，随着战争的复杂而长期的转折阶段，随着战争越来越大的胜利而逐步完善起来。

战争的总进程，我们都会记得。没有人不知道 1942 年我们退到了哪里，退到了伏尔加；1945 年我们又到达了哪里，到达柏林；在法西斯进人我们的明斯克、我们的基辅、我们的加里宁、我们的塞瓦斯托波尔三年之后我们解放了欧洲哪些首都，解放了华沙、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

不论战争的哪一天，第一天还是最后一天我们都写到了，不论在什么地点，被围困中的斯大林格勒，还是被包围中的柏林，我们的书无不反映出来。我们应当将战争的全过程、战争的一切考验：战争的一切失败和胜利都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和心灵之中。

不能忘记 1941 年明斯克公路而去写攻陷柏林，也不能只写布列斯特保卫战而忘记了进攻柏林，尽管 1941 年阵亡者并不知道这些。

我们经历了整个战争，我们也记着从开始到结束的它的全过程。我们也不准备从历史中抛开任何东西，因为任何删除都会歪曲总体情况。只有描写出战争初期的全部不幸和我们的全部损失才能够展示出我们通往柏林之路的全程，才能展示出漫长的、无穷困难的日月要求我们党、人民和军队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使我永远吃惊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火而又写出过关于战争的有份量的著作的人们突然心血来潮，对不容置辩的事实进行历史上毫无根据的模棱两可的评价。

我最近一次遇上这种现象是在不久以前，那时我读了雕塑家叶·乌切季奇的文章《我们的澄清》。我不去陈述这篇论战性文章的其他方面，我只讲它直接涉及我的题目的那段话。我先引证如下：“然而，有的是真情，有的只是真情的假象，有的是事实的真情，有的是现象的真情。这就需要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有原则的眼光去鉴别。当然，确实在战争初期阶段存在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现象，这些正是某些不大聪明的作家们现在在自己

的作品中所努力强调的东西。这是真情，然而它仅是事件的真情，事实的真情，而不是人民在其长久历史中最危急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真情。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在于我们在陡峭的伏尔加河岸打断了法西斯野兽的脊梁骨，而后又到达柏林，在国会大厦竖起了我们伟大胜利的旗帜”。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段，因为它陈述了对战争史的一整套反历史观点。

把真情的假象同真情，把现象的真情同事实的真情对立起来，叶·乌切季奇想以此说明什么呢？假如以他的表述方式，那么，战争开始时的“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是什么呢？是真情，或者仅仅是真情的假象？这些是事实，还是现象？我想，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是现象，是由许许多多事实组成的惨痛的、危险的现象。这不是真情的“假象”，而是最真实的，尽管是痛苦的真情。也只有彻底地洞察这一真情（顺便说一句，应当对斯大林作应有的肯定，尽管晚了，斯大林还是明白了真情）才能够以巨大的努力扭转战争的总进程。这是其一。

第二，如果说到真情的假象，那么真情的假象正是叶·乌切季奇对战争初期阶段的评价，用他的话说，那时是“偶然现象”。我强调指出的是“偶然现象”一词！这就是“……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

叶·乌切季奇写道：“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当然啦！如果指整个战争，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且在于我们后来到达了柏林。不仅是我们，大概在西德也不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谈到 1942 年 8 月，那么真正的真情恰好是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即我军曾经和柏林之间有着最遥远的距离。简单得很，“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不可能将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这样解释就意味着企图制造真情的假象，因为把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的不是在战争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利的偶然现象，而是更加严酷的历史原因，首先是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迷信有关。斯大林在危机时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处境绝望的时刻”在签署他那著名的第 227 号命令时要比叶·乌切季奇在战后 20 年之后的今日以“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来解释我们退到伏尔加河更接近事件的“真正真情”。

我愿诚心地劝告叶·乌切季奇，以后不要在真正的历史真情面前表现出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别试图以艺术中的真情的假象去替代历史的真情。谁也不需要它。在这样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人民、引导人走向胜利的党、彻底粉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希特勒军队的军队不怕讲出这场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的每个阶段、其中包括它的最严酷阶段的全部真情。

作家在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关于战争的这部分复杂的真情时，不必从与斯大林领导战争的作用有关的战争史着手。我们的职责是客观地，藉助于文献和活的见证去研究和分析这种作用的一切肯定和否定的方面，不论对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还是对斯大林个人最重要方面都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看来，在当代公布的由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签署的这样或那样的文件中把斯大林的名字

删去，这未必合适。或者在一系列情况下（我指的是涉及他个人的情况）以“大本营”代替他的名字，如“大本营决定”,“大本营来电”等，也未必合适。

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主观上认为这是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人人皆知的回避和替换不仅无助于，而且妨害着同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作真正斗争，使这种斗争庸俗化，将那些细小的、历史上并非公道的、例外的、颠倒是非的成分带进这一历史上绝对公正的斗争中来，这些成分加在一起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有时甚至影响正确地评价这一巨大历史人物的错误的深度及其直接犯罪的严重性。

我们正在迎接我国人民的伟大节日，战胜法西斯 20 周年。一方面，此时此刻人们更希望回忆最高兴的事情，我们的胜利。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

但是，我们远非在风平浪静的国际局势下迎接这一天，当我们回忆胜利的时候，也不能不想起充满残酷历史教训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了柏林。

这是为了更真实地描写我们党和人民的艰巨无比的功绩所必须的。对这种功绩，我们现在写，将来还写，并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1987 年第 6

期。几拉扎列夫整理原稿并加注。赵增泉译，孙娴校）

1946 年的令人窒息的夏天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是怎样通过的

A·叶热列夫

我们许多人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记住了那个严峻的文件——1946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

全国闻名的最伟大的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被指责为“以恶毒的流氓方式”描绘现实，被指责为“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这份文件也谈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问题，认为它“危害了教育我国青年的事业”，因而这“在苏维埃文学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诗作”。这似乎不是评论，而是一份判决书了。

1946 年的决定竟然违背了 1925 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十分明确地谈到，“党应该竭尽全力清除那种自以为是和非内行式地以行政方式干预文学事业的企图”，它现在反而正式认可了方法论上与之对立的立场。专横武断便成了文化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特点——③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开始掀起了战后新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对付文学的这种“措施”，也施用于电影（例如影片《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音乐（歌剧《伟大的友谊》）和戏剧（《关于剧院演出剧目》的决定）方面。这是尚未从法西斯围城封锁中恢复元气的列宁格勒命运中的悲剧。

今天我们要重新审查许多历史评价。1987 年秋季，《共产党人》杂志第 15 期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在谈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时说道，“就整个思想结构和认识文学现象来说，它完全背离了对文化所应实行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

从读者的来信可以知道，使许多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有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关于列宁格勒两个刊物的“毁灭性”的决定所依据的原则。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这些杂志的工作时，有层·谢·吉洪诺夫和亚·安·普罗科菲耶夫参加会议，这是真的吗？他们说了些什么？安·亚·日丹诺夫说了些什么？再者，在战后的年代，他在制造猜疑和意识形态上的褊狭气氛方面一般地起过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自从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即自 1934 年底以后，日丹诺夫领导了列宁格勒党组织，而自 1944 年夏起他担任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正是此时列宁格勒的文学家们首先遭受有组织的中伤和迫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发动反对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们的大规模运动的人就是斯大林。1946 年的事件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那种片面的、平板的和专横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投射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上。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用行政办法来管理。今天我们发行的这些书籍，要是在以前的年代被求知心强的读者所接触，那些读者就会失掉自由。

可是，专断思想病灶的根除是很困难的。行政上对创作生活的干预、荒谬的查禁工作、对生活真相的害怕心理，以及对书刊和艺术的批判都未绝迹。有时，《忏悔》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有时又“说服”总导演拒绝上演沙特罗夫的新剧本。有时又把“一味抹黑的”纪录片束之高阁。每一件这类事情都是 1946 年事件中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僵死的专断精神的再现。

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文学问题的呢？1946 年 8 月 15 日，即在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之次日，专程来到涅瓦河畔这座城市作“说明”的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该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速记记录保存在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即苏共中央所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分院]党史档案馆里）。

这就表明，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会上集体讨论过的……

好吧，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有人会说的。

列宁格勒的作家和记者 N·A·列沃涅夫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做了会议的笔记。他在从莫斯科返回以后又让其他参加过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作家们读过笔记，并做过核对。他当过报纸的采访记者，所以会速记，他也不会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列沃涅夫斯基笔记的原稿不久以前交出，保存在俄国文学艺术研究所（普希金旧居）手稿部。笔记的全文打算刊登在《星》杂志的夏季某一期上。

下面便是列沃涅夫斯基的话。

——在这里我度过了城市被围的整个时期——我在列宁格勒战线上战斗，在师级的《斯大林旗帜报》工作，甚至还要给《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鲍里斯·利哈列夫当副手——我没复员，而且被“借调”。直到 1946 年春天我才脱掉军装。8 月初，就是那次难忘的莫斯科之行。

我们有六个人同行，即曾经多年任《星》杂志主编的 B·萨扬诺夫，还有亚·普罗科菲耶夫、B·利哈列夫、N·卡皮察、H·尼基京和我。去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在省委会发给出差证的时候只是说，将要讨论列宁格勒的一些杂志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我们被领去见日丹诺夫。日丹诺夫那里有一位姓亚历山德罗夫的同志，据我所知，他是宣传鼓动部门的主管人。但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有关即将举行的讨论的任何具体情况。我们只是回答了有关两个杂志的一些作者的某些问题。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到亚历山德罗夫说了这样几句话：“请不要出‘莫斯科’旅馆到任何地方去。不要打电话。不要邀请莫斯科的任何作家。不要同他们任何人接触。”

茫茫然地打发了两个漫长的日子。8 月 9 日电话铃响了：“请于 19 时 30 分到通行处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中央组织局的会议大厅。喘气急走的、快活的阿廖沙·苏尔科夫来了，他向列宁格勒的人们问好，送给每人一本《星火》丛书中的书，封面上有米哈依尔·左琴科的忧郁的肖像。

“读读吧，小伙子们！前线战士们是很尊重笑声的……”

铃声响了起来，我们被请进大厅，里面像棋盘般地摆着小桌子。

在前面，桌子的后边坐着主席团：斯大林、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其他领导同志也在大厅内各就其位。

日丹诺夫宣布开会。

日丹诺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格勒的《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刊登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例如列昂尼德·鲍里索夫的小说《从黑尔丘来的魔法师》。这完全是表现了作家脱离时代的远离现实的想入非非之作……另一位作家克内赫特则描绘了一个圣像收藏家……作家雅格德费尔德发表在《星》上的剧本在思想上只有平庸的中学生的水平……

《星》杂志上的诗歌创作散布着颓废思想和悲观情绪……这就是阿赫玛托娃所写的东西——全都是对过去怀抱的忧伤的思念……

左琴科描述猴子在排队的人们肩上、头上跳跃的那篇东西是最有害的作品。这个猴子对人们及其不高明的制度感到苦闷。这篇东西谈的是食品店里食品的分配问题，谈的是民警问题。社会被描写得很不像样子。"我像教育人那样去训练它"（该男孩子在故事中是这样说的。——A·叶热列夫注）。由此可见，这猴子成了人的榜样。

斯大林：——那末，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属于哪一类野兽？

日丹诺夫（接着说）：——《列宁格勒》杂志刊登了不健康的东西。诗人塞尔文斯基描写被烧毁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死寂……只有一个女人……

斯大林：——材料还不够吧……

日丹诺夫：——错误的原因出在哪里？像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这些作家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国有一批作家受到敌视我们的文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主编也丧失了警惕。

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必需改进《星》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缺少办两个杂志的必要的力量，《列宁格勒》应该停办。

请你们发表意见。

首先说话的是 B·萨扬诺夫。他谈到了战后第一年的困难，然后悔恨地说；"我认为，我个人的错误是发表了左琴科的小说。"斯大林这时插话说："这是最空洞无聊的东西。它无论对思想或者对心都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这篇小说使人恶心。粗俗的把戏。"

《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 B·利哈列夫也引证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虽然他也同意："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

接着是列宁格勒作家协会主席亚·普罗科菲耶夫讲话。据列沃涅夫斯基看来，他适时地引用了几首可笑的歌谣之后。使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了下来。斯大林向他提了几个关于《星》杂志的编辑工作中的问题，问他在一个城里办两个杂志是否适宜。普罗科菲耶夫让他相信，列宁格勒人有能力"办好两个杂志"。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斯大林：——那末，阿赫玛托娃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年老以外，她还有什么？

普罗科菲耶夫：——她已经老了，不好对她进行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拒绝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以后，《旗帜》杂志还刊登了她的作品的原因。

斯大林：——我们得收拾收拾他们一下。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部主任 N·M·什罗科夫发言时，日丹诺夫指责他说，列宁格勒人"自己在战争年代把左琴科痛打了一顿，现在忽然又把他弄进了《星》杂志的编辑部"。所谓"痛打了一顿"是指《布尔什维克》杂志（1944 年第 2 期）上有四位列宁格勒作者的

一篇文章讨论了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在组织局的会议上，甚至弗·维什涅夫斯基在发言时也散布过这个“调子”。

维什涅夫斯基：——我们列宁格勒人向左琴科开了第一枪，因为他总是拖出陈腐肮脏的洗脚布来。他描写一些残废人、醉汉、民警，等等。

斯大林：——他是个宣扬无思想性的人……

亚历山德罗夫；——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

斯大林：——作家们认为他们可以不问政治……把人写得华而不实，仅此而已。而这就是坏之所以为坏之处，是毒害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这种人呢？因为他们所写的是比引起呕吐的药粉更坏的东西。我们能够容忍这些身居领导职位而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东西的人吗？……我们的刊物不是私人企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想承认我们制度的人们的趣味。谁不想进行自我改造，比如主琴科，就让他见鬼去吧。不是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口味，不是要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适应主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难道阿赫玛托娃可以教育人吗？难道左琴科这个傻瓜、粗鄙的小说家、下流的作家也能教育人吗？

日丹诺夫：——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电影《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所犯的“思想方面的错误……”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已被作家协会开除。停发工资后也停止刊载他们的文章。左琴科试着在一个皮鞋合作社谋生活。报刊广播上开始的中伤行为已发展成为持久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许多文学家，不只是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所提到的那几个人。

现在我们报刊的言论认为，战后的“揭露”和迫害就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措施，旨在维护和加强斯大林所建立的专断政治体制。是该结束斯大林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的、对付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做法了。当然，在这方面，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也不可能不遭受打击。列宁格勒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N·艾文托夫回忆说：阿赫玛托娃几乎已经有 20 年没发表过东西，她被宣布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但在战争年代忽然写出了优美的爱国主义诗篇，她风前写的抒情诗也马上一版再版。不但如此，而且 1916 年在莫斯科举办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诗歌晚会，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说法，会上她过去发表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作家的胜利！左琴科决非国教奉行者——须知他是一位讽刺作家，他不是溜须拍马的人，而是一位鞭笞着！就在这时，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这位讽刺作家不可能被人抛弃！值得注意的事实——但任何人当时也没看出来——是在《布尔什维克》（1944 年第 2 期）上登载的反对左琴科的文章在语调上无所顾忌，在实质上又极不公平，像日丹诺夫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说，这次批评是列宁格勒市的党的组织示意发动的，但日丹诺夫本人当时却是市委和省委书记……

另外，不论是左琴科还是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列宁格勒的一小部分人，而列宁格勒却

是这样的城市：它体现出文化修养，以它的极度美丽、以它的革命性、以它在祖国文化和科学中的独特作用，并且以它的工业发展而受到人民的热爱——总而言之，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这个城市就其在我们这个大国生活中的意义来说是全国各省中的佼佼者，它作为我国的精神中心足以与首都莫斯科并驾齐驱，它没有能得到斯大林的钟爱，是因为斯大林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只需要严格的国家集权制。列宁格勒的人在被围城期间表现出来的震惊世界的勇毅大大地提高了列宁城市的威望。

但是，在斯大林看来，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和列宁格勒好像是在一条线上，固执地一直往前闭。把别人挤倒，踩在自己的脚下。难怪两年后，一个卑鄙的匿名者被利用来发动"列宁格勒案件"，在发动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大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都被镇压。这不仅是惨杀掉一些干部，并把一些其他地方上的干部调来担任了党和苏维埃机关里所有重要的职位。这样一来，"危险的"列宁格勒精神便被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了。

显然，事情是从知识界开始的。是从作家和记者开始的。似乎只是从批评开始的。

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对于在战后和被围城时期曾丧失数百万人生命的列宁格勒所做的事情，正像许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使这个城市的精神习俗受到摧残，至今还能感觉得到这种损失。可想而知，这种损失当然不只是列宁格勒的损失。

请不要忘记战后的悲剧是怎样开始的。

（原载苏联《消息 g 报》1988 年 5 月 20 日。张书生译）

注释

韦尼阿明·卡书林

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会记得左琴科在 20 年代的声誉在文坛鹊起的情况。早在 1929 年，"科学"出版社便出版了献给他的论文集，其中的撰稿者有最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现在，当许多新书在描写他的时候，当把他和他的主人翁们之间的等号最后被抹神的时候，当在晴朗的天空下使左琴科返回第一流苏联作家的小圈子里的真相大白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来重新证明事情的真相了。但是，对于 1946 年迫害他并把他置于死地的情况则不应该忘记，不应该持暧昧态度，不应该缄口不言。不要忘记那些凌辱、痛骂、变节和贫困之中的强迫沉默的年代。

左琴科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语言和表达早已进入人们说话的语言。在所唱的赞歌中也有一些不自觉的不理解。对付这种情况只要记住一点，即不要感到幽默。不过，为了不感受左琴科式的幽默感，得完全做聋子。

在怀疑态度和否定态度中也加入了不理解的成份。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左琴科都用他每一行的作品来嘲弄在文学中越来越屡见不鲜的肉麻的吹捧。他发出奇怪的嘲笑是在这样的时候，那时广播里几乎每隔二三分钟就能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那时甚至在作家协会任何一个部门的日常开会的通知书里都要提到天才的斯大林的名字。

1957 年，在《莫斯科文学》丛刊第 2 集中刊载了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

在作家协会的大会上马上批倒了这篇小说，后来又查禁了这本丛刊本身，其实这本丛刊的出版是同我国文学中新的、带来希望的时期联系着的。我现在只是要说，这本使雅申增辉的小说只是因为它抓住并且巧妙地描述了我们国家一个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即产生两面性格的恐惧心理才被批倒的。这性格的一面是属于个人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的另一面是行政的、官场的，能瞬间把纯洁、诚恳而善良的人变成国家机器的“杠杆”。

这种人格分裂早在 20 年代就已被左琴科预言到了。不仅如此，他在他的优秀小说中塑造了一种“新”人，对这种“新”人来说，双重性格又是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

左琴科是第一个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力量的人。这种力量同智力水平的低下肩并肩地存在，也同多次对无保护的艺术的进攻肩并肩地存在着。这种力量就是无限繁衍的小市民习气。只有小市民习气才能长命不衰，因为它随时赞同双重人格，随时赞同变成“杠杆”，对“杠杆”来说，道义恰恰变成了累赘。

也是左琴科本人察觉到的，并没有任何人嘲笑过自 305 代初期以来即已占统治地位的小市民习气。

因此，这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马上陷入了孤独境地。甚至他认为是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都远离了他。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悲惨的时期，要求他空前地集中全部精神和体力来加以对付。

迄今为止，大家对 1946 年 8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杂志的决定所引起的情况并不甚了了。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文学会”发动突然袭击的原因，只能加以猜测——至少对其中直接的、个人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这些私人方面的原因并未公之于众，甚至从未向全国人民公开过。我认为经过了这 42 年之后，这件事现在可以点破了。虽然不能尽量使人相信，但是可以相信的。它的一般原因是这样的；在紧接着损失了千百万人生命的战争和胜利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有某些不确定的希望的时期。这就是人们希望得到“放松一下”的机会，得到应有的信任，得到期待已久的人道主义的待遇，得到历尽沧桑之变以后的自然的温柔情调。但就是这些希望也遭到坚决的打击；可是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反映了人民的心灵。然而在这心灵上却被坚决地捅进了有毒的一刀。

那些被故意安排着享有自由的作家则是要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做打手，——这些人也证明了我们的上述看法。

早在左琴科的第一批书籍中，作者与主人翁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只有分不清音乐和街上嘈音的人才不会注意他的。但须知，本来就有意不让人注意他的！没有疑问，事实上也这样做了。1944 年《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发表以后，小说《日出之前》的刊登便中断了。那时，他们称他为“收破烂的人”，他“在人生的秽水池边游荡，收集最坏的东西”；他们说他“顺从阴暗的心态，牵强附会解释一些畸形人物的出场”；说他“宣传对人的藐视态度，但对引人极端厌恶的吵嘴打架却是津津乐道”。

但是，《日出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是出于想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愿望。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多年如此），左琴科已完全免除兵役，他和别人一样不能做战地记者，虽然他是到过前线的。后来，当他被空前规模的诽谤所诋毁的时候，他被宣称为胆小鬼，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逃到了阿拉木图。这是谎言。1941 年 9 月，他和肖斯塔科维奇一起飞离了列宁格勒，随行的有一位够精明的市委领导，以便能够照料国家的这两位伟大的公民。左琴科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勇敢的人中的一个。

他痛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因为它鄙视个性，鄙视个人品性的独特性，鄙视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特殊性。

我们同他在列宁格勒就已谈到过这个问题，时间是在他两次短暂的上前线之后。或许那时正是酝酿已久的《日出之前》这本书正在完稿的时候。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表于 1943 年的《十月》杂志上，是由一些短篇小说所组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乍看像是日常生活的万花筒式的全景，实际上只是变态心理生活的全景。《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出的书评使该书下一部分的出书变成了不可能的事。下面试引用一节该书评的话：“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的同时代人，即这位作家的创作的想像力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左琴科给读者叙述了 62 件肮脏不堪的事件，即从 1912 年到 1926 年间使他备受‘激励’的事件。全部故事浸透了作者对人民的车视心情。据左琴科说，几乎所写的人都是些醉汉、小偷和浪荡子。这就是向读者脸上吐脏痰。左琴科怎么会写这种只有我们祖国的敌人才需要的胡言乱语呢？”

可是，他写出第一木书是为了第二本书。左琴科试图在书中说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素质，那时这 62 篇以个人生活为典型的小说就变成是必需的，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

在他于 1943 年 11 月 25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试图说明事实的真相。不言而喻，左琴科没有收到回信。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给斯大林写信，说他不能“在牢狱中”工作。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绝不后悔，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从 1926 年起就再未出书，但他保存下来了他的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被阿赫玛托娃深深埋在地下的诗篇便是她自我肯定的基础，而且她取得了胜利。伊萨克·巴贝尔沉默了，不想撒谎。他们都处在看管之中，彼此不相往来，但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尽管《日出之前》这本书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左琴科在 1946 年以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辈作家之一。但是，在 1946 年 8 月出现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社会上和文学界便形成了另一种气候。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而已，它使毫无根据的指控获得了法律的形式。根据官方的决定，左琴科是一名流氓、诽谤者、社会渣滓和鄙俗小人——我们今天在这种文件中读到这类骂街的语言当然要大吃一惊……

恐惧和庸俗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两个方面，它第一次反证了左琴科的毫不留情的、犀利的武器，而且他用这一武器来反对这种社会现象。这种武器即称之为嘲讽，它历来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但是，当这位无畏的作家所嘲笑的对象懂得了（确切些说不是懂得了，而是感觉到了，因为尚不能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以全部国家的狠毒向他展开猛烈的抨击。

但是，如果说 1946 年对左琴科的“措词”所考虑的是一些泼妇骂街的话，那末，在攻击阿赫玛托娃时却未加任何说明，只是把她叫做“发疯的太太”、“半女皇一半荡妇”，而她在世界诗坛上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品却被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破烂”。可是，这位“半女是一半荡妇”的一生却是自己人民的忠实的女儿，她曾在战争年代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它们足以使她永远和人民相亲相近，所以她的这些称谓必然要被人们所忘记。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是 1946 年 8 月通过的，但在 5 月份这位“半女皇一半荡妇”却已出版了诗作《致胜利者》，以此来歌颂列宁格勒保卫者的丰功伟绩。

哪一个俄罗斯人，哪一个苏维埃人不在 1942 年被下面的天才的诗句所惊叹，所感动啊！

这些诗句写道：

不要害怕横死在流弹之下，

不要忧伤无家可归，——

但我们保住了你——俄罗斯话语，

伟大的俄罗斯的语言！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她亲手写的每一行诗句不仅饱含着忧患、屈辱、勇敢、恐惧的情绪，而且都是在歌唱，反复地歌唱同祖国相联系的俄罗斯，通过对祖国的热爱来看人，所以它们是同俄罗斯文学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为。日丹诺夫整个报告对于文学的理解远未达到契柯夫的电报员雅基水平！这个报告充满了愚钝，对知识分子百般做作的仇——当然这是够清楚的，即他已“提出了问题”、“下达了令”，而且都是既定方针。

当然，我们今天痛苦地和觉得可笑地读着日丹诺夫的告。它折磨死了数以百计的人。由于它对恐怖和停滞来说有自我重复和踏步不前的特点，它不仅未被取消，而且有意识地被坚持了几十年。

它之所以在今天读起来可笑，是因为在电报员雅基和文学之间这场势力悬殊的搏斗中，受尽折磨的、但毕竟以宁静的光线散发着骄傲和尊严的文学终于取得了胜利。阿赫玛托娃最终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在国内也被得到承认和得到热爱。左琴科胜利了，在“用死亡消灭死亡”后终于获得我国文学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为了赢得这个胜利，他应该经受多少牺牲和痛苦啊！我们没有权利对这些牺牲和痛苦表示沉默。

如果我们是珍惜名誉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忘记过去。对我们这些创造了世界上最光辉的文学的人来说，不很体面的是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些耻辱。为什么？没有什么比回答这个问题更容易的了：为了在注视子孙的眼睛时不感到羞耻。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 年 5 月 20 日。张书生译）

胜利者

——库兹涅佐夫案件

A·阿法纳西耶夫

1945 年 1 月，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被选为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这是对他在保卫列宁格勒，粉碎敌人封锁，战胜敌人中所做的贡献的承认。四年后，他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在库兹涅佐夫一家最艰难的几个月里，舅舅西马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带来了一种很流行的游戏“杰金斯”。全家坐在餐桌前，分成两队：一队把手伸开放在桌上，另一队要猜出在谁的哪只手中有硬币或纸片。另一队队长按顺序注视游戏参加者的目光象施催眠术一样，然后大声喊道：“拿下了！”手都举了起来。纸片（或者硬币）没有了。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队长又叫道：“拿下了！”

就这样，一切再重新开始。

这家人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在这几个月，另一些人在另一张桌子前玩着另一种并不是这样无害的游戏。

1949 年 2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他发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份文件。这份文件宣布他已被解除所承担的职务。

同一天，2 月 15 日，库兹涅佐夫在列宁格勒的接班人，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波普科夫被召到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回来后心情沮丧，精神恍惚。

同一天，2 月 15 日，库兹涅佐夫一家预定要进行庆祝活动。活动没有取消。节日的桌子已经摆好。原来库兹涅佐夫的大女儿阿拉要嫁给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回来了。他看上去象往常一样愉快，充满精力，神态端庄。

没有感到发生不幸事件。第二天依旧没有感到发生不幸事件。客人走了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妻子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把孩子们叫到一起，轻轻地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被撤职了。当然，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即使后来的两个月里，也没有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一不幸事件。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开始读很多书。他是否想象得出在列宁格勒那里所发生的事？从他的眼里可以看到：他在衡量着，对比着，思考着。他依旧充满信心，精神集中。或许他只不过装出样子让那些在这些日子监视他的人相信：库兹涅佐夫充满信心，毫不畏惧，因此，他感到自己在党和人民面前是无辜的。

2 月 21 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生日的第二天），党内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安诺奇・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22 日，马林科夫在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委员阿。亚・库兹涅佐夫，候补中央委员 M・N・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 N・C・波普科夫的反党活动。

2 月 25 日，雅罗斯拉夫州委第一书记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柯（原先在列宁格勒工作）从党的代表会议主席团被直接叫到中央听候命令……马林科夫从桌后向图尔柯走过来，背着手，说："别跟党中央要花招，您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小集团？……"

3 月，又撤换了一个列宁格勒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院士，把他赶出了政治局。并解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

六个月，从 2 月 15 日到 8 月 13 日——就象六个小时一样。库兹涅佐夫的女儿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就讲了六小时。

不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被叫到中央。那是 3 月份，……不，也许更晚些时候。3 月 8 日那天，孩子被允许到她们的女子学校去参加晚会（几个孩子当时分别不同的学校上学）。加莉娅也准备去。妈妈谨慎地问："许，还是不去好？"加莉娅很惊奇；"为什么？！"

库兹涅佐夫一家对不幸事件的感觉是逐渐增强的。爸被送到了佩尔胡什科沃。他回到家时很高兴，并开始整理西："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将去学习！……"

全家人坐出租车去看他。还记得：爸爸住在二楼一间窄得象四室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铁床。还记得：那时在那里学习的人不知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将军。他们十分称赞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会玩复杂的游戏。

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只是到后来才明白，差不多所有的学员都是被逮捕的人。

7 月 31 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贝利亚的右手）向斯大林汇报说，2 月份被解除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职务的卡普斯京是个英国间谍。证据呢？远在 30 年代，当时卡普斯京是基洛夫工厂的工长，曾到英国学习蒸气涡轮机的生产技术。

8 月 10 日，加莉娅乘出租车到佩尔胡什科沃去接父亲：在那里的学习已经结束了。爸爸禁不住高兴地说："孩子们，我没有使你们失望！我没有得一个'4 分'！"他满意地给我们看发给他的军人随身携带的装具。就是说这不是游戏？那么一切都真的弄清楚了？

亚当・奥西波维奇・卡尔舍尼克，1904 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在介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入党时，曾指出他的性格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只是在经过许多年以后，通过自己的悲惨的遭遇才能看出：他的这种性格如同种子一样，既萌发了他的力量，也意味着他的毁灭。

8 月中旬，大概不仅是结束了在佩尔胡什科沃的学习。13 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已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在莫斯科散步。但这看起来就象后来西马舅舅所描述的那样：库兹涅

佐夫同孩子们在前面走着，笑着。几步远的地方自顾自地跟着两个暗探中的一个。

他们回到家里吃午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去洗手时，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小声告诉他："列纽什卡给你打过电话……"（她指的是当时在中央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走出浴室，脸色明显地变了。他很快地收拾了一下东西，在过道里吻了妻子和孩子。大门关上了。

他从街上挥着手，微笑着。看来，一切都完了？

一家人摆好了桌子，等待着他的回来。妈妈重复说着，象在念咒："没什么，孩子们，没什么，一切都会弄清楚的"。傍晚时，有一辆奇怪的汽车停在窗下。天还挺亮，所以能够看清楚，从车里走出几个穿黑制眼、戴黑礼帽的男人。

于是就有人按他们家的门铃。于是他们家的大门被完全打开。第一个进来的人（也就是最重要的人？）在门槛上就问：

——信在哪儿？！

我们同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前。这当然是另一张桌子。不在他们原先的住宅。我们看着照片："这是爸爸在博罗维契。他 14 岁时进入他父亲工作的锯木厂……这是他任共青团县委书记……这是他同妈妈在一起，新婚夫妇，他们有了阿拉……后来在卢加任共青团州委书记……您知道他几岁被选为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33 岁！……"多么光辉的经历，快速的升迁，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这两本像册中。记录在母亲的兄弟西马舅舅的两本战时笔记本中（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在列宁格勒被困时是当时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涅夫佐的军事办事员——当时有这样的职务）。

在像册旁边，有爸爸、妈妈被捕后和搜查后留给家里的厚厚一包登录单和文据。还有几封信——全部档案材料就这些。是爸爸写的信？不是，爸爸没有权利写信。是妈妈写的信，从弗拉基米尔来的，从原先沙皇时期的苦役监狱里来的信。爸爸被捕以后留下的只有登录单。在搜查时，他的所有文件全被撕毁。甚至连装过"黑塞哥维那花神"牌卷烟的盒子也给撕了。这个盒子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从 1940 年起保存的。他在上面签了名并亲自送给库兹涅佐娃作为礼物。那么那封信哪？斯大林的信呢？

那封信这里没有……

我翻看了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的笔记本。听了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叙述。我掌握了"列宁格勒案件"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是用白线缝成的，而且缝得有点技巧。

沃伊诺夫也经历了那个案件。他描述了这种游戏通常都有哪些规则："应该使怀疑对象感到被抛弃了。对他来说，机关里，工厂里的气氛都变了。被列入名单者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给他制造工作中的麻烦……，但却猜不出真正的原因。他开始变得神经过敏，不再实事求是，从而自己出现失误……我被列人这样的人的名单中，对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予以诋毁。我被列人那些在法庭面前受辱的人的行列，那些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酒鬼、精神不稳定

分子、道德堕落分子的行列。名单中也包括那些落人圈套而违纪的人，他们不仅受到诽谤，而且还要在法律和人面前负责”。

就是说事情不是简单地带走或抓起来就完。“案件”准备得很详细，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要几年。对库兹涅佐夫的“准备工作”至少有一年半。沃伊诺夫甚至认为“列宁格勒案件”根子在 1941 年列宁格勒被围困时就种下了……，而它表面上开始的时间是 1949 年 1 月。

1948 年 12 月，举行了列宁格勒州和市的党代会。会上宣布，会议一致通过了州委和市委书记的改选。很快有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莫斯科。计票委员会委员发现：“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巴达耶夫的名字在很多选票中被勾掉了”。的确是这样：“未来的英国间谍”卡普斯京被划得最多，有 15 票反对。是什么造成伪造的选票呢？是选举人的独立意愿破坏了理想的结果？或者是同样的圈套在起作用？只要看一下就够了，是谁需要哪伯只暗示一下：降低革命摇篮（按：指列宁格勒——译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只稍晚些时候就把刚炮制出来的事实供大家欣赏了……

不，我们不去断言事情就是这样。谁是伪造者，他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很难搞清楚。至少，表决这件事成了有充分根据的借口。早已调试好的（镇压）机器这就转了第一圈。第二圈是：1949 年 1 月，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全俄批发交易会。各加盟共和国都参加了这个交易会。这不成了全苏性的交易会了吗？这得到中央机关批准了吗？没有。由此可见，应把这看作是挥霍浪费的事实，而且还应看作更为严重的事实：搞小集团，与中央委员会对抗。第三圈是：N·C·波普科夫是一个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到了负责岗位上，大概和库兹涅佐夫一样，也要接受改造，但结果却不一样。

我在沃伊诺夫的日记中读到：“1949 年 1 月前不久……我见到了波普科夫。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在我十分熟悉的库兹涅佐夫原先的办公室里。波普科夫的样子令我十分吃惊，在基洛夫和库兹涅佐夫使用过的办公桌的后面坐着的是一个病人。特别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双转来转去的眼睛和一个张皇失措的人所有的可怜的、祈求宽恕的微笑。”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在这种状态下对谁说了些什么，他自己是否还能记得？至少，人们从他的讲话和谈话中诱取了第三个事实：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酝酿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思想”。

根据这样三个事实，第一局已经赢得了，现在该第二局了：侦察。参加游戏的人——不大不小——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官衔。侦察是怎样进行的呢？既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客观地检查这种侦察，它又能怎样地进行呢？如果在成文法律之上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些铁的规则：只要被告人承认——就是铁证，主要的是——侦察人员从内心认为对人民的敌人不能象对待党的同志那样，它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仅仅是受到怀疑的图尔科，侦察人员对他又是恫吓，又是利诱，大喊大叫说：“假如你不承认，就是同中央对抗……”。让我们来想一想，这样就没有受怀疑的人了。因为你只要承认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根据这个原则，你预先就注定有罪。

结果是：被判处极刑的有：A·A·库兹涅佐夫，H·A·沃兹涅先斯基，M·N·罗季奥诺夫，N·C·波普科夫，R·O·卡普斯京。稍后在列宁格勒还有：州委第二书记 F·O·巴达耶夫，州执委会主席 N·C·哈里托诺夫，国家安全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 N·H·库巴特

金，市委书记 N • H • 莱温……全国各地的列宁格勒人：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 M • B • 巴

索夫，摩尔曼斯克州委第二书记 A • N 韦尔比茨基，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 H • B • 索洛维约夫……全部因“列宁格勒案件”遭到镇压的共 200 多人。三年之内有二千多领导人因此案而被撤职。

镇压机器开足马力，把剩下的得到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承认的神圣公理践踏无遗。遭到践踏的，在无罪推定原则后，接着是法律工作者的第一条戒律，“法律不具有回溯效力”。问题是，库兹涅佐夫和其他被处决的人是在国内已经取消死刑的时候被捕的。根据上述文明准则，他们应按被捕时有效的法律进行审判。但是……，恢复了死刑，并被处决了。

弗拉基米尔 • 尼古拉耶维奇 • 巴佐夫斯基，现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关税监督总局局长，当时是列宁格勒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告诉我说，很多共青团书记由于对青年的“错误教育”而被撤职，可他们刚在不久前却因对青年进行卓有成效的共产主义教育而得过奖章……

从弗 • 尼 • 巴佐夫斯基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库兹涅佐夫被选上中央书记后“负责干部工作”。在库兹涅佐夫之前由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阿诺维奇亲自管（其中也包括贝利亚的部门）。他现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换句话说，好象库兹涅佐夫在“干部工作方面”排挤了马林科夫……

库兹涅佐夫知道并看到了这一点。不可能不知道和看不到。可是据图尔科回忆，库兹涅佐夫成为中央书记并主管干部工作后，没有特别关心自身的安全，……他批评了马林科夫。而且不是在关闭的屋子里批评的（仅仅这样，就足够构成危险了），而是公开地进行批评，就象现在所说的“公开性原则”。不仅如此，据巴佐夫斯基的回忆，库兹涅佐夫开始认真地注意起阿巴库莫夫的部门。

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就这样天真？

阿列克谢 • 亚历山大罗维奇 • 库兹涅佐夫被捕后，过了一段时间。在 1949 年秋天，国家安全部为他准备了一份材料。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一下已经形成的这种荒唐局面。另一方面，大概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不仅去“审查”一下库兹涅佐夫一家，而且去“审查”米高扬一家。谢尔戈 • 阿纳斯塔索维奇说：秋天，父亲有一次让他在桌子对面坐下。父亲十分清楚他们的谈话有可能被人偷听。他带着一副冷峻的面容开始宣读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向侦察人员交待的所谓供词……

“供词”中既没有谈到恐怖活动，也没有谈到“受雇于”某一外国间谍机关——就象 1937 年的案件中常有的那样。有的是在当时最严重的“供词”：“我们不喜欢斯大林……”当时谢尔戈问父亲：这是否有可能是侦察人员臆造出来的呢？父亲用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不可能，在每一页上都有签名。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侦察人员大概不会使用的。父亲说得很肯定，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猜出，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这些。儿子说：好吧，即使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只是公开说出的想法——事实在哪儿呢？一定会证明阿列克谢 •亚历山大罗维奇无辜的！对这个看法，父亲自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诧异地扬扬眉头。这样，儿子就明白了。审判决定原则上已经定了。父亲又补充说：我不能禁止你去库兹涅佐夫家。（儿子想，

这还用说，我就听你的！）但是，在同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谈话时要谨慎……。谢尔戈开始只把这当作劝告——不要时时提到她丈夫，以免使她受到创伤。只有当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被捕时，他才意识到：也许父亲在那时就已经知道这事。

我听着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的这些话，根直率地问：

——他为什么在房间里谈起这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比如在花园，那里可以把一切谈得更详细！

——请想想他当时的处境，——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忧郁地笑着说，——我当时是一个大学生，19 岁，年纪轻，没有经验。如果父亲把一切他所想的都告诉我，而我在激动时或争论中又去告诉给别人。他就会因此而使我们大家遭到致命的危险。

看来，比较理智的办法，就是在有人能够偷听到的地方讲话……

这件事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和人们的（甚至是国家高级干部）所处的状态。我们很难想象，人的最普通的内心活动具有怎样的价值。有人告诉我，在谢尔戈与阿拉结婚前夕，卡冈诺维奇对米高扬说：你在干什么？那儿的事已经全都决定了。

但是，婚礼并没有取消。

当逮捕和处决开始以后，在特别保育院里有许多被迫害的人的子女。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被藏在米高扬的别墅里。在逮捕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时，没有动她的孩子。据说这是因为米高扬向斯大林求了情……

我思考着这一切。我觉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本人的行为最难于置信。他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释？为了理解这一切，应当深入地看看他的内心的经历。

1941 年 6 月 22 日，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为列宁格勒命运负责的全部重担都落到了 36 岁的市委第二书记的肩上。随后就是修筑防御工事和保障人民生活，组织民兵和选拔军事干部，组织游击队和领导前线和海军的政治部——库兹涅佐夫每天都要做这些工作。

而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行动。他当着一些亲信的面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谁呢？给市委第二书记！信的内容是：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神经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同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有关的，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这是对库兹涅佐夫在当时形势下真实作用的承认。信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将军带到列宁格勒的，并绕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交给了库兹涅佐夫。自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封信。在当时，这样的信给人以巨大的权力。这仿佛是一种授权书和保护证书。看来，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样的信可离间库兹涅佐夫和日丹诺夫的关系。而且，要做到这点的借口是相当多的。在 1942 年那个折磨人的冬季，日丹诺夫开始生病，库兹涅佐夫在他的门前设了警卫：当时任何一个列宁格勒人都不应发现领导人的软弱。库兹涅佐夫代表日丹诺夫主持市委和州委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代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通话。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的意义，日丹诺夫也明白。

应该想到，所有这一切没有逃过贝利亚的部门的注意。它的耳目不会不注意到：领袖像从墙上消失了。列宁格勒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越来越少地提领袖的名字。沃伊诺夫指出:“（对列宁格勒的）饥饿封锁时期是社会意识中的转折时期”。

实质上，处于死亡边缘的这座城市的独特条件加速了道德净化和重新思考价值观的进程。原来以为不可动摇的和不可避免的个人迷信自己消失了。城市明显地从深层提出了不同的理想，并用这种理想同官方的理想相对抗。当时的一位诗人大声疾呼一首长诗的题目：“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诗人吉洪诺夫写道，在那钢铁般的日日夜夜，同列宁格勒人在一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基洛夫。

库兹涅佐夫能不看到这一切吗？假如看到了，他采取了什么呢？让我们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从观念上说，在他那种情况下，即使不去支持现状，也至少要作出不改变现状的姿态。

但是，不要忘记，他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也不要忘记另外一点：独特的围城环境改变了社会意识，促使人们表现出并增强独立战胜一切的坚强性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性格是需要的。需要有能不受权威、上层的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的影响而作出决定的人物（说实在的，只是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才保证权威乃至上层本身得以保存下来）。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切，那就会明白一些，为什么同斯大林有直接联系的库兹涅佐夫也和大家一样。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为什么不再引用斯大林的话。为什么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和在讲坛上的正式言论中消失了。为什么库兹涅佐夫常引用基洛夫的话。为什么库兹涅佐夫一家一直保存着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照片（斯大林对基洛夫的态度即使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的秘密）。

明白一些了：为什么，可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谈到个人迷信时期遭受各种迫害的人时，根据至今解释不清的原因，始终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专横枉法的无辜牺牲者。这里有正确的地方。但仔细想一想：我们如此固执地设法证明这一点，就仿佛他们的无辜程度在二十大以后有了一些减轻似的。

我们希望什么：证明已经证明了的东西？使无法相容的东西硬凑在一起？

大概不是。当然不是！

既然这样，难道还不到该弄清楚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谁的面前是无辜的？在党和人民面前？是的！那么，在那些专横枉法的罪犯、冒险家和向上爬的人面前呢？在叶若夫之流、贝利亚之流、阿巴库莫夫之流面前呢？难道那个时代的悲剧和真理只限于无辜吗？

要知道，那时确有不信个人迷信的人？谁没有同个人迷信妥胁？最后，谁进行了反抗？

我敢于想象并断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不是无辜的牺牲品。

这样说，难道“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都是对的了？不是，情况要复杂微妙得多。他不是人民的敌人。但根据一切判断，他也不是一个天真的人，不会顺从地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C·N·沃伊诺夫写道：“为了弄清楚‘列宁格勒案件’的原因，什么是必须考虑的呢？要知道，这个案件的主要点是：库兹涅佐夫把自己同中央（应该读作斯大林）‘对立起来’；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给各州、各边疆区更大的自主权；承认俄罗斯联邦的巨大功绩；举办重建列宁格勒的成就展览会；而主要的是：新任命的这位中央书记表现出独立性，并且认真对待检查贝利亚主管的部的工作。

那么整个来说，什么是‘列宁格勒案件’？造成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会回答：需要向人民隐瞒 1941 年我国军事失败的真正罪魁，当时德国人象刀子切黄油一样地浸入我国领土？需要隐瞒农业中过火行为的罪魁，这些过火行为使得农民得不到温饱，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比实际成本还低，他们不得不逃离集体农庄？最后，需要隐瞒破坏法纪、专横枉法的真正罪魁，这些行为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无辜牺牲？正因为如此，才制造出‘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和其他许多没有名称的案件，这些案件可以叫做‘边疆区案件’‘州案件’，有时甚至可以叫做‘区案件’。……”

看来还有一个原因。不仅有转移让会注意力，施放“烟幕”，把每次的责任推给无辜者的迫切需要，而且强烈需要使一整代赢得战争、变得成熟的军人“安分守己”。这一代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赢得了精神力量。这一代人实质上预先决定了二十大的现象。

不过最好一切还是按顺序来说……

1946 年 3 月，库兹涅佐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却打破常规，没有兼任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就象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日丹诺夫当时那样。这一点，本应该使库兹涅佐夫有所察觉（据知情人证明，库兹涅佐夫接受这项决定时并不高兴）。还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关于这点我们已经说过：即没有中央机关工作经验的库兹涅佐夫却被立即派去处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干部。

这是第二个令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吃惊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斯大林给“围城时”的库兹涅佐夫的信）。第三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斯大林在裹扎湖休息时，有一天，他突然向周围的人谈心。他好象十分坦率地说：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据说，没有人反对。但是，任何一个得知这一耸人听闻的设想的人都会立刻猜想到它的第二个方面：这个不吐露心机的人决定公开讨论接班人问题绝不是一桩简单的想法。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看到被提拔的两个人实际上是真正最合适的人选。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为这样一些人最危险的竞争者，而斯大林就是故意要大声说给这些人听的。结果可想而知。但是，是不是这种预兆反而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更加坚定了？

库兹涅佐夫在得到这些暗中的警告后，并没有变得更谨慎些。他没有改变原来的习惯，甚至都没想改一改那种独立的性格。不仅如此，实际上他还反对当时公认的个人迷信的那一

套准则。他在战后的发言中不提斯大林的名字。和过去一样，经常引用的是基洛夫的话。战后他常常公开去访问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身患重病的遗孀（这是同一位因失去丈夫而精神失常的妇女的不轻松的会面）。他好象示威似同特派员见面，布置他们出差。有一次，在主持书记处会议时，他革除了一个因在兵营偷窃而被揭发的将军的职务。

他被认为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所有的人，只要想看，都可以用肉眼看清楚，莫斯科出了一个真正的塞洛夫式的人物！而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啊！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时期人领导人，上过前线，胜利啊。他在继续加强自己的声望。

这是什么声望啊！他作为监察主持了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批评了这些人（！），向他们（！）提出了任务。一位目击者的印象是，这次会议无异于晴天霹雳。

终于，发生了最后一击。那个时候很时兴在夜里和星期天工作。库兹涅佐夫命令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星期天把审讯材料送到他的别墅去。阿巴库莫夫给他送去好几袋案件材料。

这是些什么案件呢！都是“人民敌人”的案件。其中包括 1937 年的案件。据说，库兹涅佐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弄清楚基洛夫被害的那段纠缠不清的历史。

这是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是哪怕为了自己想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或者是，他已经开始了战斗？……

他没有来得及。他的对手，他的敌人先下手了。

他在门口吻别妻子和孩子（这倒不是表示永别。他们分别时一直都这样），在离开家门之前，他说：“去买点冰激凌，摆好桌子，我回来吃午饭……”

他没有回来吃午饭。他再也没有回家……。“根据逮捕证逮捕了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 年生……”。当让库兹涅佐夫的家人在逮捕登录单上签字时，加莉娅第一次看到“逮捕”两字，脸色变得惨白。妈妈示威似地没看一眼就签了字：“对搜查被捕者和其他在场的人（具体说明了是谁）没有提出控告。”没有地方可以去控告，又去控告谁呢？形式上都是对的。登录得极其详尽：“没收下列物品，送到苏联国家安全部：

列宁勋章 2 枚；

红旗勋章 1 枚；

库图佐夫一级勋章一枚；

库图佐失二级勋章一枚；

卫国战争一级勋章一枚；

保卫列宁格勒奖章一枚；

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一枚；

……

将军肩章 7 对；

男式铬鞣革皮靴一双；

……

牙膏一盒；

牙刷一柄。”

这张令人难受的清单里包含着可怕的东西。这不是简单地把人抓起来，而是要把他存在的痕迹统统消灭掉。把他在生活中，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表记彻底消灭。

审讯的时候，库兹涅佐夫没有认错，也没有请求宽恕。他离去时可以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据目击者证明，库兹涅佐夫在最后的话中说："我过去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仍然是。不管判我什么罪，历史将证明我们无罪。"……

后来……，后来，加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平稳的语调说，他们又带走了妈妈。这次搜查是更加带有侮辱性的；甚至连孩子的东西都翻遍了。孩子们只剩下与瘫痪了的祖母在一起了。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活下来的，这已是另一段故事。她们到处寻找，写信，奔走，根据登录单上的地址（"要打听任何事情可掉下列地址……库兹涅茨大桥，24 号，走院子里的门"）。最后，妈妈来了一封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中一句话也没提她的情况。

斯大林死了。贝利亚被捕。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曾二次问阿拉，妈妈回来了没有？1954 年 2 月 10 日夜里，妈妈回来了。体重只有 48 公斤，脸色苍白，走路摇摇晃晃，加莉娅给米高扬家打电话。阿拉跑着回家。到了门口，阿拉才向加莉娅坦白说出；"我们的父亲牺牲了，别告诉妈妈！"什么时候？在哪儿牺牲的？加莉娅想去寻找。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劝道："如果你不想损害健康，就别去做这事。你也无法找到他。"

妈妈在二十大以后才开始讲自己的事，讲了……她一开始怎样被单独关在囚室里，带着手铐脚镣。

后来，又怎样同加莉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和葡季娅·鲁斯拉诺娃关在一个四室里。她们可以得到哪怕很小的包裹，她们尽量用融化干酪帮助她维持生命力。

后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两人的妻子被叫了出去。她们出来时不知道自己已不是妻子了，而都成了寡妇……。她们被告知，她们已经获释了。当然，开始时她们把这当成是值班看守对她们的嘲弄，但还是开始收拾东西。

虽然，监狱里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个侦查员在审讯时对她狂吼着，干了他必须要干的一切，然后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对她说："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 I 我不相信问你的那些事!"还有一个监狱监视人，很多年以后有一次他高兴地从无轨电车上下来向她奔来。她想停下来，同他谈谈话。但没有谈成就走了。只打了声招呼。

关于她丈夫，她总是象念咒似地重复着说："我没有安葬列组什卡，没有"，或者，"我总觉得上面给了他一项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说什么时候门铃会响的。他会回来的。……"

当斯大林死的时候，加莉娅哽噎着大声痛哭着。有人对她说：你哭什么？瞧吧，现在一切都会弄清楚了！事实确是这样。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把他们叫到别墅，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敌人，这你们知道!

就这样一切都弄清楚了。

过了一段时间，库兹涅佐夫被正式恢复了名誉。在莫斯科戈拉诺夫斯基大街，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最后几年生活过的地方建立了他的纪念牌。

加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手里握着那些登录单。上面是黑色的数字，他父亲的逮捕证号码：1075。我感到，她此时想到的还有 1O75 这个号码以前和以后的人们。

我还记得在那一封著名的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万能的知慧，可否知道，他说出了一个多么锋利而真实的想法？那双无情的手开始玩弄下一轮游戏了，她是否感受到，它制造了多少痛苦的预言。这些预言就象 1075 这个数字，永远嵌在、刻在这一家人的记忆中。

斯大林在信中亲笔写下这最后一句话："阿列克谢，祖国不会忘记你!"记忆中的这一痕迹、历史上的这一证明，是无法消除的，也不该被消除。

（原载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 1 月 15 日。王刚译，陈启能校）

"医生案件"的结束

达维德·加伊

50 年代初是苏维埃国家崛起和恢复战争破坏的时期，是征服原子、修建大型水力发电站和运河的时期……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战争的人民有权期待新的生活——开放的和自由的生活。他们曾为之准备，也为之历经了痛苦。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所做的报告中谈到战后的年代时说："……一切都越发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社会的现状与过去的领导方法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滥用、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都在继续。'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被炮制出来。"

1953 年 1 月 13 日塔斯社播发了一条医生团伙被捕的消息。当时宣布说，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为自己拟定的目的是通过有害的医疗方法以减少苏维埃国家积极活动家的寿命。“安・亚・日丹诺夫同志和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接着又说；“业已查明，这一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向他们出卖了灵魂与肉体，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医生团伙的大多数参加者——沃夫西、鲍・科甘、费尔德曼、格林施泰因、埃廷格尔和其他人——已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他们被吸收进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国际犹太组织’……暗杀集团的其他成员（维诺格拉多夫、M・科甘、叶戈罗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老牌爪牙。”

这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医学科学和实践的泰斗、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会是间谍和杀手？刚一开始人们不愿相信这些，然而，许多人还是相信了。结果，门诊部变得空空荡荡，医院里的患者拒绝服药。白衣使者令人感到害怕。

“医生案件”是怎样开始的？其根源何在？医学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战后曾任苏联卫生部长的叶菲姆・斯米尔诺夫就这一案件透露了一些情况。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说：

——1953 年 1 月 13 日以前不久，我在斯大林距索契不远的别墅作客。我们在花园里漫步、交谈。斯大林指着长有柠檬和橙子的树木，谈论需要如何照料这些果树。话锋突然一转，问道：

——斯米尔诺夫同志，您是否知道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看病的是哪个医生？

——知道。——我回答道并说出了姓氏。

——真奇怪。一个医生治病可两个病人却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医生是没有过错的……

——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

——我曾注意过季米特洛夫的病历和病理解剖结果。我敢说，请您相信，当时已经毫无办法了。我了解到，顺便提一下，是季米特洛夫自己把这位医生介绍给日丹诺夫的。季米特洛夫觉得他是个知道分寸、学识渊博的人，是位业务精湛的专家。

斯大林沉默了片刻，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未必已经说服了他。他总显得疑心重重，在晚年这一点简直成了病态性的。

因“医生案件”而被捕的雅科夫・拉波波特教授（他的回忆录即将在《人民友谊》杂志上发表）回忆了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在当时说过的话；

一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在最后一次探望斯大林时，发现自己的病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就在病历上作了记录，要求必须严格作息制度，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应该说，斯大林死后，

维诺格拉多夫的诊断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在“人民领袖”生前，这位著名医生政治上的天真使他付出了自由，也可能付出生命。他的建议被视为企图阻挠斯大林参加一切积极活动，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活动……

当负责斯大林医疗观察的贝利亚把维诺格拉多夫的意见告诉斯大林的时候，他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之中，喊道：“给他戴上镣铐！戴上镣铐！”

他的发怒似乎根本就不是偶然的。完全可能。斯大林想起了列宁患病时期自己借口关心他的健康在隔绝革命领袖参加党的事务中的作用。现在出现了他本人陷人类似境地的情况。他的治病医生想要让他彻底平静，停止一切活动。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很快就被捕了。

对第一批最权威的医生的逮捕发生在 1952 年 11 月。鲍皇斯·科甘教授的儿子、建筑师列奥尼德·科甘回忆说：

——我在建筑工程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回家晚了，突然听到房间里的高声喊叫声。我们家里正在进行搜捕。我记得父亲已被带走了。搜捕进行了整整三夜，他们敲打墙壁，查找武器、毒药等等。我的父亲是 1917 年 2 月入党的党员，是沃伦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此后他献身医学，成为莫斯科著名的内科医生。他负责著名国际活动家的健康情况，包括为季火特洛夫治病（斯大林在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斯火尔诺失的上述谈话中指的恰恰就是鲍·科甘）。父亲和季米特洛夫结下了友谊。第一次审讯时，当他听到证词称他是外国走狗时，他是何等震惊。

瓦莲京娜·戈特利布大夫，这位在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业已去世的雅科夫·戈特利布教授的女儿说：

——父亲曾为后来被枪毙的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鲍基罗夫看过病，好象还是 1946 年在巴库时，父亲为鲍基罗夫作过染色膀胱镜检法治疗。为此曾往其静脉注入一种专用溶液。后来，歹徒们便先给父亲，然后给他的病人的静脉注射这种溶液……

还是让我回到 1952 年的那些日子吧！我们一家与沃夫西一家交往密切。11 月 7 日我们去他们家里过节。不久以后我们就知道：米隆·谢苗诺奇被捕了。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逮捕他？百思不得其解。战时他是红军中的内科主治医生、杰出的临床医师、学者——这是怎么回事？

柳博芙·沃夫西工程师说：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我结了婚并搬到了列宁格勒 c1952 年 11 月的节日我是和三岁的儿子在莫斯科父母那里度过的。爸爸和我出去散步，路上他突然说道：“前几天维诺格拉多夫过 70 寿辰，人们很奇怪地、几乎是压低噪音向他表示祝贺。叶戈罗夫那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我明白了：爸爸是想让我对以后的事情有所准备。或许，那时他巳料中许多事情。我忧心忡忡地返回家里。而在 11 月 11 日前夕爸爸就被捕了。

对于不久以前受到尊重的人们的荒谬指责令人震惊。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莉季娅·季玛舒克却很快声名鹊起——她是揭露“罪犯团伙”的主要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授予她列宁勋章。在那些日子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还在不久以前，我们还未认识这位妇女，但是现在莉季娅·费奥多西耶芙娜·季玛舒克医生的名字成了苏维埃爱国主义、高度的纪律性、不屈不挠勇敢地同我们祖国的敌人斗争的象征。她帮助撕下了美国走狗利用医生的白大褂从事杀害苏联人民的败类们的面具”。

1953 年 1 月中旬“人民的敌人”的妻子们也被逮捕，而他们的孩子受到迫害：解除工作，开除党籍、团籍。

凡被列人“暗杀集团”主要参加者名单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年届 90 的弗拉基米尔·瓦里连科是最后去世的人。他们极不愿交谈对狱中经历的痛苦的回忆，这一痛苦没有随着岁月流逝，只是变得遥远一些罢了：他们不愿有人用各种问题来触动旧的伤疤。因此，在他们亲近的人的记忆里，保留下来的与“狱中岁月”有关的片断是不多的……

审讯是在夜间进行的。最难忍受的是通宵不能睡觉。审讯过程中用强烈的灯光照着面部。从那时起，沃夫西的妻子——藏拉就对强烈的光线感到惧怕。

他们要求米隆·沃夫西承认他同希特勒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米隆·谢苗诺维奇冲着侦查人员说道:“你们把我说成两家情报机关的走狗,就是不要把德国间谍强加到我的身上，我父亲和我兄弟一家战时都被法西斯分子在德文斯克折磨死了”。“别用自己亲人的鲜血做投机”——侦查人员答道。

国家安全部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处的头头柳明亲自负责“医生案件”。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道德、卑鄙无耻、热衷权力、追求官运的人。柳明有意伪造侦查材料。医生被捕很久以前，他就开始陷害他们。还在有关“暗杀集团”的消息在报刊上出现以前，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描记技术室主任索菲娅·卡尔芭依和这家医院的顾问雅科夫·埃京格尔教授就成了他的牺牲品。他们被指控故意错误地分析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心电图。埃京格尔没能熬过监狱生活就离开了人世。

逮捕的规模扩大了。柳明预感到了飞黄腾达、高升、奖赏……而这时斯大林死了。人民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被关押的医学家们。审讯还在继续，看来似乎劲头小了一些，好象是因为惯性仍在继续。

没有被捕的许多人——被捕者的孩子和亲属——对斯大林去世的反应是：“现在谁也帮不了我们的亲人了”。他们把斯大林看成是救命恩人和保护者……

4 月 3 日到 4 月 4 日的夜晚到了。所有被捕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突然被带出监狱，装上汽车，分别送回家里。只是现在，在获得自由以后，医生们才知道报上刊登过关于他们的报道和斯大林的死讯。

翌日清晨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特别说道：“核查表明，对他们的指控……是伪造的，而侦查人员所依据的文件资料是不能成立的。业已查明，被捕者的供词（这些供词被用来确

认对他们提出的指控)是前国家安全部侦查处工作人员通过采取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方法获得的”。

接着是关于撤销授予季玛舒克列宁勋章的命令。她本人还在医院工作了不短的时间，然后就退休了。关于这一点，看来还应说明一下，因为至今有人听信流言蜚语并且散括它们，好象季玛舒克在 50 年代中期死于一次车祸，成了某人阴谋的牺牲品。不是的，她平安地活到老年。

沃夫西、维诺格拉多夫、科甘、叶戈罗夫、费尔德曼、瓦西连卡、格林施泰因、泽列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波波娃、扎库索夫、舍列舍夫斯基、马约罗夫和其他人重新获得了清白名声，并回到医学领域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去。

至于柳明，如同政府通告中所讲的那样，“考虑到他行为的特殊危险性及他所犯罪行后果的严重性，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柳明极刑——枪决。”与伪造、强加虚假指控有关的前国家安全部有关人员也得到了严厉的惩处。

这样“医生案件”被圈上最后一个句号。

（原载《莫斯科新闻》周报 1988 年第 6 期，1988 年 2 月 7 日。杨来弟译）

最后一个受害者

——经济学家的评论

季娜・佐卡耶娃

（原编者按)这篇评论并不奢望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作者的目的是不带偏见地回顾 50 年代初经济学讨论会的教训和 斯大林所采取的解决科学问题争论的方法。大家知道斯大林自己也不怀疑在决定许多科学家命运方面他扮演了最高审判官的角色。遗传学是这样，语言学是这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

可能很少有人还同时保存这样两本书。一本是小型深红色的出版物。这本书的书皮上印着镶有桂叶花边的著名的带着小胡子的侧面像，有烫金的签字；约・斯大林，他的著作的最新名称也是长长一列烫金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的时间是 1952 年末。这样精装的一木书总共有一万册发给了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所指的是 1951 年 11 月举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末定稿讨论会。斯大林用这本书给讨论会作了总结。

另一木书是作为讨论会的结果而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结言由很有名望的作者注明的日期是 1954 年 8 月。这是一个时间分界线，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分界线！已经没有出版教科书的鼓舞者了全球已经没有带着桂叶花环的人了。但是，时代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本书像是已经死去的纪念碑，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今天，大家对经济科学的缺陷都看得很清楚，它脱离实践，它用词语进行抽象的和烦琐的议论，否则，经济学家自己也不会把这种词语叫做“毫无意义的词语堆砌”。很少进行思考，所以也没有名副其实的语言。这是表面上的缺点。这种缺点的必然性是隐藏得很深的。可以认为，人们在这门科学中由于本领不够，只是研究得差，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没有努力去解决实际任务。

但是，这不是缺点的内幕。因此，我要根据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来把这一点告诉给大家。

许多科学经历了不幸的命运。有些科学，我们以前就知道了。另一些科学，我们是最近才知道的，但是，经济科学可以说现在还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称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更是如此。我发觉名称本身变得很少有吸引力，所以听起来也不优美。政治经济学曾经使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具有吸引力，但是这门基本科学失去了以往的意义，特别是称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部分更是如此。

斯大林造成了经济理论的这种变形。现在回忆谁最早和谁调门最高说斯大林又一次对科学作出贡献，这没有多大意思。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虽然不再出现对“创造者”的阿谀，但是我们继续卑躬屈节地为他效劳：科学还是那个样。

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总的情绪从一开始就对经济科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欣快心情，一种深信历史是从完全空白的一页开始的心情。随便哪个领域：不论是社会领域、生物学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全都一样。要知道，那时许多人既不需要普希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种情况使譬如生物学变成什么，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对于经济学来说，情况也不妙，因为在这里，把历史连给成为统一的总过程的根和遗传密码也中断了。“我们是主人，我们要建设新世界！”但是，怎么建设呢？

似乎恩格斯的名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所指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自由王国”被看作是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来管理社会生活。

在虚无主义总的背景下，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科学在党性的借口下，一部分接着一部分地被以权威自居的人舍弃了。格尔曼·洛帕京这位“思想上的蒙难者”，如果能再多活些岁数，就会再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失望。由这位杰出的译者译成俄文的《资本论》中有关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拜物教等章节，首先被遗忘了。

马克思把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的原理称作是两千年来没有被看破的最神秘的现象，并认为它是自己的主要发现。这条原理却被代之以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的带甜味的废话，这一思想后来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牢固的成就”。而实际上，这句话只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社会主义是完全无冲突的经济制度。当然，人的关系（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是“生产关系”）也被宣布为是这样的。人们的命运通过社会生产发生的矛眉和冲突（唉，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是简单的矛盾和冲突）不见了，宣传的是这样一种制度，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和纯洁的”，是容易指挥的。

不难想象，这种没有生命力的论点与斯大林同时吹嘘的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理论”是多么不谐调。许多宣传生产关系“纯洁性”及其无冲突性思想的人，

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悲惨地确信，这种甜蜜的漂亮话与残酷镇压的现实是骇人听闻的不一致。这样的人中间有布哈林，有沃兹涅先斯基，有奥尔忠尼启则。

任何条件下都支配经济体系的自然调节者被越来越少地记起，也忽视了象供求关系和把生产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的这类要求……由此经济理论又丢弃了许多部分。任何新的政治经济学题目变得对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多余的：譬如广告或信贷流通形式都被宣布为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然而，同时却竭力鼓吹关于“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的说法，其中首要的是计划性规划。“计划”作为唯意志的管理方法的反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东西。就是说，也成了经济观点的主要东西。在宣布计划是主要的“特殊规律”的同时，却很少对社会主义确实需要组织生产的科学体制操心。

就这样形成了新概念的知识库，但是其中真货并不多。而主要的是，这些无定形的空话有多少分量？真是轻如鸿毛。在一次一次的“争论”都以镇压结束的时期内，真正的经济概念和杠杆就消失了。经济学家受到了“教育”。杂志上充满了他们的“悔过”和自我揭发（“是的，我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我悔过”）。他们往自己垂下来的头上撒灰。

这样，在唯意志的管理方法完全凯旋的条件下，真正的经济概念还能够站得住吗？它们是否还需要呢？

主要的经济科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准备正式形成的。它准备问世。1936 年通过了关于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决定。同时在编写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的杰作。当然，他也不会放弃插手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改写经济科学，是他最后的一个重大行动。

斯大林赋予经济科学以什么作用？他想把什么塞进经济科学？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到经济学家参加此书出版之前的讨论会时，他们已被折腾得服服贴贴，以致似乎见到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科学专家们都害怕说作为科学的主要概念的“所有制”这个词，那怕是把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从高层次（“全民所有制”）降低到具体的人的层次也是这样。他们害羞地用诸如“使用”这类平淡的同义词来代替这个词。这是多么严重的妄自菲薄，以致斯大林也不得不出来鼓励他们一下，并“稍加治疗”。不过，现在有许多人写道，他也善于用这种方式捞取资本。请看他是怎么写的：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内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所有。”

就这样，斯大林发了慈悲，宽宏大量地准许使用“个人所有”这个术语。

其实，他在下边一段解释说：“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

西属个人所有。”

至于谈到拖拉机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作为集体农庄可能的所有制（讨论会的参加者萨宁娜和温什尔建议也采用这种方案），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任问让步和任何施舍。斯大林指责萨宁娜和温什尔科学上无知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写道：“萨宁娜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斯大林给两位经济学家的建议贴上的标签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原来如此顽固的忽视商品货币关系的根子就在这里，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的心愿就是这样。可是，斯大林在言论上，在“理论”上，要点小聪明，甚至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使实践朝着直接产品交换的方向发展。

要了解斯大林的基本思想，就是说要了解他想要什么样的经济科学，不仅要读他的著作的原文和他对问题实质的论断，而且要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从书的封面上的金字后面，这位思想的霸占者观察着。根据他责怪敢于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话的愤怒和粗鲁程度，可以判断出他实际上想要干什么。雅罗申柯成了撞到最不容许碰的要害上和破坏斯大林游戏规则的主要人物。他是向政治局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提意见的一位经济学家。

我们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大学生们高兴的是，斯大林虽然没有饶恕我们所喜欢的教师亚历山德拉·萨宁娜，但是毕竟没有消灭他。而雅罗申柯感到简直是被钉上了十字架。他被吓得不敢动，受到讥笑，被侮辱。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惹起这样的大怒呢？

雅罗申柯的“罪过”在于他染指了这门被创立的科学的对象本身。这就是他使新出炉的这门科学所推崇的许多问题遭到怀疑。当亚当敢于从树上领略知识的时候，上帝大怒了。雅罗申柯也犯了这样的罪过。他所建议的，他所不同意的东西，没有列人斯大林的讨论计划，是同这样一种公式相矛盾的，根据这种公式在眼前建立着一种非常抽象的、被抛到九霄之外的、脱离地球上的需求和经济实践的科学。斯大林好像达到了一个目的——把新出炉的科学勉强塞入了不存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被规定研究的不是生产方式，而仅仅是“生产关系”，而且实际上不涉及生产力。这无异等于把根据人的影子研究人的世界当作科学。

就这样形成了使我们到现在还感到苦恼的经济科学的缺陷。

根据斯大林援引的雅罗中柯的“意见”的摘录判断，雅罗申柯坚决不同意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缩小。我们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读到：“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其次，我们还读到：“雅罗申柯在其给政治局的信中请求‘允许他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把这个主要思想作为教科书的基础。”

斯大林以其不可遏止的怒气和粗暴的态度猛烈抨击这两个建议。他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雅罗申柯同志……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的受害者。

斯大林还讥笑雅罗申柯的请求。他说："雅罗申柯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又是贴标签！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雅罗申柯在确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是不是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立场是一位专家对提供讨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脱离经营实践、对生产关系的脱离生产力所作出的自然反应。他对这门新科学的对象定义怀疑，要求去讨论主要的经济科学接近经营实践的程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根本否定了这种讨论的必要性。

教科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院士为首的作者集体。是怎样的命运的嘲弄啊！1934 年，在经济问题讨论会上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说："任务不在于去千百次地构造关于规律性的许多一般原理，而在于用具体的历史资料说明规律的作用"。

现在，摆在这位作者面前的工作是去推翻他说过的这些合情合理的话，去撰写"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去把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科学割裂开。

就这样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那里，脱离实践被推崇为一种原则。

……许多年和几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编写了不止十本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包括 1987 年出版的最新的一本。但是，实质并没有变。它们的家谱是从那第一本教科书开始的。还是那些关于"不存在雇佣劳动"、"劳动力自动地不再成为商品"的宣言式的原理（咒语）。还是那些"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计划性"、"基本规律"等等。这些规律与其说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引伸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思辩构成的。在这段时间里，已形成了一个力量越来越大的体系。有越来越多的拥有学衔和高级学位的科学干部加入了这个体系，在不断重复"谁就某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和"谁认为怎样"的基础上；学位论文和出版品的数量就象"出芽"一样地增加。学位论文和出版品越多，自然"这样说的人"的数量也就越多。这是新的学位论文的基础。

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对现实生活作出反应的能力。它的武库中没有激励研究今天经济现实矛盾的机制。就象从高处看不出地球的幅员一样，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了望台上也看不见地球上的困难。

如果严格遵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个词，那么这门课程的任何讲课都会注定以乏味和欺骗而失败。

第一篇——关于过渡时期——到 1937 年结束。教员们讲到这一年时，就会结结巴巴，猛咳一阵，有时宣布这个转折是"向共产主义前进"，有时宣布是"社会主义形成时期的结束"，有时又宣布是不管什么样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体现。

而"计划性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规律又怎样呢？要知道，规律是一种经久不变、经常重复、不能不重复出现的现象。

请你们试试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一下“计划性规律”。被当作“计划性”的唯意志的命令方法，损害了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平衡性和协调一致性的计划性概念的威信。把计划性说成目前理解的“规律”，我认为，这起着使纪律涣散的作用。这会养成一种无忧无虑的感情。既然是“规律”，它就会给自己打通道路！却忘记了，为了服从计划性规律，需要多么丧失理智。

政治经济学家把“计划”当作是“规律”的表现。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经常碰到破坏计划和不遵守计划的现象。现时好象“计划”概念中唯一经久不变的是对计划的破坏。因此，“社会主义的主要特殊规律”需要在解释上作大的修正。

还有关于矛盾的问题。任何地方没有矛盾，也就不会有运动。而在经济中尤其是这样，经济也许是一切体系中最活跃的体系。在经济中经常有东西在衰亡，又有东西在产生，经济像经常更换叶子的树木。不过与树木不同，这里的“叶子”不是自动脱掉的。于是就产生了矛盾，新的东西不会来到，因为旧的东西不会退出。请你们试试劈开这种矛盾。但是，你们别打算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来做到这一点。

在任何一种级别的教科书中，你们都别打算找到关于经济中的矛盾有什么头脑清晰的说法。如果提到矛盾，那也是一些能和睦协商解决的模糊的和无定形的矛盾。

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新技术问题的解释有什么用！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直使出混身解数，想方设法怎样才能从这个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条件中取消矛盾。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们凑合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援引这些空话都不好意思。有一本教科书这样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在那里’只有对资本家有利时，才采用新技术。‘在这里’，则根本没有这种限制”。另一本教科书随声附和地说：“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方式使整个社会和个别社会主义企业都对采用新技术感到兴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迫切问题，即所生产的产品的命运问题。产品向消费者的运动可以说是盲目实现的（你们又看到了计划性“规律”!）。人们由于这种盲目不知吃了多少苦！可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里也是一切都清楚的。请你们听听。“社会主义消除了作为社会生产基本问题的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本教科书这样说。跟在这种漂亮话后面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但是”，它们都只不过是对这些其主要涵义不变的漂亮话涂脂抹粉而已。

在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时，很多时期教室内是寂静的。死一般的寂静。但是，今天大学生们活跃起来了。而且他们来获许可便把现实生活搬进课堂：“价格怎样了？”“为什么不采用发明和发现？”“为什么出现排队、赤字、剩余，大批产品卖不出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刚开始任教的教员们害怕这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躲到教研室的角落里，拒绝讲课，恳求“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

只有教科书至今还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整个生活不理睬教科书。大家知道，风暴只是对活着的人才是可怕的。

其实，我说从 1954 年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不准确的。发生了。全国的主要经济学家

和政治经济学家都热衷于保护斯大林为自己的科学明确划定的界限。但是，以奇怪而反常的方式。通常，任何界限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这里恰恰相反，担心的是不要超出划定的框框。

在“生产关系”的解释方面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以致斯大林的那个第一本教科书在长老们看来都好象在确定界限方面显得太随意了。以前的教科书中的一章的标题《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制》成了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对象。好象重又看到“经济活动”被纳人“经济”这一词中。这个标题被推翻了，讨论“对象”所不具有的词被清除了。

我总想提一个问题：“尊敬的同行们，为什么你们把自己裹在你们称为‘生产关系’的这个非常薄的外皮里？这个脱离生气勃勃的生产力皮层的外皮？你们要把外皮同肌体结合在一起，因为外皮属于肌体。”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上刊出一张照片：一个身体壮大的瑜林学说的信奉着把自己塞进一只透明的小蒸锅里。奇迹在于他怎样使自己缩成团，以便容得下。于是又产生联想，又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不象这个瑜珈论者那样感到挤得慌吗？或者是因为在失重状态中没有空间的感觉？”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规律的科学。但是，有一个规津。虽说这个规律是解释自然界的运动的，但是社会对它也记得不坏。这就是地心引力规律。

据说，当宇宙航行员返回地面时，他们的脚由于离开地球长期处在失重状态而发痛。而只有地球才能治好他们的脚。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由于如此长期地处于失重状态，只有用接触地球的办法才能治好自己的病。

我用几句表示希望的话结束这篇评论。不久前公布了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纲。从中可以看出抛弃固定不变的死板公式和抽象的理论结构的意向。这是盼望很久的重要一步。但是，我在我认识的经济学家那里看到，同旧的观念分手是多么困难。他们对重点的猛然改变感到惊奇。他们在旧的废墟堆中乱找，打算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旧题材和旧思想，这些题材和思想从前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我想，为了弄清楚新的评价和提法的非偶然性，还需要付出不少劳动。

（原载苏联《真理报》1988 年 5 月 6 日。董智忱译，陈启能校）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

尼古拉·茹谢宁

是的，斯大林对镇压、对违法行为是负有罪责的，这点谁也不会否认，不会进行辩护。但是，绝不能把一切“归咎”于他一个人，绝不能不加区分地诅咒斯大林时期的一切。顺便说一句，在斯大林死后，无论在正式的文件里，还是在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的发言里，

都不曾说过也不会说，罪过只是斯大林一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背后有不少仆从和冒险家，就像叶若夫、贝利亚，可能还有别人。我说“可能”，是因为关于这些镇压还远没有研究和调查清楚。因此，关于这点也是应该写的。

A·F·扎夫拉日内赫

于维亚茨基·波利亚内（基洛夫区）

关于他是如何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有着许多传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经过文件资料证实的。况且，有关贝利亚生活的材料保存下来的极少，尤其是他“高升”之前的材料。这个人收集了大量有关每一位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务活动家的案卷，据传，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的案卷，他十分清楚证据和证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很难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并真实地再现我们历史上这位可怕的并招来祸患的人的活影子。

“人民领袖”的忠实战友的生活记述，一方面是一种对千百万人说的宫方说法；另一方面，是一些象黑夜中的恶梦一样可怕的传闻，其中每一个都会使人丧命。这就是今天可以得出有关贝利亚的概念所依据的轮廓。

然而，一些见证人还健在，有关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以及被捕和死时的证明材料依然存在。此刻贝利亚已无权重新编造和销毁它们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贝利亚开始“高升”的呢？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斯大林无限信任贝利亚。当有人谋杀领袖的时候，贝利亚曾用胸膛作掩护，并迅速收拾了刺客。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在裹扎湖休假期间。当时曾有人猜测，谋杀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结果造成对一些“化装人”的流血镇压，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多疑症……但是，没有人敢揭穿这个骗局，哪怕只是将其暗示给斯大林。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对斯大林的致命侮辱，有损其尊严。于是，这场闹剧被冠之为“英雄行为”成为贝利亚非凡仕途中的一块奠基石。

“贝利亚外交式地接任了自己的新职务”，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米高扬回忆父亲讲过的一些事。“他首先宣布：‘清洗’该结束了，应当干些正事了。这些话使许多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贝利亚只是稍稍松动了叶若夫紧紧套在他们身上的缰绳。因为他需要时间去了解他的前任建立起来的镇压机制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弄清为什么该机制最终会导致叶若夫垮台；逐步完善它，使其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同时这样做不仅不能引起斯大林的怀疑，恰恰相反，要使他坚信，只有这种形式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才能成为领袖的可靠盾牌，无论什么目标都能捕捉到。这正是贝利亚所谓‘真正工作’的涵义和最终目的。为要使镇压机器的飞轮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旋转起来，即使在斯大林的秘密的鼓励下，也需要有卓越的外交和组织才能，并且善于编织阴谋倾轧的罗网。”

不过，贝利亚不同于叶若夫。后者只是一个准备按上司命令去收拾人的可靠工具，而不太注意打着司法的幌子。贝利亚是斯大林政策的传播者，他能够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幌子对那些他不中意的人进行全面镇压。他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而非其他类型的。为此，有些人得到了他的宽恕，而有些人则性命难保。

贝利亚终于如愿以偿。由于他超乎寻常地忠于职守，斯大林授于他苏联元帅军衔并呈请

授于英雄勋章。

谢尔盖·尼基塔维奇·赫鲁晓夫（尼·谢·赫鲁晓夫的儿子）说，每当他父亲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回忆起贝利亚用来柬缚斯大林政府所有成员的那些讹诈和倾轧阴谋时，无不愤慨。每一个人都知道口利亚在背后对他们搞特务活动，同时也都猜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斯大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无一幸免。可以说，类似情况遍及国内每一地区。被镇压的不仅是“人民敌人”本人，而且还有其家庭、远近亲属、同事和朋友。

今天，当需要真实和完整地再现苏联人民生活和斗争历史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应用沉默来回避历史上的这一页。苏共二月全会（1988 年）强调：“应当鲜明地表明：亿万人民曾经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他们信仰什么，成功与失败、成绩与错误、喜悦与悲痛、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有时甚至是罪行怎样交织在一起的。”

至今还活着这样一些人（在撰写这些材料时我有幸同他们见面），在他们跟前只要一提到贝利亚的名字，他们的双手便开始颤抖。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害怕？为什么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种要尽快与我告辞的愿望？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什么？是意识到参与了极其严重的共同犯罪，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或是一种稍稍的自我慰藉（为了今天能继续生活并能正视人们），因为过去他们只是坏蛋手中的盲目武器？还是坚信（这是最可怕的）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这最后一种人至今仍在重复着这样一则寓意可怕的谚语：砍伐树木就得碎片飞扬。

还有一些斯大林圈子里的人活着，我曾试图接触他们，以期更多地了解贝利亚的活动。然而徒劳无获。

那些曾作过贝利亚的牺牲品、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其罪行见证的人们，每每回忆起他们同贝利亚的见面，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布柳赫尔，1938 年被枪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孀回忆道：

“我在卢比亚卡的一间单人牢房里渡过了七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利亚亲自进行的第一次审讯。虽然没有象对其他军人妻子那样拷问我，以便诈出有关自己丈夫的虚假供词。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任何轻松，因为他们夺去了我最亲爱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不需要再拷问我了：有关布柳赫尔的材料已经伪造出来了，把我单独隔离起来，仅仅因为我是著名元帅最亲近的人。显然，贝利亚亲自审讯，完全是出于一个暴虐狂的好奇。”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您还记得贝利亚是怎样一个人吗？”

“他非常高傲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象是在观察人，就象用放大镜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这是一个不仅仅我们这些肉体

被毁灭、精神受折磨的人感到痛苦的时代，而且那些生活和工作着的、甚至受尊敬的人们也不好受，并且时刻在等待着：很快就会有他们的亲人被叫去谈话了。”

退役中将伊戈尔·鲍里索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战争期间，我国人民的精力都集中到尽快粉碎敌人上。我的父亲，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为这一神圣的事业做出了贡献。说实话，我觉得奇怪的是，当贝利亚亲自下令逮捕了一位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后，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父亲忘我地工作着……”

退役上校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塔里诺夫回忆道：

“我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时，因为没有从事所谓业务工作，对贝利亚的一些事情并不留意，当然多少总有些耳闻。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战后，斯大林决定处决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贝利亚曾发愁，究竟让谁出面提供这位元帅的罪行。最后找到了诺拉·帕甫洛芙娜·切郭达耶娃，一位在西班牙同巴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工作过的翻译。根据策划，她应提供沃罗诺夫同托洛茨基昔日联系的材料。但这位坚强的妇女没有说光荣的元帅一句坏话，因而被关了一年监狱，斯大林死后她才获释。”

“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受的迫害并不比军人少。”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继续说。“他们是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并力图解救那些无辜者的人。为了拯救别人，他们自己却牺牲了，或是被处决，或在集中营里慢慢死去……”

一位青年时代参加过修建贝加尔一阿穆尔干线（193—1933 年），而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苏联著名建筑师讲到：

“那时对于囚犯来说，所谓的‘工作日评定’是个很大的刺激因素。当时完成特别重要、艰巨或紧急的工作，一天可算作两个服役日，两天也可相应地算作三个工作日。但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有一次铁路建筑集中营的一位领导去了趟莫斯科，向贝利亚报告了‘工作日评定’的混乱状况，犯人的服刑期因此普遍缩短了一倍半到两倍……贝利亚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很快评定就被取消了。几千人的一线希望从此破灭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多么挑剔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在私生活中的任何不道德和龌龊的表现。然而他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什么给几十个家庭带来了不幸。

“即使根据肖像您记得住贝利亚吗？”我问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芙娜·什。“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着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传闻可信可不信。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着危险。”

“是的，确有其事。”迈娅·伊万诺芙娜·科涅娃（苏联著名元帅科涅夫的女儿，其父主持了对贝利亚的审讯，痛心地证实了这个故事。“记得父亲十分憎恶这个恶棍。因为他听过许多母亲哭诉她们的女儿成了这个好色之徒的牺牲品。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那充满激情的话语：战争年代里，我就担忧过每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坚信战争后她们一定会成为某一个人的恋人，当妻子、做母亲。而他，这个败类，却这样惨无人道地对待她们。”

斯大林逝世前，这个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新政府班子中贝利亚是苏联内务部长。本来他可以在这一职位上坚持一段时间，然而他自己却表现得急不可待。

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讲述了父亲的回忆。“贝利亚分别面见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怂恿他们夺取政权。为什么要怂恿他们呢？或许因为这两个人当时在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担任着极有影响的职务。但是贝利亚失算了。不管布尔加宁还是赫鲁晓夫都到我父亲那里谈了这件事。他们的报告便成了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充分理由。”

“父亲还回忆了当时怎样逮捕这个十分危险然而还相当有势力的敌人。”安·马林科夫继续说道，“贝利亚被邀请参加政治局例会，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会议的议题。

“你，拉夫连基，想发动政变吗？以什么方式？’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问道。

所有的与会者都记得，贝利亚的脸骤然发白，语无论次。”

民间中流传着多少有关贝利亚被捕的传闻!我有幸见到了参加这一逮捕行动的唯一健在者，退役少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从而为澄清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可能。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别墅里。”少将回忆道。“突然我的副官打电话通知我，说国防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紧急召见我。说实话，我很惊奇，国防部长怎么会对我这个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感兴趣。我去了。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 N·巴吉茨基将军、A·巴克索夫将军、K·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场的还有莫斯卡连科将军的副官 B·尤费列夫中校……

首先，布尔加宁详细了解我的履历，询问了身体状况，最关心的是我使用武器的能力怎么样。最后问我是否准备完成政府赋于的重要任务。我严格地按着条令作了回答。谈话到此结束。”

“依您看，为什么把逮捕贝利亚的任务恰恰交给了您和您的同志？”

“我推测，是赫鲁晓夫提议由莫斯卡连科来完成，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十分了解莫斯卡连科。显然，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也希望同他一起完成这项任务的必须是他所熟悉并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友们。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失可夫元帅亲自领导并直接参加了逮捕行动。”

“你们是怎样进人基本上是由贝利亚的人守卫着的克里姆林宫的？”

“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用自己装有暗色毛玻璃的卧车将我送进了博罗维茨大门。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装扮成随同部长们来开会的人，待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

“事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休息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到我们的房间，讲明了任务。我们要在预定信号——铃声响后进入会议厅。当我们听到铃声后，端着手枪从三个门走了进去，每个门各两人。一些同志惊慌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看来，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来事情就很简单了。马林科夫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建议表决：‘谁赞成逮捕贝利亚？’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走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的贝利亚跟前说：‘举起手来，您被逮捕了。’

我们准备应付他的一切意外举动，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显然，贝利亚还未弄清事情的严重性。随后，贝利亚由参加逮捕的六个人押着，被送进一个单人房间。这时朱可夫告辞了。下一步行动的全部重担便落到了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身上。

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一直等到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岗。只有这时才能采取措施将贝利亚秘密押往下一个目的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上路了。”

“贝利亚这时表现如何？”

“他企图诱开我们，使我们放松警惕，并想方设法地要打电话和自己的人取得联系。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在审判前对贝利亚生命负责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请问他在羁押期间表现如何？”

“他什么都不承认，后来宣布绝食，持续了十一天。为了把这个恶棍活着‘拖上’法庭，让他为自己的残暴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花费了不少气力……”

前面已经提到，贝利亚十分清楚证据与证人的价值，因此他竭尽可能销毁证据。但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早在 1919 年他在巴库时便参加了由英国情报机关操纵的阿塞拜疆平等党反革命政府反间谍组织的特务工作。1920 年，在格鲁吉亚他曾和该地的孟什维克政府暗探局合作过。

斯大林是否知道这些情况？一想起这些就令人不安。

审判于 1953 年 12 月 18 日至 23 日进行。同贝利亚一起坐在被告席的还有其他六个共犯。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这是一次特殊的审判，连谈话都是特殊的，因为它是秘密进行的。

惩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拉·贝利亚、B·麦尔库诺夫、B·杰卡诺佐夫、B·科布洛夫、C·郭格利译、N·梅希克、N·弗洛特基米尔斯基极刑——实行枪决，没收其私人财产，取消其军衔及各种奖励。此乃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12 月 23 日当天执行了枪决。

……对奥莉加·安德烈耶芙娜·巴吉茨卡娅进行的简短采访：

“您丈夫曾受命执行这一正义行动。他讲过没有，贝利亚是怎样伏法的？”

“他说，贝利亚曾跪着央求宽恕。我丈夫都为此感到恶心。干了那么多卑鄙下流龌龊的勾当，却拿不出一点点勇气去一声不吭地接受惩罚……”

最后，用炮兵主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托卢布科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认为，追究贝利亚罪行的根源，与其在他自身上，倒不如在斯大林身上找。正是个人迷信和背离了列宁的准则才产生了贝利亚现象。贝利亚能猜透斯大林的心愿，善于利用主人的弱点为自己攫取个人名利。成千上万的人无辜受害，这首先应由斯大林及其象叶若夫和贝利亚这样的帮手负责。为此，历史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原载苏联《星期周刊》1988 年第 8 期。陈京宪译）

仆从

谢·米高扬

他（贝利亚）主宰过许多人的命运，用恐怖使人绝对服从。但服从并非尊敬。光荫荏苒，人民的回忆这一法庭对贝利亚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按：如果我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愿望，要再一次地揭露很久以前已被揭露的丑恶，大概不妨重新拾起这个人物。但是，目的是不同的，我们这一次打算研究慢慢形成的一种机制和贝利亚这样的家伙在这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不是一切都能看得清楚的。他是刽子手吗？是专横和恐吓的工具吗？这已真相大白。但是，其他人没有费劲就象更换旧手套一样地被更换了。而这个人却延宕了整整 15 年……人们编造出了一些神话：什么“不了解”啊，被抓获的凶手“不知道从何处来”的啊（叶若夫），还有虚假的所谓正义的恢复和法制的胜利（1938 年），以及什么犯罪分子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组织者的天才”（指贝利亚在战争年代）？这些神话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呢？把黑的变成白的或者把白的变成黑的：把无辜的人变成“罪人”，把刽子手变成善人（1938 年和 1953 年的贝利亚），把未来的牺牲品变成帮凶甚至同谋犯，这种互相交换的机制是因何而形成的呢？他们为了使所有的人今天（还有明天！）全都觉得自己是罪人，于是不仅竭力干掉对手，而且竭

力吸收、污辱和玷污成千上万不相干的人，这种“扩大同谋犯”的思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历史正在洗刷洗刷不掉的官方标签。现在到了应当按其功能重新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了。应当把这种标签加给那些臆造出来这种标签的具有好撒谎的头脑的人。那时，大家将各就其位。他不只是罪犯，而且是破坏分子。不只是凶手，而且是人民的敌人。读者们看过《胜利者》一文之后，坚决要求谈谈贝利亚。在真正的人民敌人中首先就有他贝利亚。这是他的真正角色……

对待这些破坏分子和人民的敌人，就象对待他们的受害者和反对者一样，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全部真相。文件是重要的。但是，目睹者、事件的参加者，不论已经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证词也是很重要的。具有个人关系色彩的证词虽然在终审法院不作为真实情况使用，但是这些证词也包含着难以估价的材料……我们现在公布这样一个证词。

——A．阿法纳西耶夫（《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是在 50 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披露了关于“个人迷信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当时人们把专制统治的年代称作个人迷信阶段。笑话的头一句话说得慷慨激昂，就象站在讲台上向整个大厅讲话；而第二句话是低声说的，就象对在身边不远的人说话。

的确，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拉夫连季，他总是在附近。从 30 年代初的时候起，任何时候他都能够表现出个人忠诚和愿意完成任何委托，不管这种委托具有怎样微妙的性质。（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我从我父亲和事件的其他参加者及目睹者那里知道的。）

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那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 1931 年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到这里来了，表面上是保证斯大林的安全，而实际上是骗取信任，用这种办法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过去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这回已经彼此很好地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委员会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的汇报（事先根本无此计划）。谁也不能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与什么事有关？例如，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甚至就连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除了收到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简短电报之外，也没有掌握别的消息。会议本身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卡冈诺维奇主持了会议。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人也莫明其妙，他们是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第二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布尼亚特一扎杰、杰夫达里阿尼、汉姜·波隆斯基、捷尔一加布里埃良、穆萨别科夫、多加多夫。

会议参加者，1917 年的党员，当时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 A·B·斯涅戈夫回忆道，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A·B·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找到一个方便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有来？米高扬在我的耳边低声回答说：‘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贝利亚的为人。’原

来是这么回事！就这样，我在来参加会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了，我们要干什么。”

会议本身开得很平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实际上已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当斯大林往后来出了名的烟斗里装烟时，他突然说：“如果我们这样来安排边区委员会的新领导班子：第一书记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担任，第二书记由贝利亚担任，你们看怎么样？”很有趣的是，这个时候竟然还能有不同意的意见。能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和坚持不同观点的反对者还没有被调走。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立即作出了反应，按高加索人的方式情绪激动地说：“我可不会同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家伙一起工作！”奥拉赫拉什维利问道：“科巴，你说什么？是不是我听错了？”捷尔一加布里埃良说：“我们可不能给党组织带回去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支持斯大林的提议。因此，“民主讨论”刹时之间就匆匆结束了。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说：“好吧，那我们就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几个月内，边区的领导班子被改组了。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派到位于埃哈的西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雅科夫列夫当了“东部地区黄金开采公司”的领导人，多加多夫被派到乌拉尔去。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当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贝利亚自然当了第二书记。但是，时间很短，不久奥拉赫拉什维利就被召到莫斯科，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于是，贝利亚就当上了第一书记。在外高加索联邦改组之后，他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接着发生了更加急剧和明确的转变。“此后经过两个月，在格鲁吉亚的22 个区里都出现了新的区委第一书记，——斯涅戈夫这样写道，——他们在此之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部的部长。我认为，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同样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事实，被召到莫斯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自然死亡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度过18 年后活下来了……”

不久，贝利亚又成了“历史学家”。出了一本叫《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书。这本书的原稿是由一些格鲁吉亚历史学家撰写的，作为贝利亚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不用说，作者们不久就都被枪毙了，而书却签上拉·帕·贝利亚的名字顺利出版了。当然，他竭尽全力“突出了”斯大林的作用。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她于国外出版的第一木书中企图编造一个“美妙的传说”，说什么贝利亚这个“凶恶的天才”欺骗了斯大林，把他弄糊涂了，利用了他的轻信态度。其实，这种传说早在贝利亚之前就流行过，不过是与叶若夫这个凶险的人物联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那个直到自已被捕前还担任党内要职的斯涅戈夫写道：“当政治局委员们无权保护自己信任的副手、战友，也无权保护自己的妻子甚至子女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了解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和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程度；当他们并非昧着良心，而是认真地把消灭许多中央委员、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归咎于叶若夫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斯大林”。

有些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足够的勇气按其本来面目对待历史事实，他们不大了解情况，但是现在其中的某些人毕竟也不反对议论议论这个问题了。

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在贝利亚之前，雅哥达和叶若夫就已经先后起过贝利亚的作用，不过操纵这些傀儡的始终是一个人。与贝利亚同时和在贝利亚以后，还有梅尔库洛夫、阿巴

库莫夫以及其他许多级别低的帮手。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弄清楚许多怪事。例如，为什么 1938 年贝利亚取代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之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大意是：可能已经到了少抓人的时候了，否则，很快就根本没有人可抓了？老一代人还会记得逮捕的浪潮曾有某些收敛。甚至还开始释放一些人。这使贝利亚对那些形式上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但却不能有丝毫作为的人给予某种扶持，以便停下开动着的镇压机器。

贝利亚何以敢这么说呢？原因是很清楚的：需要缓和一下，把锅炉里的气放出一点来，谈谈“过火行为”，把罪过推给某个人（这次是推给叶若夫）。而后呢？而后又心安理得地继续干“该干的”勾当。

贝利亚对于亲自参加审讯并不回避。据同时代人的证明，他在第比利斯自己的办公室里亲手开枪打死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汉姜。他不仅毫不留情地镇压了长期同斯大林一道工作过和了解斯大林的价值的人，而且也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多多少少有些知道他贝利亚底细的人，这种镇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受的灾难大概比其邻近的各共和国共产党受的灾难确实要严重得多。

贝利亚的突出特点是为人狡猾，会要手腕，善于使“老板”相信：他过去有用，现在有用，今后许多年也会有用处。他的确很有用处……

论素质，贝利亚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战争时期，这一点使他不仅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且在涉及国防的事务上表现了自己的能力。诚然，他能自由调动集中营的大批劳动力这一点也对他帮了大忙。只要说一声这是“贝利亚的命令……”就必须绝无条件地执行。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尽力使自己不要放松对新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监视。他这样做是得到允许的。当然，只要不违背“个人迷信”制度的基本原则：镇压机关应当直接归第一把手管，归根到底只能由第一把手控制。一般来说斯大林所熟悉的一些人的命运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贝利亚其人对此也毫无办法。例如，贝利亚憎恨彼 •列 •卡皮察院士。他借口说卡皮察不研究原子裂变问题，而集中搞最新的、简单的和便宜的氧气生产（顺便提一下，这对整个工业是极其重要的！），便想方设法先把卡皮察的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撤掉，然后又把他的制氧工业局局长的职务撤掉。卡皮察被迫在自己的别墅里建立了一个小试验室，闭门不出。但是，贝利亚始终没能使斯大林批准同意逮捕卡皮察，因而贝利亚也就没能动卡皮察一个手指头。

了解情况过多的人通常是讨人嫌的。贝利亚的才能也表现在对这一点的理解上。他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未让斯大林对他贝利亚产生类似的想法。但是，轮到他的时候终于来了……50 年代初，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授权逮捕贝利亚的亲信，例如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察纳维和其他一些人。发生了所谓“明格列尔案件”（贝利亚的许多帮手是他从自己的老乡中网罗的）。在向斯大林报告案情进展情况后，斯大林指示：要抓当大官的明格列尔人。斯大林可能认为，阿巴库莫夫也“了解许多事”，而且可能同贝利亚过往甚密，结果，这位部长也被斯大林撤换了……

但是，正好在 1952 年一桩更急和更严重的“医生放毒案件”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

新任部长、原来的党务工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人。他没有找到这群被捕的医术高超的医生的罪证以及证明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任何材料，只有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叫季玛舒克的人写的一封信。而且，医生当中谁也没有招供！这个部长当着几个政治局委员的面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政治局一般地不举行定期会议，被请到斯大林的别墅的人一起吃晚饭，这本身就算参加了会议）。而这个部长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找不到罪证，而他们又不招供，那你也要到他们呆的地方去……随后医生就“招供了”，在干这类勾当方面比这个新部长更老练和更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制造了罪证。

1953 年 3 月初的一天夜里，患高血压症的斯大林去浴池洗澡。室内只有他一个人，沙发上有准备好的床铺。他每天过了 12 点甚至午后 1 点起床，如果没有他召唤，谁都不能到他那里去。这天过了两点、三点、四点、已经是五点了，也没有听到召唤声。不安的保卫人员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最后，去叫女厨师，她是一个很早就在“主人”这里工作的已过中年的普通俄国女人（可能她是斯大林还信得过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中的一个）。她敲了门，但没有回答，再敲得狠些也一样。最后，决定撬开了门。“主人”躺在离沙发不远的地板上。病情很重，全身瘫痪不能说话。他只是愤怒地看着周围的人和来的医生（已是新的医生！）。政治局委员得到马林科夫的通知来到了别墅。又过了三、四天。

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是，贝利亚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公开地不表示悲哀。按他的盘算，一切都再好不过了。正式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因为他刚刚在 1952 年末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是个软弱的人，处在他贝利亚的影响之下。现在，他贝利亚不仅不须要怕斯大林了，而且自己实际上就要成为整个国家的掌舵人。

厚颜无耻的贝利亚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已经看出口利亚的欣快心情。于是瓦西里随便地制造了一个流言，说他的父亲是被“治死的”，甚至可能是被毒死的。后来国外著名的“苏联学家”阿夫托尔哈诺夫开始“论证”这一流言，附和瓦西里。瓦西里曾发疯地幻想：要是他父亲能够重新说话，那么他的父亲就能够下命令，枪毙政治局里所有敢于比他活得长的人。

在这个时候，贝利亚还“美化自己”。他大概是回忆了 1938 年的情况后，开始重新审理“医生案件”。“老板”刚刚死后，医生就平反了，被释放了，而以柳明为首的几个侦查人员则被判了死刑。不是单纯地使几个侦查人员当了“替罪羊”，而是要完全用惩办使医生遭到不幸的凶手来向所有的人表明，时代好转了，而这应归功于贝利亚。

时代确实是变了，但是这个诡计多端和罪行累累的人还没有明白，时代往哪个方向改变。贝利亚认为，党早已在精神上被镇压机关压垮了，它永远不能恢复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了。他不能理解，他关于一个人价值的衡量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他的衡量是基于对“宫廷政变”把戏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这个社会推翻了贝利亚自己，他的机关，化了 20 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令人厌恶的机器。

1953 年的夏天到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斯大林死前将其改称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叫来了一群苏联元帅和将军，他们受命逮捕贝利亚，并把他押送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

对贝利亚的审判进行得很快，也许过快了。看来，应当迫使他多交代些情况，这样会使今天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一些……人们在盛怒之下，把他划成了什么人的“间谍”。看来，在这样做以前应该认真地弄清情况。（即使贝利亚 1919 年在巴库以平等党情报机关的间谍身份进行工作，而不是象他企图断言的那样，实际上是执行党的任务，也应该弄清情况）。

当然，问题在于整个时代结束了……

历史给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以高度的评价。以尼•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结束了这些丑恶事件，而这些丑恶事件当时歪曲了我们社会的形象，造成了不应有的牺牲。

现在的问题是编写党和苏联社会真正客观的历史。最近党的中央全会强调指出：问题在于撰写真实的和完整的历史，这部历史应当是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要包括各种胜利和失败，光明和痛苦，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行为，而有时是罪行……

有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触动这些幽灵，为什么要惊动过去？回答只有一个：应当知道过去，其中有一个目的，即要使未来完全摆脱过去的羁绊。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 2 月 21 日。董智忱译，康春林校）

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阿•伊•米高扬

在代表大会之前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三天，边区党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从北高加索来到了莫斯科。我和当时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的伏罗希洛夫到莫斯科去要早些，因为我们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要参加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当我和伏罗希洛夫准备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把我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送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市。1924 年 6 月，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为了纪念在此之前五个月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给他起名叫沃洛佳。

我们与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奥拉赫拉什维利和米亚斯尼基杨（在罗斯托夫同他们会合了）一起乘梯弗里斯一莫斯科的快车去莫斯科。当然，沿途不少谈话是关于行将到来的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形势和国家总的情况的。我们彼此之间早已是朋友了，而许多东西则把我本人与外高索联系在一起。

1923 年和 1924 年的特点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由于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不仅能够解决国家的粮食危机，而且能够明显地增

加谷物出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第一次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况。这额外地提供了很可观的一笔外汇，一方面，它是预防意外经济困难和自然变化无常的某种保证，而另一方面，它能够拨出大约 5000 万卢布在国外超计划为轻工业企业购买我们所缺少的原料（棉花、皮革和橡胶）。购买原料能使这些企业满负荷地进行工作并安排农村所必需的消费品生产。所有这些都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办法相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实行所谓的“商品干涉”政策，即从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工业品。

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宣布的吸收工人人党的号召。结果，无产阶级最优秀、最顽强、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士们加入了党。

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也大大高涨。在北高加索（我在这里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象在国家其他许多农业地区一样，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考虑到许多农民——贫农和中农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为了普遍加强党与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边区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1924 年 4 月作出决定，吸收两万名先进的农民入党。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公布了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议程中的报告提纲，使千千万万党员能在当地的党代表会议上广泛讨论提交党代表大会审议的问题，并委托自己的代表提出具体的建议。

领袖的信

我们非常理解我们对党代表大会工作所负的重大责任。要知道，这是列宁逝世后第一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前一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列宁由于生病没有出席，但他还是通过直接书面的指示对大会进行了领导，而现在我们要自己解决问题，要努力象列宁还活在我们中间时那样做。

在 1924 年 5 月 21 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受政治局委托宣布，三天前（5 月 18 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已故列宁的嘱咐，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列宁遗嘱》。

我们十分激动地听了列宁的信。信中充满了对党的命运和对维护党的统一的极大关怀。列宁一向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团结一致是维护党的统一的保障之一。列宁对这一点的担心也感染了我们全会参加者。列宁对中央委员会形成的局面表示担忧，他对某些中央委员下了评语，并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对如何维持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发生可能的分裂提出了政治忠告。

由于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喜欢搞行政命令，实际上列宁对他表示不信任。同时列宁也就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缺点向党发出警告，对他们每个人作了客观的和极其准确的评价。

列宁在谈到斯大林时强调指出，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这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加米涅夫在宣读这封信后宣布，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志，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传达给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但是，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会议上，而是在代表之间宣读和讨论这一文件。这一“细节”本身就有意义。同时加米涅夫还补充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应以能够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为出发点，因为他已承认列宁所指出的缺点，并且答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认为，这一建议反映了政治局存在的矛盾，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担心托洛茨基的地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这一建议也包含着回避执行列宁遗嘱的倾向。

政治局的建议没有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因为谁也没有提出其他意见。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向代表大会代表传达列宁的信的程序的建议。并决定不准备广泛公布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只是给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大会的决定

每个代表团都宣读和讨论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所有代表团都支持把斯大林留在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我们代表大会代表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进行的尖锐斗争。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巧妙地论有所据地坚持了列宁指引的我们今后应走的道路。

我们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能不考虑，斯大林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在全会上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表示反对，虽然他们当中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几个人在列宁逝世后都在觊觎党的“第一把手”的职位。政治局里也还有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的有威信的人。

回首往事，我认为，一些人无视列宁的警告，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另一些人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个一心想要成为波拿巴式领袖的人。因此，宁可保留他，也不愿意从那些比斯大林更有权威、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威信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提出另外一个人。耽心这样的领袖会比斯大林更严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给集体领导带来危害。今天看来，这不单奇怪，甚至不大可能，但是，在我看来，当时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我们还注意到，在《列宁遗嘱》中在对党的许多领导人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提出了批评，列宁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候选人来取代斯大林。假如他提出了具体的候选人，那么，政治局，更不必说全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会反对列宁的建议。此外，我们当然也希望斯大林本人能考虑列宁的尖锐批评，更何况斯大林对此曾作过相应的保证。应当承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斯大林的这些品质。相反，在同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委员和党的其他著名工作者打交道时，他完全是以一种同志式的态度，认真听取别人的谈话，没有“领袖至上”、随心所欲、盛气凌人的表现。在象往常一样热烈争论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只发言两次，

其余时间都是沉默地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甚至连主席铃一次都没有拿起来。我想，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斯大林的这种表现给予肯定评价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只有过了一些年才得出了结论：这种特意表现的谦虚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刚刚讨论过《列宁遗嘱》，嘱遗中建议由其他人取代斯大林。而且后来也都清楚了，这种表现是为了在他策划的反对政治局委员的斗争中赢得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信任。那场斗争后来演变成针对党本身的大规模镇压运动。

当然，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难道只我一个人吗？）不同意列宁的建议是极痛苦的。只能用下述事实为自己辩解：列宁发出这封信后，斯大林在把坚持列宁路线的干部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周围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这帮助党在同托洛茨基斗争后达到了统一和团结。要知道，托洛茨基当时是主要危险。

谈到自己，我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大约是在头十年，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老同志，对他非常尊重；另一个是在以后时期，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在 2O 年代，我从未相信过，他会犯罪，那是什么样的罪行啊！当然，我们在地方上曾猜想，政治局内有斗争，但是，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整个局势和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央委员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任务。

人们逐渐明白了，完全保持列宁在世时的那种平衡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某个人。不同意见的斗争被视为正常现象。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把真实的目的精心地掩盖起来了。他甚至把已经开始的“清除”领导人的做法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认为没有列宁政治局不可能保持原状。有时——最后一次是在 1926 年——他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按他的主张解决问题，或者他离开……这种最后通牍多数都是以间接方式提出来的，但十定在那样的时刻，即多数中央委员都觉得，如果他离开，想搞“专制”活动的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从而导致分裂。对斯大林本人的专制倾向和行为，我是在已经不可能同它们进行斗争时才真正认清的。我同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很熟，了解他们的情绪，我想，他们也被斯大林的“第一种”面貌蒙蔽了。甚至 1934 年冬，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时基洛夫得票最多，一批大会代表提议他担任总书记，但是，他拒绝了，表现出这个最忠诚的人所具有的忠诚和原则性。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斯大林，但是，这招来了斯大林对整个代表大会，当然还有对基洛夫本人的仇恨。

只是 20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情况。斯大林逝世后。老布尔什维克 A•B•斯涅戈夫和 O•F•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回来。从 20 年代起我就认识斯涅戈夫，同沙图诺夫斯卡娅在 1918 年就见过面。当时她在巴库当斯捷潘•绍武勉的秘书。赫鲁晓夫也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们的。他们向我和羹鲁晓夫讲了我们原来不太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后来，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基洛夫被害案。根据文件查明，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同意基洛夫的只有三票，不同意斯大林的几乎为前者的 100 倍。计票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和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计票委员会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秘密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把反对他的票也降到三票。计票是分 13 个单独委员会进行的。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是我上教会学校时的一个朋友，名叫 H•安德烈阿相。他对我说，仅在他所在的那个委员会里就有 20 票反对斯大林。韦尔霍维赫是总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被关了 18 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此，情况都清楚了：第一，在斯大林的眼里基洛夫是一个对手，第二，甚至在所有反对派都已失败之后，党内，包括领导层，对斯大林的不满加剧了。所有这些使我们对许多事情看得更清了……

起初，斯大林对基洛夫不坏。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只能解释为企图使基洛夫“顺从”的事件。在党内政策方面，斯大林更加倚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后来是日丹诺夫，再以后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为人不坏，但太没有主见，有时可能成阴谋家、首先是斯大林本人最不体面的勾当的帮凶。

讲到基洛夫，我不禁回忆起《真理报》上一篇由“佐里奇”署名的小品文。说一个负责人从巴库搬到列宁格勒，在宽敞的住宅里等着两只狗。这完全是恶意煽动！令人不快的是，大家都知道小品文说的是谁。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梅利斯永远不会刊登这种小品文。有一次，政治局还组织讨论了基洛夫 1913 年发表的文章中“不恰当的”词句。

回过头来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我要说，不幸的是，列宁在其《遗嘱》中所指出的斯大林的那些弱点（而且还不只那些），只是在斯大林以后时期的活动中（那已经是 20 年代末，特别是从 30 年代起）大家才看清，其严重程度不是当时所能预见的。这就是我们由于没有执行列宁的遗训而受到的可怕而又可悲的惩罚。

在红场上

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来到红场瞻仰列宁墓，来向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祝贺的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游行。

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列宁墓两边，而主席团成员则登上了列宁墓。当时列宁墓还是临时的，是用木头建造成的，只是后来才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一万多名少先队员整齐地排列在红场上。孩子们的头、红领巾和鲜花汇成了一片海洋。当共青团中央的代表瓦休京宣布开始庆祝游行，并宣布今后以伟大列宁的名字命名少先队组织时，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几个成员致贺词和德国著名的女共产党员蔡特金充满热情的发言之后，受人尊敬的国际工人运动最早的参加者之一——费利克斯·柯恩发了言。他的外表很象古代的圣人：松软的银白色的头发，宽密的银白色的大胡子，浓厚的眉毛，眉下一双聪明的、炯炯有神的、不能以其年龄估量的明亮眼睛。

他对少先队员们说：“我作为一名老战士，受委托带领你们宣誓。”

他宣读了誓词，红场上成千上万名少先队员齐声重复了誓词。

“时刻准备着！”少先队员们的声浪回荡在红场上空。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当庆祝游行结束后，代表大会的代表走进了陵墓，默默地从棺椁旁走过。

关于党的任务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是相当简短的。他根据具体事实，平心静气地进行阐述，没有进行任何论战，对把党和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的状况进行了

分析。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作了长篇报告。对有关纪念列宁逝世吸收党员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因为这个题目包括了当时我们党的工作所涉及的一切基本问题。我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党员中的工人核心、活跃党的工作和扩大党内民主的任务，就是要使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到党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来，使他们同国家、党、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和教育。

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政治错误时，引用了英国著名的谚语："不论正确与否，这毕竟是我的祖国"，并且照常以下面一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漂亮词句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如果党作出一项决定，我们之中有某个人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公平的，他便会说，不管公平与否，这毕竟是我的党，我永远承担党的决定的后果。"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在托洛茨基之后，就反对派问题发言的有鲁祖塔克、恰普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立场。

代表大会在掌声中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活动。

合作社、商业、农村

商业、合作社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我国农村问题，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占有主要地位。代表大会的报告人和代表在谈到商业问题时是以列宁的下列指示为出发点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商业是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正如代表大会所指出，在国家的零售贸易额中，私人资本还占优势。在 1922—1923 年经济年度中，私人资本占零售贸易总额的 93．4％。私人资本和国家合作社资本在整个批发零售贸易中的比例好些，大约是一半对一半。仅仅在批发贸易方面国家和合作社占 85.5％，而私人资本总共只占 14．5％。主要任务是占领农村市场，逐渐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去。在这方面，发展国营商业和巩固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大会指出："农村合作社的薄弱是无产阶级工业和农民相结合的最薄弱环节"。

加里宁作农村工作报告，他象平时一样，十分生动、"通俗易懂地谈了农村的形势和党在农村的政策。在谈到农村阶级斗争进程时，他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复杂化，还由于农村的共产党员在同富农阶级斗争时往往把某些多少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列入富农。

因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援引了列宁不止一次说过的关于党对待中农和"我们应该同他们和平共处"的意见。同时，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同富农阶级进行斗争首先应全力以赴地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加里宁报告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对报告作了补充发言。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教育的状况和政治教育的组织上。她说农村学校和农村图书阅览室的状况令人失望，农村教师的物质生活艰难，农村学校缺少铅笔、练习本和教科书。

在代表大会进行的那天我们得知，红场上聚集了数万名教育工作者——教师，他们是主动来对我们党表示忠城和尊敬的。他们也向代表大会派来了代表闭。季诺维也夫以代表大会

的名义在红场上对他们表示欢迎。

代表们从莫斯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感到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标志着党的闭结。我在罗斯托夫召开的边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证明，党有能力顺利地实现列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遗训。

歉收年的重负

1924 年春天，我的肺结核病重新发作，而且比前一年春天更厉害。我消瘦了，体力很差。大概，当时从外表上看，我病得很重。因为晚些时候，即 7 月初，我在莫斯科办事，斯大林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医疗小组认为我身体状况很不好，要求我长期治疗，至少治疗 3—4 个月。但是，我不能马上享用这次休假：在在此以前已经完全明白，我们边区的许多区将严重歉收。在斯塔夫罗波尔、捷列克、萨尔斯克、莫罗佐夫斯克和孙扎区以及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和印古什自治州的许多区，那年几乎没有下雨，庄稼旱死，许多村庄甚至连饮用水都不够用。

为了拯救牲畜，农民们开始把牲畜赶到有水和饲料的库班地区。也有许多农民在当地把牲畜杀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结果，这些地区的牲畜总头数大大减少。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克服干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征得边区党委常委的同意，我的假期推迟了一个月——直到采取了刻不容缓的措施与我们边区碰到的灾难进行斗争时为止。

因干旱而歉收的地区需要紧急帮助。我们知道，收获之后才能够依靠收成好的地区（库班、顿河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对这些受灾地区给予帮助。但是，这些受灾地区需要立即得到援助，因此我们决定动用一部分储备粮，并紧急送到灾区，以便首先降低由于干旱被当地投机商和富农马上抬高了的粮价.

这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达到了。但是，为了保证来年的收成，不容许减少边区的播种面积，需要供给农户种子粮。

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我立刻动身去莫斯科，向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汇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并请求它们从中央的储备中给予我们边区以种子和资金帮助。

这一年，察里津省和阿斯特拉罕省以及萨拉托夫省和奔萨省的部分地区也遭受了旱灾。为了帮助所有这些省，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由几名人民委员参加的政府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我们得到了支援。当时国家集中的种子储备也不多。但委员会还是认为有可能从国家掌握的 900 万普特秋播种子中拨给我们 250 万普特，并通过农业银行给我们提供 200 万卢布的农业贷款（按黄金计算）。

此外，苏联政府还免除了庄稼全部死亡的地区的粮食税，减少了庄稼遭受严重旱灾的地区的税收（留归地方需要）。这是个很大的帮助。

边区党委常委批准了种子和资金的分配计划。给地方组织下达了只在遭受旱灾地区的农民申分配种子的严格指示。以最优惠的条件给他们提供种子贷款，以货币形式给他们提供购买牲畜的贷款。同时农民有义务保住牲畜。歉收首先使贫穷的农户受到损害，因此，首先应对他们给予帮助。

为了把种子用于播种和保住牲畜，必须对得到种子和资金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督。

因此，边区党委常委作出决定，派常委委员到遭受旱灾的地区去，以便同居民见面和交谈。必须到地方上去还因为，在许多歉收地区富农鼓动者活跃起来，他们使农民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帮助农民。必须取缔这种鼓动。

指派我到斯塔夫罗波尔、萨尔斯克和捷列克区去。期限很短，不超过 10 天

罗斯托夫有一架属于德国公司的小飞机，我们同它有空运租让合同。我和飞行员制定了飞行计划。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出差。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

我原计划召集居民大会，但结果却是另一种情况。谁都不需要召集：看到正在接近的飞机后，所有居民都奔向飞机着陆的地方。于是，大会可以开始了。

我刚刚走下来的飞机，成了临时安排的讲台。我讲了边区的情况、干旱情况、政府给予我们的帮助、种子和资金如何分配，要求农民不要惊慌，要好好准备并及时进行秋播，不要抛弃自己的经营，不要减少播种面积，要保住牲畜。

当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感觉得到，农民的整个情绪明显地提高了，他们放心了，、振奋起来了，并且确信苏维埃政权不会在困难时刻丢下他们不管。

我想起了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库尔萨夫克村发生的一件事。在这个村里住着。万多口人。实际上是个小城市。因为干旱，村里的大多数水井干枯了。人们把雨水收集在白铁桶里，但是，储备的水总会用尽。必须紧急采取某些根本措施。在与地方工作人员讨论之后，决定开始铺设水管。问题在于，在离库尔萨夫克村 20—25 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极好的自然饮用水源。决定延长水管。大多数村民得知，不过几个月水管就会铺设好后，都很高兴。但是，也有人怀凝。我记得，在大会上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白发老头。他说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抬起手，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指着手掌说：

——我手掌上长出毛发要比我们村建成水管快。

我回答说：

——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水管和资金，你们的工作是保证建筑工程的劳动力。

铺设水管是完全现实的工作。大约过了半年，区里邀请我去参加放水仪式。我决定去，我想顺便去看看我记忆中的那个老头。当然，他来参加隆重的大会了。这是 1925 年 1 月 9 日的事。打开阀门，水开始流了出来。四面鼓起掌来。

老头沉默不语。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对他说：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你手掌上的毛发没有长出来，而水已经流来了。

……8 月，布哈林在基斯洛沃茨克休息。他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的妻子阿什亨与两个儿子——斯捷潘和沃洛佳也在那里。小儿子才一个半月。我的妻子住在布哈林住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经常在这栋房子里休息。尽管这是边区，我在这里工作已快四年了，但我很少在那里休息。很快我将到那里去，与在那里休息的朋友们会见和交谈。后来，即在 30 年代，以这栋房子为基础，建成了“红宝石”疗养所。这所疗养所的新建筑物是按照建筑师梅尔扎诺夫的设计用亚美尼亚的玫瑰色凝灰岩建成的，比当时我们“政府”休养所还高。尽管名声如此之大，但是，那里的一切都很俭朴。

我很高兴看看布哈林，因为我们的同志关系很好，彼此都有好感。他叫我“米高扬什卡”。起初，我从未象其他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那样亲切地称他为“布哈林奇克”，因为他比我大。但是，由于他憨厚、直率和性情温和，很快我们的关系就如此亲近了，以致我也开始叫他“布哈林奇克”。

他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边区的情况、当时发生的事情和采取的援助措施。他对我在干旱地区的飞行很感兴趣。他本人也想乘飞机去看看。我马上安排了这一飞行。当然，在此之前布哈林在同莫斯科直接通话时讲了我们的计划。斯大林坚决反对。布哈林在同我一起商量怎么办后，还是决定要飞行，而我也支持他。要知道，我们当时都还年轻。乘飞机飞行当时是很诱人的事情。我很高兴同布哈林一起乘飞机去，但是，这样我们就违犯了政治局的决定！要知道，斯大林不仅不赞成这种飞行，而且还把问题提交给了政治局。而政治局作出决定，禁止中央委员坐飞机，这顺便也就禁止了我同布哈林的飞行。当时我很不愉快，因为利用飞机办公事能够大大节约总是勉强够用的时间。

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违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那么，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发生在 20 年代末。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在某个工厂里进行党内学习。我在“红色无产者”工厂里学习。于是政治局决定，必需在各自工作的那个人民委员部或者主管部门里办理登记。我后悔自己没有这样做。从党章角度来看，政治局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它中断了同工作集体日常生活的联系。在“红色无产者”工厂里，我经常参加党的总结工作大会和其他会议，得到了在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的东西。要知道，我已经那样熟悉人民委员部的集体生活。我不是替自己辩护，而只是说明我违犯政治局决定的原因。

边区党委常委们到各区去看看是很有益的，可以了解歉收的各种后果（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疏漏和缺点）。歉收的后果之一，是儿童流浪街头。在一些农村里，妇女们来找我，并且哭着请求说：“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吧，我们不能够养活他们。”

政府拨出的、防止儿童流浪街头的钱不够，不得不在地方预算中寻求资金。

在各地区，边区党委的常委们看到了我们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再次确信，必须要坚决地把整个边区党组织的注意力转到农村问题上来。

歉收以及与此有关的贫困和损失使农民确信联合成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的优越性。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不仅能帮助他们克服自然灾害的后果，而且能够使他们免受富农的奴役。农村生产合作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同农民经济落后性进行斗争中的支柱。

所有这些问题在边区党委和边区执委会致党组织、地方苏维埃、合作社、全体工人和农民、哥萨克人和东南边区山地居民的信中都提出来了。信中指出，当前的一年应成为全民与歉收和干旱进行斗争的一年。

边区党委开始加强宣传整地和增产的先进经验。在大的村庄里，有 4—5 个房间的非常好的农村图书阅览室。它们有书报和杂志。但是，农民很少去看，而党组织也没有使之具有应有的意义。在捷列克区的集市上有成千上万辆农民大车，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他们中间进行文化工作。难通不值得在这样的市场上建立小亭子：出售报纸，同农民进行交谈？要知道农民渴求受到教育，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明显地提高了。例如，只要一宣布在村镇开会，全村居民马上就来了，十分注意听演讲者讲话，他们也积极地发言。

……当你回忆当时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阶段并把它们与今天的任务作比较时，那么，你就会懂得，当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多么少。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有理由为每一个胜利、哪怕是微小的胜利感到高兴的。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5O 期。王廷玉译，陈桂荣校）

向真理迈进

——关于 20 年代的对话

德·谢列斯托夫康·叶留金

【原编者按】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撰写的《从人 物看时代》（载《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42 期）一文刊出 后反响强烈。不少人来信要求编辑部继续在“1917 —1987”栏目内公布材料。

读者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对此我们非常理解。我们今后准备设立专栏，介绍苏维埃社会诞生和形成的历史。下面刊登的是历史学博士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同记者康斯坦丁·叶留金就 1917—1920 年这个伟大斗争的时代所进行的对话。

问：国内外对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报以极大兴趣。看来，这个文件对历史学家也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吧？

答：米·谢·戈尔巴乔夫这个报告，以及刚刚出版的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所指

出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深入研究伟大十月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其中包括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20—30年代。

我们反反复复地回顾往事，追本溯源，力求尽可能深入地思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初建的那个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对国家70年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深刻的评价，同时没有隐瞒当时的困难和危机。比如，其中首次明确谈到，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农民政策。斯大林当权时期所特有的行政命令体制导致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严重冒进。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农村开始的变革是1917年以后的最大变革，它使千百万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读了A•马雷什金的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就可以想象出，那时候，使农民的命运转向工业化是多么的不易。城市居民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人口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大规模的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造成了许多社会后果。顺便提一下，依我看，这正是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视其为“主宰者”那种局面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

问：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了斯大林个性中的矛盾性并严厉谴责了对他的迷信，认为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格格不人。那么，历史学家应从哪些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呢？

答：为了弄清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过程，我们还应分析1922年以后国家和党的领导状况。

问：通常以1924年为划分界限……

答：这不错。但并不排斥分析从1922年开始的事件的可能性。这一年4月斯大林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过了不到10个月，在12月16日和23日两次重病发作使列宁实际上脱离了对国家和党的直接领导。1956年发表了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口授记录。这些信意在防止中央领导机构发生分裂，信中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信的发表对揭露个人迷信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到了60—70年代对信的研究慢慢地停止了，但最近这些信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问：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仔细谈一谈，况且，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也提到过《给代表大会的信》。

答：只是首先要明确这样一点，即从整个发展进程中截取某些事件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不应掩盖列宁晚期（1922年12月末—1923年3月初）所有著述的整体意义，这些著述实际上构成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至于前边提到过的记录，要记住这只是列宁当时在重病中口述的所有记录的一部分。

记录的内容不仅局限于把斯大林撤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而且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它反映着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列宁在患病之前就巳十分注意了。

在离今天已很遥远的1922年，民族众多的、有1亿3千5百万人口的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几乎 84％的人口住在农村）在新经济政策和反对饥饿和经济崩溃的斗争的道路上迈

出了最初的步伐。有近 40 万党员的列宁的党领导了人民争取新生活的斗争。1922 年 3 月，列宁在分析了国家状况之后向中央委员们指出，在 20 年代前就已变得很复杂的条件下，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由“可以被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个极精干的阶层的强大的、特有的威信决定的。”

他接着指出：“只要这个阶层内发生哪怕不大的内部斗争，那么它的威信即使不动摇，也会相当削弱，以致于决定权将不再被它所掌握。”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便能读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在 9 个月之后关于中央情况的口授记录。这些内容是他当时急于口授的（要知道，谁也无法预测，病情将如何发展），可见他对此问题是多么重视，当时内部出现斗争的现实危险加剧了。特别是当涉及到两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过份自负和醉心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托洛茨基和当上总书记才几个月就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尤其突出。这正是列宁所特别担心的。因为他没有把握，斯大林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问：有时在读者来信中有这样的看法，似乎列宁指定了某个人做自己的继任者……

答：不知道有任何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文件。况且“任命继任者”是什么意思？是担任什么职务吗？列宁极高的威信与他的职务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群众自己承认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是自己的真正领袖。至于职务，列宁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过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一个、而是两个国家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成立之后，从 1923 年夏天起这两个机构都成为全联盟的了。人民委员会的、苏联的和俄罗斯联邦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和亚·德·瞿鲁巴。弗拉基米尔·依里奇逝世以后，这些机构的领导权可以说分开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是阿·伊·李可夫（到 1930 年），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波·加米涅夫（到 1926 年）。列宁给我们留下的继任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党的老近卫军、中央委员会。保证它们的统一，正如今天我们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看到的，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问：当时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是如何组成的？

答：最后一届有列宁参加并经 1922 年 4 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计有 27 名中央委员和 19 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都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其中豆玉人（弗·伊·列宁、安·谢·布勃诺夫、尼·伊·布哈林、菲·埃·捷尔任斯基、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伊·帖·斯米尔加、格·雅·索科利尼科夫、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是 1917 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22 年代进人中央的还有十月革命以后在党、国家、军事和经济部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克·叶·伏罗希洛夫、米·伊·加里宁、谢’米·基洛夫、瓦·弗。古比雪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列·皮达科夫、扬·厄·卢祖塔克、米·巴，托姆斯基、米·瓦·伏龙芝、弗·雅·邱巴尔等人。

1922 年以前，中央确定并组成了一些机构。早在 1919 年为了解决一些政策性的和紧迫的问题，成立了中央政治局，为了推行党的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组织局。当时第一次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第二年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除保留组织局负责中央总的工作以外，把管辖“日常的组织和执行问题”交给了书记处。

1921 年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弗·伊·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尼·尼，克列斯京斯基、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米，伊·加里宁。1921 年选举格·叶·季诺维也夫接替尼·尼·克列斯克斯基为政治局委员，增补维，米·莫洛托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 年这个机构稍有扩大，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进入政治局，增补扬。厄·卢祖塔克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组织局（弗·依·列宁没有参加其内）在历次代表大会后的构成都有明显变化。从 1919 年起唯一长期参加组织局工作的中央委员就是斯大林一人。另外，组织局还有几位中央书记参加。1924 年之前有 3 人，后来有 5 人，再以后人数更多。1922 年中央四月全会设立总书记一职，担任总书记的，正如上边提到过的，是斯大林，他一直在此职上呆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除斯大林之外，担任书记处书记时间最长的是莫洛托夫（1921—1930 年）。

问：就是说，1922 年 12 月末列宁在对中央的状况加以评述时，指的是 20 年代初形成的党的领导构成了？

答：当然，列宁的文件很具体。需要指出，列宁提议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额，使其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列宁指出，“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1922 年 12 月 23 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送斯大林转中央政治局。

12 月 24 日和 25 日口授的以下部分，以及 1923 年 1 月 4 日口授的部分，包括对中央 6 名委员所做的个人评价，根据列宁的要求是绝密的。只有在列宁去世之后这部分才能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布。

列宁认为稳定问题是防止党发生分裂的保证。他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最危险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正如他指出的，是中央最杰出的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指出了这两个人个人品质的不良方面。

之后，列宁提醒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他们不同意中央的武装起义计划，出卖了该计划，随后，在 1917 年 11 月和一些中央委员一起成为建立“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特别重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人，同时指出，虽然布哈林“应当被人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值得怀疑的”。而皮达可夫，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在贯穿着维护党的统一的深刻关怀的信件中，列宁注意到上边提到的六个中央委员的弱点，但这不意味着要把他们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之外，其中也包括斯大林。列宁只是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一职。

问：那么，正如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他预见到中央内部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他非常关心，希望能保持党和社会主义本质所固有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原则？

答：这正是列宁遗嘱的重要方面之一。根据这些遗嘱，总书记应同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构共同保证党的实际的集体领导制，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弗拉基米尔·依里奇认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应是一位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对同志更关心、不热衷于行

政命令、不粗暴的共产党员。列宁发现斯大林太粗暴，他目光敏锐地指出："粗暴总的来说在政治中通常起到最坏的作用。"斯大体性格的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对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无理的狂妄态度上，他粗暴的斥责她、怀疑她是否不顾医生的禁令记录了列宁的话，这一点引起列宁的极大愤慨。列宁得知这个消息后，于 1923 年 3 月 5 日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其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他道歉，并指出，否则就和他断绝关系。第二天他请人把信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就在这个时候，即 3 月 6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4 天之后的一次新的发作，加快了右侧身体的瘫痪，列宁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问：这发生在列宁已不能参加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那么，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否就不为人所知了？

答：不完全是这样。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谈到中央领导状况的口授记录没有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信的某些部分在 1922 年末和 1923 年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所合的列宁的指示在党的决议中得到体现，而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者"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于 1923 年 4 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各代表团进行了宣读。

问：一年以后，即 1924 年 5 月，列宁评价几位中央委员的口授记录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向各代表团宣读了吗？

答：1924 年 5 月 18 日，党的第十三代表大会召开前 5 大，记录和其他一系列文件由克鲁普斯卡娅交给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持的列宁文献征集委员会。提醒一句，他们三人同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他们收到列宁文件的报告，1924 年 5 月 21 日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文件的宣读转交给代表大会，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在各代表团内的宣读工作由伊里奇文件征集委员会成员进行。"

问：就是说，在各代表团内宣读列宁的文件是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进行的，在该问题上代表大会只局限于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吗？

答：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 53 人，但是以列宁参加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基础形成的。在 1924—1925 年的这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产生了 7 人政治局。他们是：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约·维·斯大林、米·巴·托姆斯基、列·达·托洛茨基和 6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菲·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维·米·莫洛托夫、扬·厄·卢祖塔克、格·雅·索科利尼科夫、米·瓦·伏龙芝。会上斯大林请求解除他的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请求没有被批准。为什么呢？可以这样推论，代表大会和它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从以下这点出发，即在列宁 1922 年至 1924 年初患病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会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得出结论，并将按照党的奠基者和领袖所嘱托的那样保证对党进行集体领导。

问：但我们今天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很不简单……

答：问题就在于此，很不简单，耐人寻味。还在 1923 年托洛茨基分子就利用列宁患病之机企图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修正。而今，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托

洛茨基正如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鉴定的那样露骨地表现出权势欲，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从思想上粉碎这股反列宁主义的逆流已经在我们的著作中得到阐述，所以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其结论。须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热衷于搞派别活动以及他惯于在政策问题上摇摆，都给以后意见交锋的整个过程打下烙印，而他的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自觉不自觉地给后来的每一次观点分歧投下阴影。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加剧斗争也起了作用，他公开以粗暴地同思想敌人斗争为骄傲。他所具有的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特点同容不得不同意见、多疑和其他不良特点交织在一起。使他变得不仅仅是粗暴，而且毫无理由的严厉，甚至是残酷，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问：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被粉碎，斯大林的威信也随之提高了吗？

答：现在，许多人都习惯于认为，几乎从 1917 年起斯大林就广泛闻名于全党、全国。实际上，他的个人知名度在 1923 年还很低，大大的逊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当时其他一些著名领导人。顺便提一句，1923 年在《星火》周刊刊登的斯大林像，大概属于群众性刊物第一次刊登的斯大林照片之一。十年之后著名德国作家卜费希特万格来到苏联，看到的已是各地都悬挂着被他称为“蓄小胡子的人”的画像。

斯大林的威信仿佛是逐步提高的。随着他的中央书记地位的巩固，他积极参与国家生活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了。1923 年—1924 年期间他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其他党的著名活动家一起发表的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客观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政策。这还明显的表现在后来在 1925 年战胜“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粉碎了 1926 年—1927 年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肃清 20 年代末期党内右倾倾向（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上。在这场斗争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于 1926 年被开除出政治局。托洛茨基于 1929 年被驱逐出苏联。同年及 1930 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问：不难发现，到 1930 年初，1924—1925 年党的领导机构中 7 名政治局委员就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了。

答：这并不意味着战胜反对派、制订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功绩象 30 年代所说的那样只属于一个人。怎么能忘记 1925 年 10 月过早地离开人世的米·瓦·伏龙芝和 1926 年六月全会上在激烈的发言反对反对派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的菲·埃·捷尔任斯基同托洛茨基主义展开的一贯斗争呢！安·谢·布勃诺夫、谢·米·基洛夫、斯·维·科肖尔、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巴·彼·波斯蒂舍夫、扬·厄·卢祖塔克、弗·雅·邱巴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一起为党集体制订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做出了贡献。

在 20 年代下半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索科利尼科夫）声称权力都集中于斯大林手中，但是，党和国家的事务一直表现出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此同时，还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1925 年）伏罗希洛夫就已指出，斯大林是“中央政治局的主要委员”，而 4 年以后，他在 1929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斯大林与红军。的文章，文章在散播对斯大林有利的歪曲苏联社会的历史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1938 年）使这种曲解更臻完备。斯

大林曾积极参加揭露托洛茨基提出的党的“两个领导”的构想，可是后来他却独出心裁地利用了这一点，力促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即正是他和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他和列宁是苏联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问：那么，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指出斯大林严重缺点的事，1924 年以后就这样被忘却了吗？

答：没有。在党内斗争扩大时不断有人提到这些文件。最后一次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大会决议，大会的简报收人了列宁口授的记录，以后本来还应当收入列宁文集公开发表，但后来大会的决议未能执行。相反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发表这些文件与宣扬对斯大林的迷信相抵触，这种迷信是在党内由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以及后来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派别斗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中慢慢形成的。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1923—1924 年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随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列宁患病期间形成的和在列宁逝世后头几个月维持着的领导核心分裂了，争权夺利的无原则斗争不能不使党的老近卫军受到打击、动摇它的威信，减少它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所发生的这一切，正是列宁 1922 年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专横的权力悄悄地确立了，他偏离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在列宁生前就出现的一些分歧，在新形势下又表现出来了，而且更尖锐了。众所周知，列宁曾警告过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强调指出：‘这不是小事，或者说是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小事。’结果在许多方面正是这样”。

我们刚刚隆重庆祝过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这再一次证明，生活本身要求我们真实、大胆地写出苏联历史的史书，从而揭示一系列事件的英勇精神及其戏剧性，揭示前辈们所经历的复杂的和内容多样的道路上的一切。这条道路在所有阶段上都是朝着社会主义。

（原载《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47 期。沙增明译，曹特金校）

公正审判与我们

——3O 年代的教训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938 年 1 月 2 日至 3 月 13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确认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成员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这些罪行是：背叛祖国，破坏行为，暗中捣乱，谋杀谢·米·基洛夫、阿·马·高尔基、维·鲁·明仁斯基，阴谋杀害弗·伊·列

宁。受到审判的共 21 人。18 人被判处死刑，3 人被长期剥夺自由。

1988 年 2 月 4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取消判决和撤销尼 •布哈林、阿，李可夫、赫 • 拉科夫斯基、阿 • 罗森霍尔茨、M • 切尔诺夫、N • 布兰诺夫、J • 列文、N • 卡萨科夫、B • 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和 N • 克留契科夫等人案件的决定。在这之前，曾撤销了对其他十个在 1938 年案件中受审的人的判决。恢复了 N •谢连斯基、B •伊万诺夫、n • 估巴列夫、厂 • 格林科、O • 霍贾耶夫、C • 别索诺夫、N • 普列特尼奥夫、H • 克列斯京斯基、A • 伊克拉莫夫、B • 沙兰戈维奇等人的名誉。在这一案件中有关 F • 雅哥达的问题，苏联监察院未提出异议。

在我们面前放着一本 1938 年出版的有关这一案件的法院判决总结。起诉人安 • 亚 • 维辛斯基的讲话。见证人的证词和被告人的供词。辩护人的发言。被告人的最后讲话……

在翻阅这一文件时，一种奇怪的、沉重的感情控制了我。这一诉讼案件的所有参加者毫无例外地谈得很一致，很谐调，谈得都一模一样。此外，被告人本人都指责自己犯有最严重的罪行。每个人都进行自我揭露，都谴责自己，都表示仟悔。谁也不同起诉人和见证人争辩，谁也不想去推翻哪伯是一小点对自己有害的证据，而只是对这些证据进行补充。完完全全的自我认罪！

这一诉讼案的特点是：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检察长完全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主持和左右着整个程序。起诉人进行揭发和谴责，其他人只对他附和。听不到法官的声音。辩护人只是请求宽恕。没有法庭辩论。没有双方的辩论，没有论证，也没有反论证，没有对证据的调查。没有专家参加诉讼程序，也没有任何鉴定。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呢？被告人进行详细的描述，说他们自己是些什么样的坏蛋。

这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幕经过精心策划、预先排练好的闹剧。

被告人被指控犯有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罪行——似乎他们准备把乌克兰出卖给法西斯德国，把远东出卖给日本。他们被宣布对牲畜得瘟疫、对事故、对拙劣制订的计划、对失误负有罪责，甚至对当时这一困难时期的一切自然灾害、歉收、一切不幸和灾难都负有罪责。他们被指控犯有破坏耕地和轮作制，扩散“猪瘟”和“马的贫血病”，拖延亚麻联合企业建设，“毁坏”牧场，破坏性地消灭苴蓿草等罪行……医生被指控犯有杀害病人罪，因为他让病人在炎热的四月天的中午睡在花园的长椅上。其他被告人被指控通过在办公室内喷洒水银和酸的溶液的办法毒害负责人。所有被告人对这一切都承认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切革命的伟大活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同过去决裂。世界划分为善恶两极。革命斗争的痛苦与牺牲使得为未来幸福而采用的暴力行为变得神圣高尚。政治斗争所固有的范畴和概念具有一种重要的特征；它们要末标志着黑暗谬误和罪恶，要未标志着真理、光辉照人的善良和值得为之奋斗和牺牲的革命的理想。经过破坏、摧毁和打倒之后，应该继续朝前走。应该建设、创造、发明。列宁在使国家现实地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刑法领域，这意味着从“红色恐怖”和公开的镇压阶级敌人转向法制。

列宁去世以后，政治范畴和口号的炽烈的力量被自私地用来争夺个人的权力。在“对领袖迷信”的条件下，滥用政治权力的现象也反映在刑法领域。

在社会中人为地制造了并积聚着一种对革命成果造成不祥威胁的感觉。这一威胁被人格化了，体现在其狡诈的载体（“人民的敌人”）身上。甚至为革命忠心耿耿的效力，也被解释为坏人的可耻的伪装。这一威胁被赋予全面的和无孔不人的性质（“敌人的巢穴”）。

既然是同所谓的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那末，斗争手段的选择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对证据也用不着关心了，甚至根本就把这些作为“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残余而抛弃掉。这样自然就在审问中采用非法的手段。

那些没有做到一接到信号就向被指定的“敌人”猛烈攻击的人，就成了“人民敌人的帮凶”。而那些被划为“人民敌人”的人，就被开除出社会，变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连同自己的亲属、朋友，甚至于熟人）。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人，因为他未“缴械投降”。承认有罪的人必须“供出自己的同伙”。“有问题的人”的范围扩大了。结果是，惩罚体制孳生出“敌人”，而这些敌人的“存在”反过来又为这一体制提供了佐证并使之进一步扩大。

当时制定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刑法法典进一步加剧了 30 年代的违法行为。

1932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凡侵占、盗窃国家、农庄和合作社财产者一律处以死刑。在“宽大的条件”下，死刑可以用剥夺 10 年自由来代替。从 1935 年开始，12 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用这法律来处治。从 1937 年起，犯有这种罪行的人改为剥夺 25 年自由。根据当时人提供的证据，当时采用的刑事镇压方法的特点是：“大量追究劳动人民的责任”，曾发生搞“被镇压者数量的指标竞赛”，“大量查办和审讯农庄骨干”，“就一些微不足道的罪行和细小的失误而追究刑事责任和采取镇压行动”。

今天我们应从过去吸取政治的、道德的和法制方面的教训。

当前，党已通过有关民主化、建立法制社会的方针。这种法制社会有能力可靠地使公民权利和自由不受任何人的专横的侵犯，不受违法行为的破坏。从党的这个方针中，我看到，我们已经吸取了最重要的政治教训。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的有关进一步研究 30—4O 年代和 50 年代初镇压情况的委员会的工作、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为 1938 年“莫斯科诉讼案”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决定，这些都是这方面工作的一部分。根据新思维所制定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许多方面是完整统一的世界的构想，苏联外交为同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相互敌意和猜疑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道德的教训表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之中，即任何目的，那伯是最崇高的目的、思想和原则，都不应该成为可以不择手段的理由，都不应庇护残忍、下流和撒谎。因为，错误的手段不可能达到正当的目的。还有一个教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迟早总会被揭露出来的。当年使用的这些非法手段，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意味着用个人的权欲来偷换伟大的目标。

我们也在吸取法制方面的教训。

刑法体制的社会成熟程度的标志是清醒地承认某些原则。过去那些年代，由于放弃了这些原则，使得下述情况成为可能：无辜者受到惩罚，诬告别人的罪犯飞黄腾达，审判机关蜕变成为专横肆虐的工具。

经验告诉我们，刑法的现实目的是保持和保障社会公正所需要的限度。这种限度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取得，即。法律只能包含最小数量的真正的危险行为，并准确地根据罪行来量刑，要明确地意识到，只是在不得不惩罚的时候才进行惩罚。因为，惩罚的本身就是制造痛苦，就是“行恶”，尽管它是被迫进行的。没有惩罚是不行的，但如果不加选择地（更不用说带着感情地）采取惩罚措施，就只能瓦解人民的法制观念，助长厚颜无耻，破坏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公正的法律可以使人畏惧，但不可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其结果只能增强社会意识中的残暴凶狠和冷酷无情。

在刑法体制的文明增长的各种标志中，有三个特点可以立即看到：由根据“初步怀疑”便进行惩罚演变为只有取得过硬证据之后才进行惩罚；在调查罪行的过程中，由根据被告人的口供（或逼供）过渡到根据由严格合法手段取得的客观证据；区分起诉者和法官的作用；起诉人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平等；法院的决定性的中心作用。

对于法律思维来说，没有被证实的东西，等于不存在。公正判决只存在于这样的法律思维在法庭上取得胜利的地方。只有把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寻找证据（物证和文字证据）作为侦查主要要办的事，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看来，最不能容忍的是这种情况：侦查者权力很大，法官的作用不怎么看得见，而辩护人或者没有或者软弱无力。

当法官和两个陪审员三个人就可以决定被告者命运的时候，这种程序也未必使人满意。因为人数是如此之少，如要致人于死地，三人中有两票就足够了。上世纪末，这种问题在俄国要由 12 名宣过誓的陪审员的多数票来决定。如果票数是一半对一半，问题就要以有利于被告者的结果解决。

刑法的历史命运是独特的。就其实质而言，它应同罪犯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它同大多数公民没有关系，只同少数犯罪分子有关系。但正是在这里，正是在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中，可以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实质性的东西。这里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对法律和人的合法利益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因为，如果这里“正常”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相信，所有地方都是正常的。反之也一样。正如我们的令人痛苦的教训所表明的，如果在这方面是目无法纪和专横枉法的话，那么社会就处在危险之中：一切都善恶不分，一切不取决于自己的善心和罪恶（更有甚者，诚实和单纯的人比狡猾和无耻的人受到更多的损害）。让我们提高警惕，让我们在刑事案件中严格注意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当然，为了严格遵守权利和竭力保护权利，有时会使罪犯借此隐藏下来。那就让他去吧。一个狡猾的贼漏网，总比每个人都象贼一样在房间里发抖要好得多。”这是亚历山大·赫尔岑说的。

……在“人民敌人”的诉讼案中出现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能看作是对审讯的“歪曲”和司法制度中的“缺陷”。这根本就不是审讯，这是“反法律行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过去吸取教训。现在已经在吸取教训。我们大家和每个人都应该吸取教训。要知道，我们今

天掌握着未来。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88

年第 7 期，1988 年 2 月 14 日。叶军译，曹特金校）

为什么会发生大清洗？

尤里·费奥法诺夫

是什么使我震惊……全然不久之前，正当大家读着苏联最高法院为无罪判决的人恢复名誉的通告，就在那辆人们都在沙沙作响地读报纸的电车上，我听到两个妇女的对话。谈的是流氓和吸毒者，正好前一天晚上电视播映了流氓和吸毒者的事。“这些人该关他们一辈子……”，“该碾成齑粉，可是他们却在医院治疗……”。说话者竟然毫不怀疑“碾成齑粉”是否合理。这种不假思索和随口而出的奴性道德从何而来？是从什么样的漩流深处来的？

在描述布哈林审判案的文章中也有这样的用语。只是这些话出自国家公诉人之口。用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揭露 50 年前的不公正的“法庭”，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仅仅是听听使神经兴奋的故事，而不是帮助每个人理解所发生事情的机会吗？

可是，无轨电车上的议论有什么呢……不久之前，法学家和记者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此前，《消息报》收到一封来自乌兹别克的信。有一个人被捕了。开庭审理前规定的一切拘留期限都已经过去了，可他仍在押……这与法制的原则相符吗？

立即会有人回答说。——您怎么啦，您希望一个惯偷或者可能是杀人犯的人，仅仅因为期限已过而被放走吗？

——关起来的不是小偷，而是一个无辜的人，他只是被怀疑偷盗。

——不应当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回答说。

法学家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的话：“在有些情况下，法律的形式上的要求可能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社会迫切需要相矛盾……”应该指出这本在报刊上不止一次被提到过的书：《苏联法律中的诉讼证据》（“法律出版社”，莫斯科 1941 年版，第 120 页）。作者是安·亚·维辛斯基院士。

如果认为，30 年代震撼国家的践踏法律行为的原因似乎仅仅在于维辛斯基对法制原则的歪曲，那将是天真的。可是，这一点也是原因！法律上的论证总是有份量的，即使它是伪证。

难于令人相信的是，列宁的朋友和战友们公开地，而且是组织严整、招摇过市地变成了

“人民的敌人”、“间谍”和“杀人犯”。显然，被迫害的人、他们的家属，亲近的战友和朋友是不可能听信愚蠢的谎言的，即使他们曾经被迫与“人民的敌人”断绝关系。可是其他的人呢？一个作家问道：“当你身临其境时，你能看得清吗？”或许这个作家说的对。

当时许多事物妨碍了对处于时代之中的自我的认识。不错，有斯大林，有个人迷信。但是，他并非是在真空中升高、自大并把残酷和专横变为常规的。无视法律的现象是逐渐地渗入我们生活的，尽管渗透得相当快。为什么人们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呢？

当你读到《托洛茨基右派反苏集团，的审判速记记录（它曾刊登出来以供公开使用）时，你会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大册速记记录稿共计 708 页充斥了这样的无稽之谈，如此粗制滥造的罪名，你会感到惊奇，审判组织者怎么会有胆量将所有这些拿到公开的会议上并且大量发表？从布哈林、李可夫等被称为领袖、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职位以来总共只过去十年，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他们在革命、国内战争和实施新经济政策中的功绩。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外交家、人民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突然变成了特务和杀人犯的刑事犯罪集团。这怎么可能呢？

是的。可是须知他们自己公开承认了一切。当着审判庭的公众，向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而且是何等地懊悔！我不必写出这个被告的名字，只把他的自供引证出来：“我像一只寻尸逐臭的乌鸦，钻进了各种与苏维埃政权作对的敌对集团”。被告成为他的原告的第一名助手。克·格·拉科夫斯基宣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供认，他每年直接从盖世太保领取 25 万马克。

正式加冕的“证据之王冠”把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完全弄糊涂了：可不是，“自己承认了”，还说什么呢？于是，审判的导演们将他们竭力掩盖的东西不客气地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这样的厚颜无耻也不再使任何人不安。请看例子。

尼·尼·克列斯克斯基曾试图使用自己向法庭说实话的权力，希望法庭听取。于是出现了他和维辛斯基的下述对话。

摘自 1938 年 3 月 2 日审判速记记录：

克：我在预审中做了伪供，因为我根据自己的体验以为，审判前我不能够毁掉我的这些口供。

维：而现在您想您能够毁掉它们吗？

克：重要的是我现在声明：我不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可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真话。

克：今天我说实话。

审判暂停。第二天继续。

摘自 1938 年 3 月 3 日审判速记记录。

克；昨天我受虚妄的耻辱感的驱使，一时冲动，未能在世界社会舆论面前说出实话：我一直在做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作。我请求法庭认定我的声明：我完完全全地承认自己在所有被控告的重大罪行上是有罪的。

维：我暂时没有要问的。

法庭主席瓦·乌尔里希：被告请坐。现在提审被告李可夫。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确认吗？

李：是的，我确认。

对于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所给予的教训是露骨的和显而易见的。他们已经知道，3 月 2 日夜里，即两次审判中间的间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克斯基的遭遇。所以，当看到不幸的格·费·格林科同志的"悔过的"言词时值得惊讶吗："对于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可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被告被揭穿时会引起庆幸的感情。

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我们最好是还其真相。要知道，甚至在克列斯京斯基那一幕过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尽管自己处境悲惨，仍试图保持尊严，并且有勇气与万能的原告争论。

在恢复名誉的决定公布之前，我在《共产党人》杂志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它与当前大众所注目的问题如此合拍，是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见解的。您读读这篇文章，将它与我们现在的情景对照一下，然后您再回想 1938 年 3 月，您便会觉得那些年代的悲剧如同身受。不过这是为了研究。

我仅仅是想再现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在那个法庭上的表现。那里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一切都按既定的脚本进行，而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告竭力帮助检察官对他们自己控告，竭力帮助法庭对他们自己审讯。当然，他们知道自己注定的命运。但是他们仍然……这种如此粗劣地炮制的闹剧究竟是如何排演的呢？

M·沙特罗夫在剧本《前进……前进……前进！》中提出一种说法：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他们为了彻底揭露反对派的"崇高目的"，在拯救亲近的人的虚幻的希望中，给还活着的自己穿上了寿衣。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文学表述有自己存在的权力。但是我觉得它终究不过是一种文学表述。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人们常常用各种诸如西藏尘埃这样的荒诞无稽的东西来解释忏悔……谈论催眠术……用内心矛盾来解释……'接我吧，东正教徒们，我是一个恶棍'……燃而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想，问题在于终究要避免说出即使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也难以承认的东西。

“我否认关于谋害列宁的指控，但我的反革命同伙（我是其首领），却企图毁掉列宁的事业，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可耻的自我诽谤吗？不，这是不至于彻底践踏自己，而又承认向导师和朋友下毒手的唯一可能的方案。是的，他承认所有归咎于他的罪行。一般地承认了。犹如“毁掉列宁的事业”。但是他坚持不承认强加于他的具体的行动。他“竭力”复辟资本主义，选择了战争和肢解苏联作为推翻苏联政府的手段；他曾是破坏、恐怖和特务活动的“组织者”。所有一般性质的指控他都承认。但他断然否认一点，即他是杀人犯和间谍。

但是，审判是公开的，指控必须有证明，必须向人民和世界公布。没有事实，没有具体行为是不行的。这在严格保密的特别会议上是可以的，宣读一下控诉书便可作出判决。而在这里则必须要有会响的炮弹。唉，可是这样的炮弹“检察官同志”并非总能得到的。

请看法庭辩论的例证。好，就让我们谈谈“宫廷政变”的例子吧。

布：我们这些右派阴谋家，大约到 1929—1930 年的时候，产生了国家政变的想法，但当时并没有去搞“宫廷政变”……

维：“宫廷政变”的提法指什么？

布：使用驻守克里姆林宫的兵力。

维：那末，如果不说“宫廷政变”，而说试图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不是更好吗？

布：不，说成武装起义不完全正确。武装起义是群众性的事情。

维：什么样的群众，你们没有任何群众。

布：所以，这不是起义。

维：有一群人协助的起义。

布：如果您愿意把一群人的起义定为起义……

人们曾经说，而且现在还在说：不管维辛斯基是什么人，作为一个犯罪学者和逻辑学家，他在这些审讯中确实表现出是有才气的。读一读他的发言和讯问的过程，会看到恶语连篇，逼压有力。然而那个无权的被告的智力要高出一筹，他非常了解跟他玩弄的无耻把戏。检察官必须证明：布哈林和他的难友想要肢解苏联，把乌克兰送给德国人，白俄罗斯送给波兰人，而远东则送给日本人。

布：如果其他人这样说，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维：您能否不用哲理回答我？

布：这不是哲理。

维：不要用哲学的词藻。

揭露这一点想必是指控的中心任务。卖身投靠外国情报机构，堕落成领取报酬的间谍，于是谁也不再表示同情，大家都会“清楚”，而一切都将证明是正当的。

许多被告已经承认是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机构的间谍。这位“党的宠儿”、列宁的朋友、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还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权威理论家，也应该变成这样的人。

维：被告布哈林，您承认自己犯有间谍罪吗？

布：我不承认。

维：被告李可夫，布哈林是否得到过什么有关这类活动的情报？

李：我与他没有谈过这件事……

维：请容许认为这是成立的（？！)：李可夫和布哈林知道背叛活动的关系存在，其中也包括间谍活动。这个结论得自于……

布：这样一来，就是说我知道某种东西是从哪里推断出来的。

维：我请求法庭向被告布哈林说明，他在这里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罪犯……

假如这是法庭而不是衙门，他们会向检察官解释，他是个检察官，不是法宫，怎么能在判决前就宣布一个人是“罪犯”。他会因不尊重法庭而被勒令住口的。但是，这里假如是法庭就好了……

维：我们在这里，在公开的无产阶级的法庭上询问您，我们在这里，当着全世界……在这个法庭上询问您，您是被什么情报机构招募的，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

布：根本没有。

维：我暂时对布哈林没有要问的了。

布哈林和李可夫不论打算承认什么，外国的情报机构反正都否认了。休庭后没有再问间谍问题。不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叙述了他们与托姆斯基打算如何“逮捕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如何筹划肢解苏联等等。

怎么能够认真地对待这样的“发明”呢？

按照一种奇异的逻辑，露骨的专横、预谋的戾也还是要寻求哲学的、历史的或法律的掩饰。放肆的暴虐势力总想看起来是和善的。缺乏罪证不能停止迫害。于是，为使他们承认，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手段都用上了。正像布哈林在审讯中说的，“被告的承认是中世纪法律

的原则”。

然而，问题在于：为法律所否认作为真正证据的承认，可惜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未失去其可信性。所以，就是现在，受过教育的法律学者，读了大学的课程，后来变成了审判官和检察官，往往把满腹经纶和现行法典一起推至脑后，问自己的对立面说：“你一承认就可以回家，要不然……”。我不想引用最近期间的报导，它们太多了。难道说现在有教养的法宫不是也不加任何分析地在判决书中写上：“被告在预审中的供词被认定是可靠的”？

有人会说，这是侮蔑性的比较。但可能有人知道，比较的侮蔑性最令人信服地证实蔑视法律原则的悲剧性。对法律原理的理论上的歪曲不能不变成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变成专横的根据。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我国对刑法进行了修改，改正了错误。法学的争论也见诸于报刊。二十大已经开过了，还留在人世的人已经“从那里”回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放弃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观点，仍把它当作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我们还需要去努力论证：在案件的客观真实性没有认定时审判是不能进行的，罪过没有得到证明就不是犯罪。我觉得，法学上的这些原理载入法律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当时没有去分析一下莫斯科审判案，而对苏联法律学曲解的全部症结就汇集于这些审判案中。

30 年代的非常法不是基于法制，而是基于口号。只要读一读审判速记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一根据多么脆弱，对于社会和人是多么危险。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避免用口号去代替法律。口号常常确实是诱人的，尽管其中隐藏着潜在的危险。

比如，当我们说；“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能溜掉”。谁会反对呢？目的是良好的。但是，作为一项实际任务的执行，目的的现实程度如何呢？让我们假定罪犯脱逃了。没有抓到。无论如何，要马上抓到罪犯。从美好的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侦破）中后来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坏事。人们会问：怎么，那就不要提出这样的目的吗？目的是对的。我们要提出这样的目的。但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压过法律。不能让它掩盖法制的主要原则：“任何一个无辜者都不能被判罪。无论何时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这样”。这既是目的，又是今天的现实的任务。对于每个法庭，每个检察官，每个民警局都是如此。要做到这点不需要任何花费和贵重的技术。没有确凿证据以前，必须存疑。法律也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司法的这一主要目的在我国仍旧处于次要的地位。使人遗憾的是，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而且在我们的法律观念中仍旧是：“给他们客气个什么……把他们碾成齑粉……”

这可能就是一度谁也不容许怀疑的时代的最沉重的遗产……在乌拉尔某城一个艺术铸造品博物馆中，我看到一把有镶饰的精制斧子。它是 1929 年或者 1930 年党代会的礼品。在斧刃的右边刻着“砍掉右倾”，左边刻着“砍掉左倾”，斧背上是“打击调和派”。这是呈现在社会中坚面前的一件象征性的礼品。甚至保持沉默都是危险的，那样行事是有罪的，要“打击调和派”呀。实质上，这是不许作任何一种选择，不允许哪怕出现选择的想法。它同样排除了怀疑的余地。因为选择只有基于怀疑才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更为压抑的环境中，举行了三次公开的莫斯科审判。正是这种环境和决定这种环境的气氛，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切能够发生。

现在，所谓《布哈林的遗嘱》已为人所知。它是布哈林真正的“最后陈述”。他的妻子把它背得烂熟。显然，它不可能具有文件的效力。速记记录中写入了他另外的正式的最后陈述。它对于法庭来说毫无意义，完全不能影响已经预先决定的判决。就是被告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仍归说话了。他全都招认，但实际上全都否认了（“我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要为破坏活动负责，尽管我不记得发出过进行破坏活动的指示”）；他把建立集团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时，对加于集团的罪过进行了嘲笑（“怎么可以断定集团是受法西斯情报机构之命组织的呢？这是在 1928 年哪！”），他在承认他应得到的最严厉的惩治时，仍希望真理的一天将会到来。

这一天到来了……他这个人的世纪令人惊奇地正好分成了两半：1888 年诞生，1938 年处死，1988 年又从虚无的世界回归。显而易见，他的著作将被研究和分析，看他哪里写得对，哪里不对。要弄清楚他的思想，也要弄清楚他的错误。这是自然的。我觉得，不自然的甚或令人难以置信的仅仅是：现在，当平反判决书的墨迹还未干之时，又出现了污蔑，这就是 4 月 6 日的《文学报》显然迫不及待地干出的事。

布哈林、李可夫等的审判案是最后一次公开的审判。此后“司法判决”全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就是在当时对这样做也会产生怀疑……

在党的二十大上，批判了那个时期无视法律的现象，废除了秘密法庭，通过了新的刑法。一切整顿就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出现无罪判决的人，虽然判决是遵从人们有目共睹的一切诉讼程序，也可以进行辩护和上诉。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电话授权”，“定制的案件”，“按指示办”的侦查。关于这些，立陶宛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阿利别尔塔斯·梅卢斯说得很生动：“现在我胸前戴着英雄勋章，但我也可能得到有期……”。

在公开性和改革的时期，审判工作恢复了法制：按命令草率从事的案子重新在审查，冤案在平反昭雪。但是，恢复一个无辜者的权利要遇到多么激烈的对抗，而这同时也是恢复法律本身的权利啊。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想：他既然在“那里”呆过，那就是说“有过”什么，“政府不会错的”。这不是什么日常用语。为了它法律和正义受到践踏。人们因此而遭受磨难。而且改革的真意也受到破坏，因为一切还在照老规矩、老方法，可以说“照老的教科书”去办。

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会谈到了法律的全面彻底的胜利。这一点暂时还不是事实，而是目标。而通向目标的道路看来将不是很平坦的。法制不仅仅是司法的问题。这也是公开性。这也是把民主作为生活准则加以确立的问题。并且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改变并培养人们的法律观念。最后这一点需要付出极其巨大的努力，而且显然需要不少时间。然而，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有向目标奋勇前进，不然的话，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行都是不可能的。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 年 4 月 10 日。康春林译

真理正在澄清

——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关于历史上充满矛盾的教训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原编者按）党的全国第 19 次代表会议正在临 近。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 教授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被选为出 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同他的这次谈话涉及到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以及我们应该从过去得出的结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个需要深刻思考的复杂的题目，处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内。

——1985 年四月全会所选择的方针是十分必需的。除了革命性的改革以外，另一种合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相当一致。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什么方式来赢得这种转变，却是摆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面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革新的中心点，而如果准确些说应是列宁主义复兴的中心点，在我看来在于下列两个方面。首先，经济的彻底改善；其次，广泛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真正的人民主权。它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苏联人的权利的价值，特别是会提高他对社会、对历史和对自己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通读祖国历史的所有篇章对解决革新的问题具有不小的意义。遗憾的是，人们对这暂时还所知甚少。历史——这是人民的记忆。它使人们可能真实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这种了解是创建需要的事物所必需的。真理正在澄清，虽然经常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剧烈的和长期的……

——您在自己的书里是否写到这些？

——是的，我现在正在写作《胜利与悲剧》一书，讲的可能是苏联历史上最充满矛盾的时期——斯大林专权的时期。我力图既分析斯大林个人的个性，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源，也分析“恺撒主义”和强加于党和人民的不可思议的迫害的原因，力图搞清 20 至 40 年代胜利和悲剧的教训。我想要说明，一个人的胜利是怎样转变为整个人民的悲剧的。

——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大力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并指出克服它的方法以后，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但遗憾的是，我国人民对很多事情了解得仍很不彻底。用今天的观点看，对斯大林的个性，对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避免象个人迷信这样丑陋的现象呢？《劳动报》的很多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向编辑部寻求解答。

——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有一个很睿智的思想：历史学家有权用自己的假设与已经发生了的事变相对立。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完全不是必定如此的，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考虑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的欲望，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末甚至这个能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大概就有可能使我们避免后来发生的给人民心灵造成流血创伤的许多事件。如果伊里奇遗留下来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基础（其中包括，譬如，确定总书记的任期）能够得到发展，如果权力的交接、监督、选举、报告工作和最广泛的民主化的机制能够得以实现，象列宁遗言嘱咐的那样，那么，我想，就谈不到任何法制的破坏。专权的实质在于民主不完善的体制，在于缺乏避免滥用权力的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在于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当

然，也还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外部原因：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鼓励了集权和限制民主。

有时人们会说，我们与斯大林一道“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建设”，“做成了”很多事情。当然，否定下列情况是荒唐的：我们在建设强大的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尽管存在着扭曲、存在着那个年代的法制破坏，社会主义在上次大战中，在很多其他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但我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完成的建设和做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会更多一些，而付出鲜血和损失会更少。只是凭借着十月革命留下的巨大的纯真的精神财富才在斯大林恐怖横行的时期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价值。

例如，我们谈谈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取得胜利是由于斯大林。而事实是这样的。在战争前夕，每一个军区的指挥员，几乎一半的军长和师长遭到镇压。从 1937 年 5 月 1 日到 1938 年 9 月 1 日，几乎有 40000 名红军中高级指挥员被消灭。如果说排级指挥员可以在不少于 6 个月的时间内被培训，而这个期限也只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的做法，那么，为了培养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当时马上就由一些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人指挥我们的集团军和师。很多人表现出色，但这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流血啊！我还没有说人的生命本身无可挽回的价值啦……

——而他们思想的活力又怎样呢？

——是的，牺牲的不仅是人，而且常常还有思想。一般来说应该指出，在 30 年代，我国的军事理论思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图哈切夫斯基、伊谢尔松和其他一系列理论家提出了对那个时代来说很先进的思思，例如，机动战、积极防御、使用大批坦克等。

众所周知，在战争前夜，斯大林曾三次审查国家的防御计划。但总书记又两次否定了它。为什么？这是因为总参谋部认为，主要打击将来自西部方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最近的道路。而斯大林从自己的国内战争期间的观点出发强迫修改计划。主要打击方向被确定在南部地区。这导致部队配置方面的变化，力量没有被集中在那些需要的方向上。在后来，在 1942 年，斯大林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这次正相反”。当时，由于他的坚持，部队被集中在西部方向，而希特勒军队恰好突然冲向南部的高加索……你们看，这就是来来的大元帅战略天才的代价。是的，在 1943 年和后来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失误，但这不只是他的功劳。而是整个最高指挥机关的功劳。

还存在着政治错误。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仍不相信希特勒将要进犯我们国家。在 6 月 22 日前的一星期内，他说战争至少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大有可能爆发，虽然他掌握有来自侦察人员、外交官和投诚人员关于相反情况的所有材料。大家知道的塔斯社 6 月 14 日的可悲的声明，与其说迷惑了法西斯分子，不如说迷惑了苏联人民，这个声明追求的是十分具体的目标：召唤希特勒举行新的谈判，以为谈判可以拖延下去，6 月、7 月……，而到 8 月，法西斯分子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冬季临近了。但在这些问题上，希特勒不比斯大林了解得差，他没有吞食这个诱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怎么回事？康•西蒙诺夫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中谈到这个条约，曾在人民中间引起困惑。直到现在对这个条约还存在着相反的态度。

这是一个错误呢，还是相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步骤？

——确实，直到今天，这个条约仍有很多批评家。特别是在国外。很多人认为，它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是对西方的背叛行为。然而，我想，真理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在从很多方面谴责斯大林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拖延战争，是正确的。他为此做了很多事，虽然在方法上常常是错误的。不应忘记，波兰和西方国家在我们之前已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我们首先在这里开辟了道路。要知道我们曾建议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建议被否定了。斯大林与波兰大使举行过会谈，当时谈到允许我国军队通过波德边界来保卫波兰安全，这种安全是与我国的安全相关的。但遭到了拒绝。

因此，虽然这个条约看起来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它却在使战争有所推迟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真正不可原谅的失误是在一个月后即 9 月 28 日作出的。还是在莫斯科，还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南（斯大林也出席了）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只要想想它的名称就够了，与法西斯德国的友好条约。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注释了，因为所有这些看起来是极端亵渎性的。

因而，当时希特勒感觉到，只要不爆发战争，斯大林准备作任何让步。他开始变得更加无耻。《友好条约》使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迷失了方向。我们在国际上变得极其孤立。实际上，这种在手段选择上的不讲道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特点）导致了与他设想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希特勒得到了鼓励，反法西斯力量精神颓丧，自己的道德形象受到损害。所有这些在战争进程中都有反映。

——斯大林本人是否在事后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真正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在您看来，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他变得更“平凡”了，“神圣的方面”大概消失了。他感觉到，他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斯大林变得，如果可以对他用这个词的话，更普通了。他感觉到，不仅我们的国家，而且他本人能否存在，这个问题仅仅取决于领导接近人民，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虽然在胜利以后他重又变得“唯我独尊”了。

一般说来这个人心理（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很不同异常。例如，他无限地信任纸面上的东西。如果某个材料向他表明，某某是敌人，通常他总是相信。几乎找不到这种情况，他否定了告密，把它当做虚假的、幼稚的，杜撰的或者完全是挑拨性东西。对书面材料、机构、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的偏爱，大概是斯大林的心理特点之一。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隐讳感情的人，很多人力图猜测他的意见。只有少数人成功。例如，贝利亚的特点是，他比别人更善于猜测，并因此自鸣得意地说，“他想的和斯大林想的一样”。但一般说来“领袖”通常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也要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当斯大林企图达到某种大的目标时，那就要较长时间地、谨慎地、用小步来走向它。但在这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坚定和始终如一，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特别是在权力的角逐中和在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斗争中更是如此。

我相信，总体说来，这个人的心理特征首先在于，就他的智慧和性格来说，他是个教条

主义者。他认为下列情况是完全自然的，由于信奉马列主义，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就都是终极真理。请试着阅读斯大林的任何一部大的著作吧，他经常引用自己的话。同时，引文已经被看做是经典的、无可争辩的、和绝对正确的。他只是对它们作了些解释。

同时，斯大林在内心深处又是孤独的。请想象一下这样的专制君主，没有人和他争辩，不需向谁证明什么，解释什么，也不需向谁道歉。无论他说什么，立即都会成为“伟大的、天才的、无以复加的”。

斯大林的智慧尽管是合理的、机智的和狡诈的，看来并没有失去实际的考虑，但他终究只是个理论上的通俗解说者。虽然他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顺便插一句，这部著作不是他写作的），他并不懂政治经济学。哲学更使斯大林感到困难。当然，他有一本著作叫做《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一部粗糙的书。斯大林不可能使自己表现得象个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家，譬如说，像布哈林那样。布哈林常提出独创性的思想，尽管有时不是无可争议的，有时是错误的。在 20 年代，一些来自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教授每周两三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讲课，它的正式的说法叫咨询。著名的哲学家斯滕也教过斯大林，他拟订了一个提纲，向斯大林介绍古典哲学，介绍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著作。然而，这位从前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表现出对理解这样复杂的材料缺乏训练。在 30 年代，斯滕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斯大林成了列宁主义的积极的通俗解说者。他把列宁的理论以简单化的、粗陋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被如此密集的引文所取代，以致于如果“抖动”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只留下标点符号。说实在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家。这个具有教义问答式思维的人喜欢把一切都按照格式来罗列。机会主义的“四个特点”，红军的“三个特点”，生产的“四个特点”，托洛茨基主义的若干特点：一切都按格式。但这里没有辩证法的深刻性，这只会促进教条主义思维。

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才能的演员，他善于扮演“民族之父”、“统帅”和“领导者”的角色。在人们面前，他通常不表现出自己残忍的品性。但例如只要有一次空军司令雷恰戈夫对较高的事故率表达了与“领袖”不同的意见，刚过一星期他就永远地消失了。甚至与斯大林一起共事 20 多年的最亲密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也成了斯大林惩罚机器的牺牲品。根据贝利亚的决定，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被逮捕了。甚至不允许她写信。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跪在地上请求斯大林赦免她，发誓说，有 3 个孩子的她不可能是间谍，“领袖”还是不为所动，只是说，一切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的，这件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我发现有一次斯大林赦免了一个人。在每周呈报给斯大林的由维辛斯基和乌尔利希签署的有关死刑判决数量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指出，一个被判刑的人不适宜枪毙，因为他得了癌症，治愈无望。斯大林写了批示：“同意”……

——斯大林周围是些怎样的人？您怎样看待他们的个人品质和对列宁的思想和原则的忠诚程度？

——我想，这些人的绝大多数盲目地相信斯大林。这是些毫无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完全接受了斯大林信奉的官僚式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和斯大林一样认为，社会主义

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被建成的，而对专政他们只承认一个方面，即暴力。但要知道暴力不是唯一的方面，也完全不是主要的方面。

一个就其实质来说并不具备某种深湛的专业基础的人领导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达 30 年之久。他实际上甚至没有专业。这个人既不真正了解工人的生活，也不真正了解农民的生活。除了极偶然的例外，斯大林没有到过集体农庄、工厂和前线。他周围的很多人也是同样的人——无怪乎我们当时感受到只受过中学教育，但很熟悉革命词藻的“人民院士”那样多。概而言之，很多当时的“领袖”不了解真正的工人的生活。例如，同一个莫洛托夫毕业于革命前的实科中学，实际上没有生产实践。马林科夫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表现得象个技术秘书。卡阿诺维奇是个皮鞋匠。

斯大林本人为自己选择了周围的人。到 30 年代末，列宁时代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只有斯大林一个还活着，这决不是偶然的。所有其他人都被当做“人民的敌人”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这个极端狡猾、诡诈、好记仇的人就按照独裁者的古老原则行事。他清除了那些了解他革命前和革命年代情况的人，而提拔了那些在某些事情上（更好的是那些在所有方面）都从他那儿得到好处的人。要知道，在革命时期斯大林在列宁的大军中处于第 10 至 15 排的位置。我认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坚定的和有毅力的执行者。但后来他采用双手推开所有的人，从队伍的深处冲了出来，站到了队伍的第一排，再后来又领导了这支队伍。这个上升的过程是很快的。如果有人 1917 年在图鲁汉斯克对斯大林说，过 5 至 6 年后他会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大概他本人都会认为是不高明的玩笑。

有这样一件事使我感到惊讶。在写书的时候，我重新通读了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的第 11 版，这是在 1945 年印行的。文集中有他在 20 和 30 年代的一些讲话。他在讲话中进行辩驳，辱骂、批判和大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克里斯京斯基和其他许多人，请注意，在当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在了，他把他们都消灭了！但在 1945 年出版书时，这些话就象在“当时”说得一样，——就象他和从前一样地在对他们这些活人说话。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可怕；斯大林在继续和影子作战。破坏法制的机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象从前一样要求不断往它的炉膛里送牺牲者——活的，甚至是死的。

——难道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个狂妄地把自己看作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者的人吗？

——这里有几个方面。首先，不能否认，斯大林在群众通常的意识中，他个人成了社会主义的体现。他使自己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实际上，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一无例外地成了官方的路线，被所有人理解为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因此，同他进行斗争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有些人（当然有这样的人）曾感觉到他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和罪行。但是，企图指出这一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会被当做社会主义的敌人。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使我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学者内心更加不安。在最困难的和最异常的状况下，一个人总会有表现自己良心的机会。那怕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明白，谁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全会上，代表大会上和大规模的会议上挺身而出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你在干什么？难道这些人是敌人？为什么恐怖的斧钺落到了我们党的优秀成员的头上，落到了列宁的近卫军头上？”这样的人就会被消灭。可以设想，这种良心的勇气不会不留下

痕迹的，因为党会知道这样的发言。大概，这不能制止镇压，特别在它的后期。但无论如何存在永久的价值——真理、善良、高尚和荣誉。然而，表现这些品质的机会，这种良心的机会却很少被利用。相反，产生害怕告密，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气氛。所有这一切又浓密地贯穿着对领袖的赞美……

当然，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有勇气讲出真理，讲出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利用良心的机会那该有多好啊！归根结底，个人迷信不只是斯大林自己建立起来的，其他人、他周围的建立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对此也负有责任。因为，如果说人民群众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个概念不是抽象的？这个作用不仅表现在“归根结底”的作用上，而且表现在表达对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不符合的现象的自己的集体态度的能力上。

——您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哪些特点，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在研究祖国历史上如此矛盾的现象时您给自己提出了什么任务？

——我想，如果委托某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者由科学院院士组成的有声望的集体来写作此书，它一定会写得更出色，但不管怎样对它的看法照样会是矛盾的。对斯大林的不同观点现在还存在着。只有被全面地研究了的真实情况（这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才会形成对这个人物和与他相关的事情的完整的态度。因此，我不抱任何幻想。在我的想法中出发点只有一个。在文献的基础上讲述真理。我不想讨好任何人，不去迎合任何人的口味。我不是斯大林分子，也不是反斯大林分子，而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应该记述我国历史的盾牌上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应该用真理来修补。与这个人物的“胜利”相联系的人民的悲剧会永远提醒我们。我想，我们越是迅速地进入这个人在过去的谬误的深处，对我们所有人的将来就越好。

当然，这会触动很多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什么，难道大家过去的劳动、工作、干的活和完成的事都是徒劳的了，不，不是徒劳的。过去所作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祖国这一切都会留在我们的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潜力之中。我在很多档案馆，包括党的、中央的、军队的和法律的档案馆里工作过。与数十人（如果不说数百人的话）谈过话。这些人本人了解斯大林。同时，我的书不是政治传记，而是政治肖像。我力图在文献、资料和证明材料的基础上，说出自己对过去的判断、思考和想法。

——在出现大量关于我国历史的文章的今天，是否存在着为填补“空白”表现出急躁和浮浅态度的危险呢？因为对历史的分析需要深刻的分析和专门知识……

——我和很多人一样，一度曾对斯大林很迷恋。在事后的今天我不想说，好象我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罪人。不是这样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曾认为斯大林是个特别高大的人物，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个领袖等等。我现在记得，在他逝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尉官很真诚地为之痛苦，为之哭泣在今天这是很难理解的。但社会意识的洞察力是必要的，它已经来得太迟了。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人民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但人民只有在有真正的领导人的时候才能表现出自己的权力和意志。只是这些领导人必须置于这样的条件下，即要实现人民对他们的完整的和深刻的监督。换句话说，要在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条件下。

一言以蔽之，领导者、群众、人民、党应该在真正民主的结构中深深地相互联系。我很高兴，我很快将成为一次人民集会的参加者，这次集会将为确立这种结构提供希望。我们不应该错过表现良心的历史机会。如果了解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并没有结束，未来已经开始。

（A・齐加诺夫采访）